毛澤東的大饑荒

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

馮客 著

2011年度塞繆爾·約翰遜大獎獲得者

歷史學家馮客不僅披露了鮮爲人知的真實歷史紀錄，而且他以精湛的文筆將這些事實構建成一個難以磨滅的故事。 ——杰弗里·凱思，《基督教箴言報》，2010年11月2日

毛澤東的大饑荒

1958–1962 年的中國浩劫史

馮 客 著

郭文襄
盧蜀萍 譯
陳山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by Frank Dikötter

Translated by
Guo Wenxiang, Lu Shuping, Chen Shan

新世紀出版社
New Century Press

書名：　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 年的中國浩劫史
作者：　馮客
譯者：　郭文襄、盧蜀萍、陳山
特約編輯：　莫懷遠
特約咨詢：　禹一裔
封面照片：　中國數字時代
封面設計：　Renee Chiang
出版社：　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聯絡方式：　editors@newcenturymc.com
國際統一書號：　978-988-19430-0-2
定價：　港幣 128 圓

香港印刷，2011 年 9 月。

版權聲明
沒有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的書面同意，本書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媒介中複製或傳播。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English Title: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Author:　Frank Dikötter
Chinese Translation:　Guo Wenxiang, Lu Shuping, Chen Shan
Special Editor:　Mo Huaiyuan
Special Consultant:　Yu Yiyi
Design, Layout
and Production:　Renee Chiang
Publisher: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editors@newcenturymc.com
ISBN:　978-988-19430-0-2
Price:　HK $128

First printed in Hong Kong, September 2011.

Copyright ©2011 by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atsoever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Cover Photo (foreground): China Digital Times, Berkeley, CA, USA
Photos inside book: Brian Brake/Museum of New Zealand Te Papa Tongarewa(O.000617) (picture 2).
Every reasonable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trace and contact copyright holders of material reproduced in this book. To the extent that a copyright holder could not be found or an inadvertent error was made, the publisher stands ready to make corrections.

目錄

中文版出版前言 1
作者原序 3
大事年表 10

第一篇 追逐烏托邦

1 兩個對手 15
2 賭局開場 22
3 整肅隊伍 27
4 吹響號角 36
5 衛星上天 44
6 鳴炮發令 51
7 人民公社 54
8 大煉鋼鐵 61

第二篇 穿越死亡谷

9 警訊乍現 69
10 徵購狂潮 74
11 衝昏頭腦 83
12 真理死了 88
13 殘酷鬥爭 96
14 中蘇分歧 99
15 進口洋麵 103
16 尋找出路 110

第三篇 毀滅

17 毀了農業 119
18 毀了工業 135
19 毀了貿易 143
20 毀了住房 150
21 毀了自然 159

第四篇 求生百態

22 餓鄉狂宴 175
23 上欺下騙 180
24 小偷小摸 189
25 偉大領袖 195
26 鋌而走險 203
27 背鄉離井 208

第五篇 弱勢群體

28 兒童 221
29 婦女 230
30 老人 236

第六篇 死因

31 事故 241
32 疾病 245
33 集中營 257
34 暴力 262
35 恐怖地 274
36 人吃人 287
37 最終計數 291

結語 301
關於《引文來源及參考書目》的說明 304
引文來源及參考書目 313
註釋 325

中文版出版前言

馮客教授通過數以千計的官方文件，對 1958-1962 年中國的大饑荒進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從而為研究現代中國的這段歷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書的副題是「1958-1962 年的中國浩劫史」。由於把文革當作「史無前例的浩劫」似乎已被視為定論，提出中國此前已經陷入過一次絕不比文革好受的浩劫，似乎不可思議。但是不幸的是，事實如此。第二次（1966-1976 年的）文革浩劫並不「空前」，儘管它使幾千萬人在飛來橫禍中挨鬥；第一次（1958-1962 年的）浩劫倒真的是空前的，它把幾千萬人活活餓死。這兩次接踵而至的浩劫惡果都是直接由全體中國人民承擔的。

馮客教授把大饑荒定位為中國現代史的核心，這是史家的卓識。的確，毛澤東及其戰友們在 1958 年前所確立的一切組織、制度和大政方針，他們在內政外交各方面所作出的全部努力，是「因」；而大饑荒，則是不依他們的意志而收穫的「果」。接著，大饑荒則變成了「因」，文革又是毛澤東不惜一切代價必欲奪取的「果」。隨之而來的，是整個中國社會「瀕於崩潰的邊緣」。

不研究大饑荒就無法瞭解現代中國。本著這樣的認識，本社榮幸地把馮客教授這部力作呈獻給華語世界的讀者們。限於學力和時間，中譯本的缺點在所難免，歡迎方家指正。

作者原序

1958-1962 年間，中國陷入了人間地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帶領全國投入瘋狂的大躍進，企圖在十五年之內趕上並超過英國。毛澤東認為，中國有廣大的資源，即數以億計的勞動力，足以一舉飛越他的競爭對手。他沒有仿照蘇聯單一發展工業的模式，而是「兩條腿走路」：發動廣大農民同時改造農業和工業，把經濟落後的現狀，轉變為物質極大豐富的共產主義社會。為了追求烏托邦天堂，一切都集體化了，把農民集中在龐大的公社裏共同生產勞作，這些公社就是共產主義的試驗性標誌。農民被剝奪了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家園，他們的田地，他們的財產和他們的生計。食物由集體食堂根據工分按勺分配，於是就成為迫使人們服從黨的領導的武器。多達一半的農業勞動力被迫投入大修水利的群衆運動，這些大規模的蓄水工程的所在地往往離家很遠，勞動者必須在那裏長時間地連續工作，缺乏足夠的食物和休息。這場實驗最終為國家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災難，奪走了數千萬人的性命。

相比同類的災難——例如波爾布特、希特勒或者斯大林統治時期的災難——發生在中國的情形有所不同，即，大躍進期間發生的災難的真正規模至今鮮為人知。因為長期以來，共產黨的檔案是不公開的，是機密，只有極少數持有證明信的最受信任的歷史學家才能看到。但是最近，新檔案法出臺，大量檔案資料得以向專業的歷史學家開放，這就使得學者們對於毛澤東時代的研究能夠較為深入。本書參考的檔案文件多達一千餘份，歷經幾年收集，從數十個黨的檔案館中遴選，包括位於北京的外交部，還有來自河北、山東、甘肅、湖北、

湖南、浙江、四川、貴州、雲南、廣東等省的材料，分佈在全國不同地區的市縣檔案館，行政級別雖然較低，但其資料同樣珍貴。收集到的材料有公安部門的機密報告，黨內高層會議的詳細紀錄，未經刪節的重要領導人講話，農村工作研究，大規模死人事件的分析，對死亡數百萬人負有責任的幹部們的檢討，大躍進晚期派去的特別小組對饑荒真實程度的調查，農民抵制集體化運動的綜合報告，秘密意見調查，以及普通群眾的上訪信等等。

這些浩瀚詳細的卷宗推翻了我們對大躍進的理解。例如，關於最終的死亡人數，迄今為止的研究者只能根據官方的人口統計數據下結論，其中包括 1953、1964 和 1982 年的人口普查數據。他們估計，非正常死亡人數在一千五百萬到三千二百萬之間。但根據公安部門同期整理的報告，以及大躍進最後幾個月內中共彙編的大量秘密報告顯示，上述數字是遠遠不足的，災難的實際程度要嚴重得多：從 1958 到 1962 年間至少有四千五百萬人非正常死亡。

「饑荒」，或「大饑荒」，這兩個詞常被用於形容毛澤東時代那四五個年頭，但它無法概括過激的集體化運動所導致的各種死亡情況。同樣，不負責任的「饑荒」二字有助於形成一種流行的觀點，即死亡是由於經濟計劃匆匆上馬、執行不善的無心之失。通常也不會將毛澤東、大躍進與大屠殺聯繫起來。通常認為，中國當時的情況和緩得多，這是沾了柬埔寨或者蘇聯的浩劫的光，與二者相比仿佛如此。但本書披露了新的證據，顯示大躍進期間高壓、恐怖和制度性暴力無處不在。這歸功於中共自己匯總的極盡詳細的報告，我們從中推斷出，1958-1962 年間，粗略估計有 6% 到 8% 的死者是遭酷刑致死或直接處決的——僅此一項至少有兩百五十萬人。至於其他受害者，有的是被有意剋扣食物而餓死的，還有許多死於衰老病弱或喪失勞動力——因為不勞動就無法得到維持生命的食物。被故意整死的人，有的因為富裕，有的因為幹勁不足，有的因為直言不諱，還有的僅僅是莫名緣由

不討食堂掌勺人的喜歡。當地幹部出於壓力，千方百計迎合上面下達的指標，只抓數字，不顧人命，間接導致不計其數的人因此喪生。

物質極大豐富的空頭支票，不僅造成人類歷史上最慘重、規模最大的死亡，還給農業、貿易、工業和交通帶來前所未有的破壞。鋼鐵產量被視爲經濟發展的神奇標誌，於是鍋碗瓢盆和農具都被扔進後院的熔爐以增加鐵水的產量。興辦萬豬場本來是讓家家戶戶有肉吃的偉大宏圖，但事與願違，牲畜數目驟減，不光因為大量宰殺供應國外，還因爲是成批牲畜病餓而死。原材料和資源隨意配置，加之工廠領導們為了增產無視生產規程，使浪費越來越嚴重。人人都在偷工減料，盲目追求更高產量。生產出來的劣質產品堆積在鐵路兩邊如同廢物。腐敗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根纖維，從醬油到水壩一起變質。交通系統陷入停滯，最終全面癱瘓，再也無法負荷計劃經濟的需求。價值上千萬元的貨品堆積在食堂、宿舍甚至是馬路上，就此爛掉或者生銹。浪費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穀物堆積在塵土飛揚的阡陌之間，而人們則在啃樹根或者泥巴果腹。

本書同樣記錄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如何造成人類歷史上對財產的最大程度的破壞——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任何一次轟炸。40%的民房變成瓦礫，有的被推倒，用來製造肥料、建設食堂、安置農民、修建公路、留出空間創建更美好的明天，甚至什麼都不為，單單為了懲罰住在房子裏的居民。自然界也未能倖免。我們永遠無從得知大躍進期間究竟減少了多少森林面積，我們知道的是，在某些省，長期過度砍伐所毀掉的樹林高達一半。河流和水道同樣遭殃：水壩和運河遍佈全國，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參與修建，耗掉巨大的人力和財力，絕大多數毫無用場，反而成為禍患，導致泥石滑坡，河流淤積，土地鹽鹼化以及洪水氾濫。

因此，本書並不局限於論述饑荒本身。它披露了許多災難的細節，詳細記下毛澤東如何在一個瀕臨崩潰的社會和政治制度上建立[illegible]

己的威信。隨著災難的展開，毛澤東對批評自己的人殘酷打擊，以維護自己作為中共領袖的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饑荒結束之後，形成了一些對毛不滿的新的派系：為了牢牢把握政權，毛澤東不得不發動文化大革命，將整個國家搞得天翻地覆。大躍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關鍵的事件。若想真正瞭解共產中國，必須將大躍進放在整個毛澤東統治時代的核心位置來考量。從更宏觀的角度說，現代社會致力於如何在自由和制度之間尋找平衡；而發生在那個時期的災難，則時刻提醒人們：把國家干預當作解決社會矛盾的良藥，實在是錯上加錯。

* * *

本書提供了新的線索，說明一黨制政體下權力如何運轉。政治學家研究大躍進背後的政治，都是基於官方聲明、半官方文件或者文化大革命時期流傳的紅衛兵材料，但這些經過審查刪剪的資料無法透露內幕。人們無法完整地瞭解核心領導人的真實的所言所為，除非北京的中共中央檔案向研究者開放。這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是不可能的。但在省級檔案中可以找到許多關鍵性會議的紀要，因為地方幹部經常參加重要的黨內會議，以隨時領會北京的領導意圖。這些檔案披露了領導層的另一面：隨著一些極機密的會議內容逐步為人所知，我們看到中共內部成員之間的勾心鬥角互相傾軋。其中毛澤東的面目很難令人恭維，與他精心樹立的公眾形象相差甚遠：談話漫無邊際，老子天下第一，沉湎於於陳年瑣屑，開會時擅長虛聲恫嚇，最重要的是，他無視人民死活。

我們知道，是毛澤東一手策劃了大躍進，因此對於此後的災難，負有主要責任。[1] 為了實現目標，他使出渾身解數，協商、哄騙、煽動他的同僚，有時還要折磨或者迫害他們。他不像斯大林，不是把他的對手投入地牢處決，但他有權罷他們的官，撤他們的職——作為黨內的最高統治者，他還有其他許多特權。趕超英國的運動是毛澤東發

起的，幾年後他勉為其難地允許他的同僚重新採取較為和緩的經濟發展政策，大躍進才算壽終正寢。但如果劉少奇和周恩來這兩位權勢僅次於他的領導人帶頭反對的話，他也不可能一意孤行。劉周二人輪番驅策黨內其他高幹支持毛，由此形成的利益鏈和派系聯盟一直深入到基層農村——本書對此首次作了記錄。黨內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使表現一般的幹部被撤職，而強橫霸道的角色則借助於從北京颳出的極端過激主義的狂風，橫行不法。

本書最重要的工作是，將這場災難的兩個層面結合起來分析，在此之前的研究都將兩方面孤立起來。我們必須把中共權力中心——中南海——內發生的事件，和普通百姓的遭遇結合起來。除了個別基於訪談的農村調查報告，根本沒有任何關於毛澤東時代的社會史，更罔論大饑荒了。[2] 正如檔案中的新證據所顯示的，這場災難遠遠不能只歸咎於毛澤東一人。中共彙編的大量文獻展示了該黨統治下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些文件顛覆了老百姓僅僅是受害者的觀念。儘管共產黨對內對外都在宣傳本制度的穩定有序，但它從來沒有能力把它制定的宏偉藍圖成功地實施過，因爲總是遭到這樣那樣的隱蔽的抵制和顛覆，這種抵制和顛覆在任何一個民選政府的社會中都是聞所未聞的。和有民選政府的社會相反，在實行嚴酷紀律的共產社會裏，決策層的錯誤導致整個社會機器發生故障陷入停頓。從檔案和訪談中暴露出來的，是個正在解體的社會，是個人自為戰，但憑本能求生，不擇手段的社會。所以，正是極端激進的集體化運動本身起着破壞作用，迫使各階層的人大家都想方設法規避、削弱或者利用中央（興公滅私的）政策，暗中演化成（極度自私自利的）利益驅動，而這正是中共致力消滅的對象。隨著饑荒的蔓延，普通人要想求生，必須越來越依賴於各種反常的手段，諸如撒謊蠱惑、私藏欺瞞、行騙偷竊、巧取豪奪、玩弄謀術，諸如此類，和國家周旋。正如羅伯特・賽韋斯（Robert Service）所指出的，在蘇聯，這些現象並沒有使國家機器停止運轉，

反而像潤滑油一樣防止整個制度完全陷入停頓。[3]「純潔無私的」共產主義政體，不可能提供足夠的動力推動人民合作，而沒有一定程度的利益驅動，它只能走向毀滅。共產黨真想長久維護其統治地位，就得時不時地違反自己的共產綱領。

只有反抗，才能生存。從農民私藏糧食到地方幹部造假賬，群眾發明了種種求生存的方法，同時也延長了政權的壽命，從而成為制度的一部分。混亂是共產主義者的生存方式。人們靠說謊求生存，結果是信息被一路篡改到黨的主席那裏。計劃經濟需要大量錄入精確的數據，然而在每一個層面，目標是失真的，數據被誇大，和地方利益相衝突的政策則不被理睬。在求生的驅使下，個人創造性和批判性的思維都必須被壓制，終于形成了長期的封閉僵化。

有些歷史學家會把這種生存行為解釋為「抵抗」的證據，或者是「農民」反抗「國家」的「弱者的武器」。但是各個社會階層都有自己的生存技巧。如果大饑荒期間從上到下各式人等偷竊糧食都算「抵抗」行為的話，這個黨早該垮台了。乍一看，普通百姓的抵抗佔據道義上的優勢，這種抵抗文化很容易被賦予光榮色彩。實際上，面對有限的食物，一個人吃飽往往意味著另一個人挨餓。農民把糧食藏起來，城裏的工人就沒有飯吃。這個工廠的職工在麵粉裏摻沙子，到頭來總會有人吃進嘴裏。那不過是絕境之下的生存方式，不能把它浪漫化，就好像不能將世界看成非黑即白。事實是，集體化從不同角度逼迫每一個人做出艱難的道義選擇。墮落一旦成為習慣，勢必導致大規模的破壞。普里莫・列維（Primo Levi）在關於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回憶錄中提到，倖存者很少是英雄：在一個奉行弱肉強食原則的世界裏，誰把自己凌駕於他人之上，就意味著他的道德觀已經蛻變。列維在《被淹沒的和被拯救的（*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一書中有個灰色地帶，描寫幾個同住的人，為了獲得一份額外的食物，不得不背叛自己的倫理道德，以求生存。他盡量不評判，只敘事，層層展現集中營的日常生

活。這也是本書的主旨之一：讓讀者理解大災大難期間人類行為的複雜性。中共檔案首次使我們能夠進一步瞭解半個世紀之前人們所做的艱難選擇——無論是最高決策者，還是遠離北京的茅屋裏的饑餓的農家。

* * *

本書前兩部分考察大躍進是怎樣展開的，背後的原因是什麼，確認幾個關鍵的轉折點，詳細說明千百萬人的命運如何被寥寥幾個最高領導人的決定所改變。第三部分考察破壞的程度，從農業、工業、貿易、住宅到自然環境。第四部分展示宏偉的藍圖如何在普通百姓的生存鬥爭中變形，其後果沒有人預料到，也很少有人完全認可。城裏的工人偷竊、怠工或者蓄意破壞計劃經濟；農民則採取形形色色的手段以保命，從直接吃地裏的青苗，到背鄉離井逃荒活命。還有人搶糧倉、縱火燒黨委辦公室、襲擊貨運列車，偶爾還組織起來，武裝對抗政權。但在森嚴的社會等級制度下，人民處於最底層，他們反抗求生的能力是極其有限的。其中有些人相對更加脆弱，第五部分關注的就是兒童、婦女和老人的狀況。最後，第六部分試圖分析人們的致死之由，從意外事故、疾病、折磨、被謀殺、到絕食自殺。本書最後《關於引文來源及參考書目的說明》較為細緻地解釋了從檔案文件中取證的情況。

大事年表

1949 年

中國共產黨征服了大陸，並于十月一日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戰敗的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委員長暫安於臺灣島。十二月，毛澤東動身前往莫斯科以尋求同蘇聯締結戰略同盟和得到斯大林的援助。

1950 年 10 月

中國介入朝鮮戰爭。

1953 年 3 月

斯大林死。

1955 年秋至 1956 年春

毛澤東不滿經濟發展速度緩慢，而加速推動農村的集體化和大幅度增加糧食，棉花，煤炭和鋼鐵的生產。他的「社會主義高潮」，一些史學家稱之為「小躍進」，造成工業短缺和部分農村地區的饑荒。1956 年春天，周恩來和其他經濟計劃工作者主張政府放慢集體化步伐。

1956 年 2 月

赫魯曉夫在莫斯科發表秘密報告，譴責斯大林和個人崇拜。對斯大林的災難性的集體化運動的批評加強了中國那些不滿社會主義高潮的人的地位。毛澤東發現去斯大林化會挑戰自己的權威。

1956 年秋

「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從黨章中被刪除，集體領導的原則得到肯定，而個人崇拜受到譴責。社會主義高潮停止。

1956 年 10 月

受到去斯大林化的鼓勵，匈牙利人反抗他們的自己的政府，蘇聯軍隊入侵該國，粉碎了一切反抗並扶植了一個受莫斯科支持的新政權。

1956 年冬至 1957 年春

毛澤東，與他的大多數同事的意願相反，鼓勵以「百花齊放」運動為標誌的更開放的政治氣氛，以確保科學家和知識分子在發展經濟中的支持，並避免導致蘇聯入侵匈牙利的社會動盪。

1957 年夏

事與願違，該運動招致越來越強烈的質疑黨統治正確性的批評。毛澤東轉而指責這些批評聲音是「壞分子」對黨的執意攻擊。他委派鄧小平負責的反右運動迫害了五十萬人——其中許多人是學生和知識分子，他們被發配到偏遠地區做苦役。黨團結起來支持它的主席。

1957 年 11 月

毛澤東訪問莫斯科。蘇聯將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送上軌道印象令其印象深劍，於是他宣稱「東風壓倒西風」。針對赫魯曉夫公告蘇聯要在十五年內超過英國的經濟生產，他宣布中國也將在同一時期超過英國。

1957 年冬至 1958 年春

毛澤東在一系列黨的會議上攻擊周恩來等反對他的經濟政策的高層領導。他推行自己的群眾運動和加速農村集體化的藍圖，要求增加農業和工業的指標。「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口號成為黨的路線。

1957 年冬至 1958 年夏

一場鎮壓運動對準了數十萬對經濟政策持批評意見的黨員。幾名省委領導人被撤，用毛澤東緊密的追隨者取代。黨內反對意見沉默。

1957 年冬至 1958 年春

發動群眾性水利建設運動，標誌「大躍進」開始，驅使數億普通村民連續數星期在遠離家鄉的工程項目上服勞役，卻往往沒有足夠的休息和食物。

1958 年夏

赫魯曉夫訪問北京，出現緊張局勢，毛澤東決定事先不同它的蘇聯盟友商量就炮擊臺灣海峽的幾個島嶼，引發與美國的國際危機。莫斯科被迫支持北京，聲明攻擊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被視同攻擊蘇聯。

1958 年夏

爲了大規模動員村民從事巨大的水利工程項目，需要在農村設置更大的行政管理單位，於是將集體化的合作社合併成巨大的規模高達兩萬戶的人民公社。在這些公社中，日常生活採取軍事化。幾乎所有的東西，包括土地和勞動，都是集體管理。公共食堂取代了家庭廚房，而孩子們則由寄宿幼兒園照看。用工分制來計算報酬，甚至在某些公社還取消了錢幣。後院煉鋼爐熔融各種金屬物件，為完成黨的不斷升級的鋼產量指標作貢獻。全國許多地方出現了饑荒端倪。

1958 年 11 月至 1959 年 2 月

毛轉而反對那些製造浮誇和預言即將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地方幹部。他試圖遏制大躍進一些最嚴重的弊端，但繼續推進公社化。他宣布，黨的錯誤只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為了履行外國的合同和供應城市，在農村大幅度增加食品採購。饑荒在蔓延。

1959 年 3 月

在上海會議上毛澤東尖刻地斥責黨的高層領導，並施壓對農村提出更高的征購指標，高達全部糧食的三分之一，儘管饑荒已經普遍存在。

1959 年 7 月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譴責彭德懷等批評大躍進的領導人為「反黨集團」。

1959 年夏天至 1960 年夏

發動了一場旨在打擊表達了類似彭德懷及其盟友的批評意見的黨員。數千萬村民死于饑餓、疾病和酷刑。

1960 年 7 月

赫魯曉夫將蘇聯顧問撤出中國。周恩來和李富春將貿易結構從蘇聯移向西方。

1960 年 10 月

一份關於在河南信陽發生大規模饑荒的報告由李富春交給毛澤東。

1960 年 11 月

發出緊急指示，允許村民保持自留地，搞副業，每天休息八小時，恢復當地市場，以及其他一些措施，旨在削弱人民公社對村民的控制力度。

1960–1961 年冬季

派調查組下農村，全方位減輕災難。從西方進口大量食品。

1961 年春

黨的領導成員的巡迴檢查導致進一步從大躍進撤退。劉少奇把造成饑荒的責任由黨承擔下來，但免去毛的全部責任。

1961 年夏

在一系列黨的會議上討論了大躍進的後果。

1962 年 1 月

在北京黨的擴大的七千人幹部大會上，劉少奇把饑荒描述為人為災難。對毛澤東的支持減弱了。饑荒消退，但在部分農村仍在繼續奪去生命，直到 1962 年末。

1966 年

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

第一篇

追逐烏托邦

1
兩個對手

1953 年，斯大林死了，毛澤東解放了。過去三十多年，毛澤東只能替這位共產主義的世界領袖當個跟班。二十七歲那年，他到上海，參加了中共的創立大會，從蘇聯經紀人手裏接過二百大洋，俄羅斯的金錢從此改變了毛澤東的一生。他毫不猶豫地領取津貼，利用莫斯科的關係，領導一支衣衫襤褸的游擊隊，為奪取最高權力而奮鬥。在這個過程中，他和蘇聯顧問進行過無休止的爭執，不斷受到莫斯科的無情斥責，多次被貶離領導崗位。斯大林幾次三番逼迫毛澤東與他的死敵、統治著中國大部份地區的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妥協，要毛甘當蔣的下屬。斯大林信不過毛澤東和他的農民軍，公開偏袒蔣介石，甚至不顧國民黨 1927 年在上海已經對共產黨人進行過一場屠殺。幾乎長達十年之久，蔣介石的部隊無情地圍剿陷入困境的毛澤東，迫使共產黨人躲進深山，然後向北流竄，也就是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1936 年，蔣介石在西安被綁架，斯大林電令毛澤東立即釋放人質，不得有誤。一年後，日本入侵中國，斯大林再次要求毛澤東與他的主要敵人蔣介石組成「統一戰綫」。斯大林用飛機、武器和顧問援助國民黨政權，而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從斯大林那裏得到的只是一批傳單，裝滿了一架飛機。

毛的策略是：把主力用於發展自己在華北的勢力，而不用於抗日。在戰爭結束的 1945 年，實用主義的老手斯大林，和國民黨簽署了盟約，使中共在內戰中獲取斯大林支持的可能更加渺茫。日本投降不久，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恢復了全面戰爭。斯大林再次觀望，甚至

以不要得罪美國為由，警告毛澤東住手，因爲美國是領導盟軍打敗日本的公認的世界領袖，一貫站在蔣介石一邊。毛沒有理睬斯大林的意見。共產黨人最終佔了上風。當他們攻克首都南京時，蘇聯是讓自己的大使跟隨國民黨政府一起逃亡到廣州去的少有的幾個國家之一。

甚至在毛的勝利已成定局的時候，斯大林還繼續和毛保持距離。毛的一切作爲，在這位蘇聯領導人眼裏都顯得那麼可疑。斯大林想不通，什麼樣的共產黨人會害怕工人？你看，毛澤東的軍隊在上海外圍逗留了幾個星期遲遲不進，只是爲了不想負責解決這個城市居民的吃飯問題。斯大林在閱讀了這位中國領導人著作的譯本後認定，毛澤東是個農民，是個洞穴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個「封建分子」。很明顯，在毛的身上有一股叛逆和倔強的勁頭，不然就難以解釋，他怎麼能戰勝蔣介石，並迫使後者一路撤退到臺灣。但毛的自命不凡和自作主張正是深深困擾斯大林的原因所在，因為在斯大林眼裏，敵人無處不在：毛會不會是另一個鐵托？那位南斯拉夫領導人因爲與莫斯科政見不同，已被逐出共產主義大家庭。一個鐵托已經夠麻煩了，斯大林不希望另一個不經過他的幫助就上臺的政權在毗鄰的邊界上主導一個龐大的帝國。斯大林不相信任何人，尤其不信任一個積怨甚多的潛在對手。

毛澤東的確也從來沒有忘記別人對他的怠慢，他對斯大林待他的方式極爲不滿，但他沒有選擇。他的共產政權迫切需要國際承認和經濟幫助，以重建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毛澤東宣布了「一邊倒」的政策，忍氣吞聲，尋求與蘇聯和解。

毛與斯大林會面的要求幾次遭到拒絕。然後在 1949 年 12 月，毛終於被召到莫斯科。但是，他沒有得到像一個把四分之一人類帶入共產主義軌道的偉大革命領袖所應得的隆重歡迎，他受到了冷遇，僅被當作前往莫斯科慶祝斯大林七十壽辰的衆多代表中的一員。匆匆見過一面之後，毛就被擯到首都以外的一所別墅。隨後幾個星期，孤零零

地等待召見。日子一天天過去，毛終于認識到，在這位蘇聯獨裁者主宰的共產主義兄弟圈中，自己的地位並不高大。毛澤東和斯大林最終會見時，只得到了三億美元的軍事援助，還得分爲五年使用。為此微薄之利，毛作出了重大的領土讓步，令人想起十九世紀的不平等條約：保證蘇聯控制旅順口，管理滿洲的中東鐵路，直到1950年代中期；毛還被迫承認蘇聯在新疆的採礦權。毛的收穫是取得了中蘇相互保護的承諾——如果受到日本或其盟國特別是美國侵略的話。

早在毛澤東和斯大林簽署「友好互助同盟條約」之前，金日成——他是1948年半島分裂後控制著北朝鮮的共產黨游擊隊的領袖，就已經在策劃用武力重新統一半島。毛澤東支持北朝鮮，認爲金是反美的共產主義盟友。1950年6月爆發的朝鮮戰爭，促使美國為保衛南方而出兵干預。面對壓倒性的空中力量和坦克部隊，陷入困境的金被一路擊向中朝邊境。毛澤東擔心美國可能越過鴨綠江進攻中國，在得到斯大林承諾提供空中掩護之後，派出志願軍入朝作戰。接下去的戰爭非常殘酷，中方傷亡很大，斯大林本來承諾的飛機卻很少兌現。戰爭進入了血的對峙，斯大林一再阻撓談判。和平不合乎他的戰略利益。雪上加霜的是，斯大林還要求中國為蘇聯送往朝鮮的軍事裝備付款。 1953年3月他的去世，使停戰很快得以實現。

三十年來毛澤東在斯大林手裏受盡屈辱，只是出於戰略上的需要，他才願意服從莫斯科。 朝鮮戰爭使他對蘇聯的援助更加反感，他的感覺得到其他國家領導人的共鳴，他們也同樣渴望在自己的國家與莫斯科打交道時，能夠得到平等。

朝鮮戰爭加深了毛澤東在他的同僚中的威望。 毛主席曾領導黨於1949年取得了勝利。朝鮮也是他個人的榮耀，因為當黨內其他領導人舉棋不定時，是他力主出兵干預，是他把美國逼入僵局——儘管犧牲了士兵的生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他現在聳立於同僚之上。毛澤東

和斯大林一樣，不願平等待人，也像斯大林一樣，這位主席對自己在歷史上的作用深信不疑。他相信自己是天才，絕對正確。

斯大林死後，毛看到了機會來了，可以獨立於克里姆林宮，在社會主義陣營中領袖群倫了。這位主席認為，自己理所當然是照耀共產主義方向的燈塔，共產主義將粉碎資本主義，全世界將圍著他轉。難道不是他領導部隊走向勝利，為世界的四分之一實現了第二個十月革命？斯大林沒有資格宣稱自己主持過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更不要說那個尼基塔·赫魯曉夫了，儘管此人很快就要在莫斯科掌權。

粗魯、古怪和衝動，使赫魯曉夫被許多認識他的人認為只是個能力不強、野心有限的白痴。正是這種聲譽，使他能夠在斯大林手下幸存，後者對他寬大爲懷，使他沒有落到比他更優秀的同志的下場，那些同志在和大獨裁者打交道的時候總是犯錯誤。「我的小馬克思！」斯大林用煙斗輕輕敲打赫魯曉夫的前額嘲弄他，「腦袋裏空空如也！」[1]赫魯曉夫是斯大林的寵物。他像斯大林一樣多疑，但善於藏拙，內心很狡猾，野心很大。

赫魯曉夫對斯大林處理毛澤東的方式不以爲然。他決心超越他以前的主子，和北京建立新的關係。他想成爲毛澤東的恩師，指導這個農民造反者接受馬克思主義啓蒙。赫魯曉夫還扮演了好心的贊助者的角色，向中國進行大規模的技術轉讓，為數以百計的工廠提供援助。他把顧問們派往中國，從原子能到機械工程，遍及各個領域；而中國則派出一萬名學生，在斯大林死後的頭幾年，到蘇聯去接受培訓。但北京的領導人對於這種慷慨並不感恩，認爲是應得之物，並試圖通過談判、乞求和哄騙，千方百計榨取更多的經濟和軍事援助。赫魯曉夫妥協了。一開始就做得太過火，現在他只得硬著頭皮，要求莫斯科的同事們接受遠遠超過蘇聯負擔能力的一系列援助要求。

赫魯曉夫竭盡所能滿足北京，他以爲會得到不薄的回報。毛澤東看不起他，認定他是個粗野的、不成熟的暴發戶——這正是他避之唯

恐不及的惡譽。 關鍵轉折點出現在 1956 年，赫魯曉夫在黨代表大會上發表的秘密報告中譴責了他以前的主子的罪行，但事先沒有與毛商量。 毛主席也稱讚這次講話，因爲他感覺到，這將有助於削弱莫斯科在共產主義集團內的權力。但他永遠不會原諒赫魯曉夫，因為否定斯大林也是對毛澤東本人的權威的挑戰，因為毛已經習慣於以自己為中心來解釋世界。詆毀斯大林就是削弱毛澤東。毛一貫謀求和斯大林平起平坐，儘管對斯有一肚子怨懟。毛還認為，只有他本人才有足夠的資格，有權對斯大林的是非功過進行審判。何況，攻擊斯大林只能讓美國人得利。

最重要的是，允許批評斯大林，意味著允許批評毛澤東。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為那些害怕主席權力日益膨脹，希望恢復集體領導的人提供了武器。在 1956 年 9 月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從黨章中被刪除，集體領導的原則得到肯定，個人崇拜受到譴責。由於受到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約束，毛澤東別無選擇，只好忍受這些措施，他在黨代會前數月，就為這些措施提出了自己的意見【2】。但毛認為自己正在貶值，在私下交往中，他沒有掩飾自己的憤怒【3】。

毛澤東稱之為「社會主義高潮」的經濟政策，在 1956 年底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被淡化，這是他遇到的另一個挫折。一年前，心急難忍的毛，對經濟發展緩慢不滿，多次批評那些贊成謹慎從事的人為「小腳女人」。他預言加速農村合作化可以帶來農業生產的飛躍，並在 1956 年 1 月不切實際地要求增加糧食、棉花、煤炭和鋼鐵的生產。 這個社會主義高潮——後來被一些歷史學家稱爲「小躍進」——很快遇到了麻煩【4】。城市的工業生產遇到各種短缺和瓶頸，因為增加產量所必需的資金和原材料不能到位。在農村，合作化受到普遍抵制，農民宰殺牲畜，掩藏糧食。1956 年的春天，一些省份出現了饑荒。爲了試圖控制他們的主席的突擊戰術造成的損害，周恩來總理和經濟規劃者陳雲呼籲停止「冒進」，試圖收縮合作化的規模，在農村恢復有限的自由市

場，並允許更大範圍的私營生產。毛澤東很不高興，認爲這是向他個人挑戰。1956年6月《人民日報》起草了一篇社論，批評社會主義高潮，勸告人們不要「試圖在一夜之間做完所有的事情」，當這篇社論送請主席審閱的時候，毛澤東在激怒中信筆批示，「不看」。他的理由是，「罵我的，我為什麼要看？」[5] 他的地位進一步削弱了，因為赫魯曉夫在他的秘密報告中強調了斯大林農業政策的失敗，其中包括農村的集體化。斯大林的失敗，似乎無意中也批評了毛澤東的合作化運動。 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不提社會主義高潮了。

儘管黨的其他領導人有很大的保留，毛還是在 1957 年 4 月發動了「百花齊放」運動，鼓勵公開批評黨。之後，毛受到更多的屈辱。他的希望是，通過呼籲普通市民表達他們的意見，可以暴露極少數右派份子和反革命份子，防止匈牙利在非斯大林化中造成的破壞。1956 年 10 月匈牙利發生了全國性的反抗共產黨統治的暴動，最後蘇聯軍隊入侵該國，殘酷鎮壓所有反對人士，扶植了一個由莫斯科支持的新政府。在中國，毛澤東向持保留態度的同事們解釋說，黨可以把各種反對派分割成許多小「匈牙利事件」，各個擊破。[6] 他推測，一個更加開放的環境，將有助於得到科學家和知識份子的支持以發展經濟。毛主席嚴重失算，因為他這樣做，招致了越來越猛烈的批評，他們不僅質疑共產黨的統治權，而且質疑毛的領導權。毛的回擊是，指責這些「壞人」要破壞黨。他讓鄧小平負責反右派運動，這場運動非常激烈，被鎮壓的目標超過五十萬人——其中很多是學生和知識份子，他們被驅逐到邊遠地區去服苦役。毛竭力重新獲得控制，雖然整個事件非常尷尬，但他的策略在某種程度上成功了，因爲它創造了使他可以唯我獨尊的條件。由於攻擊來自四面八方，黨的統治權已受到質疑，所以黨以得緊緊地團結在主席的週圍。

1957 年 6 月百花齊放運動的失敗，也證實了毛主席關於「右傾保守」思想是主要敵人的判斷，而這也是當前經濟停滯的原因。他想重

提社會主義高潮的政策，這一政策因爲受到他非常想取悅的專家們的尖銳批評而失去信譽。如果這麼多具備專業技能和科學知識的、能夠幫助經濟發展的知識份子心懷不滿，將國家的未來寄托給他們顯然是不明智的政治之舉。這一看法得到黨的第二號人物劉少奇的認同，他轉而支持主席在農村提出更高的產量指標。[7] 1957 年 10 月，在劉的支持下，毛打出了凝聚著他的夙願的口號：「多，快，好，省」。他還成功地換掉了「冒進」這個詞（含義是魯莽地向前衝撞），代之以「躍進」。經過氣勢洶洶的反右派鬥爭，沒有多少領導人敢出面反對。毛澤東達到了目的，他可以向赫魯曉夫挑戰了。

2
賭局開場

1957 年 10 月 4 日，一個沙灘球大小的閃亮的不銹鋼球體劃過天空，進入軌道，開始以每小時 29000 公里的速度繞行地球，發射出可以被全球無綫電儀器接收到的信號。美國完全措手不及。蘇聯成功地發射了世界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斯普特尼克，揭開了令人敬畏和恐懼的太空競賽的新篇章。觀察家指出，要將一個 84 公斤重的衛星送入軌道，需要一個像洲際彈道導彈那樣強大的火箭助推器，這意味著俄羅斯人也有能力向美國發射原子彈。一個月後，一顆更重的衛星進入太空，攜帶第一個活物在太空環遊：一只名叫萊卡的小狗穿著特製的太空服，成爲斯普特尼克第二號衛星中的旅客，創造了歷史奇跡。

赫魯曉夫的大膽舉動揭開了導彈外交的時代，他的背後是莫斯科對洲際彈道導彈試驗成功的不懈的宣傳。 第二次衛星發射是為了配合紀念十月革命 40 週年。慶典在紅場進行，從世界各地請來數以千計的共產黨領導人出席這次盛典。

然而，儘管衛星發射成功，赫魯曉夫卻處在脆弱的地位。不到半年前，他剛剛躲過斯大林強硬派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和卡岡諾維奇針對他的未遂政變。朱可夫元帥一一指揮了對德國的最後總攻並佔領柏林的二戰英雄，用軍隊運輸機將關鍵盟友送往莫斯科去保衛他的老闆。但朱可夫既然能指揮軍隊，也有可能將坦克對準赫魯曉夫。由於害怕再有軍事政變，這個蘇聯領導人在 11 月初將朱可夫廢黜。他可以為自己清除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和卡岡諾維奇（他們被稱為「反黨集團」）辯護，但他又怎麼向他的外國客人解釋爲什麼要廢黜那位功勳卓

著的蘇聯元帥？這些人已經受到他的秘密報告和匈牙利暴動的驚嚇。約瑟普·鐵托——拒絕聽從蘇聯擺佈的完全特立獨行的南斯拉夫領袖，是另一個可能使慶典蒙上陰影的潛在反對者。十月中旬，他反對將在莫斯科黨的領導人會議上發表一個由蘇聯起草的宣言，並拒絕參加那次活動。

赫魯曉夫發現毛澤東是一個關鍵的盟友，儘管他們在外交政策和意識形態上不同。反過來，毛澤東也有足夠的理由來幫助他的對手。他一再糾纏這位蘇聯領導人，要求幫他獲得核武器。自從美國開始對臺灣提供軍事支持，並在 1955 年 3 月推出戰術核導彈後，毛就決意要擁有核彈。現在，在國際首腦會議前夕，赫魯曉夫與中國在 10 月 15 日簽署了一項秘密協議，爲了獲得後者的支持，他答應將在 1959 年交付一枚蘇聯原子彈【1】。

毛澤東非常興奮。他知道，他的機會已經到來。赫魯曉夫有求於他，對他及其隨行給予高度的關注。兩架圖 104 被派遣迎接中國代表團到莫斯科。這位蘇聯領導人，在一些最高級別的黨領導人簇擁下，在伏努科沃機場熱烈歡迎毛澤東，並親自護送他到賓館下榻。在所有 64 個代表團中，惟有中國代表團出席了在大克里姆林宮舉行的會議。

毛澤東被安置在凱瑟琳皇后的行宮。牆上掛著錦緞，天花板上飾有葉狀渦紋。 整個西廂房裝飾得富麗堂皇，高大的廊柱，頂上是青銅，牆壁上懸垂著水絲或嵌有核桃，拱頂鍍金粉刷，地上全部鋪著厚厚的地毯。面對這一切，毛不爲所動，兀自使用著自備的夜壺【2】。

11 月 7 日出現了週年遊行的高潮：在列寧陵上，毛澤東站在赫魯曉夫的旁邊，檢閱著通過紅場的四小時遊行，蘇聯軍隊展示著他們的新式武器，人們揮舞著中國國旗，高呼「毛澤東和中國萬歲！」

儘管給了毛以殊榮和特權，他還是喜歡對他的東道主吹毛求疵，嘲笑他們的食物，蔑視妄自尊大的俄羅斯文化，冷對赫魯曉夫。「看，

他們現在對我們大不一樣了，」他和醫生打趣，輕蔑地微笑著。「即使在這種共產主義的土地上，他們也知道誰強誰弱。什麼勢利小人！」[3]

但是，他發表了支持赫魯曉夫的重要聲明。11月14日，在各黨代表面前，他宣布：「我們這麼多人在這裏，有這麼多政黨，我們必須有一個頭……如果蘇聯不是頭，那麼是誰呢？難道以字母順序進行排列？阿爾巴尼亞？越南胡志明同志？別的國家？中國沒有資格當頭，我們經驗不足。我們懂革命，但不懂社會主義建設。人口上我們是大國，經濟上我們是小國。」[4]

但是，毛這種效忠是做做樣子，他來莫斯科的真實目的，是爲了證明：是他，而不是赫魯曉夫，是共產主義陣營真正的頭。他幾乎不錯過任何削弱蘇聯領導人的機會，甚至當面宣告，他有得罪人的壞脾氣[5]。兩天後，11月18日，等來了他一直期待的時刻。毛澤東無視會議禮節，坐在座位上，向代表們即席講話，他拒絕起立，藉口健康狀況不佳。赫魯曉夫後來在回憶錄中說，毛自以爲鶴立鷄群[6]。在一篇又長又散漫的獨白中，主席轉向赫魯曉夫，發出勸告，像訓導學生似的：「任何一個人都要人支持。一個好漢也要三個幫。這是中國的成語。中國還有一句成語，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你赫魯曉夫同志這朵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好像這還不夠神秘，毛澤東然後宣佈1957年6月赫魯曉夫和斯大林強硬派之間的攤牌是「兩條路綫的鬥爭：一條是錯誤的路綫，而另一條是比較正確的路綫。」這到底是貶還是褒？翻譯沒有說清楚，他含糊其辭地嘀咕著什麼關於「兩個不同集團」，其中一個「赫魯曉夫率領的贏了」。毛澤東究竟說了什麼，南斯拉夫大使後來回憶說，「沒有人知道，除了中國人」。但它引起了死一般的沉默[7]。毛進一步奚落他的主人，他描述6月政變主要策劃者之一莫洛托夫是「一位老同志，有很長的鬥爭歷史」[8]。

毛澤東講話的核心更使其俄國主人感到害怕。「這個世界上有兩股風，東風和西風。我們中國有一種說法，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

風壓倒東風。我認為，現在國際形勢的關鍵是東風壓倒西風，這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力量，已經大大勝過資本主義的力量。」

毛繼續檢討兩個陣營間的權力平衡的變化，然後提出自己關於即將發生世界大戰的看法，震驚了其他黨的代表[9]。「讓我們設想一下，如果戰爭爆發，有多少人會死。世界上有 27 億人，三分之一會死。如果高一點，可能死一半……我說，如果最壞的情況發生，一半死亡，那麼仍然有一半活著，但帝國主義將被消滅，整個世界將變成社會主義。經過數年後，將又有 27 億人了。」[10]「美國只不過是『紙老虎』，」毛澤東繼續說，毫不在乎他想象中的生靈塗炭。他的虛張聲勢，他在這個場合和其它類似的場合這些張牙舞爪的言辭的要點，是想表明：他，而不是赫魯曉夫，是更堅定的革命者。

毛澤東不僅為他的聽眾唸搗人口數字。近來他一直在關注著赫魯曉夫的做法：推動經濟權力下放，精簡莫斯科辦公官員數量，以便將權力移交給由他自己的地方追隨者監督下的新的經濟區域議會。赫魯曉夫巡遊農村向農民講授如何提高農業產量：「你必須這樣種土豆。你必須像我的祖母一樣種白菜。」[11] 他嚴厲批評自命不凡的經濟學家，他們可以在「算術」上正確，但不了解蘇聯人的能力：「讓資本主義世界的思想家去無休止地空談吧。讓經濟學家同志去臉紅吧。有時候，人必須突飛猛進，超越自己的實力。」[12] 這「突飛猛進」，就是將農民從斯大林式國家的僵死的土地集體產權中解放出來，創造更多的財富，在經濟上超越美國：當「人們認識到自己的力量，他們會創造奇蹟」。1957 年 5 月赫魯曉夫聲稱，在未來數年，蘇聯在肉類、奶類和黃油方面的人均生產量將趕上美國[13]。現在，在莫斯科，在外國黨代表面前，赫魯曉夫在慶祝十月革命週年的主題演講中宣布他的經濟改革的成功：「同志們，我們的計劃工作者的計算表明，在未來的十五年內，蘇聯不僅能夠趕上，而且將超過目前美國重要產品的產量。」[14]

毛澤東沒有浪費時間。他公開接受了這一挑戰，立即宣布，中國將在十五年內超過英國——當時仍被視為一個主要的工業強國：「我國今年有了 520 萬噸的鋼鐵，再過五年，可以有 1000 到 1500 萬噸；再過五年，2000 至 2500 萬噸，再過五年，可以有 3000 至 4000 萬噸。也許我在這裏說了大話，將來國際會議在開的時候，你們可能批評我是主觀主義，但我說話是有相當根據的……赫魯曉夫同志告訴我們，十五年后，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可以講，十五年后我們也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15] 大躍進開始了。

3
整肅隊伍

在莫斯科，赫魯曉夫為毛澤東提供了向前衝刺的武器。不僅人造地球衛星展示了相對落後的蘇聯有領先於經濟發達國家如美國的能力，而且蘇聯領導人自己也正在準備一場類似毛主席曾被迫放棄的社會主義高潮的重大經濟運動。

從蘇聯回到北京後不到兩個星期，毛澤東獲得了副主席劉少奇對大躍進的支持。劉少奇是一個節儉和沉默寡言的人，他身材高大，略有駝背，頭髮花白。劉畢生貢獻於黨，經常徹夜工作。他認爲自己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他相信這個位子是對他多年的辛勤和無私工作的獎勵。幾個月前，毛澤東本人表示不想再當國家主席，他可能還私下向劉擔保過，支持劉作爲繼承人[1]。劉擁護毛澤東的遠見：「在十五年後，蘇聯的工農業在最重要的產品的產量上上面可能趕上或者超過美國，我們應當爭取在同一時期內，在鋼鐵和其他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2]」還不到年底，全國各地的報刊文章就到處歡呼水利、糧食生產和鋼鐵產量上的偉大進步。1958 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了劉少奇批准的社論，傳達了毛的願望：「鼓足幹勁，力爭上游」[3]。

李富春是個書生氣十足的人，態度謙虛，掌管着國家計委，定期向各省發送電話本那樣厚的藍圖，詳細規定每種產品的產量指標。他也支持毛澤東。他是毛的湖南同鄉，童年時代就與主席相識，參加過長征。不知是出於恐懼、信念還是野心，李是經濟計劃工作者中第一個跳上大躍進的花車的。他和劉少奇同聲贊美毛澤東的宏圖大略[4]。

在宣傳的鑼鼓聲中，加以在私下會見或黨的會議上受到毛的哄騙慫恿，各省領導人紛紛對他的鼓足幹勁運動表示全力支持，在所有經濟活動中承諾更高的目標。1958 年 1 月初在杭州的一次黨的領導的小型會議上，柯慶施——一個頭髮蓬鬆的高大男子，時任上海市長，從心底裏敬畏主席——熱情洋溢地支持「社會主義建設新高潮」，建議全國依靠偉大的群衆「乘風破浪」[5]。身邊有人支持，柯慶施又跑來效忠，毛澤東不再遏制已經壓抑了數年的憤怒，當著薄一波（曾經抗命的主要經濟規劃師之一）的面爆發了。薄一波是個老革命，他關心的是保持預算平衡。「我不聽你這一套！」毛澤東嚷道。「你在講什麼呀？我幾年都不看預算了，橫直你是強迫簽字。」他然後轉向周恩來：「《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對全國發生了很大影響，是『個人崇拜』還是『偶像崇拜』？不管什麼原因，全國各地報紙、大小刊物都登載了，發生了很大影響，這樣，我就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6] 揚鞭把規劃師們趕上通往烏托邦之路的時刻到來了。

座落在中國南端的南寧被稱為「綠城」，因為溫和的亞熱帶氣候使甜桃、檳榔和棕櫚樹常年茁長。一月中旬平均氣溫攝氏 25 度，溫暖宜人，柑橘樹鮮花盛開。這樣的環境本來可以使來自隆冬北京的黨的領導幹部得到放鬆，然而氣氛緊張。狂熱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興致勃勃地說：「主席從頭到尾是批判右傾保守思想！」[7] 毛在會議開幕當天就定了調子：「不要提『反冒進』好不好？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洩了氣，六億人一洩氣不得了。」[8] 過去幾天，毛澤東對計劃工作者多次發脾氣，指責他們「給人民的熱情潑冷水」，拖國家的後腿。毛說，反「冒進」的人「離右派只有五十米」。1956 年 6 月 20 日刊登了那篇社論的《人民日報》的主編吳冷西，也高高列在被毛召見的名單上。毛對他的判詞是：「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庸俗的辯證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實際上並沒有反右，而是專門反左，而且尖銳地針對我。」[9]

巨大的壓力降臨到被調來的領導人身上。即使是那些習慣了嚴酷的黨內生活的堅強的領導人，也承受不了這種高壓。國家技術委員會主任黃敬，曾經是毛澤東妻子的前夫，在執行主席給他的任務時崩潰了。他躺在牀上，望著天花板，語無倫次，精神恍惚，用一種令人困惑的眼神看著醫生，乞求寬恕：「饒命啊！饒命啊。」他被擡上飛機，到廣州去接受治療，向陪著他的李富春跪倒叩頭。在一個軍隊醫院中，他跳出窗戶，摔斷了一條腿。他於 1958 年 11 月去世，時年 47 歲。[10]

但是，毛的真正的目標是周恩來。1 月 16 日毛澤東對總理揮舞著柯慶施的小冊子《乘風破浪，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新上海》，輕蔑地問道：「恩來！你是總理，你寫得出這麼好的文章嗎！」「我不能，」總理喃喃作答，緊張地任他責罵。然後，一如既往，在公開羞辱後，毛又迎頭一棒：「你不是要『反冒進』嗎？我可是反『反冒進』的！」[11]幾個左派領導人加入了鬥爭的行列。柯慶施和激進的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對總理進行揭發批判。[12]三天後，周作了長篇自我批評，對 1956 年的逆流承擔全部責任，承認這是「右傾保守思想」，承認自己偏離了主席的指導方針。毛澤東指出，黨的錯誤沒有什麼了不起，（無非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載入了會議的宣言，從此不准別人攻擊「小躍進」[13]。

周恩來溫文爾雅，輕聲細語，舉止有點女人氣，是位天才的外交家，有一種在意外挫折中軟著陸的本領。如果有必要，他可以表現得非常謙卑恭順。共產黨勝利之前，他被國民黨稱為不倒翁[14]。在他的革命生涯早期，周就決定永不挑戰毛澤東。他是在一次正面衝突後做出這一決定的，那次事件使毛懷恨在心。那是在 1932 年的一次會議上，游擊戰術的反對者們抨擊毛澤東，要毛把前線指揮權移交給周，結果是一場災難。數年後，國民黨軍隊重創紅軍，迫使共產黨人離開根據地，走上長征之路。到了 1943 年，周恩來意識到毛的氣數已成，就宣布自己永遠支持主席。他宣佈：「毛澤東的方向，就是中國共

產黨的方向！」但是，毛沒有放過他。周恩來的忠誠度，在一系列的自我批評會上受到測試，他在會上不得不承認他的政治罪行，給自己貼上無原則的「政治騙子」的標籤。這種經歷不是好受的，無異於打自己耳光，但周也因此脫穎而出，成爲主席的忠實助手。他們之間開始形成一種若即若離的不穩定的聯盟。毛一方面提防周，把他當作潛在的權力競爭者；另一方面，又需要他來主持節目。毛對日常事務和組織的細節不感興趣，而且他經常和人發生磨擦。而周是一個有組織能力的一流管理員，善於促成黨的團結，善於和稀泥。正如一位傳記作者所說的，毛澤東「緊緊地抓住周，即使有時需要舉鞭抽打，也不能沒有他」[15]。

鞭打並沒有在南寧停止。兩個月後，在成都，黨的會議的最後幾天專門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毛首先對計劃工作者者盲目跟從斯大林，只知道重視大型工業，迷信龐大的官僚機器，忽視農村的經濟路綫，表示不屑。早在 1956 年 11 月，他就抨擊他的一些同事，「我們有些同志不加分析，認爲蘇聯的一切都好，屁都是香的。」[16] 毛澤東認爲，只有創造性思維才能找到中國自己通往共產主義的道路，不應該僵化地堅持蘇聯的社會主義教條。中國應該「兩條腿走路」，同時發展工業和農業，重工業和輕工業。作為這條新道路上的領袖，毛澤東要求忠誠。「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裏，爲什麼不崇拜呢？」毛解釋說，「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17]。柯慶施立即心領神會，他激動地顫抖著嗓音說：「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18]

在自己登上神壇供人膜拜之後，毛將具體事務交給他的心腹劉少奇。雖然幾乎所有的參加者都作了自我批評，但這種情況對周恩來是痛苦的。周、劉兩人競爭激烈。劉可能認爲，周是對他將來繼承主席的威脅[19]。那一天，劉在對毛阿諛奉承時勝過了周：「多年來，我體會到毛主席無比偉大。我跟不上他的思想。毛主席的知識超人，特別

是精通中國的歷史，黨內無人能及。 他有實際經驗，特別是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毛主席在這些方面的偉大，值得我們敬仰和學習。」[20] 周感到強烈的壓力，急於取悅於主席，後者在南寧剝奪了他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權。周再一次提交了一份關於自己錯誤的長篇檢討，但沒有打動毛澤東。

五月間，在一個 1300 多人的黨的正式會議上，周恩來和黨的經濟沙皇陳雲被傳喚，準備作另一次自我檢查。實在不知道怎樣才能滿足毛澤東，周恩來自我隔離了好幾天，搜索枯腸。和同處困境的陳雲電話交談後，周無比沮喪，頭腦一片空白。他盯著秘書咕噥幾句之後，長時間沉默。那天深夜，他的妻子發現他垂頭喪氣地坐在辦公桌前。秘書想幫助他，替他在檢討稿上加了一段話，講周、毛二人「風雨同舟，朝夕與共」。周後來詳細地審閱了文稿，憤怒地斥責秘書，老淚縱橫，批評秘書「你不懂黨史」[21]。最終，周在一群領導人面前亢奮地大讚大頌毛主席，告訴大家，毛是「真理的化身」，黨之所以犯錯誤，是因爲脫離了主席的偉大領導。這次表演之後，又過了幾天，周給毛送上一封信，發誓要認真學習主席著作，遵守主席的一切指示。 主席終於滿意了，宣布周恩來和其他人是好同志。周保住了地位。

大躍進開始了，頭幾個月，周恩來多次受到侮辱和訓斥，但他從不撤回對毛的支持，只是默默地接受主席的批評。周恩來沒有權力推翻他的主子，背後卻有計劃工作者的支持，他本來可以引退，放棄政治生涯。但他學會了在主席手中接受侮辱，保住烏紗帽，在主席的陰影底下討生活。周恩來效忠毛澤東，像傭人一樣千方百計去慫恿和幫助他的主人[22]。毛澤東在做夢，周恩來則是催生婆，把毛的夢魘變為現實。由於老在接受考驗，他必須在大躍進中不懈努力，表現自己。

* * *

周恩來被貶到權力和羞辱的景觀之中，其他高級經濟官員迅速各就各位。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從來沒有作過自我批評，他在 1957 年

12 月支持了毛澤東的口號，從其他計劃工作者中脫穎而出。陳雲作了幾次自我批評。財政部部長李先念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都是 1956 年小躍進的反對者，現在認識到潮流無法抗拒，誰也不敢不同意。李富春和李先念在宣布效忠毛澤東後，被列入黨的內部核心——書記處。

為了對高層施加政治壓力，毛主席還將權力從中央轉移到省級。南寧會議是毛澤東即興召集的一系列會議中的第一個，他嚴格控制與會者的名單，安排議程，控制開會程序，使他可以拉攏追隨者們支持大躍進。他把書記處成員們帶到各省漫談，而不是召集各省領導到京城的國務院來開更正式的會議[23]。通過這樣做，他掌握了省級領導人的心態。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對國家的普遍貧困憂心忡忡，這代表了許多地方幹部的想法[24]。毛澤東把中國定義為「一窮二白」，在那些相信黨有能力使國家領先於競爭對手的理想主義者中間產生了共鳴。「中國有窮又白。窮就要革命，一張白紙好做文章。」[25]激進的省領導人響應領袖的遠見。河南的領導吳芝圃，歡呼「不斷革命」，粉碎右派反對者，飛躍前進。解放軍老將和安徽領導人曾希聖，提出了口號「苦幹三年，改變中國面貌」。但最主要的是，由於在自己的地盤上看到自己的上司被貶，各省受到鼓勵，紛紛發動了揪鬥各自政敵的鬥爭，迫害之風吹向全國。

毛澤東有時神神秘祕，讓他的同事們莫測高深，但這次的打擊方向很明顯，因爲來自北京的壓力非常大。為了確保反右派鬥爭進行得深入徹底，毛澤東派他的獵犬鄧小平到一系列的地方開會。指示是明確的。在甘肅，鄧小平說，針對副省長孫殿才、陳成義和梁大均的鬥爭不能含糊[26]。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沒有浪費時間，幾個星期後，他宣布，省委內部破獲了一個反黨集團。它的領導人剛巧就是孫殿才、陳成義和梁大均，他們被指控：否認 1956 年社會主義高潮的成

就，攻擊黨，詆毀社會主義，提倡資本主義——還有其他令人髮指的罪行[27]。

這些都是得力的領導人，在北京的支持下被推翻。這場清洗活動在全黨一切級別全面進行，使絕大多數的批評為之失聲。沒有人膽敢反對黨的路線。甘肅是個接近內蒙古沙漠的邊遠地區，任何對糧食徵購過度的批評都是不可想象的。關心農民的黨員們被直言不諱地警告：「你倆要考慮，是不是右傾呢？」[28]在位於甘肅首都的蘭州大學，高達一半的學生被拔了「白旗」——那是政治上保守落後的標誌。有些人背後被貼了白條：「你老子是白旗。」有些人被毆打。採取中立立場的人被指責為反動派[29]。這種清洗運動，在張仲良統治下一直繼續著。到 1960 年 3 月，大約十九萬人在大會上被譴責和羞辱，四萬幹部被開除出黨，其中包括 150 位省級官員[30]。

類似的大清洗全國各地都發生了，激進的領導人趁機翦除膽小的對手。從 1957 年 12 月起，南部省份雲南的反右派運動從黨的高級幹部一直整到村幹部。1958 年 4 月，強硬的地方頭頭謝富治，這個雙下巴的矮小男人，宣布推翻「反黨集團」的領導人：組織部負責人鄭敦、王鏡如，犯有「地方主義」、「修正主義」、崇尚資本主義、企圖推翻黨的領導及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罪行[31]。到 1958 年夏天，這個陷害導致約兩千名黨員被清除，十五分之一的高層領導人被解職，其中包括 150 多名縣級及地區級的得力幹部。隨著運動進一步展開，又有九千名黨員被打成右派[32]。

「反黨」集團幾乎到處被發現。毛澤東援引列寧的話教育各省領導人：「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1958 年 3 月，他說，「各省都有類似的問題：是江華獨裁，還是沙文漢獨裁？[33]」在浙江，省長沙文漢被省委書記江華追逼，類似的鬥爭發生在廣東、內蒙古、新疆、甘肅、青海、安徽、遼寧、河北、雲南、河南，還有其他省份[34]。在河南，這個將受到饑饉影響最嚴重的省份之一，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是個

溫和的領導人，被毛澤東的狂熱追隨者、第二書記吳芝圃掃地出門。潘的罪行是醜化社會主義高潮運動期間的合作化。「農民……現在和牛馬一樣。黃牛拴在家裏，而人在田裏幹活，小姑娘和婦女挺著肚子拉犁耙。合作社在剝削勞動力。」[35] 這顯然是要復辟資本主義，潘的追隨者們都挨了鬥。黨和農民都分成兩派，掛著口號標語的稻草人出現在塵土飛揚的路邊，上面寫著「打倒潘復生」或「打倒吳芝圃」。大部份地方幹部看清了風向，站進了擁護吳芝圃的隊列[36]。

不管壓力多大，總得有所選擇。毛澤東視察江蘇，問地方領導人他們反不反右派，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鼓起勇氣，告訴主席：「如果省委常委裏有右派份子，我就是他們的頭頭，黨應該首先清除我。」毛澤東笑著說：「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渭清啊！你是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37] 江蘇挨批鬥的幹部最少。

但是，有信念、有勇氣、敢於反潮流的人很少。清洗運動遍及全黨上下。正如毛澤東在北京強行貫徹他的意願，地方老爺們也在本省份發佈了條律，譴責任何反對者為「右傾保守」。而且，正如省裏一樣，縣級領導和他們的親信，也利用清洗，打擊自己的對手，對當地真正的惡霸則視而不見。在這片土地上，一個烏托邦開始出現。

1958 年夏天出現了一個早期預警信號，一份在高層中傳閱的報告顯示，在上海南部的奉賢縣反右運動中，暴力已成為正常現象。一百人自殺身亡，許多其他人在田裏因被强迫勞動過度而累死。縣領導王文忠認爲「群眾」像狗一樣，只怕幹部手裏的竹棒。 成千的村民在批鬥會中被指責為「地主」或「反革命份子」，批鬥會每天都有，歷時數月。許多人經常被打、被捆、被折磨，有些甚至被押入了遍佈該縣的特別勞動營[38]。

奉賢是黑暗來臨的一個可怕的警告。但是在高高脫離了地面的高層，仍然對人民群衆改天換地的力量充滿了無限的信心。1957年12月，

毛最信賴的同事之一陳正人，抨擊保守主義的「右派」壓制了群眾興修水利運動的積極性，由此吹響了大躍進的號角【39】。

4
吹響號角

一條泥濘的河流，貫穿中國的心臟，從青海的荒山，流經 5500 公里，進入渤海——這裏是北京附近的黃海的內海。河的上游是清澈的，經過一系列的懸崖和峽谷後，它蜿蜒地流過塵土飛揚的黃土高原，接受了風暴沉積下來的粉質軟泥沙。泥沙排入河流後，變成骯髒的赭石色。 下游水速減緩，黃土沉澱，河牀上升。它經過古城開封時，河牀比週圍的田地高了十米。每當河堤決口，平坦的華北平原很容易被淹沒，是這條河的有記錄可查的最危險的自然災害之一。開封本身就多次被淹沒、遺棄和重建。傳統的防洪設施是開溝和設堤，但收效甚微，河流每年攜帶大約 16 億噸泥沙而下。 在中國話裏，「黃河清」，是「豬能飛」的同義語。

另一種傳統的說法預示著大救星的出現：「聖人出，黃河清。」毛主席能馴服這條象徵著「中國的苦難」的河流嗎？早年有一張宣傳海報，毛坐在一塊巖石上，俯瞰河流，若有所思，也許他真的在琢磨如何治河哩[1]。就在拍攝這些照片的 1952 年，毛澤東視察了黃河，說了一句簡單而深奧的話：「一定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2] 工程師們隨後對計劃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毛則超然觀望，最後贊成建大壩的一派佔了上風。迷戀大壩工程的蘇聯專家測量了下游，決定河南三門峽是一個合適的地點。1956 年 4 月推出了一個正常蓄水位為 360 米的設計，這意味著近一百萬人將要搬遷，約 330 萬畝的土地將被淹沒。 這個項目於 1957 年 4 月正式啓動，儘管幾位水利工程師持保留意見。訪問過所有美國主要大壩、在美國學成的水文地質學家黃萬里，認為試圖

清除河道泥沙會帶來可怕的後果，用大壩阻擋污泥和黃土將使水庫短命，並最終導致災難。毛干預了。「這是為什麼？」是發表在 1957 年 6 月《人民日報》上的怒不可遏的社論的標題，是毛為反右派鬥爭發起總攻的動員令 。批判黃萬里的文章列舉了他一系列的罪名，其中有攻擊毛主席、反對共產黨，宣傳資產階級民主和崇洋媚外等等[3]；而黃萬里對三門峽大壩的不同意見則被置之不理。

1958 年年底，黃河截流了。這一規模巨大的工程，徵調了數以萬計的村民，搬運了約 6 萬立方米的土石。一年後，大壩修好了。水是清的。最初的設計提供了幾個出口和管道，使沉積物被引出大壩。但在匆匆忙忙按計劃完工時，它們被鋼筋混凝土擋住了。一年之內，沉積物開始緩慢上行，擡高了水位，使工業中心西安受到洪水的威脅。然後進行大規模重建，以清除沉積物，導致蓄水量下降。由於水位變低，花了巨大代價安裝的十五萬千瓦渦輪發電機根本用不上，必須轉移到另一個地點。河水不再清澈。到 1961 年，黃河的泥沙量增加了一倍，這一點周恩來自己也承認。鄭州以西的一段黃河含泥沙量高達 95%[4]。數年後，由於淤塞，只好禁止外國人訪問大壩[5]。

「大躍進」這個詞，首次出現在 1957 年底興修水庫的群衆運動中。毛澤東決心在十五年內超過英國，他發現，要加速工業化，關鍵在於用人力替代資本。 群眾是這個國家的真正財富，應當動員他們，在春耕前的冬閑季節改造農村。如果引水灌溉北方貧困鄉村的乾旱的表土，如果把南部亞熱帶的洪水控制在巨大的堤壩和水庫中，糧食產量就會猛增。全國各地數以百萬計的農民投入了水利工程。宣傳說，如果大家努力，他們就能在幾個月內實現他們的祖先用幾千年來一直在做的事情。在 1957 年 10 月，約有三千萬人被徵募。到了一月份，中國有六分之一的人在挖地。當年年底，超過五億八千萬立方米的巖石和土壤搬了家[6]。正在修建三門峽大壩的河南在此活動中堪為表率，因爲本地頭頭吳芝圃無情地推動勞動力加入這一獻禮運動。在河南和

安徽接壤的地區，是雄心勃勃的「治淮」運動（此運動後來開展了數十年）的中心，在1957年至1959年之間建成了一百多個大壩和水庫[7]。

在這個追求越大越好的國家里，到處出現了大型水利工程，儘管領導層把重中之重放在西北部。批評的聲音寥寥可數。毛澤東不信任知識份子，1957 年夏季已經迫害了數十萬在百花齊放中敢於表達不同意見的人。前面已經提到，從 1957 年末起，就通過反右運動，對黨的各級領導班子進行整頓，此刻，誰要是反對大躍進，就更容易被清洗掉。

以甘肅省為例，高層領導人如孫殿才和梁大均被打成「反黨」集團的頭目，並在 1958 年 2 月被開除。對他們的指控之一是，他們對興修水利運動的速度和規模表示懷疑：因爲他們算過，每灌溉 75 萬畝土地，就得付出 100 個村民的生命。他們的革職使得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有機會帶頭響應北京的號召。大約有 340 萬農民，佔甘肅勞力近百分之七十，被部署在水利工程上。許多村民建設了小型水壩和水庫，但不足以滿足領導。張仲良對未來有一個更大膽的設想，其中之一是修築一條大型水道，穿越雪山，跨過深谷，向該省的中部和西部地區供水，「引洮上山」，再流經 900 公里，從九甸峽至青羊[8]。在將乾淨的飲用水帶到全省乾旱的村莊後，甘肅省就會變成大公園，像北京的頤和園一樣鬱鬱蔥蔥[9]。

工程在 1958 年 6 月開始，並吸引了國家領導人的支持。 1958 年 9 月朱德元帥題詞：「引洮上山是甘肅人民改造自然的偉大創舉」。[10] 不過，這個項目一開始就受到諸多問題的困擾。頻繁的山體滑坡造成土壤侵蝕，水庫充滿淤泥，河流變爲泥沼[11]。參加工程的村民，不得不在山上挖窯洞作為寒冬的住房，覓食草藥以補充微薄的糧食[12]。到 1961 年夏天，工程停止，1962 年 3 月，工程被完全放棄。結果是，擁有灌溉面積：0 畝；國家付出資金：1.5 億元；出工天數：60 萬；人民所付成本：不可估量。在其高峰期，約 16 萬人次被要求為工程工作，

其中大部份是被調離農業的村民。至少有 2400 名死亡，有些出於事故，更多的人是爲暴政所迫，夜以繼日地從事奴隸勞動，以致活活累死[13]。就是因爲幹部瘋狂地驅使村民勞動，位於工程心臟的通渭縣，死亡率進入全國最高之列。慢性饑餓和普遍體罰，使得這個荒涼的山區變成恐怖的世界。

* * *

水利工程的進度以挖掘的土方進行衡量——這個魔術般的數字與工程的實際效用完全無關——然後在全國范圍內進行評比，以決定一個省的政治地位。專為監督該運動而設立的水利辦公室的副主任劉德潤後來回顧說，「我們的日常工作，包括給各省打電話，查詢他們正在建設的項目數量，參加的人數，搬運了多少土方。事後看來，我們收集的數據顯然被誇大了，但當時沒有精力去核實。」[14]

這場運動是北京定的調。在首都，毛澤東要求確保人人參與。由北京城往北大約 30 公里處，有一個寧靜的山谷，人口稀少，羣山擋住了北部吹來的風，這裏有地下陵墓，埋葬著明代列祖列宗和他們的后妃。大象、駱駝、馬、麒麟等神獸保衛著他們，神獸後面是人像塑成的出殯隊伍。這些皇帝現在受到批判：他們為自己建造了華麗的宮殿，而他們的臣民則暴露在泥石流下。1958 年 1 月，解放軍士兵開始在陵墓附近挖水庫。通過攔河築壩蓄水，以便定期向人們供水。軍隊派出了突擊隊。工程晝夜不停，人力由首都的工廠和機關提供，而報章和電臺則持續不斷地向公眾進行報道。

十三陵水庫是大躍進的旗幟，後來成為全國上下學習的一個榜樣。不久，來自首都的數萬「義務勞動者」加入了這一努力，包括學生、幹部甚至外國外交官。工作在各種氣候條件下持續進行，夜間也借著火把、燈籠和燈光進行。幾乎沒有使用任何機器：來參加勞動的人，領了鎬頭、鏟子、籮筐和扁擔，將瓦礫倒在鐵路貨車裏，然後運到大壩，在那裏磨成碎石。混凝土板用滑輪擡起來。1958 年 5 月 25 日，

毛澤東出現在群眾面前，他肩上橫著扁擔，挑著兩個裝滿土的筐，擺開姿勢，讓攝影師拍照[15]。這些照片出現在所有報紙的頭版，全國群情振奮。

來自波蘭的年輕學生 Jan Rowinski 參加了這個水庫的建設。他和其他志願者一樣，領到一根扁擔和兩個裝滿瓦礫的籮筐，沿著鐵軌勞動，戴著防曬草帽。勞動者被編為十人一組，十夫長的上級是百夫長，百夫長又接受更高的上級指揮。大家都睡在由軍隊支起的帳篷或農民小屋裏，上面掛著橫幅：「三年苦戰萬年福」。Rowinski 很快就領悟了，那些欺壓剝削百姓的帝王們，很可能就是使用了類似的策略——將成千上萬僅有一根扁擔的勞動者，融合成一支溫順而高效的工程隊，才把長城、大運河和十三陵建成的[16]。

主動提供幫助的外國顧問 Mikhail Klochko 也對此持懷疑態度。他說，他鏟的幾鍬土幾乎沒有宣傳價值，不過提供了一個值得歡迎的機會，使數百名工人騰出幾分鐘時間休息，來圍觀外國人挖土。大部份工作是無組織的。本來，幾百人用挖土機和貨車，可以比成千上萬徒手操作的工人做得更有成效。在工程期間，所有這些人都必須用車運來，還得解決他們的吃住問題[17]。

十三陵工程的匆忙上馬造成了重大失誤，1958 年 4 月，水庫出現滲漏。一位波蘭土壤固化專家被從格但斯克請來，凍結地面，以防漏水。拖了好久，大壩終於落成，在銅管樂隊的伴奏下，嘉賓政要讚揚毛澤東，並向億萬勞動者致敬[18]。由於水庫選址錯誤，幾年以後，蓄水量大大降低。

對於某些外國學生而言，在十三陵勞動可能是個令人興奮的事件，但大多數人害怕這種累活。毛澤東本人，在太陽下挖了半小時的土，就開始出汗，臉色通紅。「稍微動一動，就出了這麼多汗，」毛說，他就退到帳篷裏休息去了[19]。他身邊的人，包括秘書、保鏢和私人醫生，也被毛送到水庫。「幹吧，要是疲勞不堪，真的快要到嗚呼哀哉

了，就隨時給我報個信。」這些人被稱爲「第一小組」，是有特權的階層，睡在教室裏的褥子上，別人都睡在室外的草席上。他們也倖免於初夏的酷暑，被總指揮分配在夜班工作。毛的私人醫生李志綏是 38 歲的健康年輕人，但那樣的挖土和擡土是他一生最辛苦的工作。兩個星期後，他筋疲力盡，四肢酸痛，夜間冷得發抖，體內能量被耗盡了。第一小組沒有人自願繼續幹下去，即使是身強力壯的警衛員；但誰願意因爲要求退出而被稱為落後份子呢？幸運的是，他們被命令回到中南海【20】。

首都以外的地方，壓力更大。農村居民是運動的首當其衝者：他們沒有奢侈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像精英幹部們那樣，只幹兩個星期的活，就可以回家。他們集體行軍，到遠離家人的地方，連續幾個月，全天筋疲力盡地勞動，有時夜以繼日，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任由風吹雨打，經受嚴寒酷暑。

想知道在遠離政治中心的地方發生了什麼，可以看看雲南。這裏地處亞熱帶，有些村莊在 1957-1958 年冬春就開始造水庫，但當地黨的領導仍不滿意。 1958 年 1 月上旬，省委第一書記謝富治，這個幾個月後將向他的同事無情地開展反右鬥爭的人，抱怨農民太落後，沒有抓住冬季農閑大幹苦幹。 他要求每個成年人每天至少工作 8 小時，而這些水利工程勞動者的糧食消費量則應當壓縮【21】。1 月 15 日，《人民日報》把雲南列爲興修水利運動中表現最差的省份之一【22】。謝決心迎頭趕上，第二天就召開緊急會議。他下令，全省抽調一半勞力興修水利，每天勞動十小時，如有需要，通宵達旦。 怠工者必須受懲罰，要不惜一切代價達到指標。不稱職的幹部一律革職【23】。這是在反右運動中下達的命令，那個運動已經批鬥了數以千計的當地幹部，所以並非虛聲恫嚇。果然見桿立影。 1 月 19 日《人民日報》報導，雲南（幾天前剛受批評）現在已有 250 萬人，即三分之一的勞動力，在挖掘土方【24】。受到鼓勵的謝富治宣布，該省將在 3 年內全面解決灌溉問題【25】。

代價很高。在楚雄，有一個像海一樣大的高原湖，參加水利工程的農民經常被打罵。有些村民因偷了幾顆蔬菜而被捆綁，有些人因幹活不夠賣力而被幹部持刀刺傷。頑固份子被送進臨時勞動營。高層領導人知道後，1958 年 4 月雲南省委派出工作組到該縣去調查。希望來了，有個勇敢的人試圖請願，抱怨食物不足和勞動時間過長。在送給謝富治的最終報告中，他被定性為「反動份子」和「破壞份子」【26】。

省會昆明以東約 130 公里，在原始森林及沙石形成的崎嶇山地之間，有個陸良縣。1957 年，縣委因屈服於農民對糧食的「右傾要求」而受到省委的批評。 新的領導人縣委第一書陳盛年嚴格遵守黨的路線，組織軍人帶着皮鞭在村裏街上巡邏，確保村民即使生了病也必須下田勞動【27】。1958 年 2 月開始餓死人。6 月，水腫病廣泛出現，一千村民死於饑餓，其中大部份是建設西冲水庫的勞動者。水腫病發生，是因為液體積聚在腳、腳踝、腿部或身體其他部位的皮下。在發達的國家，它可能是因為吃鹽太多，或天熱時站得太久。但在貧窮國家，它是由於缺乏蛋白質，被認為是營養不良的症狀，有時也被稱為饑饉性水腫。陸良縣幾次派出醫療隊調查這些情況，但在反右運動中間，沒有人敢確定水腫是由饑餓引起的——對這個具有悠久的饑荒記錄的國家來說，這本來並不罕見。有些醫生說，它可能是一種傳染性疾病吧，開出的處方居然是抗生素，而不是休息和進食【28】。開始時還能用棺材埋葬，過了幾個月，屍體只用草席一裹，就被扔到工地附近的溝渠或池塘裏去了【29】。

雲南并不特殊。全國上下，在害怕被打成右派的幹部的驅使下，農民在大辦水利的運動中被推到饑餓的邊緣。毛自己也鏟過半個小時的砂石，應該懂得大辦水利的人力成本。1958 年 3 月，在聽取江渭清關於江蘇的水利工程的報告時，毛澤東沉思著說，「吳芝圃講搞三百億方，我看得死三萬人；曾希聖講搞二百億方，我看得死兩萬人；渭清講六億方，可以一個人不死。」【30】水利工程的群眾運動繼續了好幾年，

奪去了數以十萬計的已因饑餓而虛弱的筋疲力盡的村民的生命。作爲柬埔寨紅色高棉令人毛骨聳然的前奏，甘肅清水的村民將這些工程稱為「殺人的戰場」【31】。

5
衛星上天

不斷攀升的指標，配著美麗的彩色圖解，這些圖表和殺人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隨著指標在每一個可以想象的領域飛速飆升，從糧食和鋼鐵產量到農村挖井的數量，在口號世界與地面的現實之間，出現了一道黑暗的鴻溝。這種差距的壓力，來自毛澤東之手。在與地方領導的非正式談話之中，他鞭策和驅使他們保證達到更高的生產指標。

周小舟是毛澤東的家鄉湖南省的領導人，他行事穩重，是 1957 年 11 月毛發表高談闊論的第一批聽衆之一。「湖南的農業就是上不去，」毛澤東在訪問省會長沙時責問。「為什麼湖南只種一季稻？」周解釋說，湖南的氣候只適宜種一季稻。毛澤東指出，你這湖南，同浙江在同一緯度上，自然條件也和浙江相似，為什麼浙江能種兩季稻，你湖南只能種一季稻？「我看，你就是不吸取人家的好經驗，」毛澤東繼續道。「我們回去再研究研究，」周囁嚅地回答。「什麼研究研究，」毛搶白說。「我看你們是研究不出什麼名堂來的。回去吧，」他說完，就打發這位省委第一書記退席，自己兀自打開一本書，開始閱讀。被羞辱的周只好應允：「主席，我們回去就改種兩季试试。」毛没有理他[1]。

幾個月後，周的代表在北京見到毛，毛對河南大加稱讚：河南生產了全國一半的小麥，「你們怎麼看的？」然後他對湖南表示失望：盧森堡人口才 30 萬，年產 300 萬噸鋼鐵。湖南有多少人？[2]

毛澤東還派密友回老家灌輸這個概念。正如鄧小平是他反右派運動中最倚任的部下，負責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也是毛的忠實的追隨者。譚個子矮小，密集的頭髮，厚重的眼鏡，鱒魚般的嘴唇，他緊跟

毛澤東，是上海的後起之秀柯慶施的盟友。他以前的同事認爲他不夠厚道，是一個無情的以使命為重的人[3]。他建議被主席傳呼的同事，應該毫無顧忌地立即進行自我批評，不論自己是對是錯[4]。譚花了許多時間巡視全國，為支持大躍進而鞭策施壓。他對在湖南看到的情況非常不滿，認爲他們落後[5]。由於他指責該省在政治上落後，周小舟開始被迫誇大作物的數字[6]。

除了面對面地施壓外，電話也是施壓的重要工具。在中國這麼大的國家裏，它能使領導人和下屬保持聯絡，不論距離遠近。例如，在大煉鋼鐵的狂熱中，謝富治輪流給省內各縣委書記打電話，警告他們有落後於鄰居廣西和貴州的危險[7]。而謝富治又會定期得到冶金部的最新消息。例如，1958 年 9 月 4 日，北京打來電話告知最新的記錄[8]。然後 9 月 6 日，毛澤東的一個講話在電話會議上被傳達。接著是 9 月 8 日，薄一波談鋼鐵指標。 9 月 11 日，彭真講話。9 月 16 日，王鶴壽講話。在此期間，數不清的有關農業、工業和集體化的會議，從首都通過電話召開[9]。我們不知道電話的使用頻率有多高，據廣東的一位公社幹部估計，在運動的高峰期間的 1960 年，僅僅爲了確保密植，一個季度就開了大約九十次電話會議[10]。

壓力也通過毛澤東召集的黨的特別會議而貫徹落實。毛親自控制議程，思想掛帥，提高生產指標[11]。薄一波——曾經因爲反對毛的躍進因此必須接受考驗的計劃工作者——對毛的狂熱也作出了不小的貢獻。他在 1958 年 1 月的南寧會議上用「兩本賬」取代單一國家指標。毛又增加了第三本賬。它的運行如下：中央有一套必須實現的指標，而第二本賬則是預期要完成的高指標。這第二本賬下達到各省，成為他們的第一本賬，需要不惜一切代價達成。 同時又要求各省也有自己的第二本更高的賬，以反映他們預計要完成的目標，總共是三本賬。 然後向縣延伸，實際上又增加了第四本賬。如此層層加碼，從中央一路下到村裏，完成了狂歡式的浮誇，造成了指標的飆升[12]。

競爭進一步增加了政治壓力。在眾目睽睽之下，毛澤東不僅奚落膽怯的同事，稱讚激進的同事，而且喜歡將任何事、任何人亂比一通，藉以激發競爭精神。湖南與盧森堡比鋼鐵生產，中國與英國比工業產值，甘肅與河南比水利工程動員情況。這也體現在毛澤東在南寧向黨的領導人下達的指示之中：爲了力爭上游，全國必須互相評比。各級無休止的會議上的定期檢查評比，把省、市、縣、公社、工廠直到個人，分爲三類。根據他們的成就，「紅旗」授予先進份子，「灰旗」屬於中間份子，而「白旗」則是對落後份子的懲罰。這些象徵性的名稱，在下班後的群衆會上發佈，有時畫在黑板報上。這是一個可以任意侮辱人的社會，甚至可以把缺乏政治熱情的人打成右派分子。全國成為被定額、配額和指標支配的世界，揚聲器大聲播放口號，幹部在檢查和評價工作，委員會在不斷地給週圍的一切評級排名。評比的排名決定著待遇——最後落實到饑腸轆轆的勞動者能不能在食堂得到一瓢粥。毛澤東講得很清楚：「如何比？所謂『比』，就是『逼』。」[13] 一位縣幹部回顧了這樣的經歷：

> 那一年，我們把勞力集中起來挖井，春耕沒人管。地委開會評比，我們挖井得了「紅旗」，春耕得了「白旗」。我回來向縣委報告這個情況，縣委書記罵我：「你怎麼能扛著紅旗走，拿著白旗回來！」，我才意識到問題嚴重，我自己可能被打成「白旗」。所以我不得不離開將要分娩的哭泣的妻子，和染上破傷風的臨死的妹妹，趕回山上的工地。[14]

很快，全國上下都得了指標發燒癥，競相追逐農業和工業產值的離奇數字以引起注意。在黨的會議上發出各種豪言壯語，然後由強大的機器宣傳鼓吹，包括宣傳那些領導大家取得最新光榮紀錄的領導人。指標高不可攀，實現了新的高度則被稱為「放衛星」——這是向社會主義陣營上年送入太空的第一顆人造衛星致敬。「放衛星」、「火綫入黨」和「不分晝夜努力幹」是得到紅旗的方法。河南嵖岈山不久就

要成為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了（所謂「衛星公社」），1958 年 2 月設定了每畝地要打 560 斤小麥的指標。6000 名積極份子舉著橫幅、宣傳畫、傳單和標語在鄉間遊行，指標發瘋似地節節上升，到那年年底，他們承諾了傳奇般的每畝產量達到 5000 斤的目標。[15]

這種記錄被安排在「衛星試驗田」中實現，熱衷於創造新紀錄的幹部喜歡在這裏試驗高產。這些田一般僅限於集體農田中的一小片，但起了廣泛示範的農業新技術的作用。高產需要肥料。每一種可以想象的營養成份都被拋進農田，從海草、垃圾直到從煙囪裏刮下來的爐灰。動物和人的糞尿，由川流不息的人群挑到田裏，有時直到深夜。在這個帝國邊遠地區有許多少數民族，在傳統上把糞便視為髒物和邪僻，也首次建立了戶外廁所，民族情感受到凌辱。收集糞便的任務分配給受懲罰的小組[16]。後來，人糞又擴展到頭髮，廣東某些農村婦女被迫剃光頭以貢獻肥料，否則被禁止進食堂吃飯[17]。

普遍的做法是推倒泥巴和稻草修築的建築物，以便爲農田提供養料。牲畜住過的尤其是撒尿的地方，如馬廐，可以提供有用的肥料。開始是摧毀老牆和棚屋，隨後整個運動勢不可擋，往往整排房屋被夷為平地，土坯被砸碎，然後撒到田裏。座落在大別山南麓的湖北麻城，數以千計的房屋被拆毀，用來積肥。 1958 年 1 月，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表揚了這一水稻產量達到每畝 800 斤的模範縣。「向麻城學習！」《人民日報》狂喜地宣布。麻城的試驗受到了毛澤東的表揚，立馬成為聖地。在隨後的幾個月裏，吸引了五十萬名幹部，包括周恩來，外交部長陳毅以及財政部長李先念。到 8 月份，據說創造了每畝水稻產量 36956 斤的新記錄。「創造奇跡的時代：湖北麻城建國一社創造了畝產三萬六千九百五十六斤早稻的奇跡」宣傳機器這樣說[18]。

壓力無處不在，浮誇風失去了控制，人們用虛假的數字爭奪冠軍。麻城有個公社，婦聯主任率先獻出她的房子，讓它變成肥料。在兩天內，三百户房子，五十個牛欄，數以百計的雞舍被拆掉。到年

底，約五萬座建築被拆毀[19]。全國各地的其他公社不甘落後，紛紛效仿。廣東大石也是個名揚全國的公社，其標誌是「五萬斤大學」和「萬斤田」，當地幹部砸碎了西二村的一半房屋[20]。爲了出奇制勝奪高產，江蘇省部份地區，土地居然被蓋上了白糖[21]。

深耕是另一個革命性的配方，可以使農民從莫名其妙的土壤中解放出來。有人說，種得越深，根就有劲，莖就高大，至少這是這個實驗背後的邏輯。「用人海戰術，把耕地全部翻一遍。」毛下令說[22]。如果在水利工地上鏟砂石是辛苦的，那麼深耕（深挖的要求從一尺至三尺多，有時甚至達九尺）可以使人完全精疲力竭。沒有工具的地方，農民們用手挖土，有時打着火把，通宵達旦地勞動。在渴望成爲夢寐以求的「紅旗」的幹部的驅使下，村民有時挖到基巖，把生土翻上來，破壞了熟土層。到 1958 年 9 月，約一億二千萬畝耕地被深耕約一尺，但領導仍要求更多，要求達到至少二尺深[23]。

接着是密植，以達到更高的產量。起初這些半生不熟的實驗是在人工试驗田裏進行，但隨後幾年，在激進幹部的監督下，密植被擴散到其他田地。在廣東刁坊這個貧瘠的山區，在 1960 年饑荒期間，每畝地被播撒高達 40 斤穀種[24]。該省其他地區，農民被要求在每畝地上播下 30-37 斤的種子。結果收割時，每畝的產量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 70 斤花生[25]。

密植是耕作制度的基石。種子似乎也有革命精神，既然它們屬於同類，大概也應當平等地享受陽光和養份。毛主席這樣解釋：「有了朋友就比較容易，一起長大會更舒適。」[26] 村民們往往被指使將秧苗從相鄰的田地轉移到試驗田，將苗叢緊密地擠在一起。村民們世世代代耕種土地，當然知道如何照顧他們賴以爲生的寶貴資源。許多人表示懷疑，有些試圖和幹部講理：「秧插得太密，密得不通風，要分田又下二百擔水糞，不悶死是個舅子」。幹部不理他，說「這是新技術，你們不懂。」[27]

大多數村民經歷了 1957 年以來一系列的反右運動，變得精明了，不在公共場合表示反對。每一位因本書受到採訪的倖存者都有一個類似的故事：「道理大家都懂，但沒有人敢說話。如果你說了，他們會打你。我們有什麼辦法？」[28] 另一種解釋是：「無論政府說什麼，我們都必須照辦。如果我說錯了話，如果說我反對總路線，我就會被打成右派。沒有人敢說話。」[29] 在浙江衢縣一個村裏發生的事就是很好的例子：大鍋飯的竈設在田裏，沒有人可以離開，不管你是需要餵孩子的媽媽，還是需要休息的老人。大家不得不通宵突擊，因為幹部把回村的路封鎖了。反對密植的人，被黨員積極份子毆打。沒有幹勁的倔老頭被拽住頭髮，推入溝渠。村民們被勒令拔出秧苗重新栽插[30]。

參觀訪問都經過精心的舞臺式的策劃。在麻城，村民們被警告，不能在參觀者面前說大躍進的壞話。省領導王任重視察田頭時，他看到的成堆稻米是農民被迫精心為他的訪問而安排的[31]。在徐水縣，縣委第一書記、轉業軍人張國忠，無情地確保呈現給外部世界的必須是是一幅完美無暇的畫面：把落後份子關在勞動營裏，這種勞動營從縣到每一個公社、大隊和生產隊都有。為了「刺激生產」，落後份子在被關押前必須首先遊街示衆，1958 年至 1960 年間大約七千人被抓[32]。在廣東羅定，前來視察的領導們在 1958 年年底參觀連灘公社時，受到年輕的女孩、昂貴的香水、雪白的毛巾、和十六盤菜肴的豪華宴會的歡迎。數十名農民工作了幾天，把一個讚美人民公社的巨大口號刻在山頭[33]。陪同毛澤東訪問的李志綏被告知，農民被迫將水稻移植到主席的訪問路線，爲了給人一個大豐收的印象。這位醫生評論說，「全中國是個大舞臺，所有的人都在為毛進行大匯演。」[34] 但在現實中，一個獨裁政權永遠不會只有一個獨裁者，因爲許多人願意在他們的上司面前爭寵。 這個國家到處都有地頭蛇，每個人都在向上級欺騙，使上級相信他們的成績是真實的。

毛澤東很高興。全國各地送來關於棉花、水稻、小麥和花生的新紀錄，他開始考慮如何處理多餘的產品。 1958 年 8 月 4 日在徐水縣，在張國忠的陪同和記者的包圍下，穿戴著草帽和布鞋的毛緩緩走過地頭，微笑道：「這麼多糧食怎麼吃得完啊？糧食多了你們怎麼辦啊？」「我們糧食多了換機器。」張想了一下回答。「又不光是你們糧食多，哪個縣糧食都多，都想換機器，人家才不要你的糧食呢！」毛仁慈地微笑道。「我們拿山藥造酒精，」另一個幹部建議道。「每個縣都造酒精！哪裏用得了那麼多酒精啊！」毛澤東若有所思地說。「糧食多了，以後就少種一些，一天幹半天活，另外半天搞文化，鬧文化娛樂，辦大中小學，你們看好麼？……你們農業社員自己可以多吃糧嘛！一天吃五頓也行嘛！」[35]

終於，中國找到了一條走出赤貧的出路，解決了饑餓問題，生產了吃不完的糧食。隨之而來的全國各地的報告聲明，豐收是前一年的兩倍，其他領導人也加入了大合唱。分管農業的譚震林，視察各省，給地方領導鼓勁。他分享毛澤東的共產主義仙境的遠見，農民在那裏吃著燕窩之類的美味，穿著絲綢、緞子和狐皮大衣，住在有自來水和電視的摩天大樓裏。每個縣都有一個飛機場[36]。譚甚至認爲，中國已經將蘇聯遠遠地甩在後面：「有些同志會問，爲什麼我們這麼快，蘇聯到現在還搞好社會主義而不搞共產主義？這裏不同的一點就是我們有一個『不斷革命論』。蘇聯沒有這一條，或者抓得不緊。我們是一個革命接着一個革命……人民公社化就是共產主義革命！」[37] 陳毅則認為，由於在未來幾年可以儲存足夠的糧食，農民應該休耕兩季，把時間用來建設現代化別墅[38]。地方領導人的響應也同樣熱烈。 1959 年 1 月，國務院不得不制止各公社紛紛向北京派送證明農業新紀錄的人員、信件和禮物。 毛主席被大躍進衝昏了頭腦[39]。

6
鳴炮發令

1958 年 4 月，十月革命慶典前送入軌道的第二號人造衛星返回大氣層，流浪狗萊卡的遺體隨著衛星解體而燒毀。當這口太空棺材環繞地球的時候，下面的世界變了。由於受到俄國人揭示的導彈差距的刺激，艾森豪威爾總統將彈道導彈送到英國、意大利和土耳其。赫魯曉夫以攜帶核導彈的潛艇作爲回應。但是，要使他的威懾可信，必須在太平洋上建立潛艇基地，需要無線電發射站。莫斯科向北京建議在中國沿海建立長波電臺，暗示這些電臺可以為一個聯合潛艇艦隊服務。

7 月 22 日，蘇聯大使尤金向毛主席提出了這一建議。毛澤東大怒。在勢如暴風雨的會議上，他攻擊了這個倒楣的大使，聲稱：「你們就是不相信中國人，只相信俄國人。俄國人是上等人，中國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腳的，所以才產生了合營的問題。要合營，一切都合營，陸海空軍、工業、農業、文化、教育都合營，可以不可以？或者把一萬多公里長的海岸線都交給你們，我們只搞游擊隊。你們只搞了一點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權？」毛澤東繼續說，赫魯曉夫對中國就像貓戲老鼠【1】。

這突如其來的發作，出乎俄羅斯人的意外：毛澤東看到陰謀無處不在，他確信，聯合艦隊的建議是赫魯曉夫背棄去年作出的提供原子彈的承諾的手法，沒有足夠的解釋可以消除毛澤東的疑心。【2】

7 月 31 日，赫魯曉夫飛到北京想挽救局勢。但是，儘管莫斯科七個月前盛情款待了毛澤東，蘇聯領導人卻在機場受到了冷遇。「沒有紅地毯，沒有儀仗隊，沒有擁抱，」翻譯李越然回憶道，去迎接的毛澤

東、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都板著面孔[3]。赫魯曉夫被降級住在遠離北京的沒有空調的山上。晚上他不得不把牀搬到陽臺上避熱，結果遭到成群的蚊子圍攻[4]。

赫魯曉夫到北京後，中南海立即舉行了一個漫長而屈辱的會議。 這位蘇聯領導人被迫長篇解釋尤金的意見書，並煞費苦心地化解顯然被激怒的毛澤東。毛澤東很不耐煩，一度跳出了座椅，在赫魯曉夫的面前比劃著手指：「你講的這一大堆毫不切題。我問你，什麼叫聯合艦隊！」赫魯曉夫臉漲得通紅，勉強保持平靜[5]。「你真的認為我們是紅色帝國主義？」他被激怒了。對此毛澤東反駁說，「有一個人叫斯大林的人」把新疆和滿洲變成了半殖民地。經過更多的有關真實的或想象的無禮的爭吵，這個關於聯合艦隊的想法被完全摒棄了[6]。

第二天跟著更多的屈辱，毛澤東只穿浴袍和拖鞋，在中南海游泳池旁會見赫魯曉夫。毛澤東知道赫魯曉夫不會游泳，故意把他置於難堪的處境。赫魯曉夫在淺水區抱著一個大號救生圈撲騰了一會之後，踉蹌著爬上岸，把腿放在水裏笨拙地搖晃。毛則來回暢遊，向他的客人炫耀不同的游泳姿勢，然後仰泳，悠閑地漂在水上[7]。翻譯們則在泳池邊上來回奔跑，試圖捕捉主席的政治冥想。毛澤東後來向他的醫生解釋，他這樣做是在「用針扎赫魯曉夫的屁股」[8]。

半年前毛已在莫斯科和赫魯曉夫開始了爭奪戰。現在，他的客人垂頭喪氣地坐在水池旁，毛主席一邊踩著水，一邊談論大躍進的成功。「我們有這麼多稻米，簡直不知道拿它怎麼辦，」他吹噓，呼應劉少奇數天前在機場告訴赫魯曉夫的話：「我們現在發愁的不是糧食不夠吃，而是糧食多了怎麼辦？」[9] 困惑的赫魯曉夫禮節性地說，他無法幫助毛澤東解決這個難處。「我們這麼努力都沒能建立良好的糧食儲備，」赫魯曉夫想，「中國餓得慌，他卻告訴我有太多的稻米！」[10]

多年來，毛澤東一直在觀望赫魯曉夫。現在，他對他頤指氣使，駁回建立潛艇基地的要求，不顧設立無綫電臺的請求。蘇聯代表團空

手而歸。但這不是事情的結束，毛澤東決心在世界事務中採取主動。幾個星期之後，8 月 23 日，在沒有預先向莫斯科通報的情況下，毛澤東下令對臺灣海峽蔣介石控制下的金門和馬祖島開始炮擊，引發了一場國際危機。 美國立即加強了自己的海軍部隊，並為臺灣的一百架噴氣式戰鬥機裝備了空對空導彈。 9 月 8 日，莫斯科被迫採取支持北京的立場，宣稱襲擊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被視為對蘇聯的進攻【11】。毛興高采烈。他迫使赫魯曉夫將核保護傘延伸到中國，同時破壞了莫斯科緩解與美國緊張關係的企圖。他對他的醫生說，「這兩個岛就是我指揮赫魯曉夫和艾森豪威爾跳舞的指揮棒，讓他們跳過來跳過去。你沒見他們跳得有多漂亮？」【12】

但炮擊這些島嶼的真正原因與國際局勢沒有任何關係。毛想要營造一種緊張氣氛以促進公社化：「緊張局勢除了有害的一面外，還可以調動人馬，調動落後階層，調動中間派起來奮鬥……我們現在搞民兵，人民公社裏頭都搞民兵，全民皆兵。」【13】臺海危機為整個國家的軍事化提供了最終的理由，一個當時在中國學習的東德人把這種軍事化稱為「軍營共產主義」，或共產主義軍營，它在人民公社中得到了充份的體現【14】。

7
人民公社

和赫魯曉夫在游泳池會面後的第二天，毛澤東傳喚李志綏。凌晨三時，主席要這位醫生教英語。吃早飯時，毛澤東輕鬆地遞給他一份關於模範省河南建立人民公社的報告。「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毛澤東對把小農業合作社合併成巨大的集體激動不已。「『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1] 難道這就是斯大林從來沒有發現的通往共產主義的橋樑？

1957 年秋天興修水利運動開始不久後，農業合作社就開始融入更大的實體，特別是在那些要求大量投入勞動力的地區。其中一個最大的集體出現在河南嵖岈山，那裏大約 9400 戶人家，融合成一個巨大的行政單位。但人民公社的靈感可以追溯到徐水縣。

徐水位於北京以南一百公里，地處華北，氣候乾燥，塵土飛揚，冬天嚴寒、春天發洪水，鹼性的土壤幾乎不能生產足夠的糧食供村民生存。這個約三十萬人的小縣城迅速得到主席的注意。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動員興修水利就像動員士兵作戰。他徵召十萬男勞力，把他們按軍隊編制，組成營、連、排。他把這支部隊安排在遠離村莊的曠野，讓他們睡臨時營房，吃集體食堂。

張的做法非常有效，在 1957 年 9 月吸引了北京領導的注意[2]。譚震林就是被震住的人之一：「徐水縣」，他於 1958 年 2 月說，「已經在興修水利方面開創了一個新的經驗！」通過將村民們組織為紀律嚴明的部隊，讓他們接受軍事化的調度。張同時解決了勞力和資本的問題。其他縣因爲男人離開農田，參加水利，面臨勞動力短缺，他部署

他的部隊繼續革命，解決了一個又一個項目。關鍵詞是「軍事化」,「戰鬥化」和「紀律化」。每個大隊負責灌溉 105 畝地，要求達到年產 10 萬斤糧。「苦幹兩三年，改變自然環境，」張解釋。「短短兩個季節，就會出現大躍進！」譚興奮地說[3]。毛澤東讀了報告後指示：「徐水縣的經驗應普遍推廣」[4]。

幾週後，《人民日報》為徐水縣歡呼，認爲勞動力軍事化是成功的關鍵[5]。然後，在《紅旗》雜誌 1958 年 7 月 1 日發表的一篇短文中，主席的代筆陳伯達暢想象民兵那樣，把農民們有秩序地組成一個大公社：「全民武裝是完全必要的」[6]。在宣傳白熾化的時候，毛周遊全國，訪問河北、山東和河南，讚美將農民編為營和排的方式，並稱讚食堂、托兒所和養老院，因爲它們解決了婦女的家庭負擔，而將她們推到第一線。「人民公社好！」他宣布。中國到處大動員，那個夏天，全國各地的幹部爭相將合作社合併成公社，規模平均高達兩萬農戶，組成一個基本行政單位。到 1958 年年底，全國農村被組織成爲大約 26000 個人民公社。

在領導們每年度假的海灘勝地北戴河，豪華的大別墅俯視著渤海，毛認為他正站在千年突破的邊緣。1958 年 8 月 23 日，在金門的重炮即將開始猛擊時，他對斯大林的物質刺激體制表示不屑一顧。「糧食多了，可以搞供給制……我們現在搞社會主義也有共產主義的萌芽。」人民公社是通往共產主義的金橋，所有食物都將免費：「如果做到吃飯不要錢，這是一個大變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產品非常豐富，道德非常高尚，我們就可以在吃飯、穿衣、住房上面實行共產主義。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7]

在夏天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大出風頭的張國忠，響應毛澤東的指示，自信地預測共產主義將在 1963 年到來[8]。9 月 1 日《人民日報》宣布，在不太遙遠的將來，徐水縣人民公社將把社員領到人人各取所需的天堂[9]。在全國上下一片欣喜之中，劉少奇一個星期之後參觀了

該公社。他比其他人都更早地預告了共產主義的到來，早在七月份，他就告訴一家供電廠的工人：「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多數人可以看到共產主義。」他又說，赶超英國，已經不需要十年：兩三年就夠了【10】。現在，他看到了公社，他推動供給制，食物、衣服、住房、醫療和其他基本生活需要由公社免費提供【11】。到月底，在一個有成千上萬黨員積極份子參加的大會上，山東范縣鄭重保證將最晚在1960年實現共產主義。毛澤東欣喜若狂。「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12】

人民公社滿足了地方幹部對勞動力的不斷增長的需求，因為他們迫切地想完成大躍進中的繁重任務。1958年10月上旬，雲南領導人謝富治下令農村組成人民公社，因爲當時需要進行大辦工業，同時田裏又是秋收大忙時節。然而，村民們沒有這麼熱情高漲。隨著日常生活開始按軍事方式組織起來，村民變成了步兵，不得不在「營」和「排」的「前線」「作戰」，而「突擊隊」則隨時可能在「運動戰」中「開赴戰場」。一個革命者在社會上的地位是一個「哨兵」，而從事大型項目的群體則是一支「大部隊」【13】。

軍事術語配以軍事組織。「全民皆兵，」毛澤東宣布，群衆性民兵的形成，有助於將社會的其他成員組織成人民公社：「過去搞軍隊，沒有薪水，沒有星期天，沒有八小時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軍民打成一片，成千成萬的調動起來，這種共產主義精神很好……這一回要恢復軍事傳統。」他解釋說：「蘇聯的軍事共產主義是餘糧徵集制，我們有二十二年軍事傳統，搞供給制是軍事共產主義。」【14】

「什麼導彈、原子彈都嚇不倒中國人民，」《人民日報》在炮擊金門時怒吼，全國上下，緊密團結如一人，隨時準備反擊帝國主義勢力：兩億五千萬男女將化為兵的海洋【15】。到了十月，在四川，三千萬民兵每晚花兩個小時進行軍事訓練。在山東，兩千五百萬壯士成爲鋼鐵和糧食生產「前線」的「主力軍」。莒南縣就有七萬民兵在深翻土地的戰

役中頂替了五十萬村民。在黑龍江，有六百萬民兵，佔年輕男子的十分之九[16]。譚震林為民兵拍手叫好，規定每個成年人應該學會用槍，每年打三十發子彈[17]。不過，實際上很少人帶槍，許多人僅僅是擺擺樣子，勞動之餘，在田頭拿著老式步槍，漫不經心地受訓。但一部份人進行實彈演習，被培訓為基幹民兵[18]。他們是軍事化的骨幹份子，不僅在建立公社的狂熱中，而且在後來幾年的饑荒中。

全民皆兵運動和一小部份訓練有素的戰士把軍事組織帶到每一個公社。全中國的農民在黎明的號角聲中被驚醒，排隊到食堂快速喝碗稀粥。勞力們在口哨聲中集合，邁著軍人的步伐到田頭，舉著橫幅和旗幟，唱著行軍的歌曲。大喇叭時而大聲號召鼓足幹勁，時而播放革命音樂。黨員積極份子、當地幹部和民兵執行紀律，有時以毆打來懲罰落後群衆。一天結束時，村民們回到根據工作輪班而安排的住處。晚上開會，評比每個人的戰績，總結鬥爭策略。

勞動由公社進行分配，男人婦女由小隊領導指揮，往往沒有足夠的報酬。麻城黨委書記張先利這樣解釋：「現在成立公社除一把夜壺是私人的以外，連人都是公家的。」貧農林生其理解為：「幹部要你怎麼做，你就得怎麼做。」[19]結果是把工資實際上取消了。每個生產隊的成員，在組長的監督下勞動，按一套複雜的辦法記工分，以小組整體的平均表現為基準，考慮到任務的完成情況和每個勞力的年齡與性別。到年底，把每個小隊的淨收入「按需」分配給成員，而「剩餘」的部份原則上根據個人累積的工分分配。但實際上幾乎不存在「剩餘」部份，因為被國家取走了。而且工分在大躍進中迅速貶值。南京附近的江寧縣，1957 年一個工作日值 1.05 元。一年後，跌到 0.28 元。到 1959 年，它的價值只剩下 0.16 元。當地人稱工分制是「用黃瓜敲鑼，越敲越少」：你打得越重越聽不到，因為所有獎勵都已經被取消了[20]。

有些人從來沒有得到過報酬。1961 年 2 月，湖南湘潭縣有個受訪的壯實小伙子陳玉泉回憶說，他 1958 年總共收入四元五角，用這錢買

了一條褲子。第二年，他被派到一個不記賬的煤礦，一分錢也沒有拿到[21]。有些公社完全取消了錢。廣東龍川縣，賣豬的村民得到的是欠條而不是現金，促使人們把牲畜殺了自己吃[22]。但許多村民不得不向公社借，於是欠債纍纍。李爺爺必須靠整天挑糞來養活長期患病的妻子和五個孩子，從來沒有得到任何現金：「我們這樣的人沒有錢，我們債都還不清。我們要向公社還債。」[23]川北理髮師馮大伯在饑荒時需照顧一家九口人，不得不借糧度日，以致於到2005年他還在還債。[24]

在最激進的人民公社，自留地、大農具和牲畜必須歸集體所有。人們一般只被允許保留生活必需品。就像四川領導李井泉所說：「生活集體化，連屙屎也要集體化！」[25]作爲對策，村民試圖挽回盡可能多的財產。他們屠宰牲畜，埋藏糧食，出售各種用品。公社化運動一開始，廣東東北部丘陵地區的農民胡永明殺了四只雞，第二天殺了三只鴨子。然後三只母狗，然後小狗。最後，把貓也吃了[26]。大家都一樣，農民們吞噬家禽和牲畜。廣東農村，先吃雞和鴨，其次是豬和牛。熱衷於數字的當地幹部，認為在公社化之際單是豬肉和蔬菜的消費就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大家怕充公，就盡量消費自留地的作物[27]。在廣東有句俗語，「吃落肚子才是自己的，留在肚外不知是誰的」[28]。

類似的場景隨後也在城市出現，儘管城市公社化的企圖數年後被普遍放棄。1958年10月的頭幾個星期內，廣州有個地區銀行，50多萬元被提取[29]。在武漢，銀行出現挤兑，東方公社成立的兩天之內，五分之一的存款被提走[30]。有些手工業者，甚至賣掉了他們賴以為生的縫紉機，其他有些人則拆下家裏的地板當燃料賣[31]。一些過去很節儉的人怕自己的儲蓄將被充公，開始揮霍。普通工人買了昂貴的香煙和其他奢侈品，有些人甚至大吃大喝[32]。謠言反映著集體的恐懼：聽說某村每個人只許有一條毯子，其他一切充公，「連衣服都標了號碼[33]」。

在增加產量和指標不斷提高的驅使下，住宅也被充公：畢竟公社需要磚來建藍圖上的食堂、宿舍、托兒所和養老院。我們已經看到，

在麻城，房屋最初被拆毀作肥料，這一趨勢，隨著人民公社的出現而變得更加糟糕。 全縣村民們開始合住房子，有些家庭只能住在臨時搭建的棚屋裏。頑抗的農民被告知「不搬不發給口糧」。有些村莊提出宏偉的現代化遠景，使拆除舊房子變得有理。在龜山公社，三十座民房被推倒，為烏托邦計劃讓路，這個計劃是用平坦的街道和高樓大廈取代塵土飛揚的小巷和土屋。結果是新房子一座也沒建成，有些家庭住在豬圈或廢棄的寺廟裏，屋頂漏雨，泥坯和稻草堆砌的墻透風。「毀我的家，比挖我的祖墳還壞，」一村民憤憤訴說。但敢這樣抱怨的人很少。更多的人默默地站在一邊，流著眼淚，當地幹部則一言不發地巡視著，用手指指著將要繼續拆毀的房子【34】。四川墊江縣高安區高安公社，一支十一人的隊伍焚燒了數百個乾草屋。「一晚消滅茅草房，三天內實現居民點，100 天實現共產主義」是主導口號。有些村莊被完全清空，但不知何故，拆屋之後，就沒有建設新房的下文了【35】。拆房的目的之一，也是爲了在農村軍事化的運動中把男女分開。在甘肅靜寧，在省領導張仲良命令下，約一萬民房在大躍進期間被拆毀。大多數流離失所的人最終沒有像宣傳的那樣，住上人民公社的宿舍，而是住到街上，流離失所【36】。

除了最貧困的村民，大多數人不喜歡食堂，因為大食堂難以滿足不同的食欲、口味和飲食習慣。有些人不得不步行幾公里才能走到食堂。根據湖南省領導周小舟調查，超過三分之二的村民都反對公共食堂【37】。在全國各地，幹部不得不施加壓力，強迫村民參加食堂。麻城縣有一個簡單有效的辦法，就是停止對村莊供應糧食。但是家裏有糧的人仍然不進食堂。他們被指責為「企圖破壞人民公社」的「富農」。於是民兵介入，巡邏街道，向煙囪冒煙的家庭罰款。 最後一招是挨家挨戶沒收糧食和餐具【38】。

他們一旦進入食堂，就憤憤不平地看著用充公來的資金、糧食和家具建立的新設施。麻城有個公社，充公了大約一萬件家具、三千

頭豬和五萬七千公斤糧食，以及從自留地砍來燒火的無數樹木，送入食堂[39]。村民們勞動受剝削，財產被沒收，家園被拆毀 ，現在他們有了機會分享他們領導人的美夢：共產主義即將來臨，國家將提供一切。「按需分配」被人們從字面上進行理解，大家盡可能多吃。大約有兩個月時間，全國各地許多村莊，大家都根據毛澤東在徐水縣的指示，「敞開肚皮吃飯」，「你們應該多吃。一天五頓也可以嘛！」特別是在一些非產糧區——例如產棉區，人們更放開吃飯，因為糧食由國家提供。人們使勁填肚子，有些甚至因爲食慾不振而挨罵。剩餘的飯被成筐地倒入廁所。有些隊舉行比賽，看誰最能吃，小孩子因爲跟不上而掉眼淚。有些地方遵照毛的話，以一天五餐「放衛星」。本來足夠供一個村吃半星期的食物，一天就不見了[40]。在江蘇江寧縣，一些村民一口氣就狼吞虎咽一公斤大米。城市的消費甚至更加過份，1958 年年底，南京有個車間一天就往陰溝裏傾倒大約一百斤大米。饅頭堵住了廁所。一位一絲不苟的檢查員發現，污水缸底部沉積的米飯達三十公分厚。有些工廠，工人一天囫圇吞下二十碗飯，剩菜被送去喂豬[41]。但好景不長，無以爲繼。

8
大煉鋼鐵

斯大林以犧牲農業為代價發展工業，強制徵糧搶光了農村的財富。為了尋找不同於蘇聯的模式，毛澤東逆其道而行之，他把工業帶到村裏。依靠廉價的創新和不要求大量投資的本土技術，人民公社的工業產值可以立即提高，從而導致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反過來也會激發村民實現更大的經濟目標：這是沒有大量外資的情況下使落後的農村實現工業化的關鍵。小資產階級專家被嚴厲指責為保守的右派，而樸素農民世俗的智慧得到讚美。雲南省委書記謝富治公開譏諷蘇聯專家建議的地質測量和技術調查，主張應該依靠群眾的智慧來建設水壩和水庫[1]。直觀的知識和本土的智慧，而不是外國的專業知識，將發動廉價和有效的創新，推動中國的村莊超越蘇聯。 農村將通過由普通農民在研究機構中開發出來的簡易設備而機械化。「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毛澤東在一份顯示工人自己建造了拖拉機的報告上寫道[2]。或如謝富治聲稱，「我們算不算是神仙？我們是神仙，可能算第一種神仙，也可能算第二種神仙，別的星球上可能有人，他比我們高明，我們就算第二種。我們比他們高明，就是第一種。」[3]

勞動模範推動了黨的宣傳。河南一個從未上過學的貧窮農民何定設計了一套木製的機械搬土系統，通過空中纜繩運送，自動卸土自動返回，將水庫勞動量減少了八倍[4]。木製傳送帶、木製打穀機和木製水稻插秧機，都被譽為普通人的奇蹟。在陝西省，當地村民甚至發明了汽車和機車：每一部件都由木頭製成[5]。其中大多數人是很單純的，但浪費可以達到巨大的程度。在廣東刁坊，在公社機械化運動

中，一夜之間從居民家中拆下來了大約兩萬兩千根棟梁和樓板。造出的大車搖搖欲墜，一試用，就散架了[6]。

但是，真正的基礎是鋼。這是為社會主義增光的材料。它堅硬，有光澤，代表著工業、現代化和工人階級。 以「斯大林」即鋼鐵命名的那一位，就是個立志粉碎一切敵人的鋼鐵般的革命者。冒著煙的廠房、呼呼作響的機牀、鳴叫的汽笛、高聳的發出紅色光芒的高爐：這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神聖圖景。工人詩人阿列克謝·加斯捷夫（Alexei Gastev）寫道：「我們是鋼鐵練成的。」在這個人和鋼融合在一起的世界中，機器成為人，人成爲機器。鋼鐵是社會主義煉金術的神聖材料。 鋼鐵產量在社會主義國家是個神奇的數字，以宗教般的狂熱被傳誦。鋼產量神奇地抽掉了人類活動的所有複雜層面，使之成為一個單一的精確數字，代表著一個國家的發展規模。毛澤東可能不是什麼工業專家，但他似乎能輕而易舉地背出幾乎每一個國家的鋼產量。他的腦子裏全是鋼鐵，超過英國日益意味著超過它的年度鋼產量。鋼是指標升級的原動力，他要努力推動增加鋼產量。1957 年生產了 535 萬噸鋼。1958 年 2 月，把 1958 年的目標定為 620 萬。5 月，修改為 850 萬噸。6 月，毛澤東決定，當年應該生產 1070 萬噸。然後，9 月份，再一次確定為 1200 萬噸。毛澤東在玩弄數字的同時開始相信，到 1960 年年底，中國將趕上蘇聯；在 1962 年，年產一億噸鋼，超過美國。然後中國將拉開距離，在幾年內達到 1.5 億噸。到 1975 年，將生產鋼鐵 7 億噸，使大不列顛望塵莫及[7]。

毛澤東的胡言亂語受到他的一些親密同事的鼓勵。例如李富春說，感謝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中國的發展速度可以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英國在短短七年之內就會被超過。然後，他提出了一個宏偉的計劃，尋求在三年之內在鐵、鋼和其他工業商品上超過英國[8]。1958 年 6 月上旬，毛在泳池邊上懶洋洋地問冶金部長王鶴壽，鋼產量能不能增加一倍，部長回答說，「沒問題！」[9] 柯慶施吹牛，華東就

能夠生產 800 萬噸[10]。省領導如王任重、陶鑄、謝富治、吳芝圃和李井泉，都對鋼鐵生產作出慷慨的保證，助長了主席高瞻遠矚的衝動。

成功的關鍵是在每個人民公社後院建立由村民操作的小高爐，用砂、石、耐火粘土或磚建構，這事相對簡單，可以使村民人人動員起來為超英而努力。一個典型的小高爐，大約三四公尺高，頂上有一個木製的平臺，由橫梁支撐著。一個傾斜的坡道與爐連接，農民飛快地跑上跑下，肩上背著或扁擔挑著焦炭、礦石和助溶劑。在底部鼓風，鐵水和爐渣通過龍頭排放。這些基於傳統的冶煉古法，有些可能工作得很好，但大多是騙人的，是被緊跟大煉鋼鐵運動的幹部強加給公社的。

運動在 1958 年夏末達到了高潮。同年早些時候被貶黜的黨的計劃工作者陳雲被要求負責這一運動，通過工作，將功贖罪。 8 月 21 日，他傳達了毛澤東的命令，決不容忍比指標少一噸，完不成計劃的懲罰是輕則警告，重則開除出黨[11]。為了保持勢頭，毛澤東在 9 月訪問了武漢，為一個在蘇聯幫助下建立的大型鋼鐵聯合企業揭幕，參觀第一爐鐵水出爐。同一天，北京派出 1500 名黨員積極份子到全國各地，為大煉鋼鐵督戰[12]。接著，9 月 29 日被指定為達到更高的目標以慶祝國慶的一天。國慶之前兩星期，冶金部長王鶴壽在一次電話會議上，要求各省領導迎接挑戰。這些省領導次日又通過電話，對縣領導們進行動員[13]。

在雲南，謝富治下令，人人應該成為大煉鋼鐵的士卒，晝夜突擊兩個星期，以增加產量[14]。黨員積極份子在早上分頭出擊，有些人在天亮之前就到達了偏遠鄉村。在德宏縣，二十萬村民被捲入運動，數以千計的小高爐的火光，把天空照成了深紅色。村民被派遣到到森林中去尋找燃料，其他人則收集煤炭，有時在野外用鏃頭、鐵鍬和手挖掘。在實現指標的狂熱中，事故頻繁。樹木有時候倒下來砸到村民，沒有經驗的工人使用爆炸裝置開礦也導致人身傷亡[15]。謝富治定期打

電話檢查最新成果【16】。而他自己又被薄一波鼓動，後者傳達了1200萬噸的新目標，吹噓全國約有4000萬名工人在操作大約50萬座小高爐【17】。國慶日，薄一波宣布，十月份應該是鋼鐵生產的躍進月。緊跟著是另一輪的瘋狂。在雲南，參與運動的人數從三百萬增加至四百萬，並宣佈了一個特殊的「高產」週，以創造新的紀錄。「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視著中國，」謝富治叫道，中國必須實現吹出去的指標，否則就丟臉了【18】。

隨著一路從天而降的壓力，村民們別無選擇，只好參加運動。在雲南曲靖地區，樓板被拆掉，雞被宰殺，以便用它們的羽毛來燒火或做風箱。成群結隊的黨員積極份子，挨家挨戶地收集廢鐵，被沒收的，往往是家庭器具和農耕工具。那些熱情不高的人被辱罵，被推搡，甚至被捆綁，遊街示眾。當時就有黨的調查員，寫報告談到恐懼和恐嚇。經過一年無情的一個挨一個的運動——大辦水利、大辦積肥、大辦深耕密植、大辦人民公社——僅僅提及「放衛星「的口號，就足以使人不寒而慄，因為它預示著另一場「殘酷的戰爭」或「徹夜奮戰」，將連續數天不得休息。一些人試圖躲開，睡在寒冷和潮濕的森林裏，以獲得幾個小時的休息，從遠處遙望小高爐，像螢火蟲一樣在夜空閃著光芒。他們受凍，食不果腹：當地幹部通過克扣糧食來降低煉鋼成本，擡高產量數字。由於集體食堂的建立，糧食現在完全掌控在幹部手中【19】。

中國淹沒在火的海洋中。到處是火紅的小高爐，儘管這場運動中每個村莊具體發生的事各有不同。在雲南，一些農民被迫在吃不飽、睡不足的的條件下煉鋼，爲了急於完成生產指標而累死在高爐旁【20】。在全國其他村莊，人們僥幸留下了一只壺或一口鍋。但這一暴力劇場新增了兩個方面，以扼殺任何涉嫌違抗命令的現象於萌芽之中。第一，幹部現在可以依靠人民公社內設立的民兵，強制執行他們的命令。例如在麻城，民兵可以進村，徵募勞力到高爐日夜工作。誰提早

下班，就得被戴高帽遊街示眾，帽子上寫著：「我是逃兵，大家不要學我。」[21] 第二，因爲現在所有的食物都在公社的手中，幹部可以利用口糧，作為報酬或處罰的形式。拒絕工作——或消極怠工——就會受到食物減少或完全剝奪的懲罰。在麻城，夜間留在家裏照顧子女的婦女被禁止進食堂[22]。在安徽，經歷了饑荒的張愛華後來解釋說：「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否則，頭頭不給你食物：他手裏拿著舀子。[23]」隨著各地鍋碗瓢盆被充公，幹部對食品供應的控制進一步加強了。

在城市，運動對老百姓也很粗暴。在南京，有個爐子的定額是日產 8.8 噸，必須不停地餵料燒火，饑餓的工人暈倒在爐旁。儘管在高壓之下，仍然有人提出了抗議。王滿孝拒絕接受超過 8 小時以上的工作。當黨委書記責問他時，王直截了當反問，「我就幹八小時你怎樣？」也有人公開質疑，用這種土爐會超過英國。有些小組接近一半的工人被形容為「落後」，逃避艱苦的勞動[24]。

最後，領導得到了鋼的紀錄，雖然大部份是爐渣、未洗礦，或純屬捏造的數目字。農村公社積壓的鐵錠無處不在，他們過小並且易碎，無法用於現代軋機。據冶金部本身的報告，許多省份土高爐生產的合格鐵，甚至不到三分之一。而代價是高昂的。一噸土高爐生產的鐵的成本，估計為 300 至 350 元，是現代煉鐵爐所需成本的兩倍，而且在此之上還糟蹋了 4 噸煤、3 噸鐵礦石和 30-50 個人工[25]。後來統計局估計，1958 年大煉鋼鐵的總損失約為 50 億元人民幣——還不包括被破壞了的建築物、森林、礦山和人。[26]

米哈伊爾·科羅契科（Mikhail Klochko）是烏克蘭丘陵地區長大的外國顧問。他在 1958 年秋天前往中國南部時，看到一塊塊狹長的黃色梯田，他感到驚訝：據說這是成熟的稻穀，卻無人收割[27]。

農民到哪裏去了呢？許多人被民兵動員去大煉鋼鐵，一些被部署去大修水利，還有一些人離開了村莊，到許多不斷追加指標的工廠裏去打工。在 1958 年，總共有一千五百多萬農民在更美好的前景引誘

下進城打工[28]。在雲南，產業工人的人數從1957年的124000躍至775000，意味著六十多萬人離開了農村[29]。那一年，該省三分之一的勞動力被徵去搞水利工程[30]。舉例說，在雲南晉寧的七萬名成年勞動力中，兩萬名被派去興修水利，一萬名去修鐵路，一萬名去當地工廠，只留下三萬名幹農活[31]。但這些數字沒有揭示出另一個變化：因為大多數男人離開了村莊，婦女必須下地工作。許多婦女幾乎沒有下地幹活的經驗，插秧不勻，雜草叢生。在永仁縣，五分之一的作物爛在地裏[32]。

用於農業的勞力損失了三分之一[33]。但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認為，深耕密植等創新技術充份彌補了這一不足。另一方面，在領導的「不斷革命」的歡呼下，農民按軍事部署，農閑時搞工業，農忙時回農田。用謝富治的話來說，「不斷革命意味著不斷提出新的任務」[34]。但是，即使在收穫季節中動員了一切人力資源，從辦公室人員、學生和教師、工廠工人和城市居民到駐軍，地裏的局面仍然令人沮喪。許多農具已在大煉鋼鐵中被毀，強勞力仍在建設水壩，人民公社的公共糧倉管理不善。在連灘，這個把讚美大躍進的大標語鑿在山上以歡迎領導參觀的模範公社，秋收期間，數千名農民被徵發去深翻100畝土地。由於沒有人收穫，很多糧食被遺棄在地頭[35]。

但上繳國家的公糧必須按照當地幹部漫天申報的產量給出。1958年全國實際糧食產量剛剛超過4000億斤，但根據所有的豐收報告，領導把它估計為接近8400億斤。根據這種完全虛假的數字而強制徵糧，只能在村裏引起恐慌和憤怒。一場以人民為敵的戰爭開始了。徵過頭糧，把這個國家推入人類史無前例的最嚴重的饑荒。1958年10月，譚震林副總理對華南的一些領導人直言不諱地說：「我看強迫命令一萬年以後還有，沒有一點強迫命令行嗎？這就是先進思想跟落後思想作鬥爭，方法好的人他就不強迫命令，方法不好的，非搞強迫命令不行。說是怕強迫命令，那種觀念是不行的。」[36]

第二篇

穿越死亡谷

9
警訊乍現

在公社化之前其實就有人餓死。早在 1958 年 3 月，在一個討論糧食問題的會議上，就有代表對糧食短缺表示憂慮，當時農民們被調出農田，去興修水利。有些地方，村民傾巢而出，沿路乞討食物，這是饑荒的跡像。財政部長李先念對這些憂慮不屑一顧，只顧繼續施加壓力，提高徵購糧食的指標[1]。

到 4 月底，饑餓和糧食匱乏的現象已蔓延全國。在廣西，六分之一的人沒糧或没錢，已經有村民死於饑餓。在山東，大約 67 萬人在挨餓，而在安徽，130 萬人受難。湖南有一成農民，存糧不足一個月。即使在亞熱帶的廣東省，也有近 100 萬人挨餓，惠陽和湛江的情況尤其惡劣，饑餓的村民出賣自己的孩子。在河北省，糧食短缺使數以萬計的農民紛紛到野外尋食，滄縣、保定、邯鄲都出現了賣兒鬻女的現象，有一萬四千災民到天津去乞討，被當地安排在臨時收容所。甘肅許多村民靠吃樹皮維持生存，數百人死於饑餓[2]。

這種春荒，有可能是暫時現象，夏收以後可能緩解。但有些地方，到了夏天變得更糟了，如雲南的陸良。我們在前面的章節中看到，早在 1958 年 2 月，在被迫參加興修水利的勞工中就有餓死的。而且饑荒並不限於被徵召參加修築水壩和水庫的村民。以茶花鄉為例，1958 年 1 月至 8 月，六分之一的村民死亡，總計 1610 人。有些人被毆打致死，但大多數死於饑餓和疾病[3]。縣領導陳盛年是 1957 年調來取代他的前任的，他的前任因爲在徵糧方面不夠強硬而被撤換。陳鼓

勵用暴力強制完成徵糧任務。茶花有三分之二的幹部經常採取體罰手段，並且剝奪過於虛弱無法勞動的村民的口糧[4]。

這樣的問題不單單發生在陸良縣。雲南整個曲靖地區，到處有人死於饑餓。在陸良，據報告約有 1.3 萬人喪生，在路南、羅平、富源、師宗等縣也有數千人餓死[5]。在蘆溪縣，縣委早在 1957 年就開始虛報糧食產量，宣布每個農民一年有大約 300 公斤糧食，實際上只有一半。 1958 年 5 月後，饑餓奪去 1.2 萬條生命，相當於每 14 人中有一人死亡。某些村莊有五分之一的村民死亡[6]。

這個曲靖地區到底死了多少人，難以評估。但檔案中的人口統計數字可以說明一點情況。它表明，1958 年 8.2 萬人死亡，佔人口的 3.1%。出生人數急劇下降，從 1957 年的 10.6 萬下降到 1958 年的 5.9 萬。1957 年全省死亡率為 2.2%，超過全國平均水平（1%）兩倍以上[7]。雲南省委書記謝富治對陸良問題考慮良久，到 1958 年 11 月，決定將損失向毛澤東彙報。毛主席讚賞這份報告。似乎他認爲，謝對他說了真話。一年後，謝被晉升為中央公安部部長。至於死亡人數，毛澤東認為是「一個教訓」[8]。

另一個「教訓」來自大躍進的聖地徐水縣，毛澤東曾在那裏叫農民每日吃五餐以解決餘糧問題。在徐水縣華麗的外觀背後，張國忠經營著一個勞動營，裏面關押著當地人口的 1.5%，從不聽話的頑固農民到下級黨委書記。勞動營的懲罰是殘酷的，從鞭打，到冬天在室外剝光衣服，結果有 124 人死亡，其他一些人則被打傷或終生殘廢。在勞動營之外，大約有七千人遭捆綁、毆打、吐口水、遊街、被迫下跪、或剝奪食物，導致另外 212 名死亡[9]。大寺各莊大隊的頭頭李江生，表面上和藹可親，曾經歡迎過毛澤東和許多其他參觀者，他就經常毆打農民，有些人在冬天被吊起來凍死[10]。儘管使用了種種暴力，作物產量仍遠遠達不到張國忠向毛澤東吹牛的指標。周恩來 1958 年 12 月經過河北時，張找到他，謙虛地承認徐水縣的產量每畝僅 500 斤，跟

他夏天所吹噓的 3 萬斤相差很大，徐水人民實際上在挨餓。周答應提供幫助[11]。

很多這類情況記錄在機要室 1958 年 10 月奉毛的命令而寫的一份書面報告中。毛將此件分發給中央其他成員，並加批語，「此種情況，可能不止一個社有。」[12] 但在張國忠失寵後，毛主席擁抱了徐水縣以南 80 公里處的安國縣作為新的典範。在聽取有關農民每人每年生產糧食 2300 公斤的報告後，他設想河北全省的糧食產量將從 1957 年的 200 億斤飆升至 1959 年的 1000 億斤[13]。當河北省委第二書記劉子厚告訴毛這些數字可能有些誇大時，主席叫他不要擔心，輕鬆地說，錯誤總是難免的嘛[14]。

毛澤東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許多關於饑餓、疾病和虐待村民的報告，其中有勇敢者寄來的信，有地方幹部不請自來的投訴，有警衛或秘書代毛進行的調查。徐水和陸良是兩個例子，其他的將在本書其他地方提到，更多的資料藏在北京的中央檔案館，只有黨欽點的少數研究人員才能看到。

到 1958 年年底，毛也擺出一些姿態，來安撫人們對已經露頭的廣泛的胡作非爲現象的憂慮。他在對陸良報告的批示中，承認了只注意追求增加產量，對群衆生活不夠關心。但他認爲有了陸良的「教訓」，全國其他地方就可以奇蹟般地增強「免疫力」。在徐水這個案子中，毛只是將他的支持從一個浮誇縣轉移到另一個浮誇縣。正如我們將在第 11 章看到的，在 1958 年 11 月至 1959 年 6 月期間，毛沒有放慢大躍進的步伐，而是堅定他繼續追求烏托邦。大躍進是爲了實現共產主義天堂而部署的軍事行動，今天少數人的犧牲可以換來明天全體人民的好日子。每場戰爭都有傷亡，有些時候不可避免會打敗仗，猛烈的衝鋒可能出現一些悲劇，但運動一定要進行下去。正如外交部長陳毅在 1958 年 11 月針對其中一些人間悲劇指出的，「勞動中即使有些傷亡事故，也不足以阻止我們前進。這一點代價應該付出，不值得大驚

小怪。在戰場上班房裏不知犧牲了多少人，現在有點疾病，傷亡算不了什麼！」[15] 其他領導人則對饑荒完全不加理會。在四川，在 1958-1959 年冬春可怕的饑荒中，激進的領導人李井泉熱情鼓吹人民公社，說四川的村民吃的肉比毛澤東還多，體重增加了幾公斤：「你說公社化好不好呀？吃的胖胖的還不好呀？」[16]

這個黨打了幾十年游擊，遭遇過國民黨五次毀滅性的圍剿，經過了 1935 年的長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到日軍的騷擾，在險惡的內戰中遭受大量傷亡，但都幸存下來了，目前的損失不值得大驚小怪。共產主義不可能一蹴而就。 1958 年是一場奇襲，幾條戰綫同時出擊。指揮官們承認，士兵們需要休息一下，1959 年要進行更加常規的游擊戰。總而言之，這意味著，大躍進的關鍵決策決不改變。

經濟學決定，在 1959 年的最初幾個月應繼續保持壓力。雖然毛澤東考慮過壓縮公社化狂熱的空氣，但他從來沒有懷疑過在農業生產上出現了高潮。在一份送給他的聯合報告中，最高經濟計劃人員李先念、李富春和薄一波確認，「在糧食、棉花和油脂方面，由於去年農業生產的躍進，產量比過去大為增加，只要把工作做好，只要認真解決工作中的問題，日子是完全可以過得去的。」[17] 如此而已。

在這些計劃工作者看來，最大的問題是農村沒有給城市輸送足夠的食物。供應城市人口（已膨脹到 1.1 億人）的糧食數量，在 1958 年下半年增加了四分之一，達到 300 億斤[18]。但這還不夠。12 月份，謝頂而精力充沛的北京市長彭真敲響警鐘，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立即附和。他指出，南寧和武漢的糧食儲備只能維持幾個星期，而北京、上海、天津和遼寧省採購的糧食僅夠持續兩個月。年底以前，至少應該存糧 14.5 億斤，但只有四分之一的數量已經到位，湖北和山西等省已出現大量短缺。首先必須重點保證三個直轄市和遼寧省的需要，因此宣佈糧食有餘的省份——四川、河南、安徽、山東、甘肅——被要求額外上交糧食 8.3 億斤。 糧食短缺不是唯一的問題，許多城市的肉只夠

吃一兩天，甘肅和湖南等省只交了預定配額的一小部份。蔬菜、魚類和糖也吃緊[19]。

不僅城市有特權地位，出口也必須優先。我們將看到，中國 1958 年花了大量資金購買外國的設備。在歡樂的秋收中，給 1959 年下了更多的訂單。當賬單來了之後，中國的聲譽受到能否滿足對外承諾的考驗。從 1958 年底起，周恩來在他的同事和主席的支持下，無情地向農村施加壓力，要求滿足前所未有的出口市場的採購。為了確保城市有飯吃，爲了確保對外合同能兌現，已經沒有退路了。

10
徵購狂潮

雖然依靠群眾就可以找到通向共產主義的金光大道，但是，想要把中國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巨人，仍然需要大量的工業設備和先進技術的幫助。毛從莫斯科回來後——他曾在那裏誇口說，中國將在十五年內超過英國——北京就開始向友邦無節制地採購。鋼廠、水泥窯、玻璃廠、電站、煉油廠：所有重工業的工廠和設備都要買。起重機、卡車、發電機、電動機、水泵、壓縮機、收割機和聯合收割機，都以前所未有的數量進口。交付的金屬切削機牀（不包括完整的工廠）從1957年的187部上升到1958年的772部，播種機從429台上升到2241台，拖拉機從67輛上升到2657輛，貨車從212輛上升到19860輛[1]。有色金屬軋材、鋁製品和其他原材料的供應大幅度上升，進口的運輸和通訊設備的數量也大幅度增加。

這些大部份來自蘇聯。中國從1951年5月起就依賴於蘇聯的經濟和軍事幫助，當時聯合國對中國實施戰略物資禁運。美國在將中國定為朝鮮戰爭的侵略國後，實施了貿易禁運。1950年代，中國和莫斯科簽署了一系列協定，建造一百五十多個工程。1958年1月，為了推動大躍進，又簽了一個擴大經濟和軍事援助的合同。1958年8月，商定由蘇聯技術援助建造另外的47套工廠設備——前幾年已簽署了約200個。1959年2月，又簽訂協議，進一步擴大經濟和科學合作，包括31個額外的大型工業廠房：這就使得將要安裝的工業企業、車間和其他建築的數量達到約300座[2]。

表 1：從蘇聯進口的主要商品類別和商品（百萬盧布）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中國從蘇聯的進口（總額）	556	576	881	761	262	190
貿易	183	292	370	301	183	140
石油和石油產品	(80)	(81)	(104)	(99)	(107)	(71)
工廠裝備	245	174	310	283	55	9
軍事裝備	121	78	79	72	12	11
新技術	7	31	122	103	12	30

資料來源：外交部，北京，1963 年 9 月 6 日，109-3321-2。第 66-67 和 88-89 頁。雖然利率不斷變化，但 1 盧布大致相當於 2.22 元和 1.1 美元。因為四捨五入，數字加起來可能不完整。

北京還敦促莫斯科提前交貨。1958 年 3 月，老帥朱德要求俄國人加速完成在包頭和武漢的兩個聯合煉鋼企業[3]。7 月份，周恩來的個人特使也向臨時代辦安東諾夫（S. F. Antonov）表達了類似的懇求[4]。大躍進壓力如此之大，以至於蘇聯的整個工業部門不得不重新作出全面安排，以滿足中國對一系列商品的緊急要求和大批訂單，而且往往需要提前交付[5]。來自蘇聯的進口在 1958 年和 1959 年之間驚人地上升了 60%，如表 1 所示。1957 年的進口額是 5.56 億盧布，到 1959 年成為 8.81 億，其中約三分之二是機械和設備。中國還依靠蘇聯，大量進口鐵、鋼和汽油。北京在石油、機械零件和重型工業設備上有一半依賴於莫斯科，也有相當一部份來自社會主義陣營其他國家，特別是東德。 1958 年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同意幫助興建糖廠、水泥廠、電廠和玻璃廠，大幅增加對中國的出口[6]，來自東德的進口攀升至 1.20 億盧布，隨後在 1959 年進一步增加了一億[7]。

但是，在大躍進中經歷了急劇變化的，不僅僅是進口量。為了得到最好的裝備，以加強其共產主義的進程，北京戲劇性地改變了外貿結構，向西歐提出了貿易的建議，從而有可能逐漸打破美國實施的禁運。華盛頓無法維持對其盟國的壓力。英國渴望進入中國的巨大市場，大力慫恿消除從 1956 年開始的出口管制系統。從西德的進口從 1957 年的 2 億德國馬克猛增到 1958 年的 6.82 億德國馬克和 1959 年的 5.4

億馬克，而從英國的進口則翻了一番，1957 年是 1200 萬英鎊，1958 年和 1959 年分別為 2700 萬和 2400 萬英鎊[8]。

所有這些都是工業進口，但毛澤東也頑強追求最先進的軍事裝備。從 1957 年開始，北京的領導人側重於從莫斯科盡可能多引進軍事裝備和「新技術」。周恩來在 1958 年 6 月向赫魯曉夫寫信要求援助建立現代海軍。兩個月後，在炮擊臺灣海峽的金門和馬祖兩島過程中，他要求獲得最新的空中監視技術。1959 年 5 月，中國向俄國提交一份「國防和航空設備」的戰略物資的訂單。1959 年 9 月周恩來再次提醒俄國，表示北京當局計劃在1960年動用1.65億盧布購買蘇聯軍事裝備[9]。北京總共花了多少錢是一個謎，因爲外國觀察家公布的統計數字並不包括「無形的」項目如軍需品。不過，外交部的檔案館提供了從莫斯科進口的明確綜述，其中有「特殊商品」，意思是軍事裝備，以及「新技術」：如表 1 所示，這兩個類別在 1959 年膨脹到超過 2 億盧布，相當於中國從蘇聯進口額的近四分之一。

中國還必須履行對蘇聯的債務人的義務。 1950 年至 1962 年間，莫斯科向北京貸款 14.07 億盧布[10]。中國在 1960 年夏天與蘇聯產生裂痕後，大幅還貸，即使在此之前，債務分期付款肯定達每年 2 億盧布以上。中國有限的外匯和黃金儲備，意味着債務和實際進口都須通過實物出口進行交換，使其有限的資源更加緊張。基本貿易格局是：用信貸、資本貨物和原材料，來交換稀有礦產、成品和食品。例如，豬肉用來交換電纜，大豆用來交換鋁，糧食用來交換鋼輥。由於銻、錫、鎢等稀有金屬的數量有限，北京的進口狂潮意味着必須從農村提取更多的食品出口（見表 2）。向蘇聯出口的東西一半以上是農產品，從天然纖維、煙草、糧食、大豆、新鮮水果、食油到罐頭肉。 出口到俄羅斯的大米在 1957 年至 1959 年間增加了兩倍，如表 2 和表 3 所示。換言之，進口的衝擊，首先落在農民身上。

表 2：向蘇聯的出口：主要商品類別（百萬盧布）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中國向蘇聯的出口（總額）	672	809	1006	737	483	441
工業和採礦業	223	234	218	183	140	116
加工農產品和農副產品	227	346	460	386	304	296
農產品和農副產品	223	229	328	168	40	30

資料來源：外交部，北京，1963 年 9 月 6 日，109-3321-2。第 66-68 頁；因為四捨五入，數字相加可能不完整。

表 3：向蘇聯出口的糧食和食用油（千噸和百萬盧布）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價值	重量	價值	重量	價值	重量	價值	重量	價值	重量
穀物	77	806	100	934	147	1418	66	640	1.2	12
大米	(25)	(201)	(54)	(437)	(88)	(784)	(33)	(285)	(0.2)	(1.8)
大豆	(49)	(570)	(45)	(489)	(59)	(634)	(33)	(355)	(0.9)	(10.4)
食用油	24	57	23	72	28	78	15	41	0.4	0.4

資料來源：外交部，北京，1963 年 9 月 6 日，109-3321-2。第 70-71 頁；因為四捨五入和商品的選擇，數字相加可能不完整。

谁是中國外貿的設計师？在計劃經濟中，進口和出口通常按每年的貿易協定進行，對外貿易的增長是為了配合經濟的預期增長。因此，在資本投資率、對外貿易額和收成的大小之間有一種直接的關係。總體經濟計劃（經過中央領導的同意）確定進口的數量和結構，這反過來又決定這個國家的出口水平。貿易計劃由外交部提出，然後將進口和出口的任務授權給負責相關的農工產品貿易的公司[11]。

在共產主義中國的官僚迷宮中，周恩來總理負責對外貿易的整體監督。他熱衷於與世界其他國家加强經濟關係，不只是蘇聯，而且包括共產主義集團以外的國家。周恩來懂得，經濟發展只有通過足够的資金、技術和專業知識才能實現，而所有這些都來自國外。周恩來的親密盟友、外貿部長葉季壯也主張大幅增加出口，用來支付進口的機器和工厂。但在 1957 年，周控制了他的談判代表的積極性，要他們謹慎從事。 1957 年 10 月，葉只好對一個外國貿易代表團解釋說，中國

人民的生活已受到食品出口的影響，特別是食用油嚴重短缺。周恩來決定，1958 年與所有國家的貿易量非削減不可【12】。

周恩來在經濟規劃上循序漸進的做法與毛澤東的大躍進的大胆設想不協調。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毛澤東憤怒地將總理提出的保留意見擱在一邊，並在 1958 年 1 月南寧會議上迫使他的對手沉默。相反，他更傾向於朱德。朱德元帥是具有傳奇聲譽的老軍人，早在 1928 年就曾與毛澤東會師。兩個人互相依賴，朱管軍事，毛管黨的政治。朱德是一個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知道如何爲主席的一步躍進共產主義的目標提供支持。 1957 年 10 月，他就提出，「必須努力擴大出口和進口，使我們能夠逐步成為一個進口大國和出口大國」。幾個星期後，他說，「如果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我們就需要引進技術、設備、鋼鐵和其他必要的材料。」【13】

「更大的進口和更大的出口」，這個理想主義的政策，脫離了這個國家實際出口食品和材料的能力，卻是 1958 年的一個主要口號。它正合毛的意，可以在國際舞臺上顯示他的政策的成功。他一言九鼎，已經壓住了批評大躍進的聲音，也就沒有什麼領導人願意替經濟規律說話了。隨著預計的工農業產量不斷向上調整，進口量也不斷上升。換句話說，除非毛認識到大躍進的失敗，緊縮對外貿易才有可能。政治掛帥，進口的大躍進沒有被視為預算的不嚴謹，反而被當作對依靠群眾改造經濟表現了無限的信心。 進口，是爲了擴大生產機器和製成品的能力，可以將經濟推動到更高的工業發展水平，最終將使中國從對蘇聯的經濟依賴中解脫出來。

毛在國內很少有對手。在國外，蘇聯集團的領導人們可能對大躍進抱有懷疑，但從中國運來更多的食品對他們有好處。赫魯曉夫畢竟把蘇聯經濟的重點從重工業轉移到消費者的需求上來，並挑釁地表示要在肉類、牛奶和黃油的人均生產上超越美國。在東德，烏布利希絕望地想阻止人們逃往西德。他也提出不切實際的目標，在 1958 年第五

次黨代會上宣佈，社會主義社會正在建設中，人均消費品數量將很快「趕上並超過」西德，這個過程將在 1961 年之前完成【14】。在此期間，他搞農村集體化，造成嚴重的糧食短缺，只好更加依賴從中國進口。東德領導人可能對 1958 年中國作物的規模有疑慮，但他們渴望更多的食品【15】。不僅大米在大躍進時期成為東德的主食，人造奶油也得依賴從中國進口的食油。東德貿易代表努力推動進口更多的飼料、煙草和花生【16】。壓力如此之大，以致 1959 年 6 月有個中國貿易代表不得不解釋說，不能向德國出口那麼多的豬飼料，因爲需要用這些東西來養活中國人【17】。

中國不僅向蘇聯集團盟國出口，也開始向東南亞和非洲傾銷產品。在莫斯科十月革命四十週年的慶祝中，赫魯曉夫曾得意地宣稱，他打算在農產品生產上趕上美國。他還宣布了貿易戰。「我們在貿易的和平戰場上向你們宣戰，」他威脅道，開始了全球經濟進攻，專門破壞美國外貿，吸引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上投入蘇聯懷抱。俄羅斯以無人能比的低價出售錫、鋅和大豆產品，並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向中東發送貨車、汽車和機械——通常提供低利率貸款和優惠還款條件【18】。在經濟服從政治的計劃經濟中，蘇聯可以無視市場價格，付出沉重代價，只要能夠贏得對全球的影響。

中國發動了自己的貿易戰，向國際傾銷商品，好像這些都是大躍進造成的國內需求過剩的產品。自行車、縫紉機、熱水瓶、豬肉罐頭、鋼筆：各種貨物都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售，藉以表明在向真正的共產主義賽跑中中國超過了蘇聯。在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中國製造的雨衣的銷售價格比在廣州低 40%【19】。皮鞋每雙 1.50 美元，凍鵪鶉 8 美分一只，小提琴只賣 5 美元【20】。

不過，這場反帝國主義的經濟戰爭，最主要的敵人是日本，中國竭力在大豆油、水泥、結構鋼和窗玻璃上以低價打敗這個競爭對手。布料成了共產主義需要佔領的主戰場，從灰布到花布充斥市場。 以低

於經濟成本出口貨物，對於窮國來說，代價是高昂的。1957 年，大約 870 萬匹布出口，收入超過 5000 萬美元。1958 年頭 9 個月，920 萬匹布出口到國際市場，只收入才 4700 萬美元，反而減少了 12%。當年年底，貧窮的農民在農村面臨著沒有棉衣的冬天，而 1400 萬匹布以低於成本價出口【21】。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使中國能夠從世界布料第五大出口國上升爲第三大。葉季壯在 1958 年底一個黨的外貿會議上承認，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向市場傾銷貨物成了一場災難，因為售出的比以前多，但收入比以前少得多：「真是傷害了自己，嚇到了朋友，警醒了敵人。」【22】「我聽說，外貿部有些人隨便簽合同。是誰批准你出口的？」周恩來質問，把自己和這個計劃拉開距離。「我們以為棉花大豐收，不會有問題，所以沒有請示，」外貿部幹部馬一民回答說【23】。

但是，無論棉花、糧食作物還是工業產值，都遠遠沒有大躍進。中國有一個巨大的貿易赤字。向社會主義盟國承諾的交付沒有兌現。1958 年商定的二千噸冷藏家禽，只有三分之一交付給東德，烏布利希要求在聖誕節前補齊。欠了東德 500 萬至 700 萬盧布，匈牙利 130 萬，捷克斯洛伐克 110 萬，他們都要求用水稻、花生或皮革來償還。周同意向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追加額外的 1.5 萬噸大米和 2 千噸花生，而且對朱德的「大量進口，大量出口」政策不屑一顧。根據 1958 年向社會主義陣營的出口有 4 億元的短缺，周宣佈，「我們反對大進大出，進出口必須平衡」【24】。

應該如何解決短缺問題呢？在 1958 年 11 月，周恩來第一個聲稱，「寧可自己不吃或少吃，不用或少用，但是要履行對外已簽的合同【25】。」「拿了人家的東西，而不給人家東西，就是沒有社會主義的風格。」幾個星期後，他補充道【26】。鄧小平也附和說：「如果人人節約幾個雞蛋、一磅肉、一磅油和十二斤糧食，整個出口的問題就會完全解決」【27】。李先念、李富春和薄一波同意：「為了滿足社會主義建設，為了將來美好的前景，只要把道理說清楚，人們是願意少吃一點的」【28】。

為了履行對外承諾，1959 年出口大幅增加，從 65 億元人民幣提高到 79 億元，而進口只增長了百分之三，總額為 63 億[29]。例如，預留給國外市場的糧食增加了一倍，總額為四百萬噸[30]。有些讀者可能會認為，這僅僅是全國糧食總產量的幾個百分點，但對窮國來說，數百萬噸就意味著生死之隔。正如王任重後來在 1961 年苦澀地指出的，1959 年全國都在饑餓中求生，而湖北（歸他領導）從北京接受了 20 萬噸救命糧。請注意，就在那一年，糧食出口超過了 400 萬噸[31]。

完成出口指標的責任包乾到省，各地按比例分解國家指標。但在 1958-1959 年冬春，各省糧食普遍短缺。到 1959 年 1 月，全國只徵購到八萬噸可供出口的糧食。接下來的月份，湖北表示最多只能提供 2.3 萬（計劃是 4.8 萬），四川李井泉同意提供配額的三分之二，其餘以次級糧食補齊。在安徽，曾希聖批准交付五千噸（計劃是 23500 噸）。福建拒絕上交出口糧[32]。其他出口商品，情況也差不多，多數省份只能完成出口配額的一半；貴州、甘肅和青海等省，則不到各自配額的三分之一[33]。

北京收到了沒有履行出口合同的投訴：例如，列寧格勒的醫院和幼兒園，冬天沒有米吃[34]。爲了解決外貿失控的問題，1959 年 3 月至 4 月，在上海的黨的一次會議上進行了討論。毛參加了，建議以素食作為解決辦法：「我們要節衣縮食，保證出口，否則六億五千萬人口多吃一點就吃掉了。馬，牛，羊，雞，犬，豬都不吃肉的，六畜中有四畜不吃肉，它不是也活了嗎？人也有不吃肉的，徐老不吃肉，也活到八十歲。據說黃炎培也不吃肉，也活到八十；可否作一決議，人一律不吃肉，都拿來出口？」[35]聽到主席下令，北京市長彭真更進一步：為了增加出口，建議削減糧食消費。周恩來也勇敢地提出，「三個月內，我們不吃任何豬肉，保證肉類出口。」[36]除了肉類，食用油的使用也受到限制。 1959 年 5 月 24 日，中央向各省正式下令：爲了出口和建設社會主義，不再向農村出售食用油[37]。

但隨著出口壓力的增加，出現了另一個問題：下面爲了湊數，開始偷工減料，導致出口質量下降。蘇聯屢屢投訴肉的質量，其中往往有細菌污染。高達三分之一的豬肉罐頭有銹【38】。其他物品也被投訴：送到蘇聯的約四萬六千雙鞋有缺陷，出口到香港的紙張無法使用，伊拉克買的電池有洩漏，而瑞士發現五分之一煤炭中有石塊，西德發現五百噸雞蛋中有沙門氏菌，摩洛哥向中國買的南瓜種子三分之一被蟲蛀【39】。補償 1959 年交付的這些污染商品的代價為兩億到三億元，把中國出口商品的名聲也搞壞了【40】。

貿易赤字仍然不斷增長。1959 年 10 月，北京實施了緊急措施。國務院指示：所有可以從國內消費市場減少或消除的商品一律壓縮，而剩餘的短缺部份則應由其他可取得的貨物代替【41】。爲了支持這一調整，成立了專門的出口辦公室，以監測所有出口貨物的質量和數量【42】。貿易協定是按日曆年簽訂的，所以爲了確保當年出口目標的完成，年底動員很重要。這意味著冬季壓力更大。 例如，豬肉數量低於配額，於是在 11 月開展了一場運動，在年底前購足額外的 900 萬頭豬【43】。

1959 年快結束時，在無情的徵購高潮中，完成了出口額 79 億元，滿足了周恩來的目標。糧食和食用油達 17 億元。 這一年出口的 420 萬噸糧食中，142 萬到蘇聯，100 萬到東歐，將近 160 萬到「資本主義國家」【44】。雖然已經盡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是不行。光是 1958 年與東歐和 1959 年與蘇聯的貿易赤字就達到三億元【45】。緊張的關係在 1960 年夏天達到頂點。

11
衝昏頭腦

毛澤東推動、哄騙和脅迫他的同事們上了大躍進的船，驅策國家橫衝直撞，企圖通過快捷而危險的工業化和公社化，趕上比較發達的國家。對經濟發展步伐心存疑慮的領導人已被公開革職和羞辱，批評大躍進的人已被恐怖的漩渦沖走。隨著大躍進像雪崩般地失控，惡果日益明顯，險象環生，毛澤東就轉過身來，把自己的賬算到別人頭上。他是一位經過幾十年政治鬥爭磨練的具備自我保護本能的老練精明的政客，不僅把混亂的責任轉嫁給地方幹部乃至他的親密戰友，而且把自己打扮成關心臣民疾苦的仁慈的領導人。在這個過程中，從1958年11月持續至1959年6月，壓力有所減弱，儘管只是短暫的喘息。

毛澤東手創的政治秩序必然導致信息扭曲。這位主席不糊塗，他太清楚了，一黨制產生假報告和假成績。一切共產主義政權都存在著縝密的監督機制，藉以對付官僚衙門。對最高領導人來說，越是下級不願上報的問題，他們就越有興趣調查，不然的話，就有政變的危險。所以必須操控那些具有監督職能的機關，核查財務狀況、任免事項、辦事程序和工作報告。國家安全機構除了通常的預防犯罪、管理監獄和維護國家安全，還要調查民意，測量社會不滿的程度。因此，公安部長對毛澤東是至關重要的。毫不奇怪，毛在1959年所以任命謝富治擔任此職，因爲謝是毛可以信賴的會告訴他真相的人。各級黨的機關定期發送機密報告，涉及一系列專題，這些報告也可能有所偏頗，那也可以通過派遣受信任的官員去調查解決。毛澤東在1958年10月正是這麼做的，他還親自和省領導們下去直接解決人民公社的問

題。隨著有關統計浮誇的證據越來越多，他越來越擔心。在武昌，他看到一個致命的報告，他的親密戰友王任重說，他的省份最多可以生產220億斤的糧食，而不是預計的600億斤，毛的信心受到嚴重打擊，非常沮喪[1]。

廣東省省委書記趙紫陽送來了一條救生索。他在1959年1月向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的報告中透露，許多公社存在著瞞產私分現象。有個縣查出7000萬斤糧食被隱瞞[2]。趙沿著這條線索，發起反瞞糧運動，發現了20億斤多糧食[3]。陶鑄讚揚了這份報告，把它送給毛[4]。接著，激進的曾希聖領導下的安徽省也傳來消息：「目前農村的所謂糧食問題，不是缺糧問題，也不是國家徵購任務過重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特別是基層幹部的思想問題。」這份報告分析，生產隊長們有四個擔心：即公社不會讓他們留足口糧；其他隊可能瞞產少報、隱藏一部份收穫；如果春天出現饑荒，那麼多餘的糧食可能被沒收；如果他們如實上報糧食產量，配額會加重[5]。毛澤東立即批轉這些報告，表示「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影響廣大基層幹部的共產主義品德，對春耕和1959年大躍進的積極性，影響人民公社的鞏固，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6]

毛澤東把自己打扮成一個關心群眾疾苦的仁慈的君主。 共產風已在農村刮起來了，他說。由於過份熱心的幹部在公社化上走得太遠，隨意以人民公社的名義徵用資產和勞動力，村民們已開始隱藏糧食。在1959年3月，毛澤東甚至對農民爲了迴避糧食採購而採取的策略表示欽佩，威脅說，如果黨不改變做法，他就要和農民站在一起了[7]。「我現在是支持保守主義，我站在『右派』這一方面，我反對平均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幹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我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堅持不可。你們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傾』，那麼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

籍。」[8]「右傾」這個詞，只有毛澤東可以輕率地使用，對別人來說意味著政治死刑，他儼然是個敢於說真話的獨行俠。至於被他指責的地方幹部，百分之五應該被清除，「不一定每個人都槍斃。」[9]幾個月後，毛澤東悄悄將名額增加到百分之十[10]。

毛澤東也沒放過他的同事。似乎這位萬歲爺是被親密顧問們誤導了：大豐收是有的，只是沒有像運動初期聲稱的那樣美妙罷了。毛澤東批評黨內頭頭們，並以鄙夷的態度發表驚人之談，要求對經濟產量的預測縮減到更現實的水平。當謹慎的薄一波未能在 1959 年 3 月削減工業項目，毛澤東表示了蔑視：「這是什麼人辦工業，是大少爺！現在工業要出『秦始皇』，我看你們搞工業的人不狠，老是講仁義道德，搞那麼多仁義道德，結果一事無成。」[11]

他特別指責那些曾經如此忠實地執行他的意圖的親信。4 月間，在被召集在上海開會的領導人面前，毛澤東回憶道：「我們 8 月份在北戴河召開的一個小會上，沒有人對我們為 1959 年設立的指標提出過不同意見。當時，我主要忙於炮擊金門。人民公社不是我負責的，那是譚震林的事，他在負責——我只寫了幾行字。」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毛澤東說：「別人寫的意見，不是我的意見。我看了這個東西，我不懂，只是有一個模模糊糊的印象；公社是好的。」是這份毛澤東看不懂的文件，應該對浮誇的數字負責任：「我們不應該把這些看不懂的文件拿出去。你們是大學生，教授，大知識分子，我只是一個小學生，所以你們應該用通俗的語言寫。」爲了防止任何人懷疑他的領導，他警告他的同事們：「有些同志仍然不承認我是領導者……我這個人是被許多人恨的，特別是彭德懷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對彭德懷同志的政策是這樣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澤東發表了一通不著邊際的長篇大論，每一個過去曾對他有過不同意見的領導人，都被點名，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陳雲、朱德、林彪、彭德懷、劉伯承、陳毅，甚至包括已經去世的任

弼時。每一位在座的領導者都被點名，除了鄧小平[12]。這次突然發作的目的，是表明毛澤東一貫正確，而那些曾經反對過他的人全是錯誤的。站在歷史的高度，毛澤東無需向任何人負責。

也沒有人對他的路綫在總體上的正確性及其成功的重要性有所懷疑。毛澤東從不錯過歌頌大躍進的機會：「不管我們有多少缺點，歸根到底，不過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13] 以一概全是錯誤的。要求這樣一個大運動不出一點問題，本身就是錯誤的。懷疑大躍進是錯誤的，當觀潮派指手畫腳是錯誤的[14]。毛澤東不能動搖他的基本戰略。

1959 年上半年，深耕密植繼續加碼，大辦水利進展迅速，公社化運動一往直前。1930 年，斯大林在農業集體化後進行短暫休整，發表過一篇《勝利衝昏頭腦》的文章，允許農民離開集體農莊。毛不屑效法斯大林，他不允許農民離開人民公社。他只表示，基本核算單位應該放在大隊，而不是公社。歷史學家們把這一時間解釋為「撤退」或「冷卻」，但實際上根本不是這樣。鄧小平在 1959 年 2 月向第一綫的助手們明確地說：「要熱不要冷，要有與去年一樣的幹勁。」（伍晉南）[15]

爲了保證養活城市居民，爲了滿足國外訂貨，恰恰在此期間，大幅提高了從農村徵購糧食的指標。在一份只發給 3 月 25 日上海錦江飯店會議參加者的絕密會議紀要中，毛澤東下令徵購糧食總產量的三分之一，這個額度，是史無前例的。毛澤東說：「糧食收購不超三分之一，農民造不了反。」完不成採購額度的地區應當被舉報：「這是實事求是，不是什麼狠。」國家已經大豐收，全國應該學河南，加強徵購：「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毛澤東額外提供了 1.6 萬輛貨車為徵糧服務。至於肉類，他表揚河北和山東三個月內不准農村吃肉的決定：「這是好事，為什麼全國不能照辦？」食油也必須最大限度地徵購。一個同事建議，國家應保證供應每人每年 8 米布，毛聽也不聽，反詰道：「這是誰下的命令？」如我們在上一章看到的，毛還扭轉了國內市場的

優先權。出口高於內需，必須保證出口：「我們應該少吃。」「抓緊」和「抓狠」是戰爭時期解決實際問題的保障。「不夠吃會餓死人。最好餓死一半，讓另一半人能吃飽。」[16]

毛的話就是法律。但他有些話比較費解，例如「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譚震林（在中央書記處中分工主管農業）在 1959 年 6 月的一次關於採購的電話會議上作了說明。他解釋說，在農民開始吃新糧之前就必須把國家需要的糧食徵購到手：速度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國家和農民在爭奪糧食。「但是『先下手為強』這句話只能傳達到縣、區委書記，再往下，很容易引起誤解。」[17] 曾經向毛報告幹部有浮誇風的王任重，有以下建議：「先禮後兵。經過教育，還是不服從國家統一計劃和調配的，就要給以必要的處理，從警告，撤職，直到開除黨籍。」[18]

饑荒的跡象在 1958 年已經出現。1959 年上半年饑餓變得很普遍，而村民們仍在被國家要求上交更多的糧食。即使是像譚震林這樣的狂熱者也估計，在一月份會有五百萬人浮腫，七萬人餓死。周恩來估計，會餓死十二萬人。他們都遠遠低估了，但不準備做進一步的調查[19]。毛澤東也知道饑荒，他通過轉發有關報告，加以淡化。他轉發的報告說，嚴重地區的村民已經獲得了足夠的食物，在模範省河南，每人每天高達半公斤[20]。地方幹部被來自北京的相互矛盾的信號搞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如何應對。毛澤東在上海大發脾氣，使高層的領導人們為之震驚：這是將要發生重大事情的預兆。

12
真理死了

崇山峻嶺盤旋在江西省北部，陡峭的山峰達海拔 1500 米。廬山屬於沉積巖和石灰巖結構，多年風雨在其間刻出了山澗、峽谷、洞穴和巖層，它的野性和堅韌備受遊客親睞。懸崖峭壁和在裂縫中生長的杉樹、松樹、柏樹和樟樹，與瀑布相映成趣。寺廟和寶塔也自成一景，遠處可見長江和鄱陽湖畔的沙丘。適中的氣候在悶熱的夏天給人們提供了一種喘息的機會。在革命之前，歐洲人就在冬天長途跋涉到這裏來滑雪。1895 年，有個英國傳教士買下了牯嶺谷。在隨後的幾十年中，又從山谷中運來軟花崗巖，建了幾百間平房，使廬山成爲外國人的療養地和避暑地。國民黨領袖蔣介石也有一座漂亮的別墅，1930 年代他和他的妻子（宋美齡）在這裏度過了許多個夏天。毛澤東把這座別墅留給自己享用，卻把「美廬」（蔣委員長本人親自命名）的名字保留下來。

毛主席在 1959 年 7 月 2 日召開廬山會議。黨的領導人把這個會稱為「神仙會」。神仙住在遠離凡人的雲端，穿雲破霧，不受凡俗的限制。毛澤東要他的同事們自由談論任何他們想要討論的問題，至於主席自己，他心中初步想到了十八個題目需要討論。但是，他當天就聽到國防部長彭德懷的批評，於是在他的議程上增加了第十九個題目：黨的團結[1]。他稱讚大躍進的成就，讚美中國人民的熱情和幹勁，為會議定下了基調。

毛需要了解黨內領導幹部們對大躍進的想法，他把他們按地區分成小組，在組內討論：每個小組花一個星期的時間討論本地區的特殊問題，主席則高瞻遠矚，掌握全局，各小組組長每天僅向主席一人

匯報討論情況。雖然懷疑彭德懷可能有什麼動作，但最初幾天毛澤東精神很好，作了訪問廬山著名的巖石洞穴、佛教寺廟和儒教書院的計劃。當地領導還組織了娛樂晚會，在一個前天主教教堂中，首先表演音樂和舞蹈，接著舉行舞會，舞會上主席被一些年輕的護士簇擁著，毛照例要在自己的房間裏招待她們，那裏有特殊的嚴密的安全保障[2]。

毛沒有干預，只是聽取信得過的省領導，就每組如何看待大躍進進行匯報。會議的許多與會者認為，廬山會議將進一步推進經濟改革，因為大躍進遇到的問題已經在前幾次會上討論過，也已經採取了一些相應的措施。日子一天天過去，在沒有主席任何干預和小組內都是熟人的情況下，有些領導人越來越多地公開討論饑荒問題、浮誇問題和幹部濫用權力的問題。被編入西北組的彭德懷是個直言不諱的人，多次在大躍進的方向問題上指責毛澤東：「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1070』是毛主席決定的，難道他沒有責任？」[3] 毛以沉默表示不滿，他越來越惱火，因爲他認為討論會越出了應有的界限，有些領導人開始不僅把矛頭對準公社化的失敗，而且談到了毛個人的責任。

7月10日毛澤東再次發言，他在大區領導人會議上爭辯說，過去一年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了失敗。他拿出1958年1月南寧會議上的妙喻：「一個人不是有十個指頭吗？我們的成績有九個指頭，只有一個指頭是缺點錯誤。」黨自己能夠解決自己的問題，但只能靠團結和思想統一。 他說，總路綫是完全正確的。劉少奇插話解釋說，出現的一些問題是因爲缺乏經驗：不繳學費怎麼能學到經驗教訓？周恩來說，黨很快就發現了並且很好地解決了這些問題。 主席總結說：「成績是偉大的，問題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4]

毛澤東講話後，沒有人再說話。但並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沉默。國防部部長彭德懷有眾所週知的倔脾氣。彭回到他的湖南湘潭老家（毛也在同一地區長大）去過，發現強迫和災難無處不在，無論是農民被

迫密植還是幹部在煉鋼運動中拆除民房。他在參觀養老院和幼兒園時，看到的只有苦難，孩子們衣衫襤褸，老人在冰冷的冬天蹲在竹蓆上。在訪問後，他繼續從家鄉收到有關大規模饑荒的信件[5]。彭對他所目睹的農村感受強烈，對廬山會議寄予厚望。他現在擔心：這次會議將流於形式，出於對毛澤東的尊重，饑荒的主題將被避開[6]。他相信沒有人敢提不同意見：劉少奇剛當國家主席，周恩來和陳雲已經沉默了一年，朱德沒有什麼主見，林彪元帥健康狀況不佳並對問題了解有限，而鄧小平不願說出任何批評意見[7]。他決定自己寫信給毛澤東。7 月 14 日毛主席睡下了，彭德懷將一封長信遞到他的下榻處。

彭德懷有牛一樣的身體和牛頭犬一樣的臉，微胖，光頭，大家都知道他從不對毛隱瞞自己的觀點[8]。毛和彭在井岡山打遊擊戰時並肩作戰，但多次發生過衝突，在朝鮮戰爭期間，憤怒的彭曾不顧毛的衛士的阻攔，衝進毛的臥室，和毛理論軍事戰略。毛主席非常不喜歡這位老元帥。

彭的信開頭像一段碑文：「我這個簡單人類似張飛，確有其粗，而無其细。因此，是否有參考價值请斟酌。不妥之處，煩请指示。」彭謹慎地給大躍進的成績以適當讚美，如農業和工業生產猛增，土高爐使農民學到新的技術。彭甚至預言，短短四年將超過英國。他說，不管出了什麼問題，都是由於對主席的想法理解不夠。在信的第二部份，彭堅持認為，黨可以從大躍進的錯誤中吸取經驗：包括大量浪費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虛報產量和左傾行爲。

他的信是平衡的和審慎的，但還是把毛激怒了。彭提到的「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觸及主席的痛處。另一句話也冒犯毛：「我們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9]

據毛的醫生說，毛徹夜難眠。兩天後，他在他的別墅舉行了政治局常委會，他穿着浴衣和拖鞋接見這些常委[10]。毛澤東解釋說，黨

外右派份子攻擊大躍進，現在黨內也有人破壞運動，聲稱弊大於利，彭德懷就是這樣一個人，他的信將發給所有 150 名在廬山參加會議的人，分小組進行討論。然後，他要劉少奇和周恩來從北京調人增援：彭真、陳毅、黃克誠等應盡快前來參加會議[11]。

這個時候，最高層的幹部明白了情況的嚴重性，表態反彭。甘肅領導人張仲良說，甘肅的成功說明了大躍進的智慧。陶鑄、王任重和陳正人都和大躍進有利害關係，也附和[12]。但也有一些人沒有附和。總參謀長黃克誠第二天從北京趕到，意外地贊成彭德懷。黃幾個星期後承認，他一直因饑荒擴大而無法入睡[13]。從來忠於毛的譚震林爆發了：「你是不是吃了狗肉，發熱了，這樣來勁！你要知道，我們讓你上山，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們的。」[14] 其他人也有動搖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讚揚彭的信，雖然他也認爲信裏語中帶刺。7 月 21 日，張聞天出人意料地批評毛澤東的大躍進，扔下了一個重磅炸彈，成了轉折點。

1930 年代初期，張聞天在是反對毛澤東領導的一派的成員，但後來轉而支持毛。作爲外交部副部長，他的份量相當重，毛澤東認爲他對彭的支持，是國防部和外交部之間的勾結[15]。張在 7 月 21 日講了幾個小時，儘管頻繁地受到毛澤東的支持者的質問。和黨的套話相反，他在短暫的開場白中對成就置之不理，直入要害，詳細檢討大躍進造成的問題。指標過高，作物產量虛假，導致人們死於饑餓。 土高爐成本為五億元人民幣，更不用說作物損失，因為農民們忙著煉鐵而無法下地收割。張譴責諸如「全民動員，大煉鋼鐵」等荒謬口號。生產經常中斷。外國人抱怨中國的產品劣質，國家的聲譽受損。最重要的是，大躍進根本沒有改變農村面貌：「總之，我國是『一窮二白』，社會主義制度給我們很快轉變的條件，但目前仍是『一窮二白』。」張說，毛澤東鼓勵把皇帝拉下馬，但沒人敢直言，因為害怕掉腦袋。最

後，他把毛的十個指頭的比喻倒過來用：「有人提二八開或三七開，我說是九比一。」【16】

毛澤東肯定在尋思，他們是不是串通一氣在攻擊他的領導。彭德懷指揮軍隊，周小舟領導一個省，張聞天在外交部。有沒有更多的對手藏在後面？彭被分配到西北組，是因爲他了解甘肅省的情況，他前幾個月曾參觀過那裏，彭和張多次討論那個地方出現的問題【17】。隨著廬山會議展開，當第一書記張仲良離開蘭州去參加廬山會議後，他的對手霍维德説服了省委。省委在 7 月 15 日緊急致函中央，報告數千人死於饑餓，一百五十多萬農民遭受饑荒，災情跨六個縣。對饑荒負主要負責的是張仲良，他作爲省領導，支持虛報產量，徵購糧食過頭，縱容幹部濫用職權，在 1959 年 4 月饑荒出現時沒有採取措施。在廬山會議上，毛的最狂熱的追隨者之一就這樣在主席眼前被他所在的省委拆臺【18】。

更多的壞消息傳到毛澤東耳朵裏。4 月份，彭德懷對東歐進行友好訪問，在阿爾巴尼亞和赫魯曉夫見了一面。回來後向毛澤東彙報時，彭德懷說了一句笨拙的話，使主席的臉色大變：他說，鐵托有數十名親密戰友逃到了阿爾巴尼亞。鐵托是南斯拉夫的鐵腕領導人，敢於反對斯大林。毛澤東肯定認爲彭的評論是對毛的統治含沙射影【19】。幾個星期後，6 月 20 日，蘇聯領導人取消了它幫助中國發展核武器的協議。

7 月 18 日赫魯曉夫在訪問波蘭波茲南時公開譴責了公社。他指責那些 1920 年代在俄羅斯迫切要求實現公社的人不懂共產主義，不懂如何建設。剛開始，波蘭電臺在發表他的講話時，沒有提及公社；幾天後，一個完整版本登在《真理報》上，在細心的觀察者看來，像是一個精心策劃的對毛澤東的攻擊。在北京，一份中文翻譯本幾天後出現在專供領導人閱讀的內參上【20】。但早在 7 月 19 日，毛澤東就已經轉發一份駐莫斯科大使館整理的報告，表明有些蘇聯幹部正在公開討論中國人民因爲大躍進而死於饑餓的事實【21】。黨內敵人和外國修正主

義之間有沒有勾結？赫魯曉夫的講話和彭德懷、張聞天對大躍進的攻擊，難道只是巧合？

上海的頭子柯慶施被張聞天的談話激怒，他敦促毛澤東立即對他的敵人採取行動。李井泉也向毛澤東進諫。劉少奇和周恩來於 7 月 22 日晚上晉見毛主席，不過那天晚上他們說了些什麼不為人知【22】。幾個星期後，毛以一種狡黠而聰明的方式把劉少奇捲了進來，他談到有些同志要求更大的言論自由，接著提到劉少奇，他說，劉告訴他，這些聲音不是孤立的，有個集團正在向黨的路綫發起進攻【23】。

7 月 23 日，毛澤東發表了持續三小時的漫談式的講話，裏面既有晦澀的隱喻，又有明確的威脅，矛頭對准他的對手。他的發言是這樣開頭的：「你們講了那麼多，允許我講個把鐘頭，可不可以？」然後，他反駁彭德懷的信，回顧了自黨成立以來的所有對黨的攻擊，警告領導人不要在危機時刻動搖——有些同志離右派只有三十公里之遥。他重覆了他三個月前在黨的會議上作出的威脅：「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他說，如果每個小問題都要登《人民日報》，一年也登不完。那是什麼結果？國家就會崩潰，領導將被推翻。這樣一來，「一定滅亡、而且應當滅亡，我贊成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另外組織。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毛承認了對大躍進的整體責任，但他也牽連一系列同事，從首先提出煉鋼運動的上海市長柯慶施，負責整體規劃的李富春，共同主管農業的譚震林和廖魯言，以及他稱之為左派的一些省的領導人，無論是雲南、河南、四川或湖北省。毛澤東發出最後通牒：領導幹部必須在彭和毛本人之間進行選擇，而錯誤的選擇將會給黨帶來的巨大的政治後果【24】。

他的聽衆都被驚呆了。當毛澤東與他的醫生走出來的時候，他碰上了彭德懷。「彭部長，我們談一談，」毛澤東建議道。彭德懷被激怒

了。「没有什麼可談的。不必談了，」彭回答說，用右手做了個一刀兩斷的動作【25】。

8月2日，毛澤東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的簡短而猛烈的開幕詞中為此後的兩個星期定了基調。「初上廬山有一种空氣，說沒有民主不自由，不敢講話，有壓力。當時不知道什麼事情，摸不着頭腦，不知所說的不民主是爲什麼。前半月是神仙會議味道，没有什麼緊張局勢。後來才緊張起來，他們要言論自由。緊張局勢就是要批評總路綫的言論自由，破壞總路綫的言論自由。要有批判總路綫的言論自由。以批評去年為主，也批評今年的工作。說去年工作都做壞了，基本做坏了。……現在廬山會議，這個時候，不是反『左』的問題，而是反右傾，是右傾機會主義向黨的領導機關、向六億人民的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事業猖狂進攻的問題。」毛告诫他的同事說，有一個必須作出的艱難選擇。「從團結的願望出發，我們是希望團結，還是希望破裂？【26】」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各小組對彭德懷、張闻天、黃克誠、周小舟等發起猛烈進攻，追逼每一個陰謀活動的細節。在一系列緊張的對峙和交叉審訊中，「反黨集團」不得不進行詳盡的檢討，交代自己的歷史、他們之間的關係、每一次交往的細節。李井泉、曾希聖、王任重和張仲良等省級領導已經在有關饑荒的指控中受到打擊，不需要再動員他們去反擊那些使他們聲名狼藉的人。林彪像別人一樣凶猛。他面容憔悴、謝顶，在內戰時摧毀了國民黨在東北最精良的部隊，幾個月前林剛被毛不動聲色地提拔為黨的副主席之一。他患有各種恐懼症，怕水、怕風、怕冷，經常打電話请病假，過着鼹鼠般的生活，但在廬山他支持毛主席，指責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他用嘶啞的聲音說：「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你我離得遠得很，不要打這個注意！」【27】

劉少奇和周恩來也起了作用。两人都怕失分，而且如果毛决定退卻的話，他們中間的任何一個都可以因為治國無方而受到指責。劉

少奇曾積極支持大躍進，并因為他的忠誠而獲得回報，在 4 月份被晉升為國家元首。他認為自己是黨的繼承人，因此不想添亂。在毛發作後，劉變得如此緊張，增加了安眠藥。有一次，他過量服用，在衛生間裏癱倒【28】。但他定了定神，在 8 月 17 日即會議的最後一天，像一條搖尾乞憐的哈巴狗，為毛澤東歌功頌德【29】。

周恩來總理負責國家的日常事務，如果彭德懷胜訴，他將不得不對災難性事件負責。他個人也有理由認爲自己受到了這位老帥的威脅。黃克誠在被審查時透露，幾年前彭說過，作爲政治家，周太軟弱，不能挑重擔【30】。但周支持毛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很早就作出決定，永遠不得罪毛主席：他從數十年的殘酷政治鬥争中發現，效忠於毛是保住權位的關鍵。一年多前毛在南寧批過他，他的地位已經被削弱，不能再惹主席生氣了。因此，對一切受到彭德懷威脅的領導人來說，毛澤東是他們結成不穩定聯盟的中心，没有這些領導人的支持毛可能佔不了上風。

隨着會議的進展和批評不斷升級，公開反對毛澤東的人漸漸被打垮了，直到他們坦白認罪。彭承認，他的信和他在會議初期提出的意見不是孤立的，這是「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31】

毛澤東於 8 月 11 日再次發言，特別针對彭德懷：「你說華北會議操了你 40 天的娘，你在這操 20 天不行，還倒欠 20 天的賬，現在滿足你的要求，40 天我還要加 5 天，盡你罵，满足你這個操娘的願望，不然欠了你的賬。」毛澤東聲稱，彭和他的支持者是「資產階級民主派」，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派没有什麼共同之處，從而剥奪了他們的地位，把他們列入資產階級的行列【32】。

在五天後的閉幕會議上通過的决議中，毛澤東的對手被定性為陰謀反對黨、國家和人民【33】。未來幾個月，一場抓「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運動，就要橫掃全國了。

13
殘酷鬥爭

軍隊受到清洗。林彪，這個可以靠他查出軍隊中任何反對思想的人，因為在廬山的表現受到了獎勵，取代了彭德懷。林知道，講出農村的真相太天真了，注定要倒楣，所以對毛主席阿諛奉承。但私下裏他比彭尖锐得多，他在日记——後來被红衛兵抄出——中說，大躍進是「空想、一塌糊塗」[1]。一個領導人的內心世界和他的公開聲明之間，居然差了十萬八千里！但全國上下，隨着清洗運動的展開，黨的幹部們競相證明自己對主席和大躍進的忠心。

基調是由上面定的。彭真為這場鬥爭敲鑼打鼓時，使用了後來文革那種語言：「批判要深刻，無非是戰友、同事，夫妻關係，要按原則辦事。」負責農業的狂熱的譚震林，指出敵人盤踞在最高層：「這次鬥爭要同老戰友分家！」[2] 至 1959 年年底，僅僅在北京，就有數千名高層官員被作為整肅對象，其中包括了三百名中央委員會成員一級的官員，佔高層幹部總數的百分之十。其中有六十多人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他們之間許多是老革命。但領導解釋說，必須把他們堅決打倒，否則「社會主義建設」大業將毀於一旦[3]。

全國各地，那些對大躍進發表過保留意見的人，都受到追究。在甘肅，張仲良一回蘭州，鬥爭就開始了。霍维德、宋良成等「向廬山送子彈、發毒箭」的人被打成「反黨集團」。全省有一萬多名幹部被揪出[4]。張的反對者在給北京的信中反映該省普遍吃不飽，張在給主席的信中卻說：「我省各項工作飛速發展，變化很大，糧食問題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豐收，絕大部分地區已經收割完畢；秋田生長

很好，豐收在望。」[5] 後來，在 1960 年他的省變成人間地獄之後，他再次寫信解釋饑荒死亡，归咎於反黨集團的領導霍维德。張把這種大規模死亡輕描淡寫地稱為「一個手指和九個手指的關係」[6]。

大躍進路上的絆脚石都被搬開。在雲南，工商廳副廳長因批評糧食短缺和人民公社，以及在播放毛澤東講話錄音時打呼嚕而被革職[7]。在河北，水利廳副廳長因為對煉鋼運動中拆毀暖氣片是否明智表示了懷疑而被清除[8]。一些反對公共食堂的領導人被指責放棄社會主義和「復辟單幹政策」[9]。安徽省副省長張愷帆和他的盟友被解除職務。毛澤東懷疑，「這些人是混進黨內的投機份子……他們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10] 類似的高級幹部被清洗，也發生在福建、青海、黑龍江和遼寧等省份。

設法補救大躍進惡果的領導人被革職。經常持謹慎態度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受到毛澤東及其追隨者的攻擊後，已在 1958 年對虛報產量做出妥協。但他在視察中，一有機會就遏制當地幹部蠻幹。在常德，他公開批評糧食產量作假。他懷疑供給制。有個婦女向他抱怨當地食堂，他建議她退出食堂，回家自己做飯。他直截了當地拒絕讓湖南人遵循麻城樹立的榜樣，認為衛星田是不切實際的。在寧鄉，他發現只有妇女在田裏幹活，就要求把男人從土高爐召回。他在澧縣批評小學搞勤工儉學是：「狗屁！」[11]，儘管他盡了力，但是無力回天，許多地方幹部還是出於信念或野心去趕大躍進的浪頭。

但是，總的說來，湖南比毛澤東的馬屁精王任重領導的鄰居湖北的情況要好。毛澤東的專用列車 1959 年 5 月（就在廬山會議之前）停在武昌時，這個城市的狀態非常糟糕。即使在毛澤東下榻的賓館裏，也没有肉、没有香煙，蔬菜極其有限。毛澤東的故鄉湖南省的長沙則不同，仍然有露天的餐廳在營業。周小舟對陪毛澤東到長沙的對手王任重說：「湖南被批評没有像你們幹勁大。看看湖北吧，没有香煙沒有茶。你們去年用完了所有的儲備。今天，我們也許窮，但至少還有儲

存物資。」[12] 回顧當年，周可能樹敵太多，在一黨專政的殘酷環境中難以生存。作為「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他在廬山全會後立即被清除，從而為像張平化那樣願意緊跟毛澤東的領導人鋪平了道路——結果是使湖南居民同樣挨餓。

在瘋狂的鬥爭中，所有不同意大躍進的意見被一掃而光，使農民更容易受到黨的赤裸裸的權力的傷害。每一級——省，縣，公社，大隊——都進行了無情的清洗，把温和的幹部換掉，代之以更强硬更無良的幹部，後者整裝待發，走馬上任，彈冠相慶。1959 年至 1960 年，約 360 萬黨員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作為右傾清除，而黨員總數反而從 1959 年的 1396 萬人竄升至 1961 的 1738 萬人[13]。在一個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倫理世界裏，很多人甘願成為主席的工具，昧著良心，但求自保。如果領導層 1959 年夏天在廬山扭轉局面，餓死人的數目應該可以控制在七位數（百萬）以內不再蔓延。但實際情況是，整個國家繼續向災難進軍，因為勞累、疾病、懲罰和饑餓而死亡的生命，達到了八位數（千萬）！以人民為敵的戰爭終於在全新的層面上展開，而領導層則別過臉去，若無其事。中蘇日益擴大的分歧，成了對中國大地上發生的浩劫可以心安理得若無其事的藉口。

14
中蘇分歧

米哈伊爾·科羅契科（Mikhail Klochko）在1960年7月16日收到被召回的電報。和大约1500名蘇聯顧問和2500名家属一起，他奉命收拾行李並離開他在北京的大使館。他的東道主禮數周到，奉命提供一切可能的幫助，並用一切手段取得俄國人尚未提供的技術資料[1]。在歡送宴會上，外交部長陳毅熱忱地感谢他們的巨大幫助，并祝願他們身體健康。但有個蘇聯代表尖酸地抱怨說，「我們為你們做了這麼多，你們還是不滿足。」[2]

自從毛澤東两年前炮擊金門和馬祖引發一场國際危機後，赫魯曉夫開始重新考慮是否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蘇聯和美國的核裁軍談判促使他拖延履行他的承諾。1959年6月，他終於取消原來的承諾[3]。1959年9月下旬，在美國和蘇聯的首腦會議上，赫魯曉夫同意將蘇聯軍隊的總人數減少一萬人，尋求與美國進一步和解。幾個月後，赫魯曉夫訪問北京以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十週年時，關係進一步惡化。蘇聯代表團與東道主在一系列問題上發生衝突，其中包括中國和印度之間的邊界争端，莫斯科试圖充當中間人，而不是支持其盟友北京。在1960年春天，北京開始公開向莫斯科對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權挑戰，用越來越難聽的語言譴責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和他「屈從於帝國主義」的企圖[4]。被激怒的蘇聯領導人進行報復，將所有的蘇聯顧問撤出中國[5]。

蘇聯專家的撤出對毛澤東是一個打擊。這導致了两國之間經濟關係的瓦解，多數大型項目被取消，高端軍事技術的轉讓被凍結。如張

戎和 Jon Halliday 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中指出，中國人本來可以從這些項目的取消中受益，因為現在只需要用較少的食物出口去支付昂貴的項目[6]。但是，儘管協議還款期限為十六年，毛澤東却堅持提前還賬：「延安時期那麼困難，我們吃辣椒也不死人，現在比那個時候好得多了，要勒緊腰帶，爭取五年內把債務還清。」[7] 早在 1960 年 8 月 5 日，蘇聯專家還沒有完全離開，各省級領導人就接到中央電話，說，國家出口得不夠，還欠蘇聯二十億元人民幣。要盡一切努力在二年內還清債務，必須通過盡量增加糧食、棉花和食用油的出口來達到這個目的[8]。

向蘇聯提前還款的真正規模到底多大，直到在北京外交部的檔案打開時才真相大白。在那裏，有一群會計师記錄了關於匯率變化、盧布的黃金含量的變化、貿易協定重新談判和利率計算如何影响蘇聯債務的詳情。這些記錄表明，莫斯科在 1950 年至 1955 年（不包括利息）借給北京约 96860 萬盧布。在蘇聯專家召回時，尚有 43030 萬未償還[9]。但因為貿易赤字，在隨後的幾年又借了更多的貸款。至 1962 年底，北京所欠的總額為 140700 萬盧布（127500 為貸款，加上估計為 13200 萬的利息）。其中 126900 萬在 1962 年攤銷[10]。換言之，雖然債務總額從 96800 萬盧布提高到 140700 萬，中國在 1960 年至 1962 年成功地還掉了大约五億，在此期間，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死於饑荒。實際數額可能更大，因為 1960 年提供的數字不包括利息，而這大概也要償還，但即使我們允許百分之十的校正值，事實上仍有大量資金用來支付給蘇聯。1960 年约 16000 萬盧布用來還債，而在 1962 年约 17200 萬盧布用來還債（1961 年的數字丟失了，很可能不相上下）[11]。大量出口也被用來攤銷債務，這意味着中國在 1962 年年底欠蘇聯只有 1.38 億盧布：中國堅持在 1963 年支付 9700 萬，在 1965 年償清債務[12]。

問題在於，俄羅斯從來没有要求加速償還。相反，他們在 1961 年 4 月同意，2.88 億盧布的未付餘額，應作為一個新的信貸，可以在四年

之內還清，在 1962 年的第一筆付款不超過 800 萬【13】。由於貿易赤字的延期償付被視爲一個計劃外的貸款，它實際上意味着，中國比任何其他國家從蘇聯獲得了更多的經濟援助【14】。

全體專家的撤出對經濟的真正傷害其實很輕微，因為農業方面的專家不多。而且，即使一些工業項目因為外國專家的撤離而被延誤，當時中國自身經濟已經深陷困境。但是，毛信口指責蘇聯對中國的經濟崩潰應該負責，創造了一個持久的神話，即饑荒來自償還蘇聯債務的壓力。早在 1960 年 11 月，中國就藉口蘇聯召回專家導致自然災害以及對整個經濟的巨大傷害，以此來向東德解釋，爲什麼交付糧食不得不推遲【15】。1964 年，莫斯科外交政策的主要理論家米哈伊爾·蘇斯洛夫（Mikhail Suslov）指出，中國聲稱蘇聯應該對中國的饑荒負責【16】。直到今天，當問及倖存下來的普通饑民是什麼造成了大饑荒，他們也幾乎總是認為是蘇聯造成的。靠近香港邊界的沙井的一個農民在最近的採訪中這樣解釋饑荒：「政府欠蘇聯好多錢，需要還債。因此，所有的產品都要上交。所有的牲畜和糧食都必須交給政府去還蘇聯的債。蘇聯強迫中國還債。」【17】but Mr Chan was on the otherside of the fence...

外國顧問的撤離，有沒有使中國加快採取了應付饑荒的政策？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沒有人看到。赫魯曉夫被認為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脚：一夜之間蘇聯領導人失去了在中國的一切影響力。尤其對上司感到不滿的，是當時在北京任職的俄羅斯外交官，例如斯捷潘·契爾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和列夫·德柳辛（Lev Deliusin），他們津津樂道自己國家與中國的「特殊關係」——以及他們自己所起的橋梁作用【18】。赫魯曉夫本人當然沒有這樣的目的。他可能期望中國低聲下氣回到談判桌上來重新談判對蘇聯更有利的條款。但無論他是否打算這樣做，赫魯曉夫的舉動的確進一步孤立了毛，當時正有大規模饑荒的報告從全國各地蜂湧而來。事實上，毛在 1960 年夏天變得如此抑鬱，

他把自己困在牀上，似乎沒有能力對付不利消息[19]。他在撤退，試圖走出僵局。

15
進口洋麵

1960 年 7 月蘇聯專家撤離之後不久，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三巨頭被指定負責外貿[1]。他們給赫魯曉夫的回答是把對外貿易由蘇聯轉向西方。8 月底，外貿部長葉季壯指示他在國外的代表：減少從社會主義陣營的進口，停止所有新的貿易協定談判。除了一些戰略項目，如南京大橋所需的蘇聯鋼材，不再簽訂新的進口合同。其藉口是，貨物的價格和規格不符合標準[2]。當時有些外國觀察家談到了社會主義陣營對中國的殘酷封鎖[3]，但與蘇聯及其盟國在經濟上脫鉤完全是由北京發起的。

但是，中國不能永遠以規格不符作爲拋棄過去的貿易夥伴的藉口。到了 1960 年 12 月，毛澤東不管事了，終於提出了一個新的更合理的解釋。官方版本是，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自然災害，大部份農村地區受災，沒有多餘的糧食可以出口。對社會主義陣營的貿易必須壓縮，只有阿爾巴尼亞例外[4]。提出自然災害，除了可以躲開人禍，還有進一步的好處：貿易協定通常附帶一個標準的例外條款，即第三十三條，規定在人力不可抗拒的情況下，可以終止部份或全部合同[5]。這第三十三條，現在是不僅用來減少貿易，而且也成爲取消整個合同的理由[6]。

列於第 10 章的統計表表明，對蘇聯的出口從 1960 年的 7.37 億盧布下降到次年的 4.83 億盧布。來自東歐的進口，下降得同樣明顯。葉季壯向東柏林的同行解釋說，只有在清理完欠款以後，才有可能考慮 1961 年的貿易協定[7]。但是，東德不僅吃慣了大米，而且還依賴於中

國的食用油。短缺這麼大，迫使烏布利希在 1961 年 8 月轉向赫魯曉夫求助。

中國擺脫社會主義陣營，不是因為它要報復蘇聯撤退專家，而是因為它自己破產了。衡量該國的財政狀況的最好指標是人民幣在黑市上的價值。人民幣在 1960 年開始嚴重下跌。然後，1961 年 1 月，隨着糧食短缺的新聞到處流傳，人民幣暴跌到新的低點，約 0.75 美元兑換每十元人民幣，約合人民幣官方匯率的六分之一。總體而言，1961 年 6 月人民幣的價值比上年下跌了百分之五十[8]。

表 4：1961 年中國糧食進口

出口國家	百萬噸
阿根廷	0.045
澳大利亞	2.74
緬甸	0.3
加拿大	2.34
法國	0.285
德國	0.250
總計	5.96

資料來源：BArch, Berlin, 1962, DL2-VAN-175, p.15; see also Allan J. Barry, 'The Chinese Food Purchases', China Quarterly, no. 8 (Oct.– Dec. 1961), p. 21.

人民幣貶值的部份原因是由於需要硬通貨來支付國際市場上的糧食。應對饑荒的方法之一，是將糧食從過剩地區調到饑荒地區，但到 1960 年秋天，隨着大秋作物歉收，這一策略幾乎沒什麼作用。周恩來和陳雲設法說服毛澤東，必須從資本主義國家進口糧食。不知道他們到底怎麼把毛説服的，很可能他們這樣告訴毛，進口洋麵可以促進出口，而擴大出口則是取得外匯的途徑。1960 年底，在香港談成了第一批合同[9]。1960-1961 年購買了近 600 萬噸的糧食，代價為 3.67 億美元（見表 4）。支付條款各不相同：加拿大人要求首付 25% 的可兑換英鎊，而澳大利亞人要求前期付款為百分之十，其餘作爲信貸。但總體上，必須在 1961 年支付大约一半[10]。

為了滿足這些承諾，中國必須獲得剩餘的可轉讓貨幣，而要做到這點，只有通過削減資本貨物的進口和增加向非共產主義世界的出口。自從大饑荒以來，周恩來仍然確保雞蛋和肉類每天按計劃抵達香港[11]。1960 年秋季，儘管赫魯曉夫抱怨中國向蘇聯交貨不够，周恩來仍決定將所有可提供的食物重新定向轉到香港，大大增加了與這塊英國殖民地的貿易[12]。棉花和紡織產品也轉到香港，貿易額從 1959 年的 2.173 億港元跳到次年的 2.87 億港元[13]。總而言之，香港是中國在饑荒期間最大的創匯來源，每年大约 3.2 億美元[14]。1958 年，東南亞市場也充斥着廉價的中國商品。例如，紡織品被以印度和日本等競爭對手不能想像的低價傾銷，即使這些貨物是大陸自己迫切需要的。

北京也掏空儲備，向倫敦輸出銀條。1960 年年底中國成為金條的出口國，1961 年航運約五千萬至六千萬盎司，其中 4.6 千萬（價值 1550 萬英鎊）運到英國[15]。如果我們相信周恩來的報告，截至 1961 年底，通過出售黃金和白銀籌集到總共大约 1.5 億美元[16]。為了拼命籌集更多的外匯，中國也開始了一種人性化的交易，海外華僑可以用在香港銀行的現金購買特別購物券：這些特別購物券可以饋贈給大陸境內的親屬，讓他們買些國家配額以外的食品和衣服[17]。

為什麼中國不從社會主義盟友那裏進口糧食？主要是虛榮和害怕在作怪。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領導已經毫不猶豫地把國家的面子放在人民的需要之上，用掠奪農村的手段來滿足外國訂貨。不過，虛榮的結果往往是栽跟頭，1961 年 3 月，周恩來不得不屈辱地退讓，向盟國解釋中國不再有能力出口糧食，無法履行貿易協議或經濟合同。僅 1960 年，就欠了蘇聯一百多萬噸糧食和食用油，近期也無法及時裝運。周恩來用外交辭令這樣解釋：他的國家已經對不起社會主義盟國，怎麼能夠再向他們伸手要糧食呢？[18]

北京還擔心，請求幫助可能會被莫斯科拒絕，因為整個大躍進旨在向蘇聯示威。這種害怕可能有點道理，儘管莫斯科曾經表現出了

善意。例如，俄羅斯提出願在交換的基礎上無息提供一百萬噸糧食，五十萬噸糖，費用分幾年償還。北京拒絕了糧食，接受了糖[19]。赫魯曉夫在 1961 年 4 月在克里姆林宮會見葉季壯時再次提到援助糧食。他告訴外貿部長說，他完全同情中國的困境，因為烏克蘭在 1946 年也遭受了可怕的饑荒，他補充說，當時發生過人吃人的事件，這話可能言者無心，但聽者刺耳。然後，他改變了話題，順便提到蘇聯即將在鋼鐵生產方面超越美國。葉季壯婉拒了他的幫助[20]。

幾個月後，夏天到了，饑荒沒有緩解，周恩來只好向俄羅斯求助。在 1961 年 8 月會見莫斯科代表團時，他解釋原因，為什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历史上首次從帝國主義陣營進口糧食。然後周以一種相當迂迴的方式，詢問蘇聯是否願意用二百萬噸糧食交換大豆、豬鬃和錫，甚至可能是大米；預付三分之一，其餘的將在隨後兩年內付清。在此提議前，蘇聯代表團剛剛拒絕接納七千萬盧布的貿易赤字，所以時間上不湊巧。「你有外幣吗？」蘇方直截了當地問，迫使周不得不承認中國沒有外幣，中國在賣銀子[21]。代表團將這個問題置之高閣，拖了幾個月沒有任何進展，最後有人向鄧小平暗示，蘇聯自己正在經歷困難，沒有能力提供援助。這件事使中國很沒面子[22]。

1961 年 7 月，周恩來要求追加二萬噸汽油，莫斯科也採用了拖延戰術：赫魯曉夫拖了四個月，在第 22 屆蘇共黨代會之後才答應北京的请求[23]。1961 年 6 月商定交換糧食，蘇聯也採取了政治手腕。在北京向加拿大購買的小麥中，28 萬噸運往蘇聯，後者又轉而出口相同的數量到中國。當小麥直接從加拿大被運到俄羅斯後，蘇聯裝作這是北美向蘇聯的進口，同時將自己出口到中國的糧食列為 1961 年的貿易統計數字公布。在世界面前，當外國專家通過這些統計數字尋找兩個社會主義大國之間的裂痕時，看上去好像蘇聯在養活中國[24]。

不是所有從國外購買的糧食都用於國內消費。例如，從缅甸購買的大米直接運到錫蘭，以補足中國的缺口。大约十六萬噸被運往東

德，以解决中國對社會主義盟國的貿易赤字。中國即使在饑荒中，仍然是慷慨的朋友。两艘載有大约六萬噸小麥的貨船被作為禮品直接從加拿大港口運到地拉那。由於阿爾巴尼亞的人口约為 140 萬人，這筆數字高達其國内需求的五分之一[25]。駐北京的地拉那首席談判代表 Pupo Shyti 後來回憶說，他在北京看到了饑荒，但「中國給了我們一切……我們缺什麼，就向中國要……我感到羞愧。」[26] 除了阿爾巴尼亞，其他國家也在中國饑荒嚴重的時候獲得免費大米，例如幾内亞，1961 年得到了一萬噸[27]。

中國從來没有停止建立對亞洲和非洲發展中國家提供無償援助和低息貸款的國際形象。北京在大躍進期間增加向外國捐款的原因之一，是為了證明它已經發現了一條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橋梁。但是，主要的原因還是和莫斯科對抗。在一個非殖民化時代，赫魯曉夫争取發展中國家，通過對水壩和體育场等重要項目的慷慨援助，试圖吸引他們離開美國而進入蘇聯的軌道。毛要挑戰赫魯曉夫在亞洲和非洲的領導。他對克里姆林宫「和平過渡」的主張不屑一顧，他鼓勵武裝革命，决心在和俄羅斯的競争中，援助阿爾及利亞、喀麥隆、肯尼亞和乌干達等國的共產主義革命者。

中國在自己的饑荒時代給了這些國家多少援助？總體而言，從 1950 年至 1960 年 7 月，中國向外國提供了 40 億元，其中 28 億是無償經濟援助，12 億為無息或低息貸款[28]。大多在 1958 年之後。1960 年，爲了擴大對外援助，一個名為「對外經濟聯络委員會」的部級新機構成立了，援外額度定為 4.2 億元[29]。次年，社會主義盟國在知道中國困境後，願意提供新的貸款或延期付款，但北京都拒絕了；相反，卻撥出大约 6.60 億元用於援外[30]。受益者包括缅甸，8400 萬美元；柬埔寨，1120 萬美元；越南，1.42 億盧布；阿爾巴尼亞，1.125 億盧布[31]。而當時國家的總收入萎缩了 45%，只有 350 億元。國内有些領域的經費遭到削減，包括 14 億元的衛生和教育經費[32]。

這種慷慨意味著：1960 年，人民在挨餓，糧食在出口，而且其中有些是免費的。事實上，在「出口第一」的政策的指導下，幾乎每個省的出口都比以往任何時候提高了。湖南被要求出口價值 4.23 億元的貨物，佔全省生產總值的3.4%，其中包括30萬噸大米和27萬頭猪[33]。

1960 年 8 月周恩來决定遏制向社會主義陣營的糧食出口，但五個月之後，仍向廣東徵購十萬多噸穀物，送往古巴、印度尼西亞、波蘭和越南，约佔该省在此期間徵購的 47 萬噸的四分之一。1960 年 9 月與菲德爾·卡斯特羅的政權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後，省領導陶鑄解釋，提供糧食給被美帝國主義圍困封鎖的古巴人民，是一個「國際聲譽」的問題[34]。廣州的工人對無私協助發展中國家可没有那麼高的熱情。他們本來已經對缺乏棉花（向香港出口，由那裏的百貨公司發售）嘖有煩言，現在公開表示想不通：「為什麼我們自己吃不飽，還要向古巴出口？」[35]即使在遥遠的地方如甘肅，村民也抗議，他們所以挨餓，是因為毛把大米運到古巴去了[36]。一個月後，在北戴河的黨的會議上，領導决定給卡斯特羅再運十萬噸大米（價值兩千六百萬元），用於交換糖[37]。

中國把所有的外幣用在糧食進口上；可不可以換一種方式，接受外國的糧食援助？美國總統约翰·肯尼迪冷静地指出，北京即使在饑荒時，仍在向非洲和古巴出口食物，「中國共產黨没有作出過他們歡迎糧食援助的表示」[38]。红十字會曾嘗試提供援助，但他們和北京接觸的方式不對頭，他們首先詢問西藏的饑荒——那裏解放軍剛剛鎮壓了一次重大的叛亂。北京迅速作出了可想而知的反應：我們在 1960 年獲得空前大豐收，絕對没有饑荒，饑荒是造謠中傷。红十字會笨拙的秘書長 Henrik Beer 火上加油，從日内瓦發出了第二份電報，詢問「中國」是否「也」没有饑荒。北京憤怒地答覆道，西藏和中國不是两個國家，而是一個國家，全國上下，我們政府正在依靠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克服前两年的自然災害[39]。

但是，即使红十字會以更委婉的方式處理問題，外國的幫助還是很可能遭到拒絕。日本外務大臣和他的對手陳毅悄悄地商量過：提供十萬噸小麥，避開公眾的視野，運給中國，但是被陳毅拒絕了[40]。即使東柏林的學童提供衣物以幫助 1959 年遭受颱風肆虐的廣東，也被視為丟臉；使館被告知，不要再接受任何捐助[41]。中國願意援助發展中國家，但不接受任何人的援助。

16
尋找出路

面對破產的經濟，負責外貿的三巨頭周恩來、李富春和李先念，從1960年8月開始，將對外貿易從蘇聯轉向西方。接下來的幾個月，周恩來和陳雲設法說服了毛澤東：自然災害造成了農業損失，需要進口糧食以重振經濟。黨的計劃人員也開始謹慎地對政策指令進行修補，悄悄地策劃一個轉折。1960年8月，李富春開始採用一個新名詞，強調「調整」，而不是大躍進。在一個用口號治國的一黨制國家裏，提出「調整」在半年以前是無法想象的。周恩來小心翼翼地加上「鞏固」，使它更加容易被毛認可[1]。李富春必須仔細導航，使這個新口號繞過善變的主席。

1960年10月21日，一份來自監察部的報告落在李富春的辦公桌上。這是關於信陽大規模饑荒的報告。信陽是吳芝圃的模範省河南的一個地區。此前有個調查，提到了僅正陽縣就有1.8萬人死亡，現在這個數字已經增長了三倍——8萬人死亡。在遂平縣的聖地嵖岈山公社，十個村民中就有一個餓死[2]。

三天後，李富春把報告送給毛澤東，主席顫抖了：反革命當道，他們控制了整個地區，進行恐怖的階級報復。在和劉少奇、周恩來緊急商議後，毛派遣一個由李先念率領的調查組，中途又加上了陶鑄和王任重。

他們在信陽發現了一個惡夢。在饑荒中心的光山縣，他們聽到了倖存者的絕望的哀號。他們在嚴寒中走進農民的家園：荒涼的瓦礫堆中陳列著已死者的墓冢，竈是冰冷的，門、窗、門楣、茅草頂都拆掉

當作燃料燒光了，食物全然是沒有了。在廬山全會後的恐怖統治下，當地民兵在村裏挨家挨戶搜索隱藏的糧食，沒收一切，以彌補產量的不足。在一個曾經很熱鬧的小村裏，兩個瘦得皮包骨的孩子，躺在臉色慘白的祖母身邊，他們是這裏僅有的幸存者[3]。光山五十萬人口，死了四分之一[4]，到處是群葬。在成關，十個還在呼吸的嬰兒被扔在地上[5]。僅 1960 年，信陽地區死了一百萬人以上。其中 6.7 萬人是被棍棒打死的[6]。李先念感慨道：「西路軍的失敗那麼慘，我沒有掉一滴眼淚，到光山看到這個情況，我再也忍不住了！」[7]

「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毛澤東再也無法否認災害的程度，但是作為一個偏執的領導人，他認爲世界上充滿了陰謀詭計，他把責任推到階級敵人頭上[8]。地、富、反、壞利用反右傾運動，重新掌權，進行階級報復。毛主席從來不承認，正是他自己在高層建立的恐怖政權，被各級黨委從上到下一級一級複製。

毛下令奪回權力。全國各地展開了鬥爭，目的是挖掘「階級敵人」，由北京派來的代表團撐腰。李先念和王任重監督河南的清洗，縣級領導被推翻，數以千計的幹部被審查，有些幹部被當場逮捕[9]。一支四十人的工作隊在一位將軍的帶領下從北京下去清理民兵[10]。在甘肅，一個由中監委副書記錢瑛領導的代表團監督一場大清洗，導致張仲良降級為省委第三書記。其他地區效法，一道道緊急命令，敦促推翻人民公社中的「死官僚主義分子」。1960 年 11 月 3 日，一道緊急指示終於發出，允許村民保留自留地，搞副業，每天休息八小時，並恢復當地農貿集市，以及其他措施，旨在削弱公社對於村民的控制[11]。

這是大饑荒結束的開始。李富春感覺到風向有變，於是從 1961 年起推動他的經濟調整政策[12]。他是第一個支持毛澤東發起大躍進的計

劃師。現在他是第一個走回頭路，在主席面前，慎重地操縱經濟復甦政策。

這一階段，劉少奇在觀望。他同意主席的意見，認為農村已成為滋生反革命的地盤。和其他領導人一樣，在廬山對抗後，他選擇不顧發生在地面上的一切，慷慨陳辭，譴責蘇聯的修正主義道路。他並非不知道饑荒。營養不良即使在黨的首腦機關所在的中南海紅墻裏也很明顯。肉、蛋和食油稀缺，浮腫和肝炎流行【13】。但是，把饑荒解釋為自然災害，這種解釋在政治上比較安全。1961 年 1 月 20 日，劉少奇面對來自甘肅的一群人，高談封建主義的危害，指出是它導致了信陽事件：「這是個革命，關鍵在於發動群眾。把群眾發動起來，讓群衆翻身。」【14】

前一天，毛澤東曾對資產階級在農村的反攻倒算表示驚訝：「沒料到現在農村有這樣多的反革命。反革命篡奪農村基層政權，進行殘酷的階級報復，是沒有料到的。」【15】毛不依靠來自基層的報告，認爲這些報告誤導領導，他決定派遣一些高層小組去農村調查。鄧小平、周恩來和彭真都被派到北京週圍的公社。毛澤東自己在湖南花了幾個星期。劉少奇希望農民和他無拘束地說話，也回到自己的家鄉湖南花明樓。這是一次具有啓示性的經歷，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劉少奇輕車簡從，於 1961 年 4 月 2 日離開長沙，隨行的只有他的妻子和幾個親密助手，乘兩輛吉普車，隨身的輕便行李中裝著自用碗筷，前往農村，調查無法無天的地方當權派。不久，車隊看到一塊大養豬場的招牌。仔細一數，只有寥寥十來只骨瘦如柴的豬在泥裏覓食。近處有幾個衣衫襤褸的孩子在挖野菜【16】。劉決定就地過夜，即使在飼料店裏，他的隨從也找不到鋪牀的稻草。劉發現，在肥料堆裏、已經風幹了的人糞中，除了粗纖維什麼也沒有，這是大饑荒的又一證據。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儘管警惕性奇高的農民們誰都不敢說實話，劉少奇的擔心終於得到了證實。他在回鄉的路上經過一個村莊，發現地方領導人瞞報的死亡人數。劉親自看到的景象，和官方的報告根本不同。他和當地的領導發生了衝突，那些領導試圖阻撓劉和村民說話。他找到一個 1959 年被打成右派而解職的幹部段樹成：段坦白地解釋大隊在大躍進中如何贏得紅旗。段說，為了保持特權地位，地方領導人有系統地迫害任何敢於表達不同意見的人。1960 年，把糧食收成 72 萬斤吹噓為 120 萬斤。國家徵購後，村民只有 360 斤，留出種子和飼料之後，每天只能吃一把米【17】。

在劉的家鄉炭子沖，親友們比較願意說些實話。他們否認上年發生過旱災，食品短缺的責任主要在幹部：「主要是人禍，而不是天災。」在食堂裏，炊具、髒碗和筷子被胡亂堆在地上，唯一的蔬菜是蘆葦葉，沒有食油。劉被他所看到的景象震撼了。幾天後，他在一個群眾集會上向鄉親們道歉：「我將近四十年沒有回家鄉了。很想回來看看。現在，我看到鄉親們生活很苦。我們工作做得不好，對不起你們。」當晚劉就下令解散了食堂【18】。

劉少奇是一位有獻身精神的共產黨人，家鄉的災情使他震驚。他把他一生的每一分鐘都獻給了黨，可是，他發現，這個黨為他所服務的人民帶來的卻是壓迫、貧困和饑餓。他還發現了人民和黨之間完全脫節：他一直被蒙在鼓裏——他是這麼說的。

儘管他這次農村之行的詳情已經眾所週知，他與地方官員的衝突卻鮮爲人知。劉開始歸咎於省委第一委書記張平化，後者在周小舟被撤職後負責這個省：「我的家鄉搞成這個樣子，沒有人報告過，連寫信的，告狀的也沒有；過去有些人給我寫信，後來就沒有了。我想不是他們不想寫，不願意寫，恐怕是有人不叫他們寫，或者寫了被扣了，被查了。」他直率地指責省公安廳，說，安全機構「完全爛掉了」。當地警察怎麼可以檢查和扣留私人信件，又怎麼可以任意調查和毆打那

些試圖向他反映情況的人？後來，劉當面責問謝富治——大權在握的公安部長和毛澤東的親密戰友：為什麼他家鄉那些無法無天的事情沒有人去調查？黨的耐心的建設者劉少奇消失了：這位要替同胞仗義執言的人，信念動搖了[19]。

回到北京後，劉繼續直抒己見。1961 年 5 月 31 日，在一次領導人聚會時，劉少奇作了個充滿感情的發言，他直言不諱地把饑荒的責任歸咎於黨。「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是由於天災，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劉駁回了所謂黨的政策總體上是偉大的成功的教條，觸動了毛最喜歡的說法：「有的同志說，這些問題只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但現在恐怕不能那麼說了。我們常把『九個指頭對一個指頭』當作永遠不變的公式，但這不符合實際情況。我們應該實事求是。」關於黨的路線，他也直言不諱：「在執行黨的總路線，組織人民公社，組織大躍進的工作中，存在著許多缺點和錯誤，甚至很嚴重的缺點和錯誤。」而且他毫不懷疑責任所在。「主要應該中央負責，我們領導人都有責任，不要去責怪哪個部門或哪個人。」[20]

劉少奇與毛澤東分道揚鑣。當時他沒有因此而遇到麻煩，因為到處慘不忍睹，不能置之不理。但到了文革期間，他將為他的挑戰付出高昂的代價。當時，其他領導人謹慎地向這位國家元首靠攏，略微和毛澤東拉開一點距離。素來慎重周到的周恩來承認了廬山會議後的一些錯誤，爲了幫助主席挽回面子，他公開承擔了一切錯誤的責任[21]。

劉少奇冒著風險作了最大可能的批評。李富春則利用這個機會從大躍進進行策略性撤退。李是個書生，態度謙虛，歷來不敢提不同意見，這次也改變了語調，在 1961 年 7 月在北戴河的一個會議上，對經濟狀況作出了辛酸的評估。僅在幾個月前，他照顧主席的情緒，和稀泥，說什麼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不可能是一條直線，蘇聯也經歷過糧食產量下降的時期[22]。但在劉少奇發表意見之後，他不再迴避問題。他

指出，在山東、河南和甘肅，幾千萬農民在每天只有幾顆米的情況下掙扎，饑荒與自然災害沒有多大關係。人們挨餓的原因是黨所犯的錯誤。他用七個形容詞來描述大躍進：太高，太大，太平均（所有獎勵都被取消），太分散，太亂，太快，太輕率（調撥物資）。接著他作了長篇分析，然後提出具體建議：下調所有的生產指標，使經濟回到正軌。他是毛澤東的緊跟者，他巧妙地為毛開脫：「黨的路線，方針，毛主席的指示完全正確，總是我們，包括中央機關在內，執行中發生了缺點錯誤。」[23]

李受到了主席的認可。次月，在廬山中央會議上他發表了類似的報告，再次為毛開脫所有責任。這是饑荒的轉折點。李說話輕聲細語，爲人謙虛，他對毛澤東的忠誠無可懷疑，他不像彭德懷，他能夠提出事實，而不觸怒毛。毛是一個偏執的領導人，誰要是表示絲毫異見，都會被他認爲是背叛。這一次，毛反而讚揚了李的報告。

李富春講話之後，跟著是其他一系列令人難受的評估。中南局的一名書記李一清報告說，1958 年在模範省河南有 14 萬噸以上的農具被扔進土高爐化成鐵水。鐵道部副部長武兢天說，因爲發動機損壞，五分之一的機車不能用。交通部長副部長彭德說，他負責的車輛中，能用的不到三分之二。冶金部副部長徐馳指出，因為缺煤，鞍鋼在今年夏天被迫停工數週[24]。

毛很少參加會議。他通過每天晚上看書面的綜合報告掌握會議動態。他在撤退，戰略性地隱瞞自己的判斷，同時了解他的同事們的立場。主席很不高興。他向他的醫生李志綏發洩，說：「好黨員都死光了。剩下的是一堆殭屍。」[25] 但他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最後，在黨的最高領導層中開始討論三年強迫公社化的後果。他們發現，毀滅性的災難超出了幾乎所有人的想像。

第三篇

毀滅

17
毀了農業

「指令經濟」這個詞，源于德語的 Befehlswirtschaft。它最初由納粹經濟採用，但後來又被用於詮釋蘇聯經濟。這種經濟形態，由高層權威，根據總體規劃，發出命令，確定經濟的總體方向；而千百萬買者和賣者，則無法依照供求法則，來確定自己的經濟活動。 指令原則意味著，作出一切經濟決策的權力只屬於中央，以便由它去追求更大的利益。國家確定：生產什麼，生產多少，誰來生產，在哪裏生產，如何分配資源，對材料、商品和服務應收取什麼樣的價格。中央計劃取代了市場。

計劃工作者一旦主宰了中國經濟，農民就失去了對收穫的控制權。1953 年，引入了壟斷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下令農民必須將全部「餘糧」按照國家確定的價格賣給國家。壟斷背後的目的，是要穩定全國各地的糧食價格，消除投機，保證有足夠糧食養活城市人口，以實現工業擴張。但是，在這個國家裏，既然許多農民的收成只夠勉強度日，那麼，「餘糧」到底以什麼標準來衡量？這標準被定義為種子、飼料加基本口糧（每人每月大約 13 至 15 公斤）。然而，國際援助組織認定，每天 1700 至 1900 千卡是基本生存所必需，也就是說，要由每月 23 至 26 公斤穀子來提供[1]。因此，所謂「餘糧」，無非是使徵糧合法化的政治藉口。強迫村民在滿足自己生活必需之前拿出糧食，國家就可以使他們非依賴於集體不可。村民要得到基本口糧之外的糧食，必須通過工分向集體買回來，而工分，就是按照他們在集體勞動中的表現進行分配的依據。這樣，農民們不僅失去了對自己的土地和收穫的

控制權，也失去對自己的勞動的控制權：誰應該做什麼，從積糞到餵牛，乃至能夠得到多少工分，決定權都屬於草根幹部。隨著集市被淘汰和貨幣失去了購買力，糧食也成為交換的手段，而大部份糧食掌控在國家手中。

在「餘糧」這個概念的背後，隱藏著一個更陰險的問題，即國家可以對草根幹部施加巨大的壓力，要他們保證把越來越多的糧食繳給國家。繳糧的配額是在一系列會議上確定的，這些會議從小隊一級開始，小隊長將產量彙報給大隊領導，大隊調整後彙報給公社，公社再調整，彙報到縣。當產量上報到地區一級和省一級，已由於幹部的壓力不斷加碼。最後到達李富春——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辦公桌上時，數字已經遠離現實。他再根據最高領導人的最新意圖，使之進一步膨脹：以此為依據逐級下達的徵糧指標便是黨的命令。

在大躍進中，顯示糧食產量大幅度增長的壓力達到了高潮。在瘋狂的競爭中，從村裏的草根幹部一直到省級領導，都力圖超越自己的鄰居，宣傳機器公佈了一個又一個記錄，最終使得比較謹慎的幹部也不得不誇大產量。1959 年初黨曾試圖遏制一些太過份的指標，即使在那種形勢下，不承認糧食生產大躍進仍然被認爲是「右傾保守」；至於在廬山全會後的黨內鬥爭中，更不必說了。在恐懼的驅使下，村幹部必須執行命令，不得討價還價。通常，公社黨委書記或副書記只消開車到地頭，四下一望，就有權隨隨便便敲定這塊地的糧食產量。有個小隊長回憶說：「1960 年，他們把我們的糧食產量定為 52 萬斤。幾天後，被增加了 1.1 萬斤。公社開會後，又增加了 5 萬斤。兩天後，公社打電話說，他們已經把我們小隊的糧食產量定為 63 萬斤：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我們不知道。」[2]

職位越高，浮誇的權力越大，這就影響了每一個下屬單位，人人都得玩弄數字，使之迎合領導下達的指標。當雲南領導謝富治被北京告知，全國的糧食總產量已提高為 6000 億斤，他立即召開了電話會

議，向縣領導解釋，這實際上意味著 7000 到 8000 億斤。他迅速算出，雲南人口約佔全國的三十分之一，意味著糧食產量必須是 200 億斤。由於雲南不甘落後，謝就把它進一步提高為 250 億斤[3]。這樣一來，地區、縣、公社、大隊、小隊，人人都被迫緊跟省委，層層虛報各自的產量。

隨著作物產量被虛報，徵購配額相應飆升，導致了口糧短缺和饑荒。既然數字是捏造的，我們怎麼能知道真正的產量是多少，以及收成的多大比例被徵購？倫敦大學農業經濟學專家肯尼思·沃克（Kenneth Walker）花了十年時間，從一系列的地方報紙、公佈的統計數據和政策指導方針，精心收集統計數據。他告訴我們，國家規定的徵糧指標在 1959 至 1962 的三年內達到了歷史的最高點，而這三年的人均產量恰恰處在歷史的最低點[4]。

正當他的研究在 1984 年打印出版時，中國國家統計局出版了統計年鑑，包括饑荒年代的一組歷史數據。大多數觀察家一直依賴著這些官方數據。但是，我們憑什麼去相信一個對自己的歷史諱莫如深的政黨所公佈的統計呢？後來，新華社退休記者楊繼繩根據黨內檔案出版了一本關於饑荒的書。他依據的是糧食部 1962 年編撰的一組數字。但是，這些數字都有問題。檔案文件不一定就是正確的。各個文件的數據互不一致，由不同的機構，在不同的時間，以不同的方式放在一起。由於政治壓力的結果，糧食部的統計工作在 1958 年至 1962 年漏洞百出到了這樣的程度，連國家自己都無法算出實際的糧食產量。最高層從未見過這麼大的失真度，這是由於虛假報告和浮誇指標被黨的各級組織層層追加。如果那些領導人都在自己的統計泥潭中迷失，那麼我們要想神奇地通過某一份黨內文件來提取數值真相，似乎不太可能。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是在通過層層扭曲的過濾鏡看這個世界。他們的解決辦法就是花更多的時間深入農村，去調查已經發生了的事情。

表 5：湖南糧食產量和糧食徵購的不同估計（億斤）

	糧食產量總估計		徵購總估計	
	糧食部	湖南省統計局	糧食部	湖南省統計局
1956		207.13		47.90 (23.1%)
1957	226.00	226.48	45.70 (20.2%)	54.83 (24.2%)
1958	245.00	245.52	53.18 (21.7%)	70.13 (28.5%)
1959	221.70	221.75	59.83 (26.9%)	77.78 (35.1%)
1960	160.00	160.48	35.01 (21.9%)	49.98 (31.2%)
1961	160.00	160.00	31.01 (19.4%)	44.28 (27.6%)

資料來源：湖南，1965 年 5 月，187-1-1432，第 3-8 頁；糧食數據來自湖南，1961 年 6 月 30 日，194-1-701，第 105 頁，其中數據與 1965 年的估計略有差別；糧食部的數據出自楊繼繩的著作《墓碑》第 540 頁。

1962 年至 1965 年，各地統計局爲了重建其可信性，往往對饑荒年代發生的事情有所回顧。他們編製的數字表明，實際徵糧的程度比中央糧食部提供的數字高得多。表 5 比較了糧食部 1962 年編制的數字與湖南省統計局 1965 年計算的當地數字，試圖確定農民實際上向國家上繳了多少。糧食產量估計的差別很小，但是當涉及到徵糧的數量，省級部門提供的數字比糧食部的數字要高得多，佔了總收成的 28% 至 35%。為什麼出現了 4% 到 10% 的差別？原因之一可能是統計證據的編制方式。細看之下，表明中央糧食部提供的數據沒有在饑荒後進行調整，而只是根據頭幾年糧食部發出的計劃進行機械地編制。每項計劃有兩套數字，一組說明當年「真正實現」的徵購，另一組是來年的目標。例如，1958 年的徵購數字來自 1959 年的計劃，這意味著他們是粗略的近似值[5]。在這方面，我們要補充的是，中央糧食部在 1962 年的壓力下，爲了表明它沒有徵購過頭把農村的糧食搾乾，因此採用了一套較低的數字。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可以解釋不匹配的數字：在每一級，從村和公社到省，有些數字被隱藏。湖南統計局 1965 年編制的數字是根據饑荒後的仔細研究。該局可以回到公社和縣已確認的實際徵購量，而中央的數據只是各省的呈報。 換句話說，有一部份徵購糧食逃避了國家的視線。

其他也有例子證明徵購的數量明顯高於中央糧食部的數據。例如，在浙江，一位叫曾紹文的省級官員在 1961 年承認，在 1958 年約 58 億斤（或收成的 40.9%）被徵購，而 1960 年被徵購的百分比甚至更大，達到 43.2%。 糧食部提供的百分比較低，即 1958 年 30.4%，次年 34.4%[6]。貴州的情況類似。在楊繼繩無法查閱的省檔案館，有一份來自省委的文件顯示，從 1958 年至 1960 年，每年平均採購了 36 億斤，佔糧食產量的 44.4%；1959 年最多：46.8 億斤，高達糧食產量的 56.5%。 而中央糧食部在同樣三年給出的有關數字是平均 28 億斤，比貴州提供的數字少了約四分之一[7]。

有些計算，看來比較抽象，但很重要。在指令經濟中，糧食不僅是貨幣，它也是饑荒時代的生存之源。當湖南和浙江將徵購指標提高了 8% 至 10%，從農村拿走了額外的 15 億斤糧食，挨餓的人數就隨之增長。我們已經看到，一公斤糧食可以為每人提供生存一天的熱量，這意味著一個三口之家每年需要一噸。但真正的問題是，許多農民即使在饑荒中也可以存活，如果他們的口糧每天能稍稍增加約 400 或 500 大卡的熱量（相當於晚餐的一大碗飯）。總之，為了了解人們如何大批死亡，應該看到這是在收成下降中增加徵購的惡果。

表 6：糧食徵購的不同估計（億斤）

	總產量	總徵購		
		官方統計	糧食部	統計局
1958	4000	1020	1125.44	1326.4
1959	3400	1349.8	1214.29	1444.5
1960	2870	1021.8	780.84	1007
1961	2949.4	1090.4	679.14	-

資料來源： Kenneth Walker, *Food Grain Procurement*, p. 162；楊：《墓碑》，第 539 頁；雲南，1962, 81-7-86, 第 13 頁；產量數據是穀物加工前，而徵購的數據是穀物加工後，隱藏了在加工過程中約 1/5 總重量的損耗。

總共採購了多少糧食？表 6 有三套統計數據。 前 2 套顯示了肯尼思·沃克在 1983 年根據公佈的統計數據以及楊繼繩提供的糧食部的

數據所得出的總體數字。但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不應該偏信糧食部的話，因為它既沒有技術手段也沒有政治動機去蒐集符合實際的數據。第三套統計來自雲南省統計局 1962 年其成員出席中央統計局定期召開的全國會議的筆記。檔案中永遠無法發現一組真正的數字，因為每一個數字所代表的，都是政治意圖和應付差事，而不是專家的結論。

但似乎糧食部匯集的數據，既遠低於外國觀察員在有關地區統計基礎上計算的數字，也低於該局 1962 年的統計。總之，來源不同的證據表明，全國的徵購水平從 30% 到 37% 不等，遠遠高於 1958 年以前的 20% 至 25%。正如毛澤東 1959 年 3 月 25 日在黨的領導人秘密會議上所指出，「只要你從農民手裏拿走的不超過（總產量的）三分之一，他們就不會造反。」他自己就在鼓勵創紀錄的高徵購，何況眾所週知，當時的總產量已被大大浮誇[8]。換句話說，國家錯誤地從農村徵購了太多的糧食，因為據說已經大豐收了，但大豐收是虛構的——充其量只是在 1958 年秋季可能曾經有過豐收。

徵購糧食中的一部份，又以高於收購的價格返銷給農民——但是在漫長的等待名單中，農民排在最後面。正如我們在第 10 和 15 章已經看到的，黨已經形成了一套政治優先的規矩，最不重視農村的需要。領導決定增加糧食出口，以履行其外貿合同，維持其國際聲譽，甚至到了這樣的程度，1960 年通過了一個「出口高於一切」的政策。它有選擇地增加對其盟友的外援，免費運送糧食到阿爾巴尼亞等國家。優先權還給了北京、天津、上海和遼寧省（那裏是重工業的中心）等地正在增加中的人口，其後是普通城市人口的要求。這些政治決定的後果，不僅增加了徵購的比例，而且也增加了這些徵購糧食中上交國家的總量。以浙江省為例，1958 年至 1961 年，每年平均 33.6 億斤離開該省，而此前三年則是每年 24 億斤。在 1958 年，這意味著，在該省開始滿足本省城市居民之前，就有超過半數的採購糧食被移交給北京[9]。總體來看，國家用來養活北京、上海、天津和遼寧省以及保持

出口市場的徵購糧食數量，每一個季度都在上升，從 1956 年第三季度的 32 億斤升至 1957 年同期的 36 億斤，至 1958 年的 46 億斤，至 1959 年的 50 億斤，再至 1960 年的 60 億斤[10]。

這些政策優先權的直接影響是許多村民命喪黃泉。王任重 1961 年 8 月在南部省份領導人一個會議上指出，「非常困難的情況需要非常的措施」，這句話的解釋是，糧食必須供應城市，饑餓的村莊只能自生自滅。在他看來，必須犧牲局部，以拯救大局[11]。

不是只有王任重一個人這樣看。周恩來就在努力爭取擴大徵購。他負責確保從農村拿出足夠的糧食去養活城市人口並賺取外匯。他敦促省級領導，通過電話，通過他的代表，也通過一連串不斷的「緊急」電報。他也有敏銳的等級觀念，即農村的需要必須讓位於（他所代表的）國家利益。他清楚地知道，李井泉（毛在四川的激進的追隨者）給他的大量糧食，會導致四川的大規模饑荒。但其他人也異口同聲地認為，人民挨餓不要緊，國家的需要更重要。鄧小平認為，在指令經濟中徵購糧食「要像打仗一樣」嚴厲：無論省級領導人怎樣企圖捍衛其領地，首先必須捍衛黨的路線，否則國家就要滅亡。1961 年年底，饑荒程度在領導層中已經無人不知，鄧小平對四川問題（在那裏，高徵購已經使千百萬人餓死）如此表態：「過去有的地方也有徵購過了頭的，如四川，好幾年確實過了頭，今年也過了頭，但是不得已。我贊成四川的風格，從來沒有叫苦，大家要向他們學習，並不是我是四川人才說四川。」[12]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毛澤東用了不同的措辭：「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給一半人吃飽。」[13]

* * *

國家支付的糧食採購價格各省不同。以玉米為例，1961 年初它介於每噸 124 元（廣西）到 152 元（廣東）之間。水稻價格的差別可高達百分之五十，例如廣西每噸 124 元，上海每噸 180 元[14]。國家大米出口為每噸 400 元，利潤很大[15]。這些價格，定期調整。但採購價格

如此之低，往往使農民賠掉老本。一直到 1976 年，出於這個原因，種小麥、大麥、玉米和高粱都不賺錢。 大米的盈利非常小[16]。但是，在一個指令性經濟中，農民無權自行決定種植最能盈利的作物，因為他們必須服從當地幹部的命令，後者又要遵照黨的命令。而規劃人員只把眼睛瞄在糧食上，迫使越來越多的農民非種糧食不可——這又損害了整個經濟。這在 1959 年形成了以糧為綱即糧食生產高於一切的政策，糧食耕地面積在許多省份被擴大了大約百分之十[17]。被要求放棄經濟作物而改種玉米、水稻或小麥的農民損失慘重。例如，在浙江一些村莊被下令種糧，不准再種傳統作物如瓜類、甘蔗和煙草後，收入暴跌[18]。

指令經濟的另一個問題是官員們瞎指揮，他們所強迫實施的決定，結果是災難性的。我們已經看到了，大躍進高潮期間，當政者如何堅持深耕密植。對農業知之甚少的當地幹部的反覆無常的干預，加劇了這個問題。1959 年，羅坑公社被一個當地幹部決定，在可用面積的一半上用蕃薯取代現有的作物；後來又改變主意，用花生取代番薯；後來又搗毀，代之以大米。前一年公社曾試圖深耕，集中大量人力挖深溝，大部份是用手。使用了大量化肥，在某些地方高達每畝 4000 斤。這一切都毫無結果[19]。廣東開平縣，數以千計的村民，被迫在 1959 年早春下種，而不管寒冷的天氣：種子受凍 3 次，最終每畝只收穫了微不足道的 60 斤[20]。

更荒唐的是下令「少種」。毛澤東深信農村已經糧多為患，建議三分之一的土地休耕。「中國每人平均三畝地，我看有兩畝就夠了，可以拿三分之一種樹，三分之一種糧，三分之一讓地休息，地也輪班。」[21]加上農民流向城市，總種植面積銳減。1958 年在湖南，大約 8673 萬畝種的是糧食，但到 1962 年，減少了 15%，只剩下 7375 萬畝[22]。在浙江，每年約 100 萬畝耕地消失，到 1961 年，失去的耕地約佔總面積 10%[23]。這些以省為單位的平均數，掩蓋了很大的地區差別。例如在

武漢地區，56 萬畝產的耕地，只種了 50% 強[24]。負責農業的譚震林指出，在 1959 年約一億二千多萬畝休耕[25]。1961 年年初，彭真估計總播種面積為十六億畝耕地——如果屬實，這意味著自 1958 年後，有 3.45 億畝消失了[26]。

在這些損失之上，還有種植的糧食的比例的變化。城裏人喜歡吃細糧，如大米、小麥、大豆，儘管在北方也吃相當數量的粗糧，如高粱、玉米和小米。紅薯雖被視為農民的口糧，通常不大量吃[27]。而且紅薯易腐，不易儲存，這意味著，國家對之興趣有限：徵購糧食主要是徵購細糧。但紅薯種植的比例在饑荒年份增長了，幹部們出於提高產量的壓力，往往把作物換成容易高產的塊根作物。所以，最後能夠留在農民家裏的，往往只剩下紅薯。

通過對糧食的統購統銷，國家執行了一系列龐大的任務。各級政府必須購買糧食，儲存，運輸到全國各地，再儲存，再按糧票分發——一切根據國家計劃，而不是市場要求。即使是富裕的國家都可能承擔不起如此龐大的任務，但中國是一個窮國，一個非常大的窮家。國家負責存儲——而不是由千百萬生產者、零售商和消費者各負其責的小庫存——加大了糧食的損耗。蟲子滋生，老鼠肆虐。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的一份詳細調查驚人地表明，在南雄縣 2832 個地方糧倉中，2533 個糧倉有耗子。潮安縣 123 個國家糧倉中，三分之一有蟲子；728 個公社糧倉，生蟲的比例更大[28]。在雲南，1961 年上半年，約 47830 萬斤受害蟲污染[29]。在山東諸城縣，每公斤糧食都有數百只蟲子在爬[30]。

此外，還有腐爛。這和儲存條件較差有關，也因爲農民在糧食中摻水，而糧食管理人員沒有檢測出來。在廣東 30 億斤的國庫糧食中，近三分之一含水過多，庫內糧食紛紛腐爛[31]。在湖南，國家糧倉中五分之一的糧食，要麼佈滿蟲子，要麼因爲水份含量過高而黴爛。在省會長沙，超過半數的儲糧被污染[32]。國家糧倉的溫度往往過高，加速

了病蟲害。在雲南，有些糧倉的溫度達到 39-43 攝氏度[33]。即使在遠離潮濕亞熱帶的中國北方平原的寒冷冬天，腐爛也很常見。就在首都郊區的延慶，在饑荒最嚴重的一年，超過 113000 斤白薯在十幾個村莊中腐爛。北京海淀區儲存的糧食中有 12000 斤腐爛[34]。

縱火或意外失火也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僅在雲南，1961 年，每月有 14 萬斤的糧食被燒；1960 年和 1961 年，每月超過 60 萬斤由於腐爛、蟲害和火災而註銷。據公安部門計算，僅 1960 年，該省的糧食損失足夠 150 萬人吃整整一個月[35]。雲南不是最差的。在遼寧省鞍山地區，1960 年每月損失 80 萬斤，雖然這個數字只包括了盜竊和腐敗所導致的損失——我們將在後面討論這個主題[36]。

運輸系統受到大躍進運動災難性的影響。鐵路系統在 1959 年初癱瘓，承受不了計劃要求的貨運量。運貨卡車燃料迅速耗盡。全國各地的糧食都耗費在鐵路專用線上。在昆明，每月大約有 3 萬斤糧食損失在火車和卡車上[37]。但是，這和農村收割後所發生的事情進行比較，就顯得微不足道了。在湖南，整個系統在 1959 年夏天失靈，因為每天缺少數百輛車皮。卡車也很缺。因此，只有一半的糧食可以從農村運到主要火車站。大約 4 億斤的糧食堆在路邊，而按照每月的運輸能力只能裝載 1.2 億斤[38]。

最後，農民甚至沒有留下足夠的種子去種植作物。有外國遊客在 1962 年早春乘火車從北京到上海，他們發現，鐵路兩邊的大片農田種植稀疏，一塊接一塊的田野荒蕪[39]。全國各地，曾經仔細耕耘的田野現在顯得很荒涼，一簇簇發育不良的小麥或稻穀因缺乏肥料而枯萎。成片的田地廢棄著，因為農民沒有種子可種。通常留下來供下一季播種的種子，大部份已經被絕望的農民吃掉了。即使在饑荒相對較輕的浙江，五分之一的村莊缺乏種子[40]。在亞熱帶的廣東，通常春天綠色成蔭，這時卻有百分之十爛秧，種子不良，土地缺乏營養。在中山縣

的一些公社，一半田地枯萎，秧苗變成黃色，然後慢慢地衰敗變為棕色[41]。

當規劃人員指示將越來越大比例的農田改種糧食時，經濟作物和食用油的產量暴跌。但不同於糧食，這些作物沒有國家干預的底綫，結果是徵購飆升。

棉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已經注意到，中國的紡織產品於1958年如何充斥國際市場，這個國家發動了貿易戰，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口貨物。這一戰略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但紡織品的出口仍在增加，以履行與外國合作夥伴的貿易協定。中國於1957年發運了100萬米棉布到蘇聯，1959年增加到200萬米，而1960年居然達到了14900萬米[42]。進口1萬噸原棉以供應紡織工業的價格是800萬美元。這個數學很簡單。財政部長李先念1961年11月算了算當年從農村額外徵購的5萬噸棉花的相當於減少進口的節匯額，說：「四千萬美元可愛的很呀！」[43]

表7：湖南的棉花產量和棉花徵購（噸）

	產量	徵購
1957	21,557	17,235 (80%)
1958	23,681	15,330 (64.7%)
1959	32,500	28,410 (87.4%)
1960	21,000	19,950 (95%)
1961	15,130	15,530 (102.6%)

資料來源：湖南，1962年，187-1-1021，第33頁；1964年3月，187-1-1154，第80頁和第97頁。

匯價的誘惑不可抗拒。徵購從1957年的164萬噸，增加到次年的210萬噸。雖然1960年因爲棉花作物歉收而只徵收了以上數量的一半，但仍意味著82%至90%的總棉花產量最終到了國家的手中[44]。以湖南為例（表7）。由於實際產量在1959年高峰期後暴跌，國家徵收的百分比上升至1960年的95%。1961年，湖南官員設法徵購的數量超過當年的棉花總產量，他們奔赴全省各地，搜羅每一包棉花，包括由小

隊和公社過去的儲備。河北省於 1959 年也採用了這一策略，得到領導的高度讚揚。正如國務院在 1959 年 2 月解釋，河北省已設法將其徵購增加了三分之一，他們的辦法是，通過徵用在倉庫中找到的儲備，以及「拿走仍然掌握在群眾手中的棉花」。[45]

群眾手中已經沒有太多的衣服。和糧食分配一樣，也是根據政治優先的原則，出口市場高於國內需求，大部份棉花被送到紡織行業和在國際市場上出售。剩下的棉織品，則根據等級進行分配，先是黨和軍隊，其次是城市人口，在每一個類別中又有複雜的等級制度，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棉花生產者，也就是農村人，普遍被排除在外。1961 年產生出的 350 萬件棉花製品中，大約有一半是留給黨和軍隊做制服，100 萬件被送到出口市場，剩下的 80 萬件給六億人民[46]。在廣州，買毛巾、襪子、襯衣、背心和雨衣都要布票。棉布是一年配給 3 尺，郊區居民比城市居民少得三分之一。相比之下，大躍進前，任何人每年都可以購買 24 尺棉布[47]。

到 1960 年，農村的情況已經變得如此絕望，農民把棉花的種子也吃掉了。在浙江慈溪縣，一個月內，大約兩千名村民，饑得只能吃棉籽餅，最後中毒，這還是全國受饑荒影響最小的省份之一。在河南，單是新鄉週圍地區的中毒人數就超過十萬人，造成 150 多人死亡[48]。全國各地極度饑餓的村民饑不擇食，從皮帶、茅草到棉花。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鄧小平的助手胡耀邦（幾十年後，成爲指導國家擺脫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統帥）在 1961 年 9 月花了一個月，沿著淮河視察一些破壞最嚴重的村落，他報告說，看到光身的婦女和兒童。許多五六口人的家庭只有一條毯子。「許多地方農民對生活資料的一個突出要求是布。我們看到一些社員一家 5、6 口人只有一床被單，有些婦女光著膀子下地，有些小孩一件衣服也沒有，這種情況不親身目睹難以想像。看來，有些地方必須盡可能照顧一點，以免凍死人。」[49] 全國各地，死於饑餓的人常常光著身子，甚至在隆冬。

在 1958 年大躍進中，大量的家禽、豬和牛被宰殺，而隨後幾年，它們仍然得不到照管，受餓，受凍，生病，破壞的程度可以用數字說明。在湖南省，1958 年約有 1270 萬頭豬在尋食，1961 年，只有 340 萬骨瘦如柴的豬還活著（表 8）。河北於 1961 年有 380 萬頭豬，只有該省五年前吹噓的一半。一百萬頭牛也消失了[50]。山東在饑荒時期失去了百分之五十的牛[51]。

表 8：湖南省豬的數量（百萬）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0.9	12.7	7.95	4.4	3.4

資料來源：湖南，1962 年，187-1-1021，第 59 頁。

管理不善非常普遍，因爲禽畜被人民公社充公後，無人負責了。在廣州郊外花縣，豬站在一英尺厚的糞便中。在些村莊，豬舍被拆掉做化肥，豬被日曬雨淋[52]。常規的檢疫措施失靈，獸醫服務混亂。牛瘟和豬瘟蔓延，雞瘟普遍[53]。禽畜死亡率以冬季為最高。在冬天的一個月裏，浙江慈溪市就有數萬頭豬死於饑餓[54]。僅 1960 年 12 月，湖南省有 60 萬頭豬死亡[55]。

更甚的是，發病率大幅飆升。在廣東東莞，豬的死亡率於 1956 年不足百分之十。三年後，四分之一的豬死亡，到 1960 年，超過一半的豬死亡。這個縣只剩下一百萬頭豬，而幾年前，那裏有四百二十多萬頭豬[56]。在浙江，有些縣，豬死的比生的多，比例是生一死六，導致豬的存欄數急劇下降[57]。用周恩來自己的話來說，整個河南，畜牧業的形勢，1961 年還不如抗日戰爭時期的 1940 年[58]。

豬在餓死前會互相攻擊。牲畜往往不以重量分開圈養，也就是說，大大小小都被關在同一空間中，弱小的被擠壓、踐踏、咬傷和吃掉。江陰縣的部份地區，許多豬被凍死，但不少豬成爲更強大的同伴的食物[59]。大量的豬被放在惡劣的集體環境中，顯然沒有建立起尊卑

秩序，每個動物都將其他個體視為敵人。在北京紅星公社，牲畜死亡率為 45%，村民們注意到了大豬吃小豬的現象【60】。

部分死亡原因是由於推廣了畜牧業的新技術。像深耕密植一樣，創新本應推動該國超越對手。中國進行了各種實驗以增加豬的體重，其中有些是受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騙人理論的啓發。李森科是斯大林的門生，他不承認遺傳學，認為遺傳特性是由環境塑造的（不過，李森科於 1958 年公開蔑視大躍進，使北京領導人非常氣憤）【61】。就像培育各種具有優勢的雜交品種一樣，高級領導人也想到了雜交牲畜。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要求各縣採取措施，「主動改造自然」：他建議將母豬與公牛雜交以產生較重的豬崽【62】。渴望完成高不可攀的肉類指標的幹部們，還給沒有發育成熟的牲畜人工受精，甚至包括體重只有 15 公斤的豬崽（健康的成年豬應重 100 至 120 公斤）。許多牲畜因此致殘【63】。

儘管牲畜的數量急劇下降，國家的採購是無情的。1959 年初，河北和山東下令，以三個月為期，禁止在農村屠宰動物。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毛澤東主張甚至建議通過一項決議：任何人都不准吃肉，所有的肉，都應出口，以履行對外國的承諾【64】。毛的理想沒有實現，但城市人口的食肉配額的確削減了幾次。上海，1953 年平均每人年消費約 20 公斤肉，而 1960 年只發 4.5 公斤的肉票，而且在現實生活中還出現了有票無肉的現象【65】。但黨的機關的某些幹部仍可得到定期的肉類供應。廣東在 1961 年被下令送 2500 頭豬到首都，專門用於國宴和外賓：這是在國家正常採購指標之外的額外要求【66】。

漁業也受到集體化的嚴重破壞，由於設備或被沒收或維修不善。湖州的吳興區，是太湖以南的繁華絲綢城，五分之一的船不再適航，因為沒有足夠的桐油去修復船體的隙縫。漏船的數量日益增加，原因是船釘不再由鍛鐵製造了【67】。捕魚量整體大跌。安徽巢湖的一個捕魚

隊，1958 年通常可以捕到 215 噸的魚。兩年後，不超過 9 噸，因為漁船和漁網無人管理，爛掉了。許多漁民因爲收入太低，改行了[68]。

犁、耙、鐮刀、鋤頭、鐵鍬、水桶、籃子、墊子、大車和各種工具都歸「集體」所有，但誰是「集體」？小隊、大隊和公社之間互相扯皮，所有權變來變去，結果是，誰也不管。有些村民，幹完活就乾脆將犁耙拋在地頭。過去，一個很好的工具可以用十年——有些犁在精心維護的情況下可以用六十年——現在用一兩年就報廢了。用來晾小米的蓆子如果好好維護，至少可以使用十年，但隨著人民公社的出現，大部份只用一兩年就破了。上海有個調查報告說，有些耙子剛用一天就出了毛病[69]。

但這些工具畢竟還存在著，沒有在 1958 年瘋狂的大煉鋼鐵運動中被扔進土高爐。在 1961 年夏天廬山舉行的全會上，中南局書記李一清告訴黨的領導人，爲了煉鐵，模範省河南有 14 萬噸農具被扔進火中熔化掉[70]。把這些損失和因疏忽而被毀壞的加在一起，總數約佔所有工具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在山東，大躍進後一年內，有三分之一的工具報廢[71]。在廣東韶關地區，至 1961 年，各種設備百分之四十不見了，這意味著損失了約 3400 萬件工具。剩下的當中，有三分之一是壞的[72]。河北省水車和大車的數量都減少了一半[73]。在浙江省，半數的水泵、超過一半的種植機、超過三分之一的打穀機嚴重損壞，無法修復[74]。

除了對愛護和修理那些泛泛地屬於集體而又不屬於任何個人的工具沒有鼓勵措施外，還有其他原因也不利於保護工具。普遍短缺的自然資源，特別是木材，意味著飛快的通脹——儘管計劃經濟有固定價格。例如，在浙江，竹子比大躍進以前貴百分之四十，分配給農村用來做生產工具的鐵質量低劣[75]。村民家裏的炊具和農具都已經被熔在土高爐中，然後成爲沒有用的爐渣。1961 年分配給廣東省農村的金屬，

有一半是有質量問題的【76】。我們將會看到，國有企業的工具生產也好不到哪裏去。

18
毀了工業

全國上下的工廠、鑄造廠、車間、礦山和電廠都接到了越來越高的產量指標。完成指標的程度，決定著獎勵。總產值是決定一個工廠沉浮的神奇數字。正如人民公社的幹部必須保證不斷提高糧食數量，全國各地的工廠都力圖在完成計劃上互相超越。宣傳機器每天播出產量記錄，然後在黑板報和牆報上轉載，家喻戶曉。工廠車間裏畫著增長預測的圖表。勞模的照片被放在「光榮榜」的玻璃框裏。海報、星星、彩帶和標語，裝飾著每一個車間的牆壁。落後份子在會上被點名，而超標的工人則受到表揚，其中一些到北京參加群英會，並受到主席本人接見。伴隨著金屬的融化聲、坩堝的鏗鏘聲和蒸汽的呼嘯聲，從大喇叭中不斷傳來喧囂的宣傳和廣播節目，以鼓勵工人增加產量[1]。

由於紅色工廠的最高目標是產量，所以往往不計成本。在負責工業的龐大的官僚機構中——從中央各經濟部門到工廠的職能部門，沒有人能夠完全跟踪從國外訂購的設備的驚人數額。即使是周恩來，他這麼無情地壓榨農村吐出糧食以滿足出口，似乎也無法有效地遏止機器的進口。企業向銀行借錢，以不斷地擴建風光的樓房和購買更多的設備。以洛陽礦山機械廠為例，每月欠銀行的利息，等於工廠的全部工資[2]。

但是，新設備一旦到來，立即遇到保養不善和胡亂對待。東德代表團1961年訪問上海一個碼頭時，被進口物資和設備的狀況嚇了一跳。金屬板材、管材和異形鋼被放在戶外生鏽[3]。武漢鋼鐵廠——

1958 年 9 月大躍進中由毛澤東大張旗鼓地揭幕——也有類似的極不負責現象，六個西門子馬丁爐，1962 年只有兩個在滿負荷運轉[4]。調查小組更詳細的報告確認，材料、工具和機器無人負責，甚至有意損壞。例如在石家莊鋼鐵公司，一半的發動機頻頻出故障[5]。廢品開始堆積。在洛陽，僅三個工廠就積累了超過 2500 噸的廢金屬[6]。在瀋陽，熔銅漿和鍍鎳電解液在廢金屬堆之間奔流[7]。

廢品堆積不僅是由於原材料和物資分配不合理，也由於工廠領導故意允許違規操作以增加產量。 根據一個審計檢查組的報告，濟南嶄新的鋼鐵廠，第一年就浪費了國家投資總額的五分之一，即 1240 萬元，他們在數百噸錳礦砂中摻沙子，終於不能使用，只能丟棄了事[8]。

在大家都為努力提高生產水平而狂熱工作的同時，品質不合格的商品開始堆積如山。盲目追求高產量，產品的品質被忽視，很多工廠出了低劣商品，包括搖搖欲墜的房屋，搖搖晃晃的汽車，擺不穩的家具，有故障的電線，和易碎的窗子。國家計委發現，北京生產的鋼鐵中只有五分之一是一級品，大部份是次品或更次品，超過百分之二十不合格。在河南，工廠生產的鋼鐵，50% 以上屬於三等品或更次。大型鋼鐵廠生產的劣質材料，在一系列相關產業中引起連鎖反應。在鞍山鋼鐵廠，1957 年生產的鐵軌通常全部是一級品，但到了 1960 年只有三分之一達到標準。由於鐵軌品質不達標，一些鐵路路段無法承擔繁忙的運輸，不得不被關閉，有些則完全坍塌[9]。

偽劣商品不僅數量增加，而且相當一部份進入了社會。在河南，在 1957 年只有 0.25% 的不符合質量標準的水泥出廠，到 1961 年飆升至百分之五以上，大量的不合格材料被用於建築。對河南開封的一項全面的工業調查，發現一個更加驚人的結論：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出廠產品不合格[10]。

正如故障鐵軌一樣，彎曲的橫梁和假水泥也危險地削弱了日常建築的材料結構，劣質消費品成為的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在

上海，鬧鐘隨意響，出售的搪瓷盆表面有裂縫和氣泡，半數的針織物和棉貨是次品[11]。在武漢，拉鍊卡住，刀是彎的，刀刃從農具上脫落[12]。有時工廠爲了削減成本，出廠的產品沒有任何識別標籤。在北京，出售的罐頭肉有五分之一就是這樣。有時標籤是錯誤的，例如把豬肉誤認爲水果，導致大量貨物腐爛[13]。更令人擔憂的問題是加工食品中的化學添加劑。在一年中北京染料廠出售了 120 噸專門作爲食品添加劑的有害色素。其中許多都被禁止，例如蘇丹黃（用於油墨的一種染料）。對品質控制不嚴也意味著污染的食物和藥品被允許出廠，例如一批變質了的 7800 萬瓶青黴素。在問題發現之前，已有三分之一從上海一個藥廠發出[14]。毛不承認廢品這個概念：「世界上沒有廢品，甲的廢品就是乙的糧食。」[15]

毛澤東可以不承認廢品，但廢品文化破壞了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聲譽。正如我們所看到的，1959 年僅僅爲了賠償壞電池、壞雞蛋、爛肉、假煤等等的金額，就達到了二億至三億元。廢品文化也波及軍工產品。賀龍元帥的一份報告表明，不僅衝鋒槍卡殼，在瀋陽生產的十九架噴氣式戰鬥機也是次品。在 908 工廠，超過十萬個防毒面具無法使用。負責核武器工程的聶榮臻，抱怨無線設備和測量儀表被塵埃微粒污染，性能不可靠。即使是在絕密的工廠裏，垃圾也隨處可見，一點微風就可把宣傳橫幅上的灰塵吹到敏感設備上：「美國人懷疑我們搞導彈，因為中國人太髒，搞不出來精密儀表。」[16]

工人的生活條件惡劣。大量的進口機器旨在助推國家前進，耀眼的新廠——從鋼鐵廠和水泥廠到煉油廠，都從蘇聯和東歐進口。但是，很少投資於普通工人和他們家人的住房和伙食，儘管工人隊伍隨著數百萬來自農村的勞動力而膨脹。

以山東省會濟南的鋼鐵廠爲例。它成立於 1958 年大躍進高潮之中，有最先進的技術設備，應該是工人們的天堂。但條件迅速惡化。廁所不夠，工人只好直接隨地大小便。污穢和惡臭瀰漫著工廠，蟲子

和疥瘡到處可見。廠裏亂七八糟。 打架經常發生，窗戶被打碎，門被砸壞。動物界的弱肉強食的秩序建立起來了，最強橫的人搶佔宿舍裏最好的牀位。恐懼普遍存在，尤其在婦女中，她們常被當地幹部在他們的辦公室或宿舍裏戲弄、侮辱和虐待，有時在工廠地上，當著其他工人的面。她們不敢單獨睡覺或外出【17】。

南京也有類似的情形。1960 年，工會組織調查鋼鐵和煤礦工人的生活，發現骯髒的食堂發生蟲災和鼠災。排隊很長，在靈山煤礦，一個食堂窗口，有上千名工人排隊。由於食堂只開放一個小時，工人們吵架爭空間，有時動拳頭。在官塘煤礦，遲到的礦工沒有飯吃，不得不空著肚子下井值長達十小時的班。宿舍很擁擠。平均每個工人只有 1 至 1.5 平方米的空間，有些工人睡在兩牀之間的夾板上或靠著柱子睡。許多人輪班睡，合用一張牀。稻草屋頂漏水，迫使一些工人不斷移動他們的上下鋪。也有些人睡在傘下。防護設備或者缺乏或者完全不夠。許多礦工沒有鞋子，只好赤腳下井。那些露天採礦的工人在下雨時被淋濕，外衣浸透了水。宿舍裏沒有毯子，濕度如此之高，衣服從來不會全乾。有些在高爐前工作的鋼鐵工人因爲沒有鞋而燒了腳【18】。

再往南，在亞熱帶的廣州，宿舍如此擁擠，上下鋪為每位工人提供的空間不超過半平方米。建築工地的情況很惡劣，雨季炎熱潮濕，黴菌象皮疹一樣蔓延，感染衣服和被褥。 濕度如此之高，有些設施被形容為「池塘」，牆壁滴下的水在地上形成水坑【19】。在韶關附近的曲仁煤礦，工人用坑木做家具或燒火取暖。七分之一的工人得了塵肺病，原因是吸入塵埃微粒，因為沒有任何防護面罩【20】。

北方的情況並不更好。在首都，工會組織對四家工廠的一個詳細調查表明，工人的數量是大躍進前的四倍，而宿舍面積未能相應增加。在豐臺區長辛店鐵路工廠，每個工人分到的住地只有半平方米多。全北京範圍內，到處有工人睡在儲藏室、圖書館甚至防空洞，經常是三層牀。他們擠得像沙丁魚一樣，晚上都沒有空間翻身。連進門

出門，工人也得排隊。廁所總是有人在用，而且經常堵塞。很多人把糞便拉在報紙上，然後扔出窗外。

多數工廠提供不了足夠的暖氣：調查了四家企業，有一家在 1958-1959 年嚴冬根本沒有暖氣。工人只好用小爐子燒煤球取暖，導致數人煤氣中毒死亡。流感很普遍。垃圾到處積累，盜竊的情況經常發生。欺凌問題猖獗，特別是對待新來的員工。在琉璃河水泥廠（工會組織於 1959 年 3 月進行了檢查），為一千人建造的三個食堂，供超過 5700 工人用。年齡較大的工人被急於插隊的年輕人擠到一邊，他們許多人只能吃到冷飯[21]。一年後類似的調查發現一些變化，這一次，「流氓」行爲——取自蘇聯刑法的一種刑事行爲，範圍廣泛，包括粗言穢語、破壞財產和非法性行為——在宿舍變得常見。工人們依仗強力和影響力爭奪更好的牀位，為朋友和家人找住的地方，而無視已經擁擠的狀況[22]。

到 1961 年，北京有達到一半的勞動力得了矽塵性水腫[23]。職業病普遍，大約四萬名工人被暴露在粉塵中。市人民代表大會的報告估計十分之一的工人得了慢性病[24]。實際情況可能更糟。

許多大躍進期間開張的新工廠被形容為「民辦」，而不是「國營」。它們的表現不是更好。大多數是在從民衆手裏沒收的樓房中匆匆建成，資質很差，不能用作工業生產。

南京的一個化工車間，有 275 名工人，是在一家住宅中建成的，屋頂是竹子，油漆從泥牆上剝落。放射性廢物滲透角落和縫隙，堆積在休息室的地上，或放在開口的大桶中，然後再經過風雨傳播。工人得了喉鼻過敏，由於他們本來應該穿戴的防護設備被不正確使用。口罩和手套往往內外反穿，沒有進行徹底清洗就被帶到宿舍。77 名受到醫檢的女工中，8 人懷孕或哺乳，他們每天都得接觸放射性物質幾個小時。冬天沒有淋浴[25]。

這不是一個孤立的例子。在鼓樓區（老城中心，過去這裏的鼓在夜裏打更）28 個「民辦」工廠中，垃圾隨處可見。沒有通風設備。許多工人是在大躍進期間加入的婦女。多數人沒有工作經驗，得到極少的防護裝備，有的只戴草帽。接觸化學成份和粉塵往往造成紅眼睛、頭痛、瘙癢和皮疹。一些婦女的鼻子中間的軟骨由於長期吸入化學品而消失。即使在隆冬，鍋爐附近的溫度也有攝氏 38 至 46 度，中暑經常發生[26]。在對南京一家生產電子管的工廠的 450 名婦女進行的健康檢查表明，超過三分之一沒有月經，這是營養不良的症狀。在南京化工廠，四分之一有結核病，而二分之一患低血壓。一半有蛔蟲[27]。

不管生活條件有多糟糕，工人比起種糧給他們吃的農民還是要好得多。但很少有人能夠養家糊口或者寄錢給他們的農村家裏。他們的薪水因通脹而變得微不足道，買了食品就沒有了——而食品又非買不可，以補充他們在食堂領到的微薄的口糧。在石家莊鋼鐵公司，工人用四分之三的工資買食物[28]。在南京，許多工人不得不借錢，欠下 30 至 200 元的債務。由於大部份工人薪水微薄，這些債務幾乎是毀滅性。一個三級工每月工資 43 元，而一個五口之家僅僅食物的花銷就是 46 元。食堂省不下錢，那裏往往質次價貴[29]。但很少有人能夠上升到三級工。 大部份人的工資介於每月 12.7 至 22 元[30]。在「民辦」的較貧困的工廠，三分之一以上的勞動力的月工資不到十元。許多人不得不借錢或典當僅有的個人物品，在夏天賣掉備用衣服，然後冬天到了，只好凍得發抖[31]。

隨後而來的是醫療費，工人往往要自付。於 1960 年對北京一家化工廠的仔細觀察發現，數百名工人因爲醫療而欠下債務。崇慶田照顧他生病的妻子，在她去世時欠下 1700 元。他被帶到法庭，並被要求每月還債 20 元，使他只剩下 40 元度日。他是一個出色的工人，許多人還沒有他那麼高的級別哩，結果被醫療費用——為了醫治駭人聽聞的職業病——壓垮了[32]。

計劃經濟有其內在的問題——失控的成本、巨大的浪費、品質的缺陷、卡脖子的運輸、可悲的勞動紀律——大多數工廠的業績令人洩氣。陷在國家計劃所製造的財政泥沼中，是難以計算實際成本的。會計師不僅捏造數據，有時他們甚至不知道如何處理款項。在南京，約四十家大企業總共只有十四名會計師，其中只有六人能夠記錄錢款的去向。許多工廠甚至沒有一本出納日誌，人們對所發生的費用根本不了解[33]。

但有些近似的例子可以表明破壞程度，以鋼材為例，基本上是用碳和硬化金屬對鐵進行強化。在湖南，2.2 噸的鐵被用來生產一噸鋼材，這意味著巨大的浪費。製造每噸鋼的成本是 1226 元，而出售的時候，按照國家規定的價格，是 250 元——也就是說，每生產一噸就得虧損近千元。 1959 年，全省每月在鋼材上的損失約 400 萬元人民幣[34]。比較起來，石家莊的技術先進的工廠和高爐，在生產鋼材方面更有成本效益。成立於 1957 年的石家莊鋼鐵廠，在大躍進前是贏利企業，但成本的飆升，很快使之陷於虧損。1958 年，一噸鋼材成本 112 元，該廠的盈利約 1600 萬元。 1959 年，每噸成本上升至 154 元，使該廠虧損 2300 萬元，隨後在 1960 年，成本每噸 172 元，損失超過 4000 萬元。那時，該工廠依賴於來自遙遠的海南島的礦山的各種劣質鐵礦石[35]。

虧損增加，導致產量下降。在數年的驚人增長後，經濟於 1961 年進入了嚴重的衰退。煤炭——現代工業的燃料——供應枯竭。在煤礦，設備在大躍進期間超負荷運轉，以致大部份有問題。新機器的壽命往往不到半年，因爲在其中使用了低檔脆鋼。礦工也成群離開，他們厭煩了成本高漲的食品和住房，以及基本生活資料如肥皂、工作服和橡膠鞋的短缺[36]。即使煤被搬出礦井，也運不出去，大部份仍然堆積閑置。廣東省的四大煤礦在 1959 年生產了約 170 萬噸煤炭，但運走的不到 100 萬噸[37]。在甘肅，張仲良的激進領導層確保了煤炭產量由 1958

年的 150 萬噸飛速增長到 1960 年的 730 萬噸——用盡了人力，但由於汽油耗盡，大約 200 萬噸被遺棄在礦井中[38]。

表 9：湖南省工業產量（百萬元）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819	2,959	4,023	4,542	2,426	2,068

資料來源：湖南，1964 年，187-1-1260。

由於煤炭產量急劇下降，全國各地工廠停產。因為缺乏電力，1960 年 12 月在上海的中國機器廠的工作量只有三分之一。國棉一廠有二千名工人整天閑著[39]。1961 年的頭半年，計劃運往上海的煤下降了百分之十五，而且調整後的指標仍有三分之一從未實際交付。該市重工業需要的近一半的鐵和木材也不見蹤影[40]。

由於上海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工業中心，國家計劃給它以最優先的保證。 其它地方的情況更糟，經濟失去了控制。在廣東的重工業城市韶關，在 1961 年夏天對 32 個國有企業的調查表明了生產暴跌，1960 年的肥皂產量比上年下降了 52%，磚下降 53%，生鐵下降 80%，火柴下降 36%，皮鞋下降 65%。鞋廠每個工人每天只生產一雙鞋，而大躍進前是三雙鞋[41]。表 9 顯示了在整個湖南省發生的情況。這些數據僅指產量，其中在 1957 年至 1960 年期間翻了一倍多，而在隨後兩年又減少一半。如果這種重數量輕品質的成本被計算出來，會看到巨大的災難，與國家計劃的野心正好相反。但是工廠不會倒閉：倒閉是一種和繁榮與蕭條的週期有關的資本主義現象，而計劃經濟的目的是要避免這種現象。

19
毀了貿易

許多貨物從來沒有進入商店。 中國銀行計算，在 1960 年湖南大約有 3 億元失踪，原因是假發票、貨物在途中丟失、擅自出售信貸或乾脆挪用。那只是一個省。國務院估計，那年全國約有 70 億元資金被國營工廠持有，而不是用於貨物流通[1]。在分銷網絡的每個層面，都有腐敗和管理不善，吞食了計劃分配給人民的商品供應。

當貨物離開車間後，第一站是倉庫，在那裏，由國家認可的存儲公司，根據它們的目的地進行分類。在上海儲運公司，價值超過 10 萬元的數以百計的貨物——電話、冰箱、醫療設備、起重機——只能呆在箱子中，因為登記草率，賬戶有誤，庫存清單難以辨認。一百缸蝦醬，在戶外淋了一個月雨，最後腐爛掉，只是因爲文件丟失，公司把它們忘掉了。當然，在上述各類情況之外，貨物的丟失還由於盈利的動機沒有完全消失：畢竟可以把這些「損失」掉的東西拿到黑市上去私下交易[2]。

然後需要等待火車或貨運卡車。中國是一個貧窮的農業國，缺乏從國家的一端向另一端順利發送貨物的能力，脆弱的運輸系統能很快把運輸流搞得亂七八糟。早在 1958 年年底經濟就陷於停頓，車站和港口週圍到處是堆積如山的貨物。計劃要求每天有 3.8 萬輛貨運汽車，但只有 2.8 萬輛可用。規劃人員只考察了上海北面沿海的裝卸區，就發現有一百萬噸的材料在等待運輸[3]。

接下來的三年中，由於缺少設備、備件和燃料，情況變得更糟。1960 年，在天津、北京、漢口、廣州等城市，在車站上周轉的貨物進

多出少，有的時候每天的差額達一萬噸，只好胡亂堆在臨時設施裏，10 月中旬達到了 25 萬噸。在大連，七萬噸滯留的貨物在車站變質。數百噸昂貴的進口橡膠，在秦皇島港口躺了六個月。在交通樞紐鄭州，挖了一條六米深的溝，以棄卸從水泥袋到機器等各種貨物，許多被損壞被遺棄的袋、包、箱、木桶和鐵桶堆成小丘[4]。在上海，1961 年夏天，估計價值 2.8 億元的貨物被堆積在食堂、宿舍甚至在街頭，其中有 1.2 億米急需的棉布。大部份存貨就這樣腐爛或生鏽[5]。

運輸系統的崩潰，使列車不得不排隊輪候進入車站。搬運貨物的工具和人手都缺乏。全新的裝卸設備被發現是有缺陷的，但十萬搬運工和運輸工卻因此被匆匆解雇以節省薪金。後勤和協調並沒有成爲計劃經濟的優勢[6]。加上缺乏激勵和饑腸轆轆。通常待遇比較好的司機，過去一般都享有每人每月約 25 公斤的糧食，現在被降低到 15 公斤。在遼寧大虎山，糧食被高粱和小米所取代，而在河北石家莊，每月口糧的一半是紅薯。伙食又差，身體虛弱的工人盡量少幹活[7]。混亂狀況也影響了國際運輸。僅僅因爲包租的船隻不得不在中國的主要港口滯留而失去的收入就達 30 萬英鎊[8]。

地方的運輸網絡也崩潰了。在雲南，1958 年以前有二十多萬頭騾、驢馱運食品、衣服和用品到偏僻的山村。它們被馬車取代了，從三千輛增加到三萬輛。但馬匹的飼料成本大得多，而且國有企業對它們管理不善，許多馬在饑荒期間死亡。並且，馬車也不適合南部省份通往與世隔絕村落的陡峭山路和崎嶇地形[9]。

運貨卡車也問題重重。1960 年雲南只得到它所需汽油的一半。到 9 月份，約 1500 輛車使用替代燃料，從木炭到褐煤，以及甘蔗和乙醇[10]。在湖南，用植物油代替機油作發動機潤滑，造成大量損毀[11]。即使在上海，機動三輪車不准上街，許多汽車改用天然氣，有些天然氣被裝在巨大的袋子而不是在氣瓶中[12]。疏忽也破壞交貨。例如，廣州汽車運輸公司有 40 輛汽車，其中大多數是大躍進後得到的，至 1961

年，三輛已經損毀，平均每天有 25 輛在維修中，只有 12 輛可用[13]。由於車輛在完成計劃的競賽中被使用到極限，實際運行成本增加。根據一項估計，在 1957 年，一輛汽車的備件和更換的成本每一百公里只是2.2元，1961年上升為9.7元。主要原因是不間斷使用和保養不善[14]。

在革命前的中國，各種貨物都送貨上門，用扁擔挑，用手推車推，或偶爾用驢馱。流動商販甚至深入到偏遠村莊，帶著布、陶器、籃子、煤炭、玩具、糖果和堅果，以及香煙、肥皂和洗劑。在城市，小販們走街串巷，提供一切可能的物品，從襪子、手帕、毛巾、香皂到女性內衣。

當小販和商人在農村定期聚集在一個商定的地點，定期集市出現了：許多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背著或推著自己的貨物，蜂湧到一個寂靜的小村莊，使它頓時變成了一個繁忙的現場，貨物在路邊銷售或在臨時攤位上展示。在城鎮，數以百計的精品屋、商店、雜貨鋪和百貨公司，競相招攬顧客的光顧，從製帽匠、鞋匠、布商到攝影師，還有算命先生、魔術師、雜技演員和比武的鬥士，共同提供娛樂和商業活動。

傳統的店鋪一般只有一層，樓上住人，而新的百貨商場大樓則高大聳立，在週圍建築物中鶴立鷄群。它們可以在每一個大城市中找到，在夜間由成排的電燈照亮，提供本地和進口的商品，從美國沙丁魚罐頭到玩具汽車。招搖的百貨公司和往往比鄰的傳統單層店鋪之間的鮮明對比，是國民黨時代貫穿整個日常生活結構的多樣化特色[15]。

這種繁忙和喧鬧的世界，在 1949 年後大部份都消失了。自由貿易被計劃經濟所取代。市場被關閉。自發集市被禁止。小販被取締，他們往往被迫加入由國家控制的集體企業。流動商販和一度無處不在的鐵匠成爲古跡。百貨公司被收歸國有，他們來自世界各地的穩定貨源枯竭了，被國家授權的商品取代，後者由國有企業生產，並按國家規定的價格出售。小商店的業主被迫成為政府的僱員。米哈伊爾·科羅契

科（Mikhail Klochko）記得去過北京一個不起眼的幾乎沒有任何商品的小商店。他出於對店主和他的兩個病殃殃的孩子的憐憫而買了一個鉛筆盒[16]。唯一繁榮的店鋪在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的旅遊飯店附近，出售皮草、琺瑯、鐘錶、珠寶、絲綢刺繡的風景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的圖片畫像。它們被稱爲友誼商店，專為外國遊客和高級幹部服務。

對於普通市民而言，根本沒有什麼選擇。以南京市為例，這個長江南岸曾經很繁華的城市過去是中華民國的首都。雖然政府取締自由市場，大躍進前夕尚有七百多家店鋪，直接向公眾銷售他們的貨物。到了 1961 年，只剩 130 家。複雜的製造商、貿易商和零售商的網絡，曾把這個城市和全國七十個縣和四十多個市聯在一起，但死板的集體化使南京轉向自給自足，只有六個縣和三個市在工藝品方面對它繼續有所貢獻。隨著計劃經濟取代了市場經濟，手工業產品減少到大約 1200 種。即使是知名的傳統品牌，從金雞髮夾到長江彈簧鎖，也被納入國有。設計的品種遭受不利影響。1958 年前大約有 120 種不同的鎖，到 1961 年只有 12 種幸存。大部份鎖喪失了特點，一把鑰匙可以打開多把鎖。但是，所有產品的價格更高了，一般提高約三分之一，在某些情況下加倍[17]。食品也同樣。自從發起了大躍進，在南京約兩千名食品商販被迫轉行。他們熟悉複雜的市場情況，能夠有效地把蔬菜運送到各個主要交貨點，現在笨拙和僵化的指令經濟，只能使農村的饑荒引發的問題更加複雜化[18]。

剩餘商品和廢舊材料的貿易在 1949 年以前曾經繁榮過，現在也土崩瓦解。Dyer Ball 觀察到，在清朝滅亡之前，貧窮使得人們對哪怕最不足道的小東西都不浪費，普遍地千方百計回收物品，每個人都成爲有經濟頭腦的人[19]。但饑荒期間發生的事正好相反：對國家計劃的沉迷導致浪費，物品堆積如山，因為回收得不到好處。在廣州約 170 噸廢料——從氧化鐵到石墨粉末——在 1959 年夏天遍佈整個城市。大躍

進前，每片廢金屬或碎布都會被小販們回收，他們確保這些碎布、罐頭、塑料、紙張和輪胎到達潛在的買家。這些人當中許多被迫拋棄他們的本行，參加了大型的反應遲鈍的集體企業[20]。

在垃圾大量積累的同時，最基本的生存資料卻普遍短缺。在南京，到1959年夏天，所有東西甚至日常用品都變得稀缺，如鞋子和鍋[21]。排長隊——社會主義的標誌——變成日常生活的一部份。由於饑荒的深入，隊伍排得越來越長。濟南一些工廠的工人，需要專門請兩天假，去排隊購買糧食。李淑君排了三天隊，甚至沒有排到一張票——票可以換成一個號碼，號碼才能買到糧食。每次都得排不同的隊[22]。在上海也一樣，人們不得不排隊購買稀缺貨物。這種活動一般拂曉前開始，因爲大家都知道，店鋪一到下午就沒貨了[23]。耐心有時是有限度的。一些人用磚標記他們在隊列中的位置，而其他人把這些磚頭踢開，引起打架[24]。在武漢，1960年年底常有多達二百人徹夜排隊買大米，免不了發生吵架和混戰的現象[25]。

決定商品價格的，是國家，而不是市場。本來應該穩定物價，提高人民的購買力。但是，農民以高價購買工業品，卻被迫以極低價向國家出售糧食和其他食品——通常低得使他們虧損，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巨大的財富從農村轉移到城市。青島人民檢察院蘭陵展示了這一規模的情況。通過編制和調整自1949年以來支付食品和貨物的價格，他發現，煤炭價格漲了18.5%，肥皂21.4%，鞋53%，繩子55%，家居用品157%，普通工具高達225%。與此相反，由國家支付給農民的糧食價格反而下降了：小麥收購價下降了4.5%，玉米收購價下降了10.5%[26]。

由國家規定的價格很少受到尊重，因為可以加上種種額外費用。人民代表大會在廣州的一個詳細調查發現，完全同樣類型的金屬棒材可以有高達四十種不同的轉讓價格。在鋼鐵行業，實際收取的價格經常比國家的規定提高百分之五十。在某些情況下，原材料價格可以飆

升十倍，嚴重影響工業生產，因爲公司經理們難以將嚴格的預算適應於供應成本的劇烈浮動。煤炭價格也是國家規定的，但不同企業之間的私下交易導致無情上升的壓力。因此，實際生產成本大幅上升，迫使國家進一步努力壓低成品價格，以補貼這些行業。這樣做也失敗了，因為幾乎一切都變得更加昂貴，質量則每況愈下，從玻璃瓶和樟腦球，到髮夾和木屐【27】。在武漢，和其他地方一樣，自大躍進開始後，水桶、鐵壺或小水果刀的成本，一年左右增加了一倍。在新中國的冶煉之都，一個鐵鍋成本為22元，而在1957年只要5元就夠了【28】。李富春在1961年夏天承認，每年的通脹至少百分之十，包括從食品和商品到服務等所有方面，但它在某些地方達到了40%至50%。約125億元被浪費在只值70億元的貨物上【29】。

計劃經濟的另一些副作用也出現了，因為在一紙計劃的下面，總是潛伏著盈利的動機，而不是為人民無私奉獻的精神。在人類最嚴重的饑荒期間，整個系列的高價品以溢價出售，從蔬菜、茶葉、電影票到簡單的桶。國有企業利用普遍的短缺，把產品升級，高價出售【30】。北京的人大在調查王府井百貨商店時發現，企業所應付的是通脹的壓力，而不是消費者的需求：1958年，店裏所有的內衣，大約百分之十屬高檔品價格，百分之六十是面向大多數城市居民的中檔品。到1961年，超過一半是高價品，只有三分之一屬於中檔價格。這種結構性變化發生在通脹的高峰期，而通脹估計為每月2.7%【31】。

隨著國營大企業取代小商店，修理有毛病的貨物的責任，也從街道轉移到高高在上的官僚機構【32】。國家計劃當然對這種問題有個說辭，為人民的利益設立了「服務組」。但它們並不多見，無法應付泛濫成災的偽劣商品，更甚的是，他們根本沒有興趣為人民服務。因此，在這個貧窮的國家裏，修理的費用往往超過重新買的成本。在武漢，補鞋底、修鍋或配鑰匙的費用比國家規定的價格多了一倍，因爲服務組享有了修理工作的壟斷權。在湖南湘潭，修一個火鍋的費用是

八元，但買一個新的只有九元。許多地區，補襪子的費用和買一雙新的差不多[33]。在 1960-1961 年冬天，每個人都在由於燃料短缺和衣服不足而發抖，在首都的維修中心被淹沒在成堆有缺陷的貨物之下。麻木不仁的員工只是將這些東西挪來挪去，沒有激勵機制，也沒有工具和材料去進行他們的工作。連補鞋底用的釘子都找不到。在首都心臟的前門公社，大約有六十個火爐處在銹蝕堆中，破損了的家具到處可見，但沒有鋸子、刨子和鑿子[34]。

即使到服務站裏洗衣服，也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了。繁瑣的官僚程序涉及一系列單獨的步驟，從登記物品、開收據、到交付需要清洗的衣服，所有這些步驟都由不同的人進行，涉及三分之一的勞動力。真正洗衣服的人，每天很少洗十件以上。儘管價格高，一切行業都在虧損，把賬算到國家頭上。上海汕頭路一家小洗衣店，每月收入僅 100 元左右，但必須支付工資 140 元，這還不包括對經常丟失衣服所必須承擔的賠償[35]。當然，多數老百姓寧願自己補衣服、修鞋、修家具，但他們的工具已在煉鋼運動中被拿走。在徐水縣——國家的模範公社——老田記得，那年頭，他的母親得排隊等候借針，借街坊中那根唯一沒有被沒收的針[36]。

20
毀了住房

每一個獨裁者都需要一個廣場。閱兵式是共產主義制度的中心儀式：以展示軍事武力來顯示實力，領導人們聚集在主席臺上檢閱成千上萬組成方隊遊行的士兵和勞動模範，噴氣式飛機在頭上呼嘯而過。斯大林把紅場的復活門用推土機剷平，把喀山大教堂拆毀，以騰出空間，供重型坦克鏗鏘有聲地駛過列寧的陵墓。1957 年在紅場紀念十月革命四十週年的慶祝儀式上，毛澤東是赫魯曉夫的貴賓，他不甘落後。他決定，天安門廣場必須更大：中國不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嗎[1]？廣場在 1959 年擴大到可容納 40 萬人。把迷宮一樣的中世紀的城牆、城門和通道通通夷為平地，打造了一片足足能夠擺下六十個足球場的遼闊的水泥地[2]。

擴大天安門廣場，籌建十大建築，是在慶祝中國革命勝利十週年時用來嚇唬赫魯曉夫的，這一慶典在 1959 年 10 月舉行，在數以百計的外賓眼前，十大成就代表著解放十週年。一個全新的火車站，每天吞吐二十萬人次，幾個月就建成了。人民大會堂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分別出現在天安門廣場的兩側。中華門被拆掉了，這是爲了替人民英雄紀念碑——廣場中心約三十七米高的花崗巖豐碑——騰出更多的空間。

領導們向趕來採訪慶典的外國記者們炫耀，北京已經建成了足夠的住房，擁有 37 平方公里的新樓面——超過了曼哈頓二戰後所建樓房總面積的 14 倍[3]。這是瞎吹牛，因為北京變成了一個旨在愚弄外國訪客的巨大的波將金村（波將金村是俄國歷史典故。俄国女沙皇葉卡

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波将金元帥、為取悅女皇，不惜工本，在女皇途經的路旁建起一批豪華的假村庄。——譯者註）。這個黨肯定中了邪，認爲玻璃和混凝土的高樓大厦能使北京一夜改觀，可以無視那些擠在小胡同裏的簡陋的泥屋和磚房。他們制定計劃，十年內有系統地拆毀這個城市。有一段時間連故宮也受到威脅[4]。數以萬計的房屋、辦公室和工廠被拆掉，使首都成為一個常年塵土飛揚的大工地。破壞的速度使外國使館人員吃驚，因為有些建成不久的建築物被拆。「總之是一片混亂。」一位觀察員如此評論說。天安門廣場的施工是重中之重，其他建設的地盤儘管歷時已久，也被放棄[5]。後者的支柱和橫梁往往只裝到一樓或二樓，隨後就因為材料短缺而無以爲繼，留下絕望的骨骼框架，紀念碑似地聳在那裏，自欺欺人[6]。

風光的建築大多在 1959 年 10 月慶祝活動前落成，代價慘重。 策劃者有效地在紙上創造了幻想，但實施起來充滿混亂。在愚蠢的大躍進的讚歌中，以劣充優的鋼被納入黨的新的神經中樞。用於人民大會堂的近 1700 噸的鋼樑，有的變形彎曲，有的不夠厚度。 天津生產的螺紋鋼如此脆弱，不得不棄之不用。整個廣場有數千袋水泥被浪費，而建築工地使用的設備有三分之一經常出故障。即使在黨的權力的心臟，每天早上準時上班的工人也超不過四分之三。終於到達工地後，很多人消極怠工。一支從溫州調來的二十名木匠隊伍，花了三天安裝十五個窗扉，居然只有一個合格[7]。

全國各地大量的資金被浪費在門面工程上。1959 年，爲了紀念解放十週年，特別蓋了一批體育場館、博物館、酒店和禮堂。在哈爾濱，花了五百萬元人民幣蓋國慶賓館，超過了北京飯店的總成本。另有七百萬被花在國慶體育場。天津也一樣，設計了國慶體育場，可容八萬名觀眾。體育場館也在太原和瀋陽等其他城市建成。江蘇省撥出兩千萬元專款用於國慶工程[8]。

每個地方獨裁者似乎都希望有自己的十大建築，奴性地模仿首都。 北京的權力在下級被廣泛複製，因為許多領導人渴望成為小毛澤東。另一個原因是，官員們只須向他們在北京的老闆負責，而不必對他們統治下的人民負責。巨大有形的灰色建築物肯定可以使人產生敬畏統治權力的幻覺。在貧困的甘肅省的首府蘭州，老闆張仲良推動興建十大建築，後來又迅速擴大為十六項。其中包括人民會堂——其設計正好是天安門廣場上那個人民大會堂的一半，人民廣場、火車東站、工人文化宮、少數民族文化宮、體育場、圖書館、一家豪華酒店、新的省委大樓、省人大大樓、電視塔、中央公園。 費用定為 1.6 億元。數千座房屋被摧毀，許多居民嚴冬無家可歸。但這些計劃大都沒有實現。1960 年 12 月張忠良下臺，工程停止，在市中心留下若干處廢墟【9】。另外，還有幾十個裝璜門面的建築，沒有經過批准也動工了。例子之一是為外國專家蓋的全新的友誼賓館。客人的數量被高估了三倍之多，所以最後 170 個外國人平均每人佔有六十平方米的豪華臥室，而村民們卻在蘭州附近死於饑寒。蘇聯專家撤走後，這座樓房安靜得怵人【10】。

即使在權力階梯下層的公社，也不缺激進的領導人，渴望將公社變成共產主義烏托邦。在劉少奇誕生地花明樓，黨委書記胡仁欽開始了自己的十大建設。其中有個「豬城」——一長排沿著大路綿延十公里的大豬棚。臨街的數以百計的房屋被摧毀，給這個項目騰地方。我們已經知道，劉少奇後來在 1961 年 4 月在這裏停車考察時，他什麼都沒見到，只發現十來只骨瘦如柴的豬。湖上有涼亭，有接待參觀官員的大廳，都是 1960 年蓋的，同時五十萬公斤糧食正在地裏腐爛，有些生產隊的死亡率則高達百分之九【11】。這種奢侈性紀念建築，全國各地都有。在廣東刁坊公社，雖有成千上萬人餓死，卻拆了八十戶村民的房屋，目的是獲取木材和磚，用來新建足夠容納 1500 人開會的人民會堂【12】。

截至 1961 年 9 月的三年中，共有 996 億元用於基本建設，此外還有 92 億元號稱是留給普通百姓的住房項目。大部份資金最終被投入這些門面工程的建築物和辦公室，除了黨的某些成員，對別人沒有什麼好處[13]。但這並沒有包括利用各種花招挪用和轉移的資金。貴州遵義地區用大約四百萬元國家資金，包括對窮人的救濟金，掀起了建設狂潮，蓋新大樓、歌舞廳、攝影工作室，還有私人洗手間和電梯，美化主城。在桐梓縣，六所中學的資金被挪用去造全新的劇場[14]。在檢討幾十億元花在未經國家批准的門面工程上時，李富春絕望了：「農民吃不飽，我們還在搞大樓，共產黨員於心何忍！還有沒有共產黨員的味道？！整天講群眾利益不是成了空話嗎？」[15]

隨著私有財產成爲過去，集體單位搬進舊式富貴人家引以爲驕傲和喜悅的豪宅。擁有感消失了，無人負責了，破壞開始了，這種破壞似乎比沉重的大錘聲更可怕。淮海中路 1154-1170 號——上海最豪華的地產之一——1958 年 11 月被一個電機廠接管。不到一年，窗戶被打破，大理石和瓷磚被打碎，昂貴的進口廚房設備、供熱系統、冰箱和衛生設備，不是被拿走，就是被毀壞。臭氣瀰漫，垃圾遍地。軍隊也同樣糟糕。當它控制了汾陽路的一個花園別墅後，這裏就成了廢墟。 樓梯垮掉，欄杆斷掉，煙囪倒塌，動產被盜，花園裏的樹木死掉，荷花池變成了臭坑。虹橋路的一個莊園被空軍佔領後，樓板斷裂，水電開關被拆除，馬桶則淹沒在糞便中。諸如此類的例子，房管機關報告說：「數不勝數」[16]。

失修的不限於個人住房。在武漢，白蟻啃噬了許多老建築。火車站前的大街上，一千棟建築一半有鼠患。人和街 14 號乾脆塌了。匯豐銀行漢口分行處在被老鼠接管的危險之中[17]。

禮拜堂也不例外。人民公社中沒有宗教的地位：教堂、廟宇和清真寺變成了車間、食堂和宿舍。在鄭州，27 所天主教徒、新教徒、佛教徒和穆斯林的禮拜場所中，有 18 所被國家接管，另有 680 間私人出

租給宗教團體的房間被沒收。該城市 1960 年驕傲地宣布，基督教和穆斯林信徒的數目已經從 5500 人縮減到 377 人。所有 18 名宗教領袖都參加了「生產勞動」——除了 3 人已經死亡[18]。

破壞行爲也擴大到歷史古蹟。在廣東曲江，著名的唐代大臣張九齡的墓，在一個人民公社挖掘寶藏時遭到破壞，而韶關明代的佛教寺院被拆除作爲建築材料。廣東南部，林則徐在鴉片戰爭期間爲了抗擊英軍而佈署的大炮被炸毀，作為廢鐵回收[19]。四川都江堰的灌溉系統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紀，一系列古廟宇被拆除，作爲燃料焚燒[20]。二王廟——有著豐富的文化遺跡，被古老的樹木所包圍，1957 年剛被宣布為歷史遺址——幾年後便被部分炸毀[21]。在華北，長城被開挖作爲建材，而十三陵的磚在地方黨委書記批准下被源源不斷用車拉走。埋葬萬曆皇帝的定陵，一堵長 40 米高 9 米的石牆被夷為平地，而寶城（又稱寶堂，指環繞在寶頂——位于地宮上方的圓丘狀封土——週圍的封閉性城垣——譯者註）有數百立方米的磚被挖走。「磚是屬於群眾的，」這是振振有辭的理由[22]。

城牆也成爲官方憤怒的對象。城牆的鋸齒型護欄，象徵當年帝國的榮耀，長滿了葡萄籐和灌木雜草，現在被視為落後的紀念碑。毛澤東定下了基調，在 1958 年 1 月南寧會議上指出，圍繞北京的城牆應予拆毀。大批的朱門和城垣將在以後的幾年陸續拆除。其他城市紛紛效尤：包圍南京老城區的部份城牆，被正在訪求建材的集體單位拆除[23]。

大部份破壞活動在農村進行。拆毀行爲一浪接一浪。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 1958 年初積肥運動中，建築物被推倒，以便送到地裏，爲土壤增加養份。爲了堅持繼續革命，建築物被用作燃料來源：農民在通明的篝火下，通宵達旦深耕。然後，隨著人民公社的成立，使本來屬於私人的房產變成辦公室、會議廳、食堂、托兒所或幼兒園。有些被拆掉作爲建材，另一些被拆掉為新的建築物讓路，儘管紙上的遠景並沒有變成現實。爲了增加鋼鐵產量，金屬窗框和門把手被回爐

熔化，樓板被充當燃料。當大躍進在 1959 年夏天再一次開始後，民兵們挨家挨戶去尋找隱藏的糧食，就好像搜索起義的武器似的，他們砸牆挖地，或掘開地窖，去尋找隱祕的洞，往往使建築物部份或全部受毀。饑荒的深入，迫使村民們開始拆毀自己的家園，用磚頭交換糧食，或用木材充當燃料。如果屋頂的茅草還沒有被取走生火，就在絕望中用來充饑。連抹在牆上的泥也可以填肚子。

在最好的情況下，人們被迫作出「自願」的貢獻。如在廣東新會，有個村莊，家家戶戶被要求向新學校獻三十塊磚。隨著地方幹部「借用」越來越多的建材，最後沒有房子可以幸存【24】。有的時候，村民還可以為他們的貢獻得到一些補償。四川一村民獻出半間草屋，要求交換一口茶杯和一條毛巾，最後得到了一口茶杯。一位鄰居，用四間房，換到一只小臉盆【25】。

更常見的是強迫命令。在廣東，趙紫陽 1959 年初開展反瞞產運動，民兵沒收一切，從一顆花生到整個住宅【26】。韶關的龍歸公社，黨委書記林建華宣佈廢除私有財產，派民兵到村裏肆意掠奪。有個有 85 戶人家的生產隊，約 56 個房間和戶外廁所被沒收。不服從命令的農民，被捆綁和毆打【27】。

損失難以估計。不同的地方差異很大，總體而言，到目前為止，大躍進造成了人類史上最大的財產毀壞。粗略估計，有百分之三四十的房屋成為廢墟。在花了一個月尋找自己的出生地後，國家主席劉少奇 1959 年 5 月 11 日寫信給毛主席說：「據省委同志說，湖南房屋被拆毀百分之四十，此外還被國家機關，企業和公社，大隊佔用一部分。【28】」大躍進期間，湖南省每間房的住房人數翻了一番，全家人擠在衣櫃大小的房間裏，儘管幾百萬人餓死已經騰出了空間【29】。四川的情況更糟，有些人家住在廁所裏或別人的屋簷下。在主要人口是彝族的鹽源（西昌附近）山區，在數以千計的房屋被國家充公後，情況變得嚴重：「據統計，2 戶住一間房子的有 1147 戶，3-4 戶住一間的有 629 戶，4-5

戶住一間的 196 戶，5 戶以上住一的有 100 戶，甚至還有 5 對夫婦，11 戶人伙住一間房的。」[30] 在全省範圍內，受害最大的縣，房屋破壞率為 45% 至 70%[31]。

許多人再也沒有找到新的家園，他們在社會的邊緣掙扎著生存，在碎石片拼湊成的破爛的窩棚尋找臨時住所，也有在豬舍裏棲身的。湖北黃岡地區，那裏的溫度可以降到冰點，約十萬戶家庭在 1960-1961 年冬春無家可歸，一半的人口沒有柴火取暖，人們不得不披著碎布度過嚴寒[32]。

一群特殊的受害者，在大躍進期間發起的興修水利運動中流離失所。他們有幾百萬人。僅湖南一省就有五十多萬人被疏散[33]。在河南的三門峽、浙江的新安江和湖北的丹江口，其中每一個大項目開始時，都有三十多萬人被趕走[34]。在廣東省湛江地區，在 1961 年底，需要約三十萬所房屋來容納被遷移的家庭[35]。

大多數的轉移沒有什麼計劃，也沒有補償。在湖南岳陽縣，約 2.2 萬人在建設鐵山水庫時失去了家園。 在村莊被水庫淹沒前，縣領導把流離失所的人轉移到山上，磚瓦、家具、農具和牲畜都被徵用，以便在那裏建立一個集體化的農場。村民被困在山上，沒有生存的耕地，與故土的所有聯繫都被割斷，他們發現生活很悲慘，許多人開始成群結隊回到平原。水庫項目被放棄。大部份撤離人員決定回家，但家鄉已變爲鬼域，動產已被拿走。他們只好住在臨時棚屋、戶外廁所、豬舍甚至洞穴，有些洞穴很容易倒塌，住著的人被活埋。許多人以乞討或偷竊度日，合用僅存的一些炊具，靠每月微不足道的十公斤口糧求生。很少人有棉衣或毯子過冬[36]。

許多流離失所的人在他鄉遊蕩，但有些終因家鄉難捨而返回家園。在北京東部約一百公里處，有著風景如畫的山谷，一片片板栗園、梨園、山楂園依傍著山林，這裏有六十五個村莊的居民被迫背井離鄉，為 1958 年 9 月至 1959 年 6 月建造的密雲水庫讓路。五萬七千人

失去家園。彷彿這還不夠糟糕，當地幹部還來徵用工具，偷走家具。膽敢抵制的農民被關起來。只有四分之一的村民被安置，但臨時營地擁擠不堪，他們把它稱之為「豬圈」。

兩年後，許多人仍然無家可歸，在農村漂泊。在 1961 年 3 月，一群由 1500 戶家庭組成的隊伍返回家園，男人、婦女和兒童沿著土路行進，背著破舊的行囊和包裹，裏面裝著劫餘的衣物。有人回到了本村——原來水庫裏並沒有水！——造了泥屋或睡在露天[37]。全國各地有數百萬難民生活在類似的悲慘之中。

死人也被驅逐，完全不顧慎終追遠的民族文化。傳統的喪葬文化，是通過複雜的服喪儀式、入葬儀式和祭祖儀式表現出來的。土葬是處理屍體首選的方式。祖先的遺體被看作是有價值的聖物，必須在家鄉入土。在祖先的靈魂和他們的後裔之間，被認為存在著相互的義務。人的願望必須得到尊重。在葬禮上燒紙錢以及紙做的其他東西，從家具到整個房子，目的是幫助死者在陰間過好日子。棺材必須密閉，墓地要經常打掃，祭品要定期奉獻[38]。

這類做法在大躍進期間偶可見到。雖然黨把民俗譴責為迷信，但有些地方幹部仍然熱衷於昂貴的喪葬儀式。為了埋葬他的祖母，河北省一位官員召集一支由三十名樂手組成的葬禮樂隊。徵用了一個食堂，120 位客人得到煙酒款待——這事就發生在饑荒期間。彷彿這還不能減輕他的痛苦，李建劍將他父母的遺骨（葬於大約五年前）挖出來，放到新棺材中重新埋葬。北京毛紡廠黨委副書記李永福，搭建了電燈照明的帳篷安置葬禮樂隊，燒了紙汽車、紙牛和紙民兵，五個僧人被請來誦經，以協助把他的母親超度到未來的世界[39]。

但是，大批墓地被破壞，爲了取得石材、木材，甚至只是爲了積肥。例如在湖南，墓碑被用來筑大壩，黨員積極份子帶頭摧毀自己的祖墳。在岳陽，數以百計的墳墓被發掘，屍骨被暴露[40]。在四川的一次採訪中，魏叔談了他是如何被派去清除墳墓的：「你知道，死人的墳

墓通常像小山丘。我們必須剷平它們，這是我們在 1958 年必須做的事情之一。一天晚上，命令我們把墓地變成耕地。」[41] 全國許多地方，都向墳頭進軍，佔領它們，使它們回歸農地。在北京，火葬場在大躍進期間全天工作。在 1958 年，超過七千具屍體被火化，比 1956 年多了近三倍，比 1952 年多了二十倍。這些屍體的三分之一，是爲了給農田讓路，而從墳墓裏挖出來的。[42]。

在農村，當局有時懶得火化這些挖出來的屍體。國務院秘書辦公室編輯的一個內部刊物指出，在山東牟平，當地幹部用屍體當肥料：「他們把一些尚未完全腐爛的屍體拋到莊稼地上」。一位被埋葬只有幾天的老婦人被剝去衣服，她赤裸的身體被遺棄在路邊[43]。

這絕不是什麼例外。黨員，陝西軍區供養隊侯世祥在給他所在的陝西軍區政委的報告中說，他回到湖南澧縣新合人民公社老家，看到許多棺材被挖，散落在地頭，蓋子敞開，遺體失蹤。幾天後，一個陰雨的下午，他發現一柱煙從本村副書記宋金亮的煙囪中冒出來。屋內有四只大鍋，正將屍體煮成肥料，提取物後來被均勻地撒在地裏[44]。

21
毀了自然

1870 年代，Baron von Richthofen 曾在清帝國到處漫遊。他報導說，整個華北樹木稀少，貧瘠的山區和丘陵一派荒涼[1]。如何確保漫長而寒冷的冬天有足够的燃料，一直是中國的問題。農民種了大量的玉米和高粱：種子用作食品，而秸稈則是燒炕的燃料[2]。在一個森林枯竭的國家，缺乏燃料到處可見：木材的稀缺，使得每一片樹皮、樹枝和樹根都被兒童或老婦急切地撿起來，把地面打掃得乾乾淨淨。

森林的破壞——爲了得到土地、燃料和木材——在 1949 年後因爲對自然環境的動輒干預而變得愈加嚴重。毛澤東視大自然為必須戰勝的敵人，它必須被制服，必須通過動員群眾加以改造和利用。在為生存而不懈的奮鬥中，要對自然環境發動人民戰爭。唯意志論認為，人的意志和革命群眾的無限能量，可以從根本上改變物質世界，克服一切擋在通向共產主義未來道路上的困難。物質世界可以改造，小丘可以擦掉，大山可以夷平，河流可以改道——如果有必要的話，可以一筐一筐地搬[3]。毛澤東在發動大躍進時宣布：「我們要打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4]

大躍進使森林銳減。在增加鋼產量的運動中，如雨後春筍般到處建立的土高爐都需要火，於是農民們湧向山上砍伐樹木為燃料。在湖南宜章縣，原先高山淹沒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現在森林被成片砍掉，一些地方砍了三分之二的樹木以供應土高爐。到 1959 年，只剩下光禿禿的山[5]。在長沙西邊的安化，整個森林變成了一片泥地[6]。蘇聯林業和土壤保護專家從雲南到四川，沿路經過茂密的原始森林，發

現樹木被任意砍伐，造成山體滑坡[7]。森林到處受摧殘，有時到了不能復原的程度。

但任意砍伐並沒有因大煉鋼鐵的結束而終止。中國的大饑荒不僅是饑餓問題，而且是一切必需品的全面短缺，特別是燃料。由於農民迫切需要劈柴和木材，他們繼續了煉鋼運動中養成的習慣，重返林地砍伐。盜伐比以往更容易，因為關於林業的責任制已隨著集體化變得模糊：森林屬於人民[8]。在乾旱的甘肅的武都縣，大躍進前約 760 人負責林業。到 1962 年剩下 100 人。情況在全中國都一樣。 1957 年吉林省到處是茂密的森林和美麗的林地，由 247 個林業站管理。公社化後倖存下來的只有 8 個[9]。

當地的大隊不僅無力阻止對自然資源掠奪，他們往往是同謀。1961 年 3 月，一個訪客徒步經過北京郊外山區延慶縣四海公社時，發現約 18 萬個樹墩——椴樹和桑樹——砍到只剩 1-2 吋高。這只是兩個單位的工作成果[10]。農民如此渴望溫暖，他們在冬天甚至砍伐果樹。北京的林業局報告說，五萬棵蘋果、杏、核桃樹被昌平的一個村砍掉，而另一個大隊用拖拉機剷除 89 萬株植物和幼苗，以獲取燃料[11]。往往，公社會派人去偷鄰居：從懷柔派一百個農民去鄰縣延慶，在那裏他們用不到三週的時間砍伐樹木十八萬棵[12]。在離首都更近的地方，鐵路沿線的樹木被砍伐，大興縣鐵路沿綫有一萬棵樹消失[13]。再往南，連電線桿都被砍了當燃料[14]。在內陸甘肅，僅一個大隊就摧毀了十二萬棵漆樹的三分之二，癱瘓了地方經濟；而另一個生產隊則把鄰村賴以爲生的油茶樹砍掉了百分之四十[15]。

人們迫切需要燃料。在砍光樹木後，有些村莊不僅燒家具，而且燒房屋：「鍋底下的比鍋上面的還緊，」農民們嘆息道[16]。即使在四週圍繞著亞熱帶植被的廣東番禺，三分之二的住戶沒有燃料引火，有些甚至沒有火柴。不得不向鄰居借火。一旦火種引來了，它像寶貝一樣被守護著，整個村莊回歸到原始以物易物的經濟[17]。

城市裏也砍伐樹木，但出於不同的原因。正如我們已經看到，許多公司利用大躍進以擴展設施，而且往往超出他們的實際需要。南京商業局的一個部門，摧毀了一個有六千棵櫻桃、桃、石榴和梨樹的果園。果樹被清除後，果園仍然空著。這種破壞在南京很常見。1958 年底的一個調查顯示，幾十個單位非法砍伐七萬五千棵樹木。大多是工廠需要的木材，也有一些木材在黑市上銷售，那是爲了獲得應急的收入【18】。

雖然有週期性的植樹運動把光禿禿的農村變成綠色——荒蕪的沙漠將變成鬱鬱蔥蔥的森林；但普遍的饑荒，差勁的規劃，加上廣泛的管治危機，戰勝了造林的努力。剛剛種下的樹很快就消失了。例如 1959 年，北京派出數千人在十三陵水庫種植 39000 畝風景林。當地公社在一年之內就毀壞了一半以上。北京之外，三分之一至五分之四的造林和綠化項目失敗。遠離權力中心的地區的破壞力必定更大【19】。在黑龍江，茂密的山林覆蓋著處女落葉松、紫椴和水曲柳，由於管理不善，新的防護林中有三分之一的幼苗死亡【20】。在湖北鄂城，約 1.5 萬棵為維護水壩而種植的樹木，很快被非法砍伐。然後又補植，但是工作進行得如此糟糕，大多數樹倒在地上乾死【21】。

地表剝蝕的許多原因中還應該包括火災，由於人類在森林中活動日益頻繁，以及有效的林業管理解體，火災的事故飛速上升。大躍進的頭兩年，湖南約 85 萬畝在數以千計的火災中被摧毀【22】。在陝西和甘肅乾旱的北部平原，那裏的樹木已經很稀少，1962 年春季，2400 場火災又奪去了 23 萬多畝森林【23】。火災可能是偶然的，但往往也有故意燒林以製造肥料或獵殺野生動物。隨著火勢蔓延，森林退去，動物也遭到屠殺。即使珍稀動物也是獵人的對象，其中一些——金絲猴、野象和黑貂——到了瀕臨滅絕的邊緣【24】。

火還用於清除土地以種植穀物，這種墾荒運動大部分發生在牧區。在其他地方，耕地面積實際上減少了，因爲公社化被認為能帶來

生產力的驚人飛躍，三分之一的田野可以棄耕。例如，在甘肅河西走廊和寧夏平原，冬小麥闖入草原，加速了荒漠化。 以寧夏的鹽池縣為例，那裏的農田在大躍進期間增加了一倍，達到 75 萬畝，割掉了高原的草，把羊群趕到山上放牧：這個縣現在面臨的是沙化。再往西去，在乾旱的柴達木盆地，這個四週環山、鹽沼星羅密布的荒涼寒冷的地方，不適宜長東西，被公社摧毀了 150 萬畝的灌木林和荒漠植被，企圖種糧食。然而，集體化的農場被流沙逼走了【25】。

饑荒期間森林覆蓋率損失的程度難以估計【26】。遼寧省有些縣，百分之七十的防護林被毀壞。在豫東，百分之八十的防護林消失了；在開封附近則蕩然無存，約有 40 萬畝變成沙漠【27】。一望無垠的大西北——從新疆到山西——五分之一的樹木被砍伐【28】。在湖南，一半的森林被砍伐【29】。在廣東將近三分之一消失【30】。研究這場饑荒的專家余習廣認爲，森林覆蓋率消失了百分之八十，儘管這可能是高估【31】。損壞的情況各個地方不同，即使檔案的統計數字，也是政治的產物而不是現實的客觀反映。可以肯定的是，以前從未有如此種類繁多的森林——從南方的竹林到北方的高山草甸和寒帶杉木松樹——同時遭遇這樣一個長期而激烈的浩劫。

1959 年初夏，河北上空烏雲滾滾，雷雨交加。由於大雨持續不斷，排水系統受到泥土、糞便、樹葉的堵塞，灌溉水渠塌陷，街道變成河流，省會北邊的地區洪水汎濫。季風吹垮了泥屋，破壞了田野——或是淹沒，或是沖走了表土。街道滿是淤泥和廢墟。通州有三分之一的農民受到影響，房屋倒塌，莊稼被毀，牲畜淹死【32】。這個夏天，其他災難也降臨到中國。大雨沖刷廣東。颱風痛擊廣東以北海岸。極端的天氣變化帶來不可預見的後果，造成湖北幾十年來最嚴重的旱災【33】。領導們把自然給經濟造成的影響大做文章，將人們的注意力從政治引開，將經濟挫折歸咎於天災。 老天爺應負責任的確切比例成為爭論點，劉少奇後來陷入麻煩，因爲他公開聲稱，只有百分之

三十的「生產問題」由自然災害引起，其餘的百分之七十起因於人為的因素。

但劉的解釋——雖然相當普遍，卻是在複製而不是挑戰中國當時環境退化的根本原因，那種理論認爲，人類是完全脫離於自然的一個實體[34]。但兩者是相輔相成的，當時對「自然災害」的詳細研究可以表明。當調查組次年夏天再次訪問通州時，他們發現極度窮困的景象，因爲國家棄農民於不顧，他們沒有足夠的食物、衣物或住房，在死亡綫上掙扎[35]。傳統的災難應對機制——私立慈善機構、國家援助、親友互助、家庭儲蓄和遷地為良，——都不能發揮作用。公社化使洪水汎濫的危害更深刻，更持久了。但是，這些都無法解釋為什麼通州受到如此大的衝擊。那個地方下的雨是否特別多？答案在一年後出現，劉少奇在一個數以千計的領導幹部出席的會議上指出，天災所扮演的角色是次要的。在 1962 年較爲開放的政治氣候中，水利局開始調查大躍進如何影響水利系統。它把焦點放在通州。結論是明確的：考慮不週的水利項目，在 1957-1958 年水利運動中倉促上馬，打亂了精心平衡的天然水系統。加上農業的巨大延伸，比以往更多的水被迫轉入地下。當雲層在 1959 年通州的上空折騰時，水流無可宣洩，淹沒了田野和村莊[36]。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全國各地。在河北，滄州地區在 1961 年 7 月遭到颱風強烈的摧毀，省委立即派遣一個 24 人的工作組。他們在這個地區花了十天時間，那裏接近一半的田野淹在水下。工作組很快就意識到，自然排水系統已被大躍進以來開展的水利工程摧毀。設計不當的水庫、運河和溝渠促成了災難，但增加了的耕地使情況更糟糕，因爲大型的四方的田地取代了傳統的因地形地貌而制宜的錯落有致的小塊田地。即使是從未遭受過洪水的鄉村，現在也被淹沒。有著沉重石頭屋頂的泥屋塌陷。工作組注意到，自然和人為過去的政策付出了代價：所有東西都「瘦」:「人瘦，地瘦，畜瘦，房子瘦。」[37]

通州和滄州是兩個證據充份的例子，但淮河和黃河平原的饑荒更廣泛：從河南商丘到山東濟寧，從安徽阜陽到江蘇徐州，胡耀邦花了一個月時間，旅行約 1800 公里，檢查 1961 年 9 月暴雨所造成的破壞。正如我們將會看到，死亡率在百分之十以上的恐怖區域恰恰位於這兩個地帶。其中一些名字——鳳陽、阜陽、濟寧——都已成爲大規模饑荒的象徵。 胡耀邦觀察到的第一件事是，那年秋天的降雨量並不罕見。在一些破壞最嚴重的縣，如鳳陽，「降雨量基本正常」。進一步調查發現，這些地區受到不超過 700 毫米降雨量的浸淹，主要原因是自 1957 年秋季以來過度的水利工程。這些龐大的灌溉網絡將水困住了，然後淤塞，成為「一條把土地變成海洋的惡龍」。情況如此糟糕，以至於超過 300 毫米雨量就可能造成破壞。當地村民對過去幾年中建造的運河和溝渠深感不滿，認爲它們是洪災的主要理由。胡耀邦說，「今年雨量並不算特別多；渠道變成了搗地成海的惡龍；有的同志很老實，正在實實在在的接受這個教訓。但是也有一些同志說的很含糊，甚至硬說成是天災。」【38】

全國各地的水利項目——億萬農民爲它們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大部份是無用的，或乾脆是危險的。許多違背自然規律，造成土壤侵蝕、滑坡和河流淤積。我們在湖南看到，這個有肥沃土壤、河谷和梯田、茂密的原始森林的省，怎樣被當地公社在煉鋼運動中搞得面貌全非。遭剝蝕的山被山洪冲刷得更加光禿禿，因為已沒有樹冠攔截雨水。由於森林存水能力的退化，自然災害擴展成大災。堤岸、涵洞、水庫和水渠等等破壞自然水流的大型水利工程，加劇了大災。沉積物總量的使湖南當地河流的河牀提高了 80 厘米，水一旦溢出，鄰近的村莊就成爲澤國【39】。

地方的墾荒工程把事情搞得更糟。這是國家和地方公社针對糧食短缺發起的運動，但它們表現出對大自然的規律的無知。在湖南，五十多萬公頃被開墾，很多在陡峭的山坡上。然後雨水將土壤沖進新

建的水庫，使之成爲沉積。隆回的一個生產隊在山邊斜坡上開墾了 151 畝：1962 年 5 月暴雨沖刷的泥土，淤塞了三十個水壩和五條大路[40]。

各種各樣商品的短缺也往往造成匱乏的惡性循環。肥料在 1958 年大躍進被揮霍之後，田野成了不毛之地。稻田之間的田埂缺乏維護並經常更改，因為農民失去了地界，農作物隨機播種。深耕密植進一步使農田荒蕪，因爲土壤耗盡了養份。在過去，一塊田可以保留灌溉水四到五天；但 1962 年，不到 72 個小時水就流失了。這意味著需要兩倍的水，而灌溉系統卻被淤塞了[41]。湖南水利水電局得出結論，約 5.7 萬平方米土地遭受土壤侵蝕，包括長江流域大部份，以及湘江、資江和沅江——該省四大河流中的三條——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水土保護設施高達一半被淤塞和沖走。在興修水利運動結束時，土壤侵蝕量增加了 50%[42]。

在沒有什麼計劃，以及往往不顧專家意見的情況下，由饑餓的農民進行的簡陋工藝，也破壞了水利。在湖南，在饑荒結束時，可以使用的水泵不到總數一半。許多壞了，也有些由於沒有妥善管理而停止工作[43]。在衡陽地區，三分之二的中型水庫和三分之一的小堤壩漏水，失去了應有的作用[44]。就湖南全省而言，十分之一的中型水庫毫無用處，而且半途而廢。十大水庫中沒有一個起實質性的作用，它們淹沒了大量耕地，但實際灌溉面積非常小，造成被迫搬遷的當地居民極大的憤怒[45]。在很多情況下，建材質量很差，以致水庫內的波浪運動在大壩內壁造成了深達 50-70 厘米的溝槽[46]。饑餓的農民使用炸藥在水壩和水閘附近捕魚，加劇了這種狀況[47]。

湖南並不特殊。鄰近的湖北，在 1959 年的乾旱中——黨的領導認爲乾旱是破壞國家的災難之一，長江水無法引進田野，因為超過四分之三的新水閘太高。河水在乾旱的田野旁流過，而人們和牛群無以解渴[48]。在乾旱期間，沿著監利和荊州之間一百公里的狹長地帶，農民在當地堤壩挖孔以灌溉田野，但後來這些地方在大雨中發洪水。[49]

至 1961 年，估計有四十萬小型水庫處於失修狀態，大約三分之一或倒塌，或淤塞，或漏水，或乾涸[50]。

但在其他地方，由於癡迷於越大越好，大水利項目猶如雨後春筍。在湖北，它們從 1957 年之前的幾十個，增加到超過五百個。一旦完成了，它們往往就被遺棄給當地公社，其中許多無人管理。石頭被源源不斷從河堤運走，水渠被淤積，擋水牆被挖洞，牛棚、豬圈甚至整個房子建在水壩上面。用於密封水閘的橡膠被割走，電信設備在無人看守的哨所中被偷走[51]。結論只能如此：儘管在水利工程上作了巨大的努力，在湖北強迫徵募了數以百萬計的農民，至 1962 年，全省灌溉面積不到 3993 萬畝，而 1957 年反而有 4022 萬畝[52]。湖南的狀況只比湖北稍微好一點：在對水利工程進行大規模投資後，全省總的灌溉面積，從 1957 年的 3990 萬畝增加到 1962 年的約 4020 萬畝，也就是增加了不到 1%[53]。

全國各地的水壩缺少溢洪道，使用劣質材料，並在不顧當地地質的情況下建成。許多因此倒塌。在廣東潮安縣的鳳凰大壩 1960 年垮塌，隨後東興縣的黃淡也垮了。這些是大水庫，靈山、惠陽和饒平等地的中小水庫也垮了[54]。全國有 115 座大水庫（佔全部的 38%）到了雨季無法阻擋洪水[55]。據來自中央領導機關的報告，3 個大型、9 個中型和 223 個小型水壩或水庫於 1960 年倒塌，因為它們的建造質量問題很嚴重[56]。

雖然許多水庫幾乎立即倒塌，也有一些在數十年中像危險的定時炸彈。河南駐馬店的板橋和石漫灘水庫——在 1957 至 1959 年「治理淮河」運動中建造，正如我們在前面的章節已經看到——就是例子。當颱風在 1975 年 8 月襲擊該地區，這些水壩破裂，釋放出來的巨浪淹沒了大約 23 萬人[57]。到 1980 年，河南約 2976 座水壩倒塌。省水資源局局長後來針對大躍進說道：「那個年代拉的屎，直到現在還沒有擦乾淨」。[58]

干擾自然增加了農田的鹽鹼化，這種現象在半乾旱的北部平原更為普遍。 鹽鹼化往往被視為乾旱地區灌溉的一個不利因素，雨水缺乏使可溶性鹽類在土壤中積累，嚴重降低其肥力。新的灌溉計劃對中國北方平原的鹽鹼化有著災難性的影響。在河南，15 萬畝的土壤約有三分之二變成鹽鹼地[59]。水利局發現，在北京及其週邊郊區，土壤的含鹼量，在大躍進期間增加了一倍，也就是達到了 10%[60]。在沿海地區，鹽鹼化也因爲海水入侵而增加，這是由於當地幹部用來取悅他們上級的半途而廢的工程所造成。在河北，一個離海邊 20 公里的公社，不顧傳統的做法，追求對稱，挖掘大型溝渠，縱橫交錯流經方形的稻田——本來是隨著地形而建的高低不平的田地，被重新平整了。結果是鹽鹼地多了一倍，作物產量下降[61]。全省的鹽鹼地數量增長了 2300 萬畝[62]。

河北並不是個例外：（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在他關於鹽鹼化的報告中指出，在河南北部的許多縣，鹽鹼化程度增加了一倍，高達 28%[63]。胡耀邦在檢查黃河沿岸的縣中發現，山東省一些縣的巨大灌溉計劃增加了鹼性土壤整體的比例，從 8% 增至 24%[64]。這一發現，在該省北部和西部地區的更詳細的報告中得到印證，那裏鹽鹼化的程度，至 1962 年高達百分之二十，在大躍進中增長了一倍。在惠民地區，將近一半的耕地鹽鹼化了。毫無疑問：「這幾年來發展水利灌溉，打亂了過去的自然排水系統。」[65] 不清楚在大饑荒期間有多少萬畝的地被鹽奪走，但很可能佔了所有灌溉農田的百分之十到十五。

沒有全國性的或省級的數據，但定性的證據表明，空氣和水的污染也在很大比例上造成環境危機。中國沒有污水處理廠，城市污水和工業廢水被直接排入當地河流。爲了將這個農業為主的社會轉變成為一個在其征服世界的過程中能夠領導社會主義陣營的工業強國，污染物如苯酚、氰化物、砷、氟化物、硝酸鹽和硫酸鹽排放到水中的數量上漲。苯酚是一種最常見的污染物：在飲用水中不能超過每公升 0.001

毫克，魚塘中不能超過 0.01。在流經北方黯淡的工業心臟地帶的松花江和牡丹江中，苯酚的含量達每公升 2 至 24 毫克。那裏曾經盛產鯉魚、鯰魚和鱘魚，而今只剩下有毒物質。在松花江主要支流嫩江的一段 150 公里長的地帶，1959 年春季，漁民們一天內就撈起約 600 噸死魚。在遼寧，工業城市撫順和瀋陽附近，河魚全部絕跡。大連沿海，曾經每年收穫約 20 噸海參，但這一美味在大躍進期間消失[66]。在北京，國務院抱怨污染：鞍山鋼鐵廠排放如此大量的廢水，以至於河流散發著汽油的惡臭，死魚肚皮朝天，漂浮在油膩的水面上[67]。

佳木斯造紙廠排放的鹼性廢物數量如此之大，以至於船底被鏽蝕。這些造紙廠再也不能生產高質量的紙了，因為它們賴以生產的河水遭到嚴重污染。從上海到杭州一帶的所有工廠也是同樣情況。石油公司也是罪魁禍首，茂名的一家工廠每年釋放 2.4 萬噸煤油到江河。其他饑荒中稀缺的資源也被倒入水中：國務院計算，位於骯髒、塵土飛揚的瀋陽的冶煉廠，每年可節約 240 噸銅和 590 噸硫酸——只需回收他們使用的水就可以了[68]。

當時幾乎沒有比較研究以衡量 1957 年以後增加的污染，但一個案例說明了大躍進的影響。位於西北部工業中心蘭州的皮革、針織、造紙和化學工廠，在 1957 年每天排放 1680 噸的廢水。到 1959 年，每天已攀升到 12750 噸。蘭州是黃河上游第一個大城市，黃河中的污染物比衛生部允許範圍多八倍。 這條河慢慢地穿越沙漠和內蒙古草原，然後進入中國北方平原，在那裏黃河水通過無數的渠道和涵洞用於灌溉，污染物於是深深地侵入耕地[69]。

人也被毒害，因為河流往往是唯一的飲用水源。在北方，生活在鋼鐵廠附近的工人遭受慢性中毒。在山東省淄博市，一百名農民在飲用被上游製藥廠污染的水後得病[70]。在南京，一個僅有 275 名工人的工廠每天生產 80 至 90 噸含有放射性物質的污水。沒有廢料處置的措施，所有都直接倒入下水池，最後進入秦淮河，使之變成污水河。即

使地下水也被毒性化：當地人用井水洗米，可工廠附近的井水變成了紅色或綠色[71]。在上海寶山，鋼鐵廠產生的廢水進入工人的宿舍。外面成堆的瓦楞鐵廢料積累，工人不得不爬過垃圾進入睡覺的地方[72]。雖然礦渣不如廢物排放造成的污染嚴重，然而在繁忙的上海每天有 25 萬噸在堆積[73]。

空氣也被污染了，雖然我們這方面的具體例子要少一些，因為水是比空氣更加寶貴的資源，從而得到更詳細的監測。但一項研究顯示，在上海，幾家工廠每天有 20 噸因生產磷肥造成的的硫酸霧噴湧到空氣中[74]。

其中一些工廠也生產農藥，污染了動物、人、土壤和空氣。例如，在上海，數千噸敵百蟲和滴滴涕（DDT）得以生產，還有六氯化苯（BHC）——一種被稱爲 666，在土壤中分解極慢的高毒性農藥[75]。農藥對牲畜、農地、水產品的影響是眾所週知的，但在饑荒期間，化學毒物找到了新的應用，傳播範圍遠遠超出了農場。爲了迫切得到食物，一些公社用農藥捕捉魚類、鳥類和其它動物。在湖北，殺蟲劑如滅賜松和地滅通（俗稱 1605 和 1059）以及又名 3911 的劇毒農藥，被故意播撒以捕捉鴨子，然後將其出售給城市。僅在沙口，在吃了受污染的鴨子後，就有數十人中毒，數人死亡。饑餓的農民也獨立覓食，在池塘和湖泊投放化學物質以殺死野生動物。有些地方水變成綠色，毒死了所有的動物[76]。

但最流行的一種控制蟲害的方法是發動群眾。毛澤東着迷於用群眾的力量去征服自然，他在 1958 年號召消除老鼠、蒼蠅、蚊子和麻雀。麻雀被當作敵人是因為他們吃穀物種子，掠奪了人的勞動果實。這是大躍進中最離奇並破壞生態的事件之一，全國動員起來，向麻雀展開一場全面的戰爭。人們大聲地敲打著鑼鼓和鍋盆，使得麻雀不斷地飛，直到他們筋疲力盡，從天空跌落。人們還打破鳥蛋，打死雛鳥。麻雀也在空中被擊落。時間的協調是至關重要的，整個國家都

在步調一致地對敵人作戰，確保麻雀無處逃生。在城市的人們走上屋頂，而在農村的農民則分散到山坡，爬上森林中的樹木，所有一切行動在同一時間進行，以確保完全的勝利。

蘇聯專家米哈伊爾·科羅契科在北京目睹了這項運動的開始。他在清晨被一個女人的可怕的尖叫聲喚醒，這個女人在他酒店旁邊的建築物屋頂上來來回回地奔跑。鼓敲響了，這個女人瘋狂地揮舞著一大張綁在竹竿上的牀單。連續三天整個酒店被動員參加消滅麻雀運動，從酒店男女服務員到官方的口譯員。兒童拿著彈弓出來，射擊任何長翅膀的動物【77】。

這場運動中發生了一些事故，有人從屋頂、桿頭或梯子上摔下來。在南京，李浩東爬上學校建築的屋頂取麻雀的巢，但身體失去平衡跌下三層樓。地方幹部何德鄰，瘋狂地揮舞著一張牀單來嚇唬麻雀，失足從屋頂摔下，摔斷了脊骨。被發放用來打麻雀的槍也導致意外。在南京，大約 330 公斤的火藥在短短兩天內被用光，這也表明了這場運動的規模。但真正的受害者是環境，因為槍被用來射擊任何帶羽毛的動物。損害的程度被濫用毒農藥加劇：在南京，誘餌殺死了狼、兔、蛇、羊、雞、鴨、狗、鴿子，有些數量巨大【78】。

主要的傷亡者是卑微的麻雀。我們沒有任何可靠的數據，因為數字是運動的一部份，其中也有浮誇，也有似是而非的精確度，也和運動一樣，具有超現實的特性。來自上海的捷報說，在一場對付所有害蟲的週期性戰爭中，它已消滅了 48695.49 公斤的蒼蠅，930486 只耗子，1213.05 公斤的蟑螂，和 1367440 只麻雀（使人不禁好奇，有多少人在偷偷地繁殖蒼蠅或蟑螂以獲得榮譽勳章）【79】。麻雀很可能接近滅絕，後來的幾年中很少有人見過它們。到 1960 年 4 月，當領導人認識到麻雀也吃昆蟲時，把它們從害蟲的黑名單中刪除，而代之以臭蟲【80】。

但是，糾正得太遲了：1958 年之後，蟲害蔓延，破壞了大批的作物。最大的破壞發生在收穫之前，成群的蝗蟲在農村鋪天蓋地而來，

把作物洗劫一空。它們利用 1961 年夏天湖北乾旱天氣的優勢，僅孝感地區就侵擾了約 19.5 萬畝田地。在荊州地區，超過五萬公頃被摧毀。總體而言，全省，約 15% 的稻米落進了貪婪的蝗蟲口中。一切都被剝光，宜昌地區失去超過一半的棉花【81】。曾對麻雀進行激烈戰爭的南京週邊地區，在 1960 年秋天，約 60% 的田野遭受蟲害而導致蔬菜嚴重短缺【82】。各種害蟲蓬勃成長：1960 年在浙江省，10 到 15 億斤糧食，約合百分之十的收穫，餵養了吻蛾、葉蟬、紅鈴蟲、紅蜘蛛等害蟲。預防措施因爲缺乏殺蟲劑而受到阻礙：農藥首先在 1958-1959 年對付自然的戰爭中被白白地浪費，然後在 1960 年短缺商品名單中加上了農藥，恰恰在最需要它們發揮作用的關鍵時刻【83】。

在對付自然的戰爭中，各種因素結合起來，戲劇性地放大了領導所說的「天災」。煉鋼運動造成森林砍伐，轉而導致土壤侵蝕和水土流失。宏偉的水利工程進一步擾亂了生態平衡，使水災和旱災的影響加劇，而兩者都促使蝗蟲汎濫：乾旱消除了所有對手，而隨後的大雨使蝗蟲以快於其他昆蟲的速度孵化，去佔領傷痕累累的大地。由於麻雀已經消失和農藥已被揮霍，昆蟲暢行無阻地降落到農民好不容易種下的微薄的作物上。

毛澤東輸掉了對自然的戰爭。它事與願違，打破了人與環境之間的微妙平衡，結果殺害了十分之一人口的性命。

第四篇

求生百態

22
餓鄉狂宴

平等可能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個支柱，但所有的共產主義國家都建立了森嚴的等級制度。原因之一是，大凡這樣的政權都生活在對真實的或想象的敵人的恐懼之中，並以此為理由使社會組織軍事化；每個下級單位無條件地執行上級的命令：「每個官員是他的上級的鐵砧，也是他的下屬的錘子」[1]。另一個原因是，指令性經濟對商品和服務的分配，不是根據（消費者的）需求，而是根據（黨心目中的）必要性。各種不同群體，各有其必要性，視他們在保衛國家的反帝鬥爭中或是建設共產主義事業中的地位而異，優先次序由黨排定。中國的戶籍制度（大致相當於 1932 年 12 月在蘇聯實行的內部護照制度）決定著個人得到食品、商品和服務的途徑。戶籍制度於 1951 年在城市推出，1955 年擴展到農村，在 1958 年農民被迫加入到人民公社時則具有法律的作用。戶籍把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劃為兩個不同的世界[2]。戶籍制度賦予每個居民的地位是通過母親遺傳的，也就是說，一個村莊的女孩即使嫁到城裏，她和她的孩子仍然不能擺脫農民的身分。

戶籍制度是計劃經濟的關鍵。由於國家負責商品分配，它必須對各經濟部門的需要心中有數。如果允許大量人口自由流動，就會破壞由中央計劃精心制定的定額和分配計劃。戶籍的另一個作用是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以確保集體化了的農村能獲得廉價勞動力，用從農民身上賺到的錢，來支付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農民世世代代都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特權——包括廉價房屋，口糧，醫療，教育和殘疾福利。遇到饑荒，國家就聽任農民自生自滅。

和建立在城鄉之間的壁壘一樣，同等森嚴的制度區分著老百姓和共產黨員。在黨內——像在軍隊一樣——嚴密的內部等級制度進一步確定誰有什麼權利，從糧食定量，糖，食用油，肉類，家禽，魚，水果，耐用品，住房，醫療保健，直到知情權。不同的等級，連可能獲得的香煙的質量也不一樣。1962 年的廣州，基層幹部每月有兩條普通香煙，中級幹部每月有兩條質量較好的香煙，而高級幹部，包括高級知識份子，藝術家，科學家和黨和國家領導人，會得到質量最好的三條香煙。[3]

在黨的最高層是中央領導人，他們住在高牆背後的特殊的宅邸裏，享受 24 小時保安，配有司機的汽車。以折扣價格出售稀有貨物的特別商店，是為他們及其家庭設立的。專用農場生產的高品質的蔬菜，肉類，雞肉和雞蛋，要保證新鮮和無毒，然後由專人試食品嚐。在這之後，才可供中央和各省的領導人享用[4]。他們的頭頂上是毛澤東，在紫禁城裏，挨著皇帝住過的宮殿，過著奢華的生活，他的臥室有宴會廳大小。他在每一個省或大市，都有一年四季隨時待命的豪華別墅，以及相應的廚師和服務員[5]。在這個等級社會的底層，是數百萬被關進勞改營的人，這些勞改營建在環境最惡劣的地方，比如嚴寒的東北平原或乾旱的甘肅沙漠。勞改人員在沒有任何法律保障的情況下，年復一年地被迫打石頭，挖煤，運磚或開墾沙漠。

隨著饑荒而來的，是特權階層的膨脹。儘管不斷的精簡機構，黨的成員增加了近一半，從 1958 年的 1245 萬到 1961 年的 1738 萬[6]。黨員們不會虧待自己。在饑荒中獲得享受的方式之一，就是頻繁地開會，會議的一切開銷都由國家提供。1958 年間，有大約五萬位官員到上海開會，1960 年這個數字增加了一倍，成爲十萬。他們住賓館，在國家買單的宴會上用餐。一個常去的地方是東湖飯店，這是著名流氓杜月笙的產業：它是少數幾個地點之一，在那裏不收取任何費用，無論是特製的菜肴或廁所裏的香水。這些會議，有的一開就是一個多

月。在 1960 年，上海為了這種幾乎每天都有的高級別的會議，不知道揮霍了多少錢。[7]

下級幹部也能在開會中得到享受。在被饑荒蹂躪的貴州省納雍縣，260 個幹部開了四天會，吃掉了 210 公斤的牛肉，500 公斤豬肉，680 隻雞，40 公斤火腿，130 升酒，糖和糕點不計其數，還抽了 79 條香煙。此外，會議還購置了毯子，枕頭，香皂和其他商品。1960 年底，北京一家汽車廠花了 6000 元，先後 8 次，在頂級酒店招待來參觀的幹部[8]。再有一種是開產品檢驗測試會議。在遼寧營口，1960 年 3 月的一個早上，20 多個幹部系統地「檢驗」一系列的本地特產，從香煙開始到罐頭食品，水果和餅乾，喝了不少米酒。最後，酒足飯飽的測試人員中，有三人嘔吐[9]。

幹部還有公費旅遊。1960 年 2 月，約有 250 名幹部登上豪華客輪遊覽長江，在品嚐美味佳餚的同時，欣賞懸崖，巖溶地貌和峽谷，他們偶爾也會離開舒適的包廂，參觀沿途的文化景點。他們拍攝了上百卷膠卷。擺放在客輪各部位的芳香油和熏香，發出的香味飄蕩在空中。穿著華麗的女服務員們，送上絡繹不絕的美味佳餚。樂隊演奏著背景音樂。此行不惜耗費巨資，25 天裏僅燃料和工作人員的費用就達 3.6 萬元，此外還要加上 5 噸魚肉，和不計其數的煙酒。客輪發出彩虹般五顏六色的光芒，在月光下構成了一道迷人的風景 . 觥籌交錯，杯盤狼藉，歡聲笑語迴響在長江之上。而長江週圍令人震歎的美麗山水，卻正經受大饑荒的折磨。[10]

在大饑荒的同時，幹部們卻在會議上的大吃大喝，是當時社會上普遍存在的不滿的一個根源。貪婪的幹部往往被稱為豬八戒，豬八戒是著名的明代小說「西遊記」中的人物，以他的懶惰，貪吃和好色著稱。[11] 即使黨外的一些老百姓，也有多吃多佔的機會。在集體食堂工作的人，會利用職務之便小偷小摸。河南省會鄭州的一家棉紡廠，食堂管事的人經常出入倉庫，把它作為自己的食品櫃。有一次，一名廚

師一天內吃了 20 個鹹蛋，其他人則吃了幾公斤肉罐頭。麵條和烙餅也許能留到晚上，而食堂專用的魚肉和蔬菜，白天就被食堂工作人員瓜分了。至於普通工人，是每天 3 碗稀飯，偶爾有些米飯或饅頭補充。許多人幹活時體力不支。[12]

對於各種巧取豪奪，農民並不總是袖手旁觀。廣東一個公社三分之二的豬，被當地幹部在慶祝節日來臨的宴會中吃掉了，農民警告說：「你們幹部明搶，我們社員就會暗偷」。[13] 無節制的屠宰盛行於 1958 年的農村，農民用殺掉自己的家禽和牲畜的方式抵抗人民公社。在恐懼，謠言和榜樣的作用下，他們選擇吃掉自己的勞動果實，把肉類儲存起來，或是在黑市出售，而不是把它們拱手送人。就像我們在廣東省東北丘陵一個村子裏所看到的胡永明，他按部就班地吃掉了他的牲畜：宰了四隻雞，三隻鴨，狗，狗仔和一隻貓。他的家人用這些肉類大快朵頤。[14] 但是，即使在激動人心的 1958 年後的日子裏，村民還是能找到偶爾大吃一頓的方法，當然有時需要當地領導的縱容。在羅定，一個鐵血制下的縣城，為了慶祝共產黨生日，1959 年 7 月 1 日，每個家庭吃掉四隻鴨子。[15] 1961 年的農曆新年，不滿的農民在湛江地區屠宰了數千頭耕牛。這種抗議方式，在廣東省其他地區也出現了，原因是農民在傳統的農曆年沒有不可或缺的豬肉包糭子[16]。

另一個不時大吃大喝的原因是：人們不再需要節儉，對個人財產的徵用和通貨膨脹，已經迅速奪走了個人的積蓄。陳六姑，一位住在番禺的節儉老太太，設法攢了 300 元，到 1959 年初夏也開始揮霍，她請十個人進餐廳大喝魚湯。「現在存錢無用處留下百多給母親做棺材就行了」[17]。在北京的外國居民注意到，以往通常安靜的餐廳，1959 年人滿為患，即將成立城市公社的傳言，使居民紛紛把自己的傢俱出售給國營傢俱店，所得款項則用於進飯店吃大餐。[18]

有時，老百姓能吃得好，是因為他們有幸能有一位好領導，他可以利用一切政治技巧，把自己的單位變成饑餓沙漠中的一片綠洲。上

海的徐匯區，有一些食堂有比較奢華的玻璃門，並全部安裝螢光燈。還有些食堂安裝了收音機，普陀區的一個食堂還建了金魚池。【19】另一方面，城市裏的某些單位，食品供應監管不力，使工人有時能超量用餐。在河北省的調查表明，工人有時從一個食堂吃完飯，又換個食堂再吃。餐廳的桌子上，經常堆滿剩飯剩菜，不少落在地上糟蹋了。餐後的剩飯剩菜，能裝三四個容量為五公斤洗臉盆。更令人臉紅的浪費是，一些工人把食物帶回他們的宿舍，但是並不吃。人們踩過丟棄在地上的饅頭，使地上覆蓋著一層黃色的黏稠物。【20】在北京郊區石景山，供應好到工人可以專挑棗饅頭裏的棗吃，而把饅頭扔掉【21】。在宏大的上海機牀廠的食堂裏，淘米的過程非常粗糙，每天都有成公斤的大米流入污水渠，結果被用來餵豬。鬆懈的夜班監管制度，使工人能盡情大吃，有的甚至進行吃飯競賽：有個冠軍一次能吃兩公斤米飯【22】。

23
上欺下騙

幾乎每一個人，無論他的社會地位如何，從上到下，都在顛覆現行的分配制度，變相地發揮著共產黨所力圖消滅的物質利益的作用。在饑荒發展的過程中，一般人的生存越來越多地依賴於欺騙，誘惑，藏匿，行詐，偷竊，掠奪，走私，怠工，作假，以及其他糊弄國家的方式。

但是沒有人能以一己之力玩得轉這個經濟制度。在一個門檻林立，處處設防的國家，從脾氣古怪的傳達員，到臉色陰沉的火車站售票員，人人都可以給別人製造麻煩。社會系統中的清規戒律如此繁瑣複雜，以至最低級的工作人員也有自作主張獨斷專行的權力。雞毛蒜皮的小事——諸如買票，換證，進門等等——只要碰上個死板拘泥的人，就足以使你叫苦不迭。小權力腐蝕小人物，小人物遍佈於計劃經濟的底層，有權對他們碰巧有權管轄的短缺商品做出任性的決定。至於在計劃經濟系統內等級越高的人，權力越大，濫用權力的危險也就越大。

即使辦最簡單的小事，也離不開個人的或社會的關係網。找有權有勢的朋友幫個忙，總比和素不相識，照章辦事，不想施恩於陌生人的幹部更容易打交道。任何關係都聊勝於無，一位過去的鄰居，昔日的同事，校友，甚至朋友的朋友，都更容易答應你的要求，或對某些事情視而不見，法外開恩。在權力的上層，有實力的同事可以幫助你贏得國家投資，逃避稅款，或者染指稀缺資源。各色人等都通過交換利益、饋贈和賄賂，來擴大他們的關係網。人人為自己。穆興武，上

海一個倉庫主任，聘了十九個親戚在他手下工作，相當於員工總數的一半：有了這樣堅實的基礎，他就可以對他監守的商品爲所欲爲[1]。所有的人都對下級施壓，以保護和增進自己的利益。於是，本應為大衆謀福利的計劃經濟，孕育出了一種為個人及其關係戶大行其道的制度。

體制內比體制外更容易利用制度謀取私利。在想方設法矇騙國家這方面，他們真說得上詭計多端。企業間的通常做法是繞過計劃，直接交換。武漢省公路運輸局同意為江漢區第二商業局提供運輸，以換取運輸局想要的商品。1960 年 1 月，這兩個單位間的一次交易，就涉及了成噸的糖，酒，和上千箱的香煙，以及 350 公斤肉罐頭。武漢石油採購站慷慨地用成百噸的石油，天然氣和煤，為自己的幹部換取副食品[2]。在北方，清河林業局用幾百立方米的木材，與佳木斯一家工廠以貨易貨，換來了餅乾和檸檬汁。還有人用豬肉換水泥，或是用鋼材換木材。[3]

這些做法滲透到整個國家，企業的代表在不斷旅行中建立了一個能繞過僵化的供應體系的平行經濟。採購員通過和地方官員喝酒吃飯，建立了關係網，進而完成企業交給的採購任務。賄賂是普遍現象。上海物資局的領導人定期收到五花八門的禮物，從鹿茸到白砂糖，從餅乾到羊肉。在他管理下，一年內被破壞和損失的貨物超過六百萬元人民幣。[4] 在三年大躍進之後廣州運輸局被指控浪費的資源了超過五百億人民幣[5]。一項調查估計，僅黑龍江一省，1960 年年底就有二千名幹部為他們的本單位購買木材，並以手錶，香煙，肥皂或罐頭食品作為回報。[6] 廣東省十多個廠，繞過省裏的機構，派出採購員直接去上海辦貨。[7] 人民公社也不例外：在廣東海鷗農場出售 27 噸香茅油到上海香料廠，而不是上交給省裏。[8] 誰也不知道有多少貿易發生在這種影子經濟裏，但有個調查小組估計，1959 年 4 月未經官方批准的從南京運到其他單位的商品數量為 850 噸，涉及數百個單位，

它們偽造航運許可證，使用假姓名，印製假證件，甚至以軍隊的名義運輸，以賺取利潤。[9]

以物易物，這種原始的貿易形式，成為當時分配商品的最有效途徑之一。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而且在全國範圍內暢行，損害著國家結構，蠶食了計劃經濟，但仍然在特別記賬法的掩蓋之下不致被人察覺。商品變成了貨幣。對瀋陽一個著名的餃子店的詳細調查表明，食品被用來從三十幾個城建單位換取鐵管，水泥和磚塊。用餃子和國家的供應商直接交換，保證了穩定和廉價的原料供應。市水產公司，像其他任何分銷商一樣，苦於饑荒中的嚴重短缺，把本應提供給郊區消費者的蝦，都給了餃子店以換取餃子。餃子店的領導在瀋陽最好的百貨公司用餃子券購物。餃子店的員工也可以享受自己的產品。餃子被用來買通交通警和消防大隊，也被用來支付諸如供煤供水供，廁所清潔和衛生檢查等服務。[10]

會計可以創造性地掩蓋挪用資金。他可以假造出從未有過的支出，其中有的花費可達上百萬元。另一個手段是國有單位挪用國家的工業投資進行基本建設，為自己興建辦公樓，歌舞廳，私人洗手間和電梯。在遵義地區的一次突擊搜查，發現了大躍進以來被挪用的 500 萬元人民幣。[11] 黑龍江的一個採石場把辦公室，小賣部，甚至幼兒園的固定支出，都攤入了由國家付賬的生產成本。許多企業把管理和經營費用計入生產成本。在北京，這樣的行政單位就有七百家之多，其所有的工資和費用都被掩蓋在生產成本之下。[12] 其他費用也可以變相轉嫁給國家。例如河南洛陽一家軸承廠，以降溫裝置為名，建了一個 1250 立方米的游泳池。[13]

向國有銀行借款也是常用的手法。李富春指出，1961 年夏天，銀行有 30 億元人民幣赤字，許多單位向銀行借錢，用以大吃大喝。[14] 當某市或某縣有赤字時，它就停止上繳利稅。從 1960 年起，一些省份決定，截留所有利潤。遼寧省的財政局和商業局，因而決定了下屬

企業的利潤不再納入預算，也就是是就地分掉。山東高唐縣單方面決定：利潤屬於預算外，應該留給地方；而虧損則列入預算內，由國家承擔。不僅集體企業和城鎮社區經常不賦稅，有時整個城市都決定不徵稅。[15]

此外，還有些單位明目張膽偷竊國家財產，再通過狡猾的會計手法分到下面。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沿滬寧鐵路的地方工廠，偷竊、挪用和走私了三百多噸的鋼鐵，六百多噸水泥和二百多立方米木材。徐州新華鎖廠專門雇了一輛卡車，有計劃地從鐵路倉庫竊取所需的原材料。這些活動大多是由領導幹部授意的。在車站經理杜成亮指使下，完全用被盜的物資興建的南京東站大禮堂，就是一座有組織盜竊的豐碑。[16]

另一種欺騙國家的方法是虛報配給名冊。令人毛骨悚然的「死魂靈」貿易遍佈農村。家庭試圖隱瞞死亡，以獲得額外的食物配給；幹部經常虛報農民的數量，以得到更多的餘糧。這也是城市的常見現象，因為在城市裏，國家必須保證城市居民的口糧。當調查組審核河北某縣的細賬時，他們發現國家每月給 2.6 萬名職工每人多發了九公斤口糧。每個人都可能在數字上弄虛作假，一個磚廠可以聲稱擁有六百多名工人，而實際上只有 306 個工人。有些工廠將所有的工人劃為重體力勞動者，因為這使他們能分到更多的口糧，其實大多數員工從事的是輕體力勞動。[17] 在北京，有五千名已死亡或已返村的工人還在建築行業的花名冊上。即使在中國科學院，459 名在地球物理研究所領津貼的員工中，也有三分之一的人是無權領口糧的臨時僱員。[18]

上述做法的正面作用是可以僱用計劃外人員。勞工黑市的供求決定工人的工資。熱門工人和有希望的學徒會被人用福利或金錢挖走。根據 1960 年夏天的報告，當年的前六個月，南京因此流失了數千名工人。[19] 競爭相當激烈，當工廠不讓出色的工人到其他地方追求更好的機會時，他們會抱怨缺乏就業的自由，並想辦法讓老闆解雇他們。

在一些情況下會發生暴力，工人會把怒火發向阻撓他們的幹部。在白下區商業部門的500名學徒，有180人失蹤。勞工黑市的組成部份是地下工廠，它出現在每個城市，包括南京。有些人正常工作後再頂夜班，有的人作兩份工作以補貼家用。在中原一個建築單位中，三分之二的工人都是這樣。學生，醫生，甚至幹部都可能犧牲本職單位的利益到勞工黑市上賺錢，在碼頭上做搬運工，或用平板三輪車運貨。【20】

計劃經濟中一個自相矛盾的地方是，實際上無數人都在做買賣。他們預期商品價格將因短缺或通脹的原因上漲，而囤積居奇。湖北大學有一個項目，是按照黑市需要的變動，用電報指示代理商買進或賣出特定的商品。一個在上海的中國科學院的研究中心，僱用了華東師範大學二十名學生，購買可以和其他單位交換的緊俏商品。【21】

黨員的身份很適合進行投機活動，其中一些人幾乎是全職的。李柯，北京東部建國門公社的一個幹部，給自己開了九個月的病假，然後倒賣縫紉機，自行車和收音機，再把利潤用來買電燈泡和電纜，轉手到天津賣掉後，用得到的錢購買傢俱，再到郊區賣掉。他一邊展示生意上的精明，一邊享受著國家的工資和福利。像李柯這樣做的人不是個別的。【22】

大多數幹部有更大的油水可撈，所以把小打小鬧的買賣留給了老百姓。上海是個曾經可以自由貿易的通商口岸，好多人沒有忘掉作買賣的傳統。趙建國，一個沒多少錢的女老闆，主要經營燈泡之類的小商品，但她在倒賣有名的鳳凰牌自行車中賺了不少錢。另一個小商人李傳英，在上海辦貨，拿到安徽去賣。胡玉美在浙江黃巖買賣草帽，草蓆，魚乾，和蝦，往往有翻倍的利潤。馬貴友收購富裕家庭的珠寶和手錶，外加買賣農村票證，每月能掙一百元人民幣：「我不是反革命，一不偷，二不搶，沒有工作，做點生意有啥關係？」1961年8月在居委會的幫助下編製報告的官員們，被倒買倒賣的商品範圍之廣和市場信息的質量之高嚇了一跳。儘管中央計劃經濟有收集所有信息的

機制，小商販比黨更瞭解市場的需求。這種現象十分普遍，從倒賣農村水果補貼家用的老車伕陳長伍，到以公務旅行為名去內蒙古和東北進行私人交易的有權有勢的經理，全社會的人都參與其中。【23】

工廠裏的工人也進行商品交易。使工會感到震驚的是工人熱衷於『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不顧計劃經濟的原則，投機緊俏商品。工人會仔細比較不同的商店的價格，然後從中套利。無論商店出售什麼，有些人一見排隊就會加入。還有人把家裏人也帶來輪流排隊。女工李蘭英花了五元錢買胡蘿蔔醬，希望能在日後轉售。一位同事存了一袋柿子。這些不是例外，而是生活的常態，正如報告所說的那樣，因為工人普遍認為存錢不如囤貨。存錢一個月，就可能損失幾個百分點【24】。上海人因為怕短缺，常常願意排隊搶購購買任何物品。【25】

當工人沒有倒買倒賣的本錢時，他們就用 1949 年以前的老辦法——標會。在值得信賴的若干朋友圈裏，每個人每月出五到十元借給別人，每人一年有一次使用全部款項的機會。在北京東城區一些工廠的工人裏，就有七十多個這樣的「會」。有的人會買奢侈品擺闊。趙文華，一個郵政工人，為自己買了手錶，自行車，毛皮大衣和結婚禮物，都是可以保值的耐用消費品。當時流行的看法是，商品短缺時，實物比金錢更安全。【26】即使兒童也會做買賣。在吉林省十個小學生中就有一個倒賣糕點，肉類，雞蛋，蔬菜或是肥皂。【27】

也有人在賭博中碰運氣。廣東藍塘公社，兩個幹部用屬於村裏的上千公斤糧食和上百公斤的蔬菜作為賭注。附近有個女人在賭博中輸了五十元錢，只好用自己的身體還債【28】。賭博是一種當局無法杜絕的根深蒂固的陋習，在廣州，工廠裏的工人用食品作為玩撲克的賭注，而不是金錢。有的人的賭注高達 3500 元，這在當時是個天文數字。【29】在南京附近的六合，賭博幾乎無處不在，大的賭博團伙有二十多人。【30】就在大饑荒的當時，賭博也大行其道，在徹底的絕望中，人們押上

了一切。在 1960-1961 年間災難性的冬季，湖南盛行賭博，有的人真的輸掉了褲子。[31]

當現金失去了購買力的時候，糧票和其他票證就成爲代用貨幣。買最基本的商品都需要票證，包括油，糧食，豬肉，布料，保溫瓶，傢俱，甚至建築材料。為了確保基本商品的公平分配，各種票證通過戶口發放，人們也被綁定在城鎮戶籍制度上。每戶發一個購貨本，上面有每個家庭成員的記錄，用購貨本可以領到每戶每月的糧票。糧票的有效期往往只有一個月。糧票的使用範圍一般被限制在其發行地，可能是本地食堂，本公社，本縣，本市，偶爾也可能是本省。米票只在本縣有效，迫使人們留在自己的居住地。[32] 就像交換貨物一樣，人們也交換各種票證。在一些市鎮，如河北靜海縣，各種票證成了工資的替代品，因為人們認為，錢不久就會被淘汰。針對各種商品和服務的票證種類繁多：從可以代替現金的南瓜籽票到理髮票，票證的面值從一分至五元不等。[33]

發行票證的目的之一本是為了排除囤積居奇。但是廣東省人大在 1961 年 2 月發現，自 1959 年 9 月以來發行的各種票證，有三分之一沒有被用來交換實物，這意味著價值約 4000 萬斤糧食的票證正作為貨幣的替代物，處在流通之中。[34]

因為票證往往是用劣質紙張匆匆印製的，偽造票證比偽造貨幣容易得多。在華東水利學院食堂就發現過十幾個偽造案例。[35] 這種現象普遍存在。在汕頭警方抄查中發現了大約二百個涉及偽造票證的案件。正如一份給省人大的報告指出：超過三分之一的不法行為涉及各種票證；安全部門甚至認為在 1960 年秋季清遠地區出現的大量假票證是「敵對投機份子」製造的。[36]

有買家和賣家，就有黑市。隨著交易從商店轉移到街道，市場出現在街頭，百貨公司以外，鐵路車站，工廠大門外。黑市的存在，游離於法律模糊地帶，在政府打擊的時候消失，而後馬上捲土重來。賣

方悄悄和買方搭話，再將商品從大衣口袋或紙袋裏拿出來，而其他人坐在路邊，分散地隱蔽他們的貨物，貨物可能是食品，二手舊貨，或是贓物。公安會定期進行清查，打擊黑市，但是作用不大。當地方政府視而不見的時候，人們就會在一定的時間聚集成臨時的集市，以物易物，直到臨時的集市變成固定的市場，吸引鄰近村莊的買家和賣家。

在北京的天橋，西直門和東直門，都有黑市。黑市上數百名賣家貨物，可以賣到國家定價的 15 倍。高價並不能阻止成群結隊喜歡逛店的家庭主婦，工人和幹部。使公安人員不解的是，人們實際上喜歡黑市。[37]國家可以容忍黑市的存在，只是不能容忍黑市在首都蓬勃發展；所以在廣州，就有來自全國各地的買家。這個中國南部的城市，1961 年夏天，僅從湖南來專門購買地瓜的人就可以找到數百個，其中許多人是被單位直接派來的。[38]貿易是公開進行的，有些賣家是六七歲的小孩，大點的孩子會抽著煙和潛在的買家討價還價。[39]

1961 年 1 月的第一週，天津的地方官員查出了大約八千件黑市交易。有時候，在一個黑市中有八百多人賣東西，週圍看貨的數千名客戶甚至阻塞了交通。據一位調查員聲稱，「黑市交易的物品無所不有」。[40]街道上的巡邏警察不可能戰勝黑市；在 1962 年 7 月，當局最終決定將幾十個他們沒法消除的黑市合法化。到了年底，在天津銷售的一半水果和四分之一豬肉，來自七千多名小商販。小商販的收入幾乎是國家工作人員的一倍。[41]自由市場的聲譽，每天吸引成千上萬的人專程從北京到天津。[42]

由於饑荒和饑餓逐漸削弱了日常生活的社會結構，人們開始向內發掘。一切都變賣。任何東西都可以交換，比如磚，衣服和燃料都可以換成糧食。湖北的一個大廠，三分之一的工人靠貸款生存。欠債太多的人只能賣血。[43]在四川重慶的一個單位每二十個中就有一人賣血。在成都，職工靠賣血養活家人的比例更高。幾個醫院都知道建築工人汪玉廷，因為他在七個月內賣了 1.3 升血。[44]

農村的情況更嚴重。從湖北黃陂一個區，就有三千個家庭把他們的備用衣服帶到乞討的武昌去賣。[45] 在河北滄縣，三分之一的村民出售各種各樣的傢俱，有些甚至賣掉了房梁。[46] 四川長壽縣，人們脫下身上的衣服換東西吃。[47]

在自己餓死前，人們會把自己的孩子賣給不能生育的夫婦。山東的閻西之在把他的三個女兒送人後，把五歲的兒子以十五元的價錢賣給了鄰村的一個男人。他最小的兒子，一個十個月大的小孩，賤賣給了一個幹部。吳敬西把九歲的兒子以五元賣給了一個陌生人，這點錢只夠買一碗大米和兩公斤花生。吳敬西傷心欲絕的妻子一提孩子就哭，兩眼紅腫視力衰退。兩個孩子的母親王維同把一個兒子賣了 1.5 元和四個發面饅頭。但是還有許多人沒能為自己的孩子找到買主。[48]

24
小偷小摸

在集體化的外衣下，在武裝民兵的公開支持下，黨的官員開始剝奪人民的一切私有財產——特別是在農村，面對貪婪的幹部，農民只有任人宰割。這是一場對付人民的持久戰，因為每次新一輪的掠奪，都會把擁有私人財產的微弱希望扼殺在萌芽狀態。在湖南湘潭，當地人民不會忘記在當地刮過的六次「共產風」。第一次是在 1957-1958 的冬春，為了進行「資本積累」，金錢、瓷器、銀器及其他貴重物品必須上交。第二次發生在 1958 年夏天，成立人民公社的時候。第三次是為了大煉鋼鐵，「共產風」吹走了人們家裏的壺、鍋和鐵製的廚具。然後，在 1959 年 3 月，省銀行凍結了所有的儲蓄。第五次，秋季，由於大辦水利再次啟動，工具和木材被無償徵用。最後，1960 年春天，地方領導為了建立大豬欄，奪走了農民的豬和建築材料。[1]

大多數人對公開的掠奪幾乎毫無辦法。但他們不是被動的受害者，他們創造了一系列的生存方法。最常見的做法是遵循自然惰性的怠工。高音喇叭要大家鼓足幹勁，牆報在歌頌勞模完成生產計劃，但在工廠車間裏，瀰漫著一片漠不關心的氣氛。在冬天的北京，一個典型的四十多人的車間裏，五六個工人會習慣性地蜷縮在爐前取暖，而其他人則溜出去排隊買東西或看電影。幹部根本沒有辦法控制每一個工人和懲治一切違反紀律的行為。[2] 中宣部更全面的研究顯示，在上海，多達一半的工人不遵守工作紀律。有些人會晚幾個小時上班，其他的人花很多時間聊天。有幾個懶人不做任何工作，只等吃下一頓飯。在收工前，許多工人已經走掉了。[3]

國家越是陷入饑荒，人們越是偷懶。1961 年，上海一個工人的平均年產值比 1959 年減少百分之四十，工人更多了，生產出來的商品反而更少了。磨洋工，當然只是生產率大幅下降的許多原因之一，正如我們在第 18 章看到的；問題在於到了 1961 年，工廠的工人已經成了磨洋工的老手。[4]

1959 年，許多農民不得不在沒有飯吃的情況下成天幹活。消極怠工，除了是營養不良的結果，也是求生之必需；為了度日，人們必須學會保存每一點能量。在幹部巡視的時候，農民會努力耕地，但只要幹部從視線中消失，他們就放下手裏的農具，坐待收工。有的地方的農民，會在關鍵的十字路口站崗放哨，以便其他的人睡上一個下午。[5] 如果幹部管的不嚴，當地一半的人就會逃避勞動。[6] 有些村莊，領導比較寬容，家家戶戶就蜷縮在一起，一連幾天不起牀，用真正冬眠的方式度過嚴冬。[7]

有些歷史學家認為，黑市，不合作，怠工，盜竊，都屬於反抗行為，是莊稼人這樣的弱者用來對付國家的武器。但社會各個階層都有類似的生存本能；如果真的存在著什麼「反抗行為」，共產黨可能已經垮臺了。面對由政權造成的饑饉，許多人沒有選擇，只好無視傳統的道德標準，能偷多少就偷多少。

盜竊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其嚴重程度取決於需要和機會。運輸工人的位置最容易竊取國家財產，因為上百萬噸的貨物要經過他們的手。在武漢港六號碼頭的一千二百名工人中，有兩百八十多人，常年以保養和修理為名，偷竊列車上的貨物。[8] 在內蒙古呼和浩特火車站的 864 名搬運工人裏，半數有偷竊行為。[9] 郵包被竊是常見現象，而且往往是在黨員的組織下幹的。廣州市郵政局的一個四人小組，偷拆過上萬件海外寄來的包裹，取走了手錶，鋼筆，人參，奶粉，乾鮑魚和其他禮品。很多被竊的東西，在拍賣會上出售給郵政工人。這個郵局有一百多個幹部參加了偷拆郵包的活動。[10]

學生偷食堂裏的東西。1960 年南京大學一個月中就出現了五十宗竊案。[11] 在南京郊外江寧縣湖熟中學，小偷小摸是學生之間的常態；從廚房偷胡蘿蔔開始，這種行為逐漸成為一種生活方式。[12] 國營商店和百貨公司的職員，會巧妙地篡改收據或開假收據。徐紀恕，上海友誼商店的售貨員，通過篡改收據，日積月累，攢了總數達三百元左右的錢財。在藥店供職的黎山娣承認，幾年來每天拿走一元人民幣，使她的工資幾乎翻了一番。[13]

如果說，城市中的小偷小摸是因為存在著大量的機會，那麼，農村中的小偷小摸就是出於必需，許多農民只有依靠自己的機智才能在饑荒中生存。在糧食生產的每個階段，農民總是試圖為自己保留一部份。在小麥或玉米完全成熟以前，這種做法就從田裏開始了。這是一種名為「吃青」的傳統做法，當民兵不注意的時候，農民在田裏悄悄地摘下穀物，用手搓去殼皮，生吃下去。吃青常見於北方，和稻田相比，茂密的玉米地和麥田更適合於藏身。玉米是一種生長能力很強的作物，能夠在田裏呆相當長的時間，從而為不斷吃青提供條件。[14]

1960 年，因為農民吃青，一些公社的秋收幾乎是名存實亡。在山東廣饒，有幾個大隊在玉米成熟前就吃掉了百分之八十，小米和綠豆則顆粒無收。也是在山東的膠縣，所有穀物近百分之九十失收。全省有成千上萬類似的事件。很多在田裏偷吃的人被當地民兵打死。[15] 安徽宣城，整塊地被吃得乾乾淨淨，就像剛被一群蝗蟲啃過一樣。[16] 回憶當年的饑餓，農民曾木說出了偷吃的重要性：「沒偷的人都餓死了。偷吃過的人還活著。」[17]

在檢查員的默許下，已經脫粒和裝袋的糧食在注水後出售給國家。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僅廣東一省，國家儲備的 30 億斤糧食中，就有三分之一因為含水量過高而腐爛，雖然儲存條件差也是原因之一。[18] 糧食一旦賣給國家，大量的盜竊就會出現在糧食的運輸過程中。在廣東新興縣城，1960 年出現了將近九百起盜竊案件。來自新河

的船夫林四，在不同場合拿走了大約一千斤糧食。另一些人偷得更周到，他們用沙子和石頭頂替被盜的糧食。在廣州，運貨的人用竹筒把糧食從口袋裏弄出來，再把沙子返回袋子中。[19] 在江蘇高郵縣，差不多每個船夫都為自己偷糧食，平均每人每年偷三百公斤。[20]

國家糧倉的看守也偷竊。在河北於內蒙古接壤的張家口，五分之一的看守有不誠實的行為，有時在黨員的默許下偷竊糧食。管理邱縣糧食收集站的幹部，有一半存在腐敗問題。[21] 經過如此之多的貪婪的手，人們想知道，有多少糧食最後實際到了食堂的飯桌上。根據蘇州在本地進行的一個調查估計，一公斤大米大約只有一半左右能到達它的最終目的地：先是在儲藏和運輸中被人偷竊，然後是會計的中飽私囊，幹部的假公濟私，和廚師從中剋扣，最後才能做成一碗米飯，端上食堂的飯桌。[22]

地方幹部與農民聯手，就會形成強大的盜竊集團，他們的詭計和欺騙可以使整個村子免受饑荒之苦。有些村莊保持兩套賬簿，一本是村裏的實際數字，一本是糊弄上級糧食檢查員的假賬。這種做法在廣東省非常普遍。[23] 湖北宣恩縣，三分之一的會計造假賬。在崇陽縣，一名支部書記向上級公社報告了大約 50 萬斤的產量，自己的賬簿上記的卻是 63 萬斤。[24] 1959 年 6 月，根據河北省委辦公室的調查，糧食的庫存記錄比實際儲量少了 3.2 億斤，這主要是會計報告弄虛作假的結果。[25]

從農民手裏徵集餘糧是嚴厲而且血淋淋的，因此把沒有上交的糧食隱藏起來並不容易。在湖北孝感，檢查組發現，最大的地下糧倉藏匿了 12 萬斤糧食。在義堂公社，6 萬斤糧食被藏在假牆、衣櫃或棺材裏。在一個叫武洛的地方，一次搜查就從 15 戶人家繳獲了 5.2 億斤糧食。有些地方的幹部在收穫之後立即私分糧食，並叫農民在民兵來徵糧以前盡量多吃。[26]

全國各地都有幹部悄悄地給農民發放糧食，幫助他們度過饑荒。河北易縣的有個公社，每畝收穫的糧食中就有 20 至 27 斤被分到社員手裏。檢查組經常發現地方的『黑糧倉』。在交河縣，幾乎每隊都有 1500 斤左右的『地下糧食』。[27] 當天津近郊孫氏公社的領導留下 39 萬斤種子時，他直言不諱的說，「國家的糧食也是群眾的，群眾的也是國家的」。[28] 湖南有 23 個縣實際擁有的糧食比上報多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總數達 7200 萬斤。最極端的例子之一是瀏陽，在徹底檢查了三萬個糧倉以後，多出了 1500 萬斤糧食。[29] 但是相反的情形更為普遍。在許多地方的領導，寧願老百姓餓肚子，而不敢請求上級調糧，他們怕向上級伸手會被視為懶人乞討，沒有鼓足幹勁。[30]

地方幹部使用的另一種辦法是，向國有糧倉「借」糧。在河北，大約 7140 萬斤糧食就這樣被「借」到 1959 年 4 月。糧倉同意出借，通常是迫於上級幹部的壓力。天津附近孫賈公社書記李建中打電話借糧，被糧庫的工作人員斷然拒絕。當地領導馬上來到糧庫下達指示：「叫賒也得賒，不叫賒也得賒，今後有什麼事我擋。」當場商定借出 7 萬斤糧食。在城市中的單位和機構也經常是有借無還。一所中學用借來的糧食養活自己的學生，欠了 3.5 萬元債務。[31]

但最後食物耗盡，人們開始向週圍的人下手，從同村的人，鄰居，甚至親戚那裏偷吃的。南京所有鄰里之間的衝突中有一半涉及食品，人們互相偷吃的，以致為此打架。[32] 兒童和老人受害最深，例如丹陽市，有人搶了一個失明的老祖母用救濟券買來的小米。[33] 在農村，為生存而進行的激烈競爭，逐漸侵蝕任何社會的和諧和凝聚力。長沙廖家村，絕望的幹部面對盜竊盛行毫無辦法，只好告訴農民，只要不偷自己的村子就不會受到懲罰。[34] 農村一旦失去了維繫社區的紐帶，家庭就成了爭鬥、嫉妒和衝突的舞臺。一位婦女還記得，她的婆婆睡覺時，把裝食品券的袋子繫在脖子上。她的一個侄子在一個寒冷

的冬夜剪斷繩子，用偷來的食品券換糖吃。這名婦女數天之後就餓死了。[35]

人民公社，農村，家庭：到處都是緊張和怨恨，因為饑荒，昔日的鄰居，朋友和親戚，成爲冤家。湖北一個黨的官員在分配夏糧的時候說：「國家和大隊，大隊和大隊，個人和個人，上，下，左，右，都有爭論」。[36]暴力出現了，單位或小組因為夏糧的分配打得四分五裂。社員為了吃糧而打架，專門製作了棍棒和刀具。[37]在湖北英山縣，兩個倒霉的男子偷了小米，發現後被吊死在樹上。[38]

在饑荒中，一個人有所得，另一個人就有所失。小偷小摸看上去是針對著抽象的國家，付出代價的卻是食物鏈底層的小人物。在雲南宣威縣，幾個村幹部在 1958 年 12 月交糧食的時候虛報數量。這批糧食是鐵路工人的口糧。這個計劃本應為八萬工人提供熱量，但沒有料到鄰近村莊交付的糧食大大低於計劃的要求。鐵路工人——他們也是從農村來的普通農民——因此餓了幾天，大約七十人在月底前餓死[39]。在農村，激進的公社化造成了物資奇缺，一個人的生存取決於另一個人的饑餓。高層的錯誤政策和各單位私下的自我救助，使中國的農村分崩離析。儘管難以區分饑荒中那些是自我毀滅，那些是自我救助，到頭來受害最深還是弱勢群體和窮人。

25
偉大領袖

廬山會議後，就沒有人敢講真話了。講真話在一黨制國家從不受到鼓勵，1959 年夏天共產黨領導人之間發生衝突之後，更使所有的人看清了發表與黨的路線有分歧的言論是多麼危險。雖然毛澤東的言論往往模棱兩可，高深莫測，保險的理解通常是寧左勿右。在大規模饑餓之中，沒有人提到饑荒，領導會委婉地使用諸如「自然災害」或「暫時困難」一類的提法。在基層，「饑荒」同樣是禁忌的字眼，地方幹部會花很大力氣來隱藏饑餓和因此患病的人，以逃避檢察組的眼睛。當河北隆化縣委派遣一個小組進行農村調查時，一些村子把病人趕到山裏藏起來。[1]

一些經過共產黨仔細篩選的外籍人士，在被安排參觀模範公社之後，都很願意為毛澤東思想辯護。[2] 左翼人士弗朗索瓦·密特朗，後來成為法國總統的政治家，倍感榮幸地向西方傳達毛主席智慧的話語。毛，「一個以多才多藝聞名於世界的偉大的學者」，1961 年在他杭州豪華的別墅裏告訴密特朗：中國沒有饑荒，只是「一時的匱乏」。[3] 右翼人士約翰·特普（John Temple），英國保守黨國會議員，1960 年底參觀了中國農村後宣佈：共產主義切實可行，中國正在飛速發展。[4]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這麼願意接受謊言。有華人背景的外國學生就不那麼容易被欺騙。在南京的 1500 名外國留學生中的大多數——他們主要來自印尼、泰國、馬來西亞和越南——表示了對大躍進的懷疑。他們公開質疑人民公社的活力和集體化的理想。早在 1959 年 3 月，不少人就敏銳地意識到了農村存在的饑荒。[5]

外國學生比中國學生受到的思想管制比較少，但即使在中國學生中，批評的聲浪仍然遍於全國，儘管經過了不斷的反『右』運動。正如共青團派出的一個調查小組發現，對大躍進、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懷疑普遍存在。大學生公開質疑，如果人民公社這種組織形式確實有優越性，為什麼會糧食短缺，農民為什麼背井離鄉，為什麼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的供應這麼差？如果我們的發展速度比資本主義國家高，為什麼我們的生活水平這樣低？「印尼雖是殖民地國家，但是人家的生活也過得不差，」一個學生這樣認為。[6]

在城市裏，儘管對饑荒的談論被鋪天蓋地的宣傳所掩蓋，黨的各級機構還是能聽到它的聲音。上海普陀區的街道委員會接到過舉報，像陳如杭這樣的普通工人就公開猜測由饑荒造成的死亡人數。在 1961，如果有人從挨餓的農村裏來，大饑荒是就成了家裏的主要話題。[7] 湖北工會發現，1961 年底有一半的工人在談話中表示了對饑荒的不滿。有的公然違抗他們的領導人。在一個案例中，一名因為偷懶而受到幹部斥責的工人拍了拍肚子，然後瞪著眼對幹部說「這裏是空的！」[8]

在 1962 年中國南部，靠近香港和澳門的地方，人們常常談論邊境對面那個誘人的自由世界。中山縣的青年人，在耕地的時候交換有關殖民地的故事，實際上每年都有數百人企圖越境。許多人被捕並送回自己的村莊，他們會和朋友分享冒險經歷中的見聞。[9] 廣州的青年工人公開讚美香港，任憑幻想，馳騁到一個食物豐富，工作自由的神秘的地方。[10]「香港好世界！」有人在一所小學的牆上寫下了這句話。[11]

其他塗鴉的人似乎決心要留下更持久的表示不滿的痕跡。有人在廁所的牆上塗寫反對的言論。在興寧市心懷不滿的人在公共廁所裏刻上侮辱毛澤東的口號。[12] 南京汽車廠廁所牆上發現了冗長的抨擊中國出口糧食的言論。[13]

更大膽的人會在夜間張貼批評共產黨的傳單和海報。在上海有人留下了一個 2 米長的煽動叛亂的海報。[14] 有時候傳單會數百張地出現。在高陽，一夜之間出現過一百張手寫的粉紅色或紅色的傳單；有些張貼在牆上，有些釘在城市週圍的樹上：「為什麼我國人民挨餓，因為糧食運往蘇聯去了。」另一個傳單發出警告：「麥收快到了，我們要來一個搶麥運動，有願意參加者，請作好準備！」[15] 在蘭州有人散發了 2700 多張傳單，號召在 1962 年 5 月進行總罷工。[16] 在海南，這個廣東沿岸的大島，發現過大約 4 萬張反對共產黨的傳單，有些顯然是蔣介石派飛機投擲的。[17] 這些顛覆性活動的影響範圍很難評估，因為任何反抗的痕跡，一經發現就被政府立即消除。但在南京，短短三個月內，警察就上報了大約四十件獨立的有關饑荒的傳單和標語。[18]

農民也用大字報來尋求正義，發洩憤怒或譴責幹部。在河北寧津縣，張錫榮勇敢地在牆上張貼了他寫的大字報，抗議他所在的食堂的惡劣條件。他立即引起了當地公安局的注意，並被帶走。但是張錫榮一個人的訴求，在縣政府為「提高警惕」而散發的 170 萬張傳單，海報和標語中被淹沒了。[19] 同樣固執的還有農民王玉堂，他在石首縣，用自己的大字報回應反右運動中官方鋪天蓋地宣傳和廣播。他大膽地宣稱「1958 年大躍進是吹牛，工人大吃虧，肚子大受餓」。[20] 即使力量對比懸殊，因為共產黨可以用宣傳的海洋淹沒任何不滿的聲音，個人的大字報有時還是起作用的。在四川大足縣，村民們就利用了黨的宣傳武器對付當地的一個幹部，二十多張大字報批評他挪用了六元公款。面對這樣的當眾羞辱，這位幹部不再監督收割，兀自釣魚去了，農民立即把收割的作物拿回家中。[21]

更受歡迎的是詩歌。毛澤東要求每個人都成為一名戰士，也要求男男女女大家成為詩人。人們被迫在 1958 年秋季寫出成千上萬的詩句，在為此舉辦的節日中，謳歌大豐收，大煉鋼鐵或大辦水利的最佳民歌可以受到獎勵。

成千上萬的人用富有韻律的詩句構築了狂想社會主義的未來。據稱在上海的二十萬工人創作了近五百萬首詩。[22] 雖然官方提倡的詩單調乏味，農民針對公社化編的小調卻體現了真正的創新精神。在饑荒之中，調侃是幫助人們度過苦難的一個辦法。在上海，一個流行的說法是：「毛主席樣樣好，就是肚皮吃不飽」。[23] 在廣東省江門縣，農民唱道：

公社化，公社化，
無人掙錢，有人花。
社員掙錢，小隊花，
小隊掙錢，大隊花。
大隊掙錢，公社花。
誰人積極是傻瓜！[24]

潛江一個不識字的村民楊華豐，用一首詩來形容食堂裏的稀粥：

走進食堂門，
稀飯一大盆，
兩邊起波浪，
中間淹死人。[25]

人們給當地幹部起外號來嘲笑他們貪婪、暴躁或貪吃。在廣東開平縣，農民形容一名肥胖的幹部為「閹貨狗」。其它的外號還有「金蒼蠅」和「案板婆」。許多地方都有被稱作「大肚皮」的幹部。而每一個公社幾乎都有一個來自陰間的惡魔——很多幹部被稱為閻王。[26] 荒唐可笑的事到處都是。在四川，省領導李井泉指出公社化帶來的好處是，有的人變得比毛主席還胖：有些村民就嘲弄食堂說，「辦了食堂的好處是胖子多」，指的卻是人們因吃不飽飯而浮腫了。[27]

官方宣傳的背後，是一個謠言盛行的世界。謠言把官方世界顛倒過來，提供一種與國家審查過的新聞唱反調的，另類的真相。[28] 人人都喜歡聽謠言，試圖理解其中的深意，盼望愚蠢的公社化早點結束。

謠言質疑黨的合法性，損壞人民公社的信譽。在武漢有人擔心，連妻子也會被共產了。[29]

謠言鼓勵與國家作對的行為。到處都有關於農民私分土地和搶劫國有糧倉的小道消息。在廣東潮陽，一名「女先知」聲稱，在饑餓時期共產黨會容忍私分糧食的行爲。[30]在湖北松滋，有七個大隊決定在1959-1960的冬春解散大隊，把土地分掉。[31]把土地分給個人的謠言也到了安陸，崇陽和銅山。[32]「毛主席已逝世了，土地要還家了」的消息在四川江岸饑餓的村民中流傳。[33]

有關供應短缺的謠言很多，它造成的混亂使得黨的宣傳機器不得不開足馬力生產出更響亮的口號。人民和黨陷入無休止的口水戰，因為每個正面的消息都有謠言版的解釋。有關某一貨物配給券停止使用的消息，就會引發人們的恐慌。1960年6月，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人們排長隊囤積棉織品；鞍鋼一個工人因此買了35雙襪子。[34]同樣，1961年1月，在廣東常樂的一些公社，食鹽可能下架的謠言，導致當地人民恐慌，在五天內囤積了35噸鹽，比平常多40倍。[35]

有關戰爭和敵人即將入侵的謠言蓋過了共產黨的宣傳，把恐懼帶給整個地區。恐懼和世界末日的景象把不滿的農民凝聚在一起。在廣東的農民聽說廣州已經武裝起來了，汕頭已經被拿下，因為蔣介石已經侵入大陸。希望國民黨回來長期統治的橫幅出現在路邊。一些謠言聽起來有根有據：「本月14號，國民黨已到了東溪村！」或是「蔣介石8月份回來」[36]儘管農民生活在消息閉塞的鄉村，這些謠言傳播得像野火一樣快，跨躍省市，幾天之內就傳到了湖南。[37]在臺灣對面的福建莆田，一個秘密會社分發黃色布條，好讓會員在共產黨垮臺後掛出來。據說這種布條還能預防核輻射。[38]

有些受了委屈的村民會尋求法律保護。在南京附近的六合，一名幹部搶走並吃掉一位老太太準備出售的雞。憤怒之下，她徑直向法庭提出申訴。[39]但更多情況下，訴訟往往毫無意義，更何況司法系統

在政治壓力下形同虛設——甚至司法部也在 1959 年被撤消了。政治挂帥，妨礙了正常的司法，及合理的申訴。例如在寧津縣，警察，督察和法院幹部的人數，在 1958 年減少一半。當地法院擠滿了為民事案件打官司的老百姓。[40]

正因為如此，許多人選擇傳統的申訴形式：信件投訴和上訪。由於黨內官僚弄虛作假成風，每一級給上級的報告都有不真實的成份和誇大的統計數據，國家安全機關更喜歡繞過官方，直接瞭解基層的情況。安全部門對民間言論高度注意，並鼓勵匿名揭發信。[41] 階級敵人可能鑽進黨的隊伍，間諜和破壞份子也可能潛伏在群眾中。為了把他們揪出來，提高人民大眾的警惕性是必要的。最好的方法是由人民監督黨。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人，也有可能用筆和紙，讓玩忽職守的幹部或濫用權力的官僚下臺。隨心所欲的揭發信，可以打擊權力階梯上的任何人。人們奮筆疾書，每月發送成袋的信件去乞求、抗議、譴責或抱怨，有時語氣謙和，有時聲色俱厲。有人因為一些小事告發鄰居，其他人則是要求換工作或是搬家，也有人對整個制度發表不滿的長篇大論，其間時有反黨言論。他們寫信給報紙，警察，法院和黨委。有的寫信給國務院，而不少信件是寫給毛澤東本人的。

長沙政府一個月內就接到了一千五百起投訴信和上訪者。許多人寫信是因為受了冤枉，其中有些信件中對政府大膽的批評足以被視為「反動」。那些能夠對自己的案子提出具體要求的人是有機會得到答覆的。畢竟，在共產黨龐大的監控下，地方政府不可能對群眾的要求完全無動於衷。[42] 從大躍進開始到 1961 年 3 月，南京政府收到了大約十三萬封來信。大部份投訴是有關工作，糧食，商品和服務的，但是對四百封群眾來信更詳細的分析表明，十分之一的信件作出了直接的指責或起訴的威脅。[43] 1959 年間上海的信訪局收到超過四萬件投訴。人們抱怨食物奇缺，住房條件差和工作條件不好，也有少數是攻擊黨和地方黨委的。[44] 大膽指控的目的，是為了使當局盡快進行調查，有

一些信件，為當局採取行動提供了足夠的證據。有人投訴民族學院虛報了數十名學生，以增加糧食配額。廣東省長接到投訴後派出了工作組。工作組成功地取得口供，並使學院領導認錯道歉。[45]

一些讀者寫信給《人民日報》。這些信很少公開登在報紙上，但它們的內容被匯總後在領導之間傳閱。例如，廣西煤炭礦工寫信抱怨，他們在工作中暈倒，因為他們的口糧被削減，而他們的工作時間卻增加了。[46]國務院每月收到數以百計的信件。有些作家大膽地攻擊大躍進，悲歎在饑荒的時候出口糧食的政策。[47]一些人直接致函最高領導層。這種做法繼承了長期以來在中華帝國存在的告御狀的傳統。但這種做法也表明，告狀的人認為濫用權力是地方官僚的錯誤，而不是毛澤東推動的集體化的必然結果。告狀的人安慰自己說：「如果毛主席知道，就不會發生這種事了」。在國家的首都一定能找到正義。能夠寫信告狀給人以希望。項仙枝，一個來自湖南的貧苦姑娘，把一封寫給毛主席的信縫在衣服裏面藏了一年以後，才交給省委派出的調查小組，要求替她冤死的父親，妹妹申冤報仇。[48]「敬愛的毛主席」是告狀信標準的開頭，比如葉利莊寫給毛主席關於海南存在的饑餓和腐敗案的信件。他上訴成功了。一個由高層組成的調查組，發現了當地領導欺壓人民的惡行。[49]

但是許多信件並沒有寄到他們的目的地。劉少奇曾經親自向公安部長謝富治抱怨：當地警察拆閱了鄉親們寄給他的信件（見第 16 章），在這以後，人們才知道有警方拆信的事。貴州郵局和公安局經常打開郵件，從而導致了寫控告信的人因「反黨」或「反革命」的罪名被捕。一個幹部的信中寫到了遵義普遍存在的饑餓，他被審問了好幾個月，最後下放到窯廠勞動。[50]甘肅高臺縣，警方每個月拆閱兩千多封信件。寫匿名信也不見得能保護自己。有一次，何靜芳郵寄了八封信，都是匿名的，但當地警察仍設法找到了他，逼供以後，把他投入勞改營。[51]在四川，社員杜興民譴責星光管區支書宋有余，導致了在大隊

內的瘋狂搜查，查對每個人的筆跡。杜興民被揭發出來，並被指控是個壞份子。在把杜興民移交給公安局之前，宋有余私設公堂組織打手打爆了杜的眼睛。杜興民幾天後死在監獄中。【52】上訴上訪落到如此下場，難怪有些人會轉向使用暴力。

26
鋌而走險

當絕望的農民開始搶劫糧倉，劫持火車和私吞公社財產的時候，暴力就成為最後的手段。1961 年颱風襲擊河北滄州以後，一些用鐮刀武裝起來的農民就到田裏偷玉米。一個黨委書記領了一隊人，搶了鄰村的羊和幾十噸蔬菜。[1] 有些搶劫案甚至動用了武器：在陝西發生的一次搶劫事件中，幹部把步槍發給村民。他們洗劫了鄰近的一個公社並搶走了一萬斤糧食。另一位當地幹部，率領了一個 260 人的武裝團伙，白天睡覺，夜間搶劫。[2] 在農村地區，搶劫團伙大多聚集在縣或省的邊界，他們越過邊界作案，所到之處雞犬不寧。[3]

更多的情況下，農民搶劫的目標往往是國家的糧倉。搶劫的規模是驚人的。僅在湖南的一個縣的五百個糧倉中，兩個月內就有三十個倉庫遭受搶劫。[4] 在同一省的湘潭地區，從 1960 到 1961 年的冬季，發生了八百多起糧食盜竊案。懷化農民強行打開了幾個倉庫，拿走了幾噸小米。[5]

針對列車的搶劫也很普遍。農民們聚集在鐵路週圍，搶劫貨車，仗著他們比警衛人多，以多取勝。這種情況在 1960 年後愈演愈烈，因為政府意識到大規模饑荒的嚴重程度，並開始清除濫用職權的黨員。在甘肅省主政的張仲良被降職後，根據當地警察的報告，1961 年 1 月發生了 500 例列車搶劫案。總共損失了大約 500 噸糧食和 2300 噸煤。每次搶劫成功，人們就更加大膽。在武威火車站，1 月初只有幾十人鬧事。但在更多的群眾加入後，幾個星期就發展為數百人。到了月底，四千名膽大包天的農民截住了一輛列車，拆走了列車上每一個可以拆

卸的部件。在靠近張掖的一個地方，兩千多憤怒的農民夜襲糧倉，殺死了一名警衛。另一個案件中，農民先偷了軍服；然後，負責倉庫的警衛把穿了軍服的農民當作特種部隊，讓他們進入倉庫運走糧食。[6]

鐵路沿線，到處有遭到搶劫的糧倉，被盜的牲畜，被偷的武器和被燒燬的賬簿。政府只有派出武警和民兵去重建秩序。[7] 有些劫車案甚至可能引發外交糾紛，比如襲擊貨車的人燒了朝鮮運到蒙古去展覽的物品。[8] 多虧公安部沒有下令對群眾開槍，警察接到的命令是集中對付帶頭鬧事的人。[9]

暴力產生暴力：當地方幹部的被動和無奈的假面具不再起作用的時候，農民們就會把滿腔怒火發向他們。在提高徵糧配額的會上，農民指責他們的領導是不顧大家死活。更加不滿的人會動手毆打或是用菜刀殺死領導。[10] 有些人會拿棍棒追打貪污公款的幹部。在四川雲陽縣，憤怒人們逼得當地領導和他的老婆跳入池塘自盡。[11] 在通江縣山區，當地領導劉復年被迫跪石瓦子被人用槓柴棒抽打。[12] 但這種行爲很少發生。一般人會偷盜、會詐騙、會縱火或搶劫，但他們很少是窮凶極惡的罪犯。他們不得不用中國特有的「吃苦」精神面對長期的艱辛：忍受悲傷、痛苦和磨難。

顯而易見而且同樣具有破壞性的是縱火；儘管很難區分火災是由於貧窮農民冬季取暖而造成的意外，還是有人故意放火以示抗議。據公安部估計，1958 間發生的至少七千起火災造成的損失達一萬億元——儘管無法知道其中多少起是故意縱火。[13] 根據當地公安機關的報告，河北每年都有數十件縱火案。[14] 1959 年底，在南京的火災比往年多了三倍。許多火災是由於疏忽，但也有不少是縱火犯所為。比如趙志海，為抗議而在工廠宿舍縱火。[15] 徐明宏，燒燬了四堆草料，被當地民兵開槍打死。[16] 在湖北松滋，一個市委書記的房子被人點著了。[17] 省裏有些農民把毛澤東塑像澆上汽油焚燒。[18] 四川洪雅縣李懷文放火

燒了食堂，那裏本來是他的家；他大叫：「你們滾出去，食堂房子是我的！」[19]

到了 1961 年，農村到處都有縱火案。廣州週圍，農曆新年過後的幾個星期裏，每晚都可以看到火光，許多是農民防火，為的是要求自留地。[20] 在廣東翁源縣，農民在燒燬糧倉後，在牆壁上寫下標語：表示糧食反正不再是他們的了，還不如一燒了之。[21]

當饑荒蔓延以後，饑餓的人們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生存；衰弱的人們不會去籌劃叛亂。儘管共產黨的檔案館內保留的證據表明，在大饑荒最後兩年裏出現了大量的地下組織，這些組織從來就沒有對共產黨構成真正的威脅，而且很容易被粉碎；不過他們的存在可以作為人民不滿程度的晴雨表。幾乎沒有任何地下組織能形成規模。以湖南為例，1960-1961 年冬春在一個縣的邊境有 150 人進行武裝叛亂；但旋即被當地公安部隊鎮壓。靠近省城有幾個不滿的農民組成人民黨，要求農業生產和貿易的自由，他們也很快煙消雲散。[22]

具有威脅的挑戰來自邊遠的西藏地區。1959 年 3 月間在西藏發生的武裝起義遭到了武力鎮壓，結果是達賴喇嘛流亡國外。1958 年在青海省發生的叛亂連續數月，波及该省的蒙古族自治縣的優干寧（河南）鎮（其東部接近甘肅省）、結古鎮（玉樹縣）和靠近西藏高原的囊謙縣。有些參加者是為了響應拉薩的叛亂，有些則是受了伊斯蘭教的鼓動。省裏的武裝力量有限，最初只能控制重要的公路。[23]

暴亂時有發生。1960 年秋天，雲南宣威縣農民造反，迅速蔓延到週圍幾個公社。農民得到了一些村幹部包括黨的書記的支持。他們獲得了武器，打出了廢除人民公社，恢復自由市場，和把土地還給農民的口號。軍隊迅速地進行干預，除一人漏網外，捕獲和鎮壓了所有的領導人。在公安部長謝富治給周恩來報告裏，提到了當年在西南省份發生了十幾起類似的事件。[24] 除此之外，公安部門還發現了近三千個反革命組織，僅雲南就有幾百個自稱是「黨」的團伙。[25]

1949 年後，政府無情地取締了秘密社團，然而中國歷代實行的專制已經教會了他們如何在嚴酷的環境下生存。在北部省份的一個調查揭示了秘密社團的影響程度——雖然數字可能被幹部誇大，以便向上級索取更多的鎮反經費。1959 年的頭幾個月，在河北省內，有四十幾個「反革命」組織被揭露出來，其中一半是屬於政府明令取締的，包括：還形道，升仙道，八卦道，先天道，和九宮道。僅寧津縣，接近百分之四的當地人口被認為是信教的；他們中的許多人宣誓效忠一貫道。[26] 這些社團的影響有時擴大到了外省。儘管農村人口的流動受到限制，信徒會從河北來到山東，在教主的墳墓前禱告。[27] 雖然共產黨反對「迷信」，人們還是會尋求民間的宗教。在廣東，慶祝龍母誕辰的儀式仍然很受歡迎；1960 年在德慶舉行了三千多人的慶典，參加者有學生也有幹部。[28]

但是，即使是在這個政權最黑暗的時刻，也沒有什麼力量可以破壞它的穩定。同以前在孟加拉，烏克蘭和愛爾蘭等地發生過的其他饑荒一樣，當大多數村民明白即將成為餓殍的時候，他們已經虛弱得沒有力氣走到下一個村莊，更不用說拿起武器組織起義了。任何溫和的反抗活動，都會招致殘酷鎮壓和嚴厲處理：暴動或起義領袖被處死，其他人則是無期徒刑。在成千上萬的人餓死而國家並不崩潰的另一個原因是，沒有任何黨派可以代替共產黨。不管是分散的宗教組織，還是秘密的地下黨派，都沒有能力控制這片巨大廣闊的土地。由於林彪在 1959 年廬山會議後在軍隊裏的廣泛清洗，可能出現的軍隊政變也早被消滅於萌芽之中。

有一種比單純的地緣政治更頑強的東西，阻礙了威脅共產黨統治的力量出現。大饑荒時代最常見的自救辦法是一個叫做「希望」的東西。在希望的支配下，無論村裏的情況有多壞，人們相信毛澤東的心中始終裝著人民。一個從封建時代人們就有的共同的信念是，皇帝總是好的，但是他的手下卻可能腐敗。在共和國時代更是如此，人們不

得不調和媒體每天鼓吹的烏托邦理想和災難遍地的現實。人們普遍相信濫用職權的基層幹部是沒有執行仁慈的毛主席的命令。遠在天邊的「政府」和英明領袖毛主席是和好人站在一起的。如果毛主席知道，一切都會有所不同。

27
背鄉離井

大饑荒時代最有效的生存辦法是離開農村逃荒。搞笑的是，大躍進意味著數百萬農民不是湧入公社，而是湧入城市。由於工業產值的指標不斷修訂提高，城裏的企業開始從農村招募廉價勞動力，農民如潮水般湧入城市。在美好的生活前景的吸引下，1958 年有 1500 多萬農民移居城市。[1] 長春，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等多個城市人口激增。據官方的人口普查結果，城市總人口從 1957 年的 0.99 億增加到了 1960 年的 1.3 億。[2]

儘管有嚴格的人口遷移的規定，還是有大量的人口從農村流出。為了盡快實現工業化，在第 22 章介紹過的戶籍制度被放在了一旁。但是從農村來的人很少能把自己的農村戶口正式變成城市戶口。一個人數眾多，社會地位低下的臨時工階層產生了。他們承擔了城市中艱苦，骯髒，和危險的工作；同時還要面對歧視，即使在他們的工作單位內也不被認同。臨時工沒有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的補貼，例如住房，口糧，醫療保健，教育和勞保福利。最重要的是他們沒有獲得合法地位，隨時都有可能被趕回農村。

1959 年初，由於全國糧食儲備下降，冬天面臨著出現饑荒的危險。在我們可以瞭解到的所有主要城市，糧食儲備都下降到了歷史最低水平；如武漢這個工業城市，糧食儲備只夠維持幾個星期。[3] 不斷惡化的危機，促使領導下決心強化戶籍制度，在城市和農村之間築起「長城」。這樣作的結果是，城鎮居民有了食物、住房和就業的保障，而農民只能自生自滅。為了進一步減輕負擔，國家開始限制城市人口

的增長。國務院 1959 年 2 月 4 日發文，並於 3 月 11 日再次強調，對人口流動實行嚴格限制；取締勞動力的自由市場，要求農民們回到農村。[4] 由於警察開始在上海嚴格執行戶籍制度，他們發現某些地區有五分之一的家庭只有暫住證，其中大部份人是來自江蘇省的農民。[5] 據估計，非法居住在上海的人有六萬多，其中大多數人從事貨運和建築工作。在國務院三令五申後，25 萬農民被遣送回農村。[6] 全國各地的臨時工在饑餓中往返奔波，被強行遣送回鄉。農村方面，則由地方當局極力阻止任何人去城市；農民被捆綁在饑餓的土地上。

政府企圖在城市週圍豎起的防線，由於多種因素起不到作用。在 1958 年人口向城市遷移的過程中，人們創造了許多遷移模式，並建立了聯繫網；依靠這些，農民得以重返城市。1959 年初，在河北，每 25 個農業勞動力中就有一個在鄉間晃蕩，伺機外出打工。那些在農曆新年返回村裏的農民，鼓動其他的人也出去打工；新年過後，他們就成群結隊地回到那些已經建立了良好關係、不追究打工者身份的企業。一封封來自城市並附有現金的家書，詳細地告訴鄉親如何加入打工大軍。在受災最嚴重的河南信陽，當地檢查郵件的官員聲稱，收到了大量從青海，甘肅，和北京寄來的信件。李明義寄了三封信並附上 130 元錢給他的弟弟，要他和其他四位親屬一起到西寧鐵路局來工作。[7]

在農村，關於城市生活的描述，像故事一樣被傳來傳去：那裏到處是糧食、到處有工作機會。有些公社，通過為打工者照顧小孩和老人的方式，支持人們出去打工；而城市工人的匯款，幫助了整個村莊的生存。北京西面的鐵路樞紐張家口，在 1958-1959 年冬春，大約三十萬人出外打工，佔整個農村勞動力的 7%。[8]

即使在浙江這個情況相對不錯的省份，在 1958-1959 年冬春，農民也走上了逃荒的道路。根據當局的統計，有 14.5 萬人出去逃荒，但可能有更多的人不在受命逮捕他們的當局的統計之中。和其他地方的農民一樣，出去的人多半是前往城市尋找就業機會。他們雄心勃勃，

大部份打算走到遠在千里外的青海，新疆，和寧夏，那裏的饑荒相對較輕。靠近城市是促使村民逃荒的一個關鍵因素。例如在浙江龍泉，十分之一健壯的村民，去了相距僅四十公里的福建省；其他的人則長途跋涉到蕭山，奉化，金華等城市。出去的大多數是年輕男人，婦女們被留下來照顧家庭和村莊。在蕭山以南四十公里埠下村，230 名打工者分幾批離開，其中包括地方幹部和青年團員。因為工廠在大躍進時期曾迫不及待地從週圍的村莊招募工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有了城市生活的經歷。許多人在半夜溜走，而另一些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離開，聲稱前往鎮上探望患病的親屬。在少數情況下，幹部會寫推薦信，並提供旅行許可證，鼓勵農民離開村子，到城市尋找機會。一些人靠賣加蓋了公章的空白許可證發了財。[9] 有些地方，例如，廣東南部，當地幹部採取了寬容的態度，覺得更多人員流出可以緩解饑荒。藍塘公社的一個大隊，只有七分之一勞力參加集體勞動。其他的人，不是幹私活，就是到附近縣市做買賣，有的人甚至到了一百公里外的海豐。[10]

成群的人爬上開往城市的貨運列車。在 1959 年 3 月的一天，上百個農民登上途經河北孔家莊的火車，沒有一個人買票。幾天後，同樣多的人在淮安一個叫周家河的農村小站登上了火車。[11] 從湖北的孝感到灄口，每天都有數百名農民聚集在車站，等待上車。有些人下決心打算離開農村，更多的人只是到城裏去賣木材或探親訪友。當被乘務員要求出示車票時，乘務員就會遭到辱罵和毆打。因為上車時秩序混亂，事故時有發生；體格較弱的逃票者常被擠下火車，曾經有一名五六歲的孩子被火車壓斷了一條腿。[12]

所有這些人都增加了流動人口的數量。在 1960 年的頭四個月內，僅在北京就有超過 17 萬從農村出來的農民無票乘車，其中大部份來自山東，河北和河南。一旦扒上了貨車，車上的每一件物品都有可能被

用在為生存而進行的鬥爭中。一位官員厭惡地說，他們「有的在貨物上大小便，有的用高級女襪當手紙」。[13]

這些農民到達目的地後，就會有朋友或是招聘勞力的人到火車站接他們，[14]也能在黑市上找到工作。在北京早晨就開始的「人市」上，一大群找工作的人們推推搡搡，擠來擠去，盡力爭取未來的老闆的注意。他們中多數人只有臨時的住所，有的人和親戚朋友住在一起。他們工作一天只能掙 1.3 元，木匠可以掙到 2.5 元，有技術的人最多能有一天 4 元的工資。有些人被暗地招募為國有企業工作，有的被個人雇去做體力活或家庭服務。[15]

儘管建立了保障城市人口免受農村饑荒威脅的防線，日積月累流入的農村人口給城市帶來了很大的影響。每個月都有成千上萬的人來到南京。1959 年的春天有六七萬難民來到或是經過這個城市，遠遠超過了市政府匆匆建造的臨時收容所能夠容納的人數。在 1959 年 2 月的一天，大約來了 1500 名難民。其中三分之二是年輕人，大部份來自附近縣市，雖然這個數字也包括來自安徽，河南，山東，三個饑荒最嚴重的省。一些人是來看朋友和家人，大部份人都沒有錢，所有的人都想找工作。工廠和礦山會暗地裏僱傭他們，付給他們的計件工資低於有當地戶口的工人。一些企業甚至願意偽造文件，為他們注上本地戶口。但佔 90% 的絕大多數工廠，則用多報正式工人的數量的方法，以便取得足夠的糧食來養活非法勞工。[16]

不是每個農民都能在黑市上找到工作，有些人被迫生活在城市邊緣的陰影之下，靠偷竊，乞討，撿破爛或出賣自己以求生存。28 歲的孔繁順是一個會在夜間爬到別人家裏偷衣服和錢的流浪漢。蘇玉有被抓獲的時候正一邊跑一邊把從店裏搶來的大餅塞進他的嘴裏。城市中心能夠見到年輕婦女在拉客。為了價值一兩毛錢的糧票或是一斤大米，她們會在公園安靜的角落提供性服務。沒有辦法的人只能挨餓：在寒冷的冬天，每個月都看到二十來具屍體。[17]所有這些都被地方當

局看作對社會秩序的威脅，加劇了本來就有的對農村人的歧視。在城市裏流浪的農民被抓後，會被遣返回鄉，不過幾個星期後，他們又回來了。[18]

有些難民在被官員盤問的時候，會告訴他們的故事。家住安縣農村的余義明在 1959 年 5 月被問話時說：在村裏的時候每天只有兩碗稀粥。幹部把所有的糧食都上交了，只剩下白菜。不久，榆樹皮和板栗根也被吃光了，村子裏根本找不到吃的。老鄉王秀蘭泣不成聲地說：「我們不說謊，我們幾個月沒糧食吃了。能吃的都吃掉了——我們有什麼辦法？」其他的難民訴說了他們是如何在夜幕的掩護下設法逃出來的。溧水縣來的陶民堂說，他們十一個人是聽說青年工人在黑龍江一個月能掙 70 元後，集體出走的。[19]

並不是所有的農村移民，都只能生活在城市的陰影裏，靠貪婪的工廠老闆的憐憫維持存在。在走向工業化的大躍進時期，為了留住來自農村的一些最能幹的人，工廠付給他們豐厚的薪水。[20] 在南京繁忙的浦口港，由農村移民組成的一隊裝卸工，雖然沒有像城市工人一樣有分配的口糧，但他們一個月能賺一百元左右，足夠他們去很好的餐廳就餐。有的人打兩份工，結果他們的生活比當地有戶口的工人還要好。[21] 少數人甚至專門在黑市上倒賣糧票。一名婦女被抓的時候，身上有 180 公斤米票，這些在上海買進的米票，到南京可以賣雙倍的價錢；在計劃經濟中，基本相同的商品在全國各地的價格可以千差萬別，她正是鑽了這個漏洞。男性農村移民多數是在工廠和建築工地；離開農村去城裏作小買賣的，大部份是婦女。[22]

另一方面，由於饑荒，年輕的農村移民利用勞工短缺在黑市上討價還價的優勢漸漸沒有了，代之而來的是唯求一飽。到了 1960 年，在蘭州一些工廠幹活的 21 萬名移民，沒有得到任何薪酬，工廠只是提供食宿而已。這樣的安排是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這名強勢的領導人親自批准的。但是這種由領導人們做出的重要決定導致了奴隸般的勞

動條件。在通渭的一個鋼鐵廠，農村移民被關起來，在沒有食物的情況下強迫工作到死：一年裏死了上千人，因為工廠老闆知道，反正不愁沒人打工。[23] 類似的工廠到底有多少，只有天知道。

隨著饑荒的到來，農民背井離鄉的目的改變了。總的來說，饑荒的威脅取代了就業的誘惑。在絕望之中，有些人會偷偷上山，希望以吃漿果，昆蟲和小動物為生。但很少有人真正能夠生存下來，只好返回村裏；他們從森林裏出來的時候，頭髮蓬亂，衣裳襤褸，有時完全赤裸，眼裏充滿野性，樣子改得讓人難以辨認。[24] 另一方面，當災難降臨時，人們把微薄的財產綁在背上，拖家帶口，成群結隊地離開；地方當局對此也只能袖手旁觀。

1961 年河北省滄州地區在遭受颱風襲擊後，大批群眾無精打采地踏上了逃荒之路；路上人們沉默不語，唯一的音響是他們的腳步聲。有時是整個生產隊一起上路——幹部、男人、婦女和兒童，他們在途中用衣服換芋頭吃，結果很多成年人和所有的小孩都衣不蔽體。[25] 全國各地都有人在路邊倒斃。

農村人口外流對當地會有什麼影響呢？在大多數情況下，村民，甚至是村幹部都支持大規模移民，因為他們希望移民的匯款會改善他們的生活。但是城市裏工作容易，工資很高，吃穿不愁之類故事，也無形中傷害了農村裏的士氣。革命畢竟是為了解放農民，現在農村的生活水平卻明顯低於城市。在城市和鄉村間人為築起的屏障，更使農民覺得低人一等；實際上，農村被隔離了，就像麻風病人居住的地方一樣。鄰里間的糾紛，有時是因為招工而起；鄰居家裏有在城市做工的人，會招致嫉妒甚至搶劫。[26] 有些地區本來支持當地人外去移民，但很快就發現本地也處在勞動力短缺的境地：離鄉外出的都是身強力壯，有進取心的年輕人。村子間接二連三的有組織的械鬥，從另一方面耗盡了村子裏能幹活的人。在京包鐵路沿綫的重鎮懷安縣，有一個村莊大約有五十個壯勞力，但 1959 年的春天只有七個人在村裏幹活；

連村長和黨支部書記都出去打工了。[27] 當人們因為饑荒而離開的時候，村子裏能見到的，只有鬼魂和風吹欲倒的弱者。

大躍進的初期，有大量的工作急需人手，一些村幹部會去找外出务工者，試圖勸說他們在農忙的時候返回村裏。很多人依照 1957 年間勞力嚴重短缺時早期移民的模式，越過湖南省界進入湖北打工。[28] 村裏派出一组幹部去找外出的村民，但他們受到了冷遇：移民拒絕回村，因為農村實行食物配給。反過來，移民們把這些幹部交給地方當局，指責他們企圖把人帶回去修水庫。結果這些幹部，而不是移民，被關了起來；在被釋放以後，他們灰溜溜地回了湖南。[29] 其他地方則用了更為巧妙的辦法，以河北衡水為例，1960 年清涼店公社五萬名外出的民工有一半被勸回了農村。幹部讓民工的親屬們寫信懇求他們回村。有時為了保證這些信件能夠到達目的地，當地幹部會親自去送信。[30]

但是，大多數情況下，幹部會使用粗暴的辦法阻止人們外出。我們將在隨後的章節讀到，地方幹部是如何毆打和折磨那些試圖外出的人，或是懲罰其家庭成員的。民兵在農村各個重要路口設立「勸阻站」或「收容遣送站」，抓捕逃出來的人，並把他們送回村裏。這些「勸阻站」或「遣送站」，可以在沒有司法監督和起訴的情況下，任意拘留任何人，即使這些人有臨時居留證：這種專門針對乞丐和民工的制度，今天依然沒有絕跡。在饑荒最嚴重的時候，全國有超過六百個這樣的機構。僅從廣州到哈爾濱的八個城市，在 1961 年春季就抓了超過五萬人。[31] 1960 年，有 38 萬四川人被抓，並遣返原籍。[32]

失去了社會關係所提供的基本保障，帶著僅有的生活必需品，漂流在路上的農民是理想的獵物。根據內務部 1960 年 5 月的報告，山東這些收容遣送站，不僅沒收外出民工的糧票和火車票，而且還把他們吊起來，打得鼻青臉腫。婦女受到調戲。[33] 在甘肅天水，每八個警衛就有一個人承認強姦過女人，毆打被拘留的農民更是家常便飯。為

了改造逃出來的人，甚至成立了特殊的「學校」：拘留的人受到人身侮辱：吐口水，捆綁，強迫長達數小時的下跪或罰站。他們僅有的一點財物被拿走：小刀，雞蛋，麵條，酒，繫襪子和長褲的繩子。婦女在威脅，毆打，和餓死的脅迫下，為看守提供性服務。她們中的許多人被迫為看守們做飯，清洗衣物，打掃廁所，甚至為守衛洗腳。因為沒能給守衛李國倉做好麵條，三個犯人被送入特殊的「學校」，挨了一整天打。[34]

但是無論監獄難民的待遇是多麼的苛刻，他們很少放棄外出，並經常能逃出當局束縛。在被自上海送回蕪湖的途中，75 名農民中 60 人設法逃脫。[35] 一個月後，從天津押解回瀋陽的 250 名難民中有 150 人成功地逃出。他們許多人是黨的官員稱為「慣流」的難民，一次又一次逃離村莊。[36] 出逃的道路可能是痛苦的，但總比在村裏等死好。

1961 年情況開始逆轉：迫於饑荒和農村移民的困擾，和不斷增長的難以供給的城市人口，北京最高領導層決定讓兩千萬城市人下鄉。該命令於 1961 年 6 月 18 日發出，目標是在年底前減少一千萬城市人口，以節約 40 億斤糧食。在 1962 年完成其餘的目標，1963 年收尾。[37]

當局行動迅速。在城市人口從 1957 年的 180 萬人激增到 1961 年的 250 萬人的雲南，約 30 萬人，其中許多是失業者被選定遣送下鄉[38]。其中包括了 3 萬名被安置到農村勞改營的昆明的囚犯[39]。在廣東省，城市裏有近 300 萬人失業，他們中約 60 萬在 1961 年底被送到農村[40]。在有 310 萬城鎮人口的安徽，1957 年後增加了 160 萬人；現在約 60 萬人被迫離開。[41] 到了年底，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宣佈已有 1230 萬人回到農村，1962 年的目標是遣返另外的 780 萬。[42] 最後的事實證明，國家比農民更有韌性，它毫不留情地運用新的方法，維持了未來幾年內城市人口的歷史地位。

一些幸運兒成功地越過國境，但他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在少數民族聚居的雲南，靠近越南、老撾和緬甸的人，在大躍進開始的時

候就用腳投票越過國境；但被抓後的懲罰也非常殘酷。在 1958 年，靠近邊境的地方有 11.5 萬人流亡國外，為的是抗議沒有貿易和行動自由，強迫公社化和強迫參加水利工程。被捕的逃亡者經常遭受毆打。在景洪，一個有女兒的年輕女人被刺死，其他的人被鎖在一個房子裏用炸藥炸死。即使是那些自願回來的人也受到折磨，然後處決；他們被遺棄在路旁，散發出腐屍的臭味。[43] 現在很難獲得逃亡者的準確人數，但根據英國外交部的記載，大約 2 萬名難民於 1958 年抵達緬甸，其中大部份被送回中國。[44] 鑒於許多少數民族在國外都有親戚，逃亡者的總數可能高得多。在南部邊境省份，人們逃往越南。許多人以前只是作走私生意，但是當饑餓變得不堪忍受，他們就仗著熟悉地形，一去不回。[45]

中國有漫長的邊界，越境逃亡是常有的事，特別在 1962 年以前，那時對逃亡者的政策比較溫和。但在新疆，難民的涓涓細流變成了滔滔洪水，5 月間，6.4 萬人先後成群結隊，帶著孩子和微薄的財產，跨越邊境，進入蘇聯。[46] 塔城人口的一半，從幹部到學步兒童，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跨越邊境，身後留下一片荒地。[47] 每天在哈薩克斯坦和中國的邊境綫上，在巴赫塔（Bakhta）和霍爾果斯（Khorgos）的邊境檢查站之間執行巡邏任務的士兵，面對著成千上萬的越境者。許多老弱病殘向蘇聯當局尋求幫助。[48] 蘇聯花了上百萬盧布，為難民提供就業機會和臨時住房。[49] 在伊寧，蘇聯領事館被武裝暴徒侵入，為的是搶有關少數民族的國籍檔案，因為只有那些登記為蘇聯國籍的人才可以入境。混亂隨之而來，糧倉被搶劫，有人向民兵開槍。[50] 根據蘇聯的說法，是地方當局出售邊境車票的謠言造成了混亂。群眾去黨委辦公室要求乘車，有人向他們開槍，有人被打死。[51]

1962 年 5 月，在香港邊境發生了類似的爭相逃跑的事。在整個饑荒中，人們想方設法進入這塊英國殖民地：1959 年的非法移民估計大約三萬人。[52] 除此之外，內地每月發放 1500 個簽證，給老家不再需

要的人。[53] 在 1962 年 5 月間，由於大陸暫時放寬邊境管制，出境的人如洪水一樣，每天達到五千人之多。一夜之間，香港成為東方的自由柏林。人們精心策劃越境出走；他們往往是因為工廠倒閉而剛被送下鄉的青年：面臨嚴重的糧食短缺和社會的拋棄，這些人決定離開。許多人帶著錢，餅乾，罐頭食品和地圖。

廣州的投機者甚至爲此出售被稱為「天堂指針」的簡易羅盤。[54] 火車站上公開銷售到邊境地區的車票。6 月初，暴民和警察發生衝突，軍隊迅速平息了騷亂。[55] 有些幸運兒買到票登上火車，而其他人只能花好幾天沿著海岸長途跋涉。當聚集起來的人數足以制服邊境警衛的時候，他們就開始行動，游過隔著香港和內地的界河，鑽過鐵絲網和邊界柵欄上的鋼絲。事故時有發生。一些難民誤將附近的水庫當成界河，並試圖在夜間游過去：後來在堤壩邊上人們發現漂著的二百具屍體。[56] 另一些人付錢給偷渡的舢舨，其中一些在離香港不遠的小島登陸，而倒霉的人在風浪中溺水身亡。[57] 一旦難民們達到了香港，他們就要逃避英國人的邊境巡邏。大部份人被現場抓獲，但也有少數人躲進山裏；這些人一無所有，衣衫襤褸，大多赤腳而且腳上帶傷。與柏林不同，香港不歡迎難民，因為香港人害怕殖民地被外省人所淹沒。沒有其他國家願意收留他們，美國和加拿大有嚴格的移民配額，連臺灣也只接受少量的移民。[58] 另一方面聯合國的難民機構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難民」這個政治術語根本不存在，因此也不能得到難民署的資助。[59] 就像香港的殖民大臣克勞德·伯吉斯（Claude Burgess）所說的那樣：在難民問題上「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願意和我們分憂」[60]。只有那些得到香港親屬擔保的難民，才被允許留下來，絕大多數人最終被送回了大陸。人群同情難民的困境，提供食物和庇護所，或是阻擋送他們返回羅湖邊境檢查站的車子。6 月，中國再次關閉了邊境，進入香港的人流突然停止了，快得就像它突然放開一樣。

第五篇

弱勢群體

28
兒童

1958 夏天，各地都開辦了公社托兒所和幼兒園，以便讓婦女們走出家庭，全心投入大躍進。父母響應祖國號召，與自己的孩子分開，整日不見面，有時長達數星期，這一來問題立刻凸現。在農村，退休老太太和未婚女孩匆匆接受幾堂幼兒護理課程之後，馬上去面對無數蹣跚學步的孩童，根本無法勝任。當時，工業化如火如荼，勞動力空前匱乏，即使這些保育員，也要被迫到田間或工廠勞作，留下孩子們幾乎無人看管。園內的房舍也是搖搖欲墜。有些托兒所連像樣的房子都沒有，只是一間泥瓦房或者廢棄的工棚湊合著，任由孩子滿地跑[1]。北京郊區的大興縣，475 所寄宿幼兒園中，僅有 12 所勉強配備了基本設施，大多數孩子都是在地板上吃飯睡覺。不少房舍屋頂漏水，有的則只有門窗而已。由於保育員只接受過粗略培訓，事故時有發生，比如小孩撞上沸水壺而被燙傷。孩子嚴重缺乏照顧，在某所幼兒園，幾個三四歲大的孩子甚至不會走路。在北京以外的郊區，三分之一的幼兒園被婦聯形容為「落後」[2]。即便在北京，條件也是簡陋得可憐。托兒所裏沒人不哭的，有篇報道說：孩子們因被迫離家而嚎啕，年輕的保育員手足無措，自己也哭了起來，最後是那些不忍心將子女托付給政府的母親們，也忍不住傷心掉淚。[3]

孩子太多，不稱職的保育員必然會用體罰的形式逼迫他們聽話。這在城市裏也很常見，最極端的例子是一個女教員用熾熱的熨斗懲罰調皮的孩子，燙傷了一個三歲幼童的胳膊。[4] 護理不善，設施殘破，還導致疾病叢生。食具是公用的，生病的孩子如果不被隔離，就會使

病菌在整個園內繁衍。上海的條件相對而言已經像天堂一樣，即使在那裏，幼童的褲子上也是終日沾著糞便。[5] 在北京，疾病感染率很高。在第二棉紡織廠，90% 的兒童生病，多半是痲疹和水痘，疥瘡和消化道寄生蟲也很普遍。死亡率頗高。[6] 在郊區，蒼蠅成群，幼兒園瀰漫著尿騷臭。食物中毒頻頻發生，大批兒童致死。五個中有四個腹瀉，許多孩子同時患佝僂症。[7] 隨著饑荒的蔓延，水腫成了常見病，全身都腫了起來。在南京，幼兒園三分之二的孩子都有水腫；許多還患有沙眼和肝炎。[8]

虐童現象十分普遍。幼兒園裏的食物經常被偷，大人變得冷酷，偷走本該屬於可憐的孩子的口糧。廣州有四分之三的幼兒園都存在這種情況，要麼明目張膽拿走，要麼不定期地偷偷竊取。[9] 在南京一家幼兒園，所有配給的肉和肥皂，都被院長李大繞拿回家。該市的另一家幼兒園，全部的肉和糖被員工瓜分掉。[10] 在農村，虐童更普遍，但少有記載。1960 年 11 月中，在湖北蘄春縣，每天都有一到兩名嬰幼兒死亡：幼兒園的工作人員幾乎吃掉了全部食物。[11] 後來情況越來越混亂，政府撒手不管，幼兒園乾脆關閉，農民們各自抱走自己的孩子。只舉一個例子，僅 1961 年，廣東的幼兒園的數量從三萬五千所驟減到五千四百所。[12]

孩子到了上學年齡就被強制勞動。1957 年秋，中央政府出臺一項勤工儉學計劃，要求所有學生參加生產勞動，有些學生實際上一半在校時間都在勞動。而此時大躍進甚至還沒有開始。[13] 1958 年秋全國開始大煉鋼鐵，兒童不僅要撿鐵塊和碎磚，甚至要操作煉鋼爐。有些孩子因為在烈焰熾烤下長時間連續工作而昏倒。在工業化的浪潮中，僅僅在武漢的幾百個小學裏，每所學校就有好幾個廠房。孩子整日待在校舍裏，住宿條件極為敝陋，有的三個人擠在一張牀上，睡在漏雨的房子裏。教學常常停滯達數週，因為當時集體化生產才是工業發展的重心。憂慮的父母別無選擇，只好半夜溜進學校去，看看孩子的情況

如何。後來出現了消極抵抗。[14] 1959 年早期，有些學生只參加正常課程，逃避生產勞動；有些乾脆輟學。[15] 在南京，許多輟學的孩子就待在家裏，但有四分之一去工廠工作，也有被警察抓差做事的。[16]

學齡兒童必須參加生產勞動，但往往得不到足夠的安全保障。事故頻繁發生，大躍進期間成百兒童死去。在甘肅挖運河時，一處堤壩坍塌，七名學生喪生。在山東，八名學生在一處廢窯勞動，一堵牆倒下，奪去了他們的性命。[17]

在農村，多數兒童根本無福上學。他們要在田間耕種，要挑肥，放牛，為食堂撿柴。除此之外，他們還要按照習俗，做份內的事，因為窮人家的孩子通常都要承擔家務。集體化更加重了他們的負擔。在大集體裏，勞動力不再屬於個人或者他的家庭，而成為集體資產。把孩子呼來喝去的，不再是他們的父母，而是當地幹部。這些孩子們被當做成人使喚。十三歲的女孩唐素群一次得挑 83 斤重的青草到田裏做綠肥。而一個十四歲的男孩子則要擔 100 斤的肥料。[18]

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變得赤裸裸。整個國家都是這樣。由於到處食物匱乏，身強力壯的勞動者得到優遇，而那些被認為不會勞動的人——兒童、病弱和老人——則遭到虐待。黨的檔案中的相關記載，長篇累牘，不忍卒讀。廣東一個十三歲放鴨子的男孩艾龍在挖樹根充饑時被抓。他被強制「坐飛機」，潑大糞，在指甲縫裏插竹籤。這場毒打造成他終身殘疾。[19] 在廣東羅定縣，當地幹部曲本第把一個偷了一捧米的八歲幼童活活打死。[20] 在湖南，十二歲譚雲清因為從食堂偷食物，被人們像一隻小狗一樣溺死在池塘裏。[21] 有時候孩子的父母被迫參與懲罰。在同一個村子，一個男孩子偷了一把稻穀，當地幹部熊長明逼著他父親將其活埋。幾日後，父親也活活氣死了。[22]

在孩子身上實施報復，也是集體懲罰的手段之一。獨自撫養三個孩子的郭煥生，要求請假送五歲的兒子去醫院，但未能獲准。這位固執的母親，不經允許，獨自跑到廣州，但她兒子還是死在醫院裏。當

她缺勤十天後返回家時，發現她的另外兩個孩子已經被全村人遺棄。他們全身沾滿糞便，肛門和腋窩爬著蛆蟲，很快就死去了。幹部何黎明這時出現在她家，將房門敲得山響，譴責她是逃跑份子。於是她瘋了【23】。在長沙附近的廖家村，一個家長丟下兩個孩子逃到城裏。當地幹部把這兩個孩子鎖在屋子裏，幾天後餓死。【24】

調皮的孩子也會被鎖起來。在亞熱帶的廣東省，孩子們就因為開會時聊天，而被關在豬圈裏。【25】在貴州水城縣，警察也參與其中，把只偷了一點點食物的七到十歲的孩子關進監獄。有個十一歲孩子因為偷了一公斤玉米被關了八個月。【26】各縣建起大型勞動改造場所，專為對付被認為是不可救藥的小孩子。在上海奉賢縣，大約二百名六到十歲的孩子，被送進由公安局管理的勞動營，體罰包括：挨踢、罰站、罰跪、在手掌裏扎針等；有的被戴上手銬。【27】

壓力還來自家庭內部。如果家長忙於在田間工作或者臥病在牀，就得靠孩子去食堂領取分配的口糧，他們有可能要跑到數公里之外。這些孩子——有的只有四歲——要在食堂被大人推來搡去，然後把食物捧回家。這絕不容易，很多被訪者直到今天還能清楚地回憶起來曾經有那麼一兩次讓家人多麼失望。丁橋兒當年只有八歲，卻要照顧全家，因為她父親生病，母親患腎結石，又纏了腳。所以不能為公社工作掙工分。小姑娘每天都要在食堂排一個小時隊，不時被大人推搡欺負。全家都指靠她領來的一碗薄粥度日。但是有一天，剛下過大雨，這個瘦弱的小女孩回家的路上跌了一跤，把碗裏的食物都灑了。「我哭了，但我馬上想起來爸媽和全家人都在等我回來帶東西給他們吃。於是我就爬起來，從地上把吃的捧起來，已經沾滿沙子。」她父母很生氣，責罵她把全家人的糧食都浪費了。「但最後他們還是吃掉了，吃得很慢，因為都是沙子。如果他們不吃的話，恐怕就要餓瘋了。」【28】

孩子們因為爭搶食物打架。儘管給全家人領食物的是巧兒，有時候她父母還是會把她和她妹妹的食物拿走給她的兄弟吃。她們抗議、

哭泣，有時候甚至互相扭打。劉叔是在四川仁壽縣長大的，他也記得他弟弟總是先把自己的飯碗裝滿，一點也不留給其他人。「每次吃飯，他總是大聲尖叫，每次都這樣。所以他經常挨打。」[29] 李二姐養了三個小孩，她回憶說她的兩個兒子每天都為吃飯打架。「他們打得很凶。我最小的女兒哭著要最多的那一份，分到口的卻最少。她就大哭，不願意。我其他兩個兒子罵她，他們到現在還記得。」[30]

面對匱乏的食物，一家人成了對頭，孩子們面臨的暴力遠遠不止打架而已。[31] 關於此問題沒有確切資料，但警方的報告能大致說明面對饑餓親人間的關係會變得多麼殘酷。在饑荒期間的南京，每個月發生大約兩起家庭謀殺案。大多是男人殺死女人和兒童，也有五分之一的受害者是老人。殺人動機大多數是因為受害者已經成為負擔。在六合，一名癱瘓的女孩被父母扔進水塘。在江浦，一個八歲的啞巴孩子（可能還有點智力障礙）總是偷父母和鄰居的東西，給家人帶來麻煩：他在半夜被扼死。還有幾例案件是有意餓死家裏的弱小者。比如王久常，總是把他八歲女兒的口糧吃掉。他還在大冬天拿走她的棉襖和棉褲。最終小女孩死於饑寒交迫。[32]

在鄉下，家裏人養不起孩子，就把他們賣掉或丟掉，這已經成為風氣，共產黨也無能為力。在河北內邱縣，陳振元實在無力養活一家六口，把他四歲的兒子送給村民。他七歲的孩子被送給了鄰縣的叔叔。[33] 成都的李二姐把三個女兒中的一個送給了姐姐。但那家並不喜歡這個孩子。婆婆很凶，公然護著自己的孫子。她抱怨說：「我們自己的飯都不夠吃，為什麼還要多養一個小畜生？」她把分給這女孩的口糧拿走。只有四歲的女孩每天被派去食堂領蔬菜，在長長的隊伍裏被大人拖來拽去，經常因饑餓而昏倒。她被寄養的人家虐待，幾個月後，親生母親把她領回去時，全身長滿了虱子。[34]

遭受饑餓的農村家庭很少願意接受一張多餘的嘴吃飯，所以許多人遺棄了他們的孩子。有些家庭千方百計衝破農村和城市的界限，把

孩子丟在城市裏，這些孩子算是幸運的。1959 年在南京被丟棄的兒童達二千多名，是共產黨統治之後大躍進之前的十年中棄兒總數的四倍。其中十分之六是女孩，三分之一的孩子是三歲或稍大；許多是病童，有些是盲童或患有其他殘疾。從那些能開口說話的孩子的口音判斷，多數來自安徽，其他來自南京附近的農村。一些家庭面對公社幹部的質詢，給出最振振有詞的理由是有關公社化的理論。一些村民套用官方的宣傳口徑，說因爲「孩子是政府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有烏托邦幻想，以爲在農村之外，在城市的高牆後面，富足而幸福。農村中有一種普遍說法，就是孩子「進城過好日子」了，好像從此就會錦衣玉食。

但在這些理由背後隱藏著更為悲慘的故事，例如有個叫石榴紅的十三歲男孩。他從滬江的農村坐著牛車翻山，又累又餓，就在路邊睡著了。醒來後發現他的媽媽已經離他而去。這是諸多「丟」小孩的方法之一。「丟」這個詞就是「遺棄」的隱晦說法。有個十三歲的女孩說，她父親三年前死了，村子裏沒東西吃。他媽媽最初把十四歲的盲哥哥「弄丟」了；接著小弟弟和妹妹也在山裏被丟掉了，最後輪到了她。[35]

和最後一個例子不同，通常是幾個孩子同時被遺棄，可能父母希望他們會互相照顧。在南京的街頭有個小女孩哭著找媽媽，手裏牽著另外兩個更小的孩子。將兄弟姐妹同時遺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從農村來的婦女迫於饑餓和生活的壓力，「改嫁」給城裏的男人，但對方不歡迎那些孩子。[36] 有些孩子的衣服上別著一片紙，寫著他們的出生日期，有的是口袋裏裝了一張條子。還有個別走投無路的母親，直接將他們的孩子送到警察局。[37]

沒有確切數字表明究竟有多少孩子被丟棄。僅僅在南京，一年中就有幾千名。[38] 1959 年夏，在湖北的省會武漢，每天相關部門總要撿到四五名孩童。1961 年夏，全省有大約 21000 名兒童被送進政府辦的孤兒院，不在記錄上的數字比這個多。[39]

但大多數情況下，父母把孩子留在身邊直到最後一刻。整個農村，數不清的村子裏，都能看到食不果腹的孩子們，肚子浮腫，四肢像蘆稈，細細的脖子上晃蕩著大大的腦袋，他們被留在農舍裏、空曠的田間或者塵土飛揚的路邊，直到死去。在河北靜海縣，四五歲的孩子還不會走路，會走路的孩子大冬天披著件沒有襯裏的褂子，光著腳走在雪地裏。[40] 即使在石家莊這樣的城市裏，有一半新生兒夭折，因為母親沒有奶餵養。[41] 有的地方，死亡的幾乎都是兒童。廣東瓊海的一個小村莊，1958-1959 年的冬春有 57 人（約佔總人口十分之一）死去：其中 41 名是嬰兒，6 名是老人。[42]

然而也有不可思議的例子，有時只有兒童存活下來。在四川，大約有 0.3% 到 0.5% 的農村人口是孤兒，也就是說，大約 18 萬到 20 萬名兒童失去了雙親。他們穿著破舊的衣衫，成群結隊在村子裏遊蕩，蓬頭垢面，自己養活自己——多數人靠偷竊。無依無靠的孩童很容易被掠奪，他們的監護人和鄰居會搶走他們身上僅有的物品——杯子、鞋子、毯子和衣服。十一歲的女孩高玉華被親戚奪走了身上的一切，而後被他們丟棄。她睡在乾草上，只有一塊纏腰布，靠石磨碾碎的生穀粒充饑，活了下來。一個調查小組形容她像石器時代的「野人孩」[43]。十二歲的向清平被涪陵的一個貧窮村民收養，但他對鄰居哭訴道這人虐待他，讓他吃泥巴，還打他的頭。這個縣還有個孤兒，因為在田裏偷東西，被憤怒的村民抓住打斷了脊椎。[44] 許多例子表明，活下來的兄弟姊妹往往並不和睦。其中有個七歲男孩江老三，被十六歲的哥哥毆打並搶走了身上的東西，在父母雙亡之後不出幾個月也死去了。[45]

有的孤兒顯示出超乎尋常的適應力，例如趙小白。這是個說話輕聲細語的女子，眼神哀傷。大躍進開始前幾年，他們全家離開河南老家，響應號召，遷到甘肅定居。父親被派到山上破冰，1959 年餓死了。母親重病，不能勞動。有個當地幹部來到家中，叫囂說不勞動者不得食。還有個地痞晚上闖進來，糾纏她母親意圖不軌。最後，疲憊的母

親實在受不了。1960 年 1 月一個寒冷徹骨的晚上，她起牀去廁所。當時 11 歲的小白醒來，問媽媽幹什麼。接著又睡著了。兩個小時之後她母親還在廁所裏。「我大聲叫她，但她不回答。她就坐在那裏，頭歪在一邊，什麼也不說。」

週圍都是說著聽不懂的方言的當地人。後來，趙和六歲的妹妹住在一個叔叔那裏，他也是遷到甘肅的。「他對我還可以，因為我已經大了，可以出去幹活。但他對我妹妹很不好。你知道甘肅很冷，零下 20 度。他讓我妹妹大冷天出去撿柴火。她怎麼找得到？有一天，實在是太冷了，她空著手回來。於是他就打她的頭，流了很多血。」為了讓妹妹逃離叔叔的虐待，趙幹活的時候就把六歲的妹妹帶在身邊。她像個大人一樣挖渠、耕地。但即便在外面也不太平。「有一次，我正在幹活，聽見妹妹在哭，我看見有人打她。有人拿沙球扔她，她身邊都是沙塊。眼睛都被粗砂迷住了，哭個不停。」趙找到一對打算回河南的夫妻。她把身上的東西都賣了，花十塊錢買了兩張票。最終回到河南老家，找到外婆，才算有人保護小姐妹倆。當趙小白被問起她怎麼會成為今天這樣的性格，她毫不猶豫地回答：「因為受苦。」【46】

有些孩子根本找不到人照顧，被送到孤兒院。可想而知，那裏的情況駭人聽聞。體罰是常有的，例如，在四川墊江縣一個公社，十二個孩子死在照管者手裏。【47】在湖北，孤兒們住在到處漏水的危房裏，大冬天沒有棉衣棉被。根本沒有醫療。幾千個孩子病死。【48】

* * *

大饑荒期間，嬰兒的夭折率高得可怕，但同時，出生率也低得驚人。人口統計專家根據 1953、1964、1982 年公佈的人口普查數據，試圖拼湊出饑荒年代出生率下降的概況。但更為可靠的數據可以在檔案中找到，因為計劃經濟體制下，當局必須掌握人口數字。雲南曲靖地區，饑荒是 1958 年開始的，出生人口從 1957 年的 106000 降到次年

的 59000。整個雲南省的出生人數從 1957 年的 678000 跌到 1958 年的 450000。[49]

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研究這個問題，即分析饑荒之後整理的與年齡有關的數據。湖南是受災不算太嚴重的省份，1964 年三歲（即 1961 年出生）的孩子中間有一條明顯的界限：數目比六歲孩子少了六十萬。當然六歲孩子也經歷了饑荒。另一方面，一歲的孩子比這數目多四倍，不到一歲的也多四倍。[50] 不過這些記錄下來的數字都沒有包括那些才出生不久就夭折的嬰兒：那些早夭的、根本沒有被記錄下來的孩子們，統計他們的總數有什麼意義呢？

29
婦女

集體化的目的之一是為了將婦女從男權下解放出來，事實卻是相反，她們的境遇沒有改善而是惡化了。全國各地，生產方式各不相同，不過大躍進之前，大多數北方婦女很少在地裏勞動。即使在南方，也只有窮人家的婦女和男人一起下田幹活。女人從事家務，做其他的營生，連小孩也要出力，在空閑時候做手工活，補貼家用。有時候整個村子專門從事某種特定商品的生產，在當地市場上出賣，比如紙傘、布鞋、綢帽、籐椅、柳條籃、細籐筐等等，都是在家裏做的，不存在什麼安全生產之類的事故。[1] 即使在閉塞的村落裏，按照風俗，婦女也是在家做活，編織、紡紗、刺繡，既自用，也出售。

在跑步進入現代化的號召下，從來不下地幹活的婦女也被動員起來，要求她們每天聽到喇叭就出門，跟男子一起，去犁地、播種、翻耕、除草、揚穀。但是，儘管全力投入公社勞動，婦女拿到的報酬總是比男人少，無論她們多麼辛苦。公社的工分制度，實際上是系統地剝削婦女的制度，因為只有強壯的男人才能拿到高分。婦女在外參加了集體勞動，但政府並沒有因此減輕她們的家務負擔，從補衣服到帶孩子，家務事一點也沒有少，還是要做。本來應該由幼兒園幫助照料孩子，但我們已經知道，許多幼兒園根本不起作用，所以母親們經常在全職幹活之餘，還要分身看護孩子。[2] 每個家庭還要投入一波接一波的運動，動員令一下，婦女就倒了霉，其實大饑荒開始之前她們已經筋疲力盡。有些村子，壯年男人全進城了，留下婦女在村裏，又幹農活，又照看老幼病殘。

婦女處於弱勢。在那個幹集體活才有飯吃的殘酷年代，弱者只有挨餓。為了力爭上游，人們連憐憫心都沒有了。在煉鋼、耕地和生產的時候，婦女來月經被視為缺陷。月經在宗教中通常是忌諱的，認為經期的婦女不潔。但這觀念似乎一夜之間被摒棄。不出工就受罰，最常見的懲罰措施，就是請假必扣工分。有些男幹部濫用職權，羞辱那些請例假的女子。湖南成東人民公社的黨支部書記徐英傑，強迫那些因來月經而要求休息的婦女脫下褲子接受檢查。很少人願意被羞辱，不少人因此病倒，有人還因為過度疲憊，同時承受痛經或患婦科病而死去。[3] 懷孕的婦女也要被迫勞動，常常是幹到分娩之前，但照樣會受到懲罰。僅在四川某地，就有 24 名婦女因被迫到田裏勞動而流產。有個叫陳遠明的女社員提出抗議，帶隊的幹部區主任林蔚松就朝她下身猛踢，直至流血，最後終身殘疾。[4]

有的地方幹部一手遮天，處罰更為嚴苛。上面提到的湖南同一個公社，懷孕而不參加勞動的婦女，要被迫在數九寒天脫光衣服下水破冰。[5]在廣東清遠，上百名村民被迫全體參加勞動，大冬天不穿棉衣；懷孕婦女和剛生產的婦女也不例外，誰要是反抗，就不給飯吃。[6] 廣州郊區的番禺，幹部認為女社員杜金好怠工，她已經懷孕七個月，幹部抓住她頭髮，逼她下地，還要她不停地承認錯誤，經受辱罵，直到昏厥過去。她丈夫嚇得直哭，但無能為力。她醒來後，一臉茫然，掙扎著走回家，腿一軟，倒在地上，死了。[7] 有的女性走投無路，寧可一死。有個叫梁霞女的懷孕女子，被迫在冬天勞動，最後跳河自盡。[8]

因為疲憊和饑餓，婦女身體虛弱，甚至停經。這在各地都很常見，就算有醫療待遇的城市婦女也不例外。北京城南天橋，有家冶金廠，一半的女工患有閉經、陰道炎或子宮下垂等婦科病。因為唯一的一間浴室總是人滿為患，許多婦女幾個月不洗澡。長時間在通風不暢的環境下工作，連袁變花這樣的政治上的積極份子都咯了血，有時站都站不起來。[9] 婦聯的調查也有類似報告。例如，在北京電子管廠，

6600 名婦女中有一半患有各種婦科疾病。25 歲的吳玉芳，1956 年進廠時是一個健康年輕的姑娘，1961 年的她常常頭痛，月經不調，失眠、易怒、無力。結婚五年依然沒有孩子——檢查發現她和其他許多工人一樣，得了水銀中毒。[10]

農村婦女的健康也受到嚴重損害，許多人子宮下垂。子宮通常是由肌肉和韌帶支撐在骨盆中，患者的子宮則下垂到陰道處。即便不是因為疲勞過度或者饑餓，身體虛弱也會導致子宮從正常位置下陷或下滑。當婦女難產或者雌激素停止分泌時，就會出現這種情況。這種病症分為不同程度，輕者子宮頸下垂，重者整個子宮從陰道露出：醫學方面已經多次發現後一種病例。他們提供的統計數字——即便是分門別類——也無法反映事實，在上海近郊的農村患病率是 3% 到 4%，在湖南每五名女工中就有一例。[11] 實際患病率遠高於統計，因為許多婦女羞於求醫；多數幹部也不願報道饑餓導致的疾病；另外，鄉村醫生水平有限，根本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

子宮下垂很難治癒，因為是缺乏食物和休息引起的，這在饑荒年代無法解決。許多婦女就算有錢求醫，也不能拋開孩子，停止工作，大老遠跑到為數不多的醫院去。不少村民怕醫院，她們寧可用土辦法。湖北的傳統「女郎中」，有不少祖傳方法治療婦科病，把各種配方加熱磨成粉，敷在陰道壁上，用草藥醫治月經不調。王阿姨在鐘祥縣很出名，治療了上百名婦女。她丈夫出門到林子裏收集樹葉樹根做飼料時，她的家經常住四五個病人，直到康復為止。[12] 但這種傳統的救治方法，在當時強制公社化的形勢下，是官方難以容忍的。因為缺乏有效的治療，許多婦女只能帶病幹活。

* * *

婦女在其他方面也處於劣勢。畢竟這是一個嚴酷的、男性主導的世界，婦女在社會中被邊緣化，很容易受到性虐待。當地幹部無法無天，饑荒也敗壞了社會道德標準，這二者加起來還不算，由於男子

離鄉進城、參軍、或者到很遠的地方參與灌溉工程，導致夫妻分居兩地，甚至家庭破裂。由於社會各個層面對婦女的保護都在瓦解，面對當地惡棍赤裸裸的欺凌，她們簡直毫無防衛能力。

強姦也像傳染病一樣，在這塊世風日下的國土上蔓延。僅舉幾個例子說明。廣州北部翁城公社的兩名黨委書記，1960 年強姦了 34 名婦女。[13] 河北衡水縣三名縣委書記書和一名副縣長，經常對女性進行性侵犯，其中一人與幾十名婦女發生性關係。[14] 賈家營村一名支書強姦了 27 名女性，調查表明，他對村裏幾乎每一位未婚婦女都「為所欲為」。[15] 曲陌的書記李登民，強姦了大約二十名婦女，有兩名尚未成年。[16] 在湖南耒陽，連十一二歲的女孩子都遭受性侵犯。[17] 在湘潭，一個幹部把十名女孩組織一支「專業隊」，供他發洩獸慾。[18]

即便沒有被強姦，女性也會受到跟性有關的羞辱。男女有別，舉止禮節，諸如此類的傳統道德被公社化拋棄了。中國正在革命，代代相傳的行爲道德規範被顛覆，導致了在 1949 年之前無法想象的各種變態。湖南武岡縣一個工廠的領導，逼迫婦女赤身裸體工作。僅 1958 年 11 月的一天之內，就有三百多名婦女一絲不掛地幹活。誰不服從就綁起來。甚至還發明了競爭機制，最樂意脫衣服的婦女有獎，最高獎五十元人民幣，相當於一個月的工資。有人願意利用這種機會得到提拔，也有人反感，但沒人敢說，不過少數人敢寫。一些婦女病倒後——湖南的冬天寒冷刺骨——一系列匿名信寄到毛澤東那裏。他是否讀了信，我們不得而知，但某位北京高官打電話給長沙省委，要求調查清楚。在調查過程中事件逐漸明朗：工廠領導顯然是在「反封建」的宗旨下「鼓勵」婦女們以「趕超精神」脫掉衣服[19]。似乎在解放的名義下，幹什麼勾當都是依法治國。

同樣下流不堪的還有裸體遊街，南北都有：命令婦女一絲不掛在村子裏走，極少時候也命令男子。浙江遂昌縣，偷東西的男女被剝光遊街。六十歲的周莫英已經是祖母，被迫脫光，敲著鑼走在隊伍前

面，村民求情也無濟於事[20]。這些被羞辱的婦女無顏回家。二十四歲的朱任皎因為偷了幾個小錢，被脫光遊街，事後覺得沒臉見人，要求搬家到另一個村子，要求被拒後，便自殺了[21]。在廣東的一個小村子，民兵將兩個年輕女人綁在樹上，用手電筒照其中一個女子的私處，還在另一個人身上畫了一隻大烏龜——代表男性生殖器。兩個人都自盡了。[22]

另一個現象在檔案和採訪中極少提到，但在饑荒時期很突出，就是性交易。女人可以用自己交換任何東西，一口飯，一份好一點的工作，或者一個能為她帶來些許安全感的男人，與他保持固定的但不合法的關係。很多這樣的交易都是秘密進行，但也有從事賣淫的地下集團，這是當局試圖監控的。成都一個勞教所關了一百多個妓女和女少年犯。其中十多個是 1949 年共產黨勝利後接受過「再教育」的，但拒絕自我改造。綽號「老娘」的王慶芝，介紹其他婦女入行。有些新加入的性工作者和男性竊賊結成團夥，在全國遊蕩，到西安、北京和天津尋找生計。少數是單幹，有些甚至定期給父母交錢，父母對錢的來源也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23]

農村婦女逃到城市之後，也會出賣自己換取食物，這我們已經知道。性交易進一步還會導致重婚。有的農村女孩為了在城裏找丈夫，謊報自己年齡或者隱瞞自己婚姻狀況。她們中間有的只有十五六歲，遠遠不到法定成婚年齡。有一些已婚婦女為了生存而重婚。少數婦女會遺棄與前夫所生的孩子，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會捨掉從前的家庭：有人在婚後一些日子又回來了。[24]

在農村更普遍的情況是利用假結婚掩蓋性交易的真相。河北一個農村做過仔細調查，1960 年，饑荒最嚴重的一年，新婚夫婦增加了七倍。逃荒的婦女湧入村子，結婚是為了交換貨品、衣服、或者給親人換食物。有的只有十六歲，另外有人結婚後不久就離開了。有些婦女還會給同一丈夫介紹其他對象，因此出現了六起重婚案件。[25]

還有販賣婦女。例如在內蒙古，販賣婦女的團夥每個月都從全國各地運回上百名婦女。大多來自饑荒嚴重的甘肅，少數來自山東。有的還只是孩子，也有寡婦，還有已婚婦女。被販賣的婦女來自各個階層：學生、教師甚至還有幹部。沒有人是自願的，有的被賣過好幾次。六個村子裏，不到半年，就買進了 55 名婦女。[26]

* * *

婦女被邊緣化，被羞辱，不能倖免地疲於勞作，常被男人遺棄。最後，還有最痛苦的決定，即如何在家庭內部分配那一丁點兒食物。饑荒前，男人通常說了算，男人第一個吃。在集體化生產中，婦女被有系統地壓低工分。在男權社會中，要優先保證家中的男性成員吃飽。在男人號令、女人服從的文化中，即使在平常日子，分給女人的食物也是較少的一份。當需要男人出門幹活養活全家時，這樣做也有道理。但一旦男人不在，主婦面對饑餓的孩子無能為力，一星半點的食物如何分配，就成爲痛苦的抉擇。劉溪流因病不能工作，被罰六天不給飯吃，最後實在餓得受不了，吞掉了她孩子的那份飯。小孩哭了。她自己也無法忍受折磨，服毒自殺了。[27]

這樣巨大的精神壓力和肉體痛苦，日常生活中的不平等更不待言，都是性別歧視直接導致的。但歷史學家研究發現，在其他許多更惡劣的男權社會裏，無論記錄中的死亡率有多驚人，婦女的死亡人數並不比男性高很多。在孟加拉大饑荒中，男子的死亡人數甚至超過女性，因此歷史學家 Michelle McAlpin 這麼說：「在饑荒時期的考驗下，女性的承受力比男性更強。[28]」從前面的章節可以瞭解，女性善於在夾縫裏尋找生存的辦法，例如在樹林裏尋找果腹的東西，例如在黑市上交易。饑荒最大的受害者始終是孩子和老人。

30
老人

中國農村的生存條件一直很惡劣。共產黨統治之前，也只有最富裕的人家才有條件嚴格執行傳統孝道，普通人家根本做不到。「九個兒子廿三孫，扛起鋤頭自挖墳」[1]。這諺語就能說明傳統社會對老人的尊重不過如此。雖說養兒防老，老人們還是大多依靠自己維持簡陋的生活。年高德劭，應該獲得尊重，但當一個社會只看重勞動力時，對老人的敬意也就相應貶值。所有的老人都害怕孤獨、貧窮和遺棄，尤其是那些沒有家庭的老人，更加憂懼。但 1949 年之前，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還是能夠得到一定的照顧和尊重：生存下來本身就值得尊敬。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佔據了統治地位，年輕學生迫害他們的教師，紅衛兵欺壓老人。道德觀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被顛覆的？經過幾十年殘酷戰爭和無數次清肅運動的共產黨，始終在為暴力文化推波助瀾，但真正的分水嶺是大躍進。正如麻城的村民所抱怨的那樣，人民公社讓孩子沒了娘，媳婦離開郎，老人再沒有親人可指望[2]：為了捨小家、愛國家，上述三種家庭關係因此破裂。不止如此，公社化之後緊接著是饑荒。饑餓侵蝕著這個已然岌岌可危的社會體系，家庭聯繫進一步瓦解，是饑餓在考驗著社會的底線。

沒有孩子的老人的境遇十分悲慘，所以按照傳統的做法，無子女老人有的出家做和尚或者尼姑，有的收養孩子防老。公社化使多年的風俗蕩然無存。1958 年夏天，中國農村到處建立起敬老院，專門收養無兒無女的老人；大躍進最火熱的時候，據報道說敬老院超過了十萬個。[3]

虐待老人是常見現象。毆打他們，搶走僅有的財物，有意不給飯吃。在北京市郊的通州，敬老院院長把配給老人的食物和衣物佔為己有，整院的老人沒有暖氣和棉衣過冬。許多老人在霜降的時候凍死了，一週之後才下葬[4]。在南方，廣東瓊海縣，青壯年都被徵募到遠處參加水利工程，剩下的老弱病殘都被迫下地。老人整日勞役，有個七十歲的老人整整十天都沒有睡覺。1958-1959 年的冬春，十分之一的村民死去，大多數是兒童和敬老院的老人[5]。四川重慶一所敬老院的院長，要老人每天工作九小時，晚上還得學習兩小時。在另一個地方，為了響應「備戰」號召，老人晚上也被迫勞動。如想休息，就要被綁起來挨打，不給飯吃。在河南，老人也經常被綁起來打[6]。成都一家敬老院裏的老人睡在泥濘的地上：他們沒有被子，沒有棉衣、棉帽和棉鞋[7]。湖南衡陽的一家敬老院，院長和幹部把留給老人的藥品、雞蛋和肉都剋扣下來。連廚子都毫無憐憫地說：「給你們吃幹什麼，給豬吃還長塊肉！」饑荒結束時，整個湖南省只剩七家敬老院，僅有 1058 位老人活下來。[8]

許多敬老院剛建立就倒閉了，原因就和幼兒園遇到的問題一樣：缺乏資金、負責人腐敗，都是制度性問題。1958-1959 年的冬春，這些沒有子女的老人，又失去了政府的照顧，只能掙扎求生。但離開敬老院的日子同樣不好過。因為食堂按照工分分配食物，孩子們都要像大人一樣幹活，老人也不得不為集體做貢獻。饑餓不僅僅是缺乏食物的問題，還是如何分配的問題：面對匱乏的食物和同樣匱乏的勞力，當地幹部常常為了節省食物而犧牲不能幹活的人，那些勞動力價值小的人實際上就被慢性餓死。簡單說，老人可有可無。孩子們一不小心就會受到處罰，老人也一樣，對他們的紀律和懲罰十分嚴苛，有時候他的家人也不能倖免。湖南瀏陽有位 78 歲的老人因為抱怨晚上上山幹活而被拘留，幹部命令他女兒打他。女兒不願意，也被打得血淋淋的，還強迫她往遍體鱗傷的老父親身上吐口水。老人不久就死去了。[9]

有家庭的老人，生活好壞全憑子女是否孝順。饑荒時代各種爭吵都會升級，親人的關係也變了。蔣桂花記得，母親跟外婆相處不好，她外公有殘疾。兩位老人都要靠人餵飯、穿衣服、上廁所。做這些事的是蔣桂花，因為母親總是發脾氣，還不情願給他們飯吃。桂花也沒有辦法。不久兩位老人因為吃泥土死掉。沒有棺材入殮，只用草蓆裹了一下，草草挖了個淺坑掩埋。【10】

到後來，農村裏絕望的人們紛紛離家逃荒，只剩下不能走路的老人和殘疾人。在湖北當陽，一個曾經生機勃勃熱熱鬧鬧的村子，只剩下七個人，全是老人，其中兩個還是瞎子，一個殘廢。他們靠吃樹葉為生。【11】

第六篇

死因

31
事故

生產不安全是計劃經濟的通病，儘管有詳盡的勞動立法和細密的操作規程，從提供保護性服裝，到確定照明標準等等。工會、婦聯、共青團、衛生部和勞動部等，都得派員定期到車間巡視安全生產狀況和工人的生活條件。他們這麼做是出自強大的政治壓力，本來寧可對普遍的虐工現象不聞不問，但比較嚴重的事件會記錄在案。然而，廠長和幹部們狂熱地追求產量的不斷增長，即使有龐大的監管部門，即使有些幹部個人對工人十分同情，也改變不了這個大趨勢。

狂熱份子和游手好閑者在整個運動中佔了主流。黨的積極份子急於求成，降低標準，無視安全，為了達到更高的產量定額，每一名工人，每一台機器，都在無休止地運轉。普通的工人和農民試圖抵抗一波又一波的運動。但冷漠和漏洞普遍存在，不僅上面放鬆了警惕，也讓所有勞動者的安全意識普遍變得淡漠。只要不是和自己直接相關，就可以不負責任。隨著集體化的進程，人們缺衣少食，沒有燃料，但求自保，不管可能造成什麼危險。有人在茅草棚裏生爐子，有人偷走安全設備，因此造成更多事故。疲勞作業使情況更糟，工人們在爐旁或車床邊上睡覺。

這種情況背後，潛藏著一個簡單而令人毛骨悚然的比較：廠長如果完不成生產指標就會被撤職，但違反生產安全不過是被訓斥一頓了事。生命不值錢，而安裝安全設備或者執行勞動法，得花很多錢！說到底，為了更好的未來，死幾個人算得了什麼？我們前面已經看到，

外交部長陳毅將大躍進比作一場戰爭，態度十分堅定，認為生產事故不能阻擋革命向前。他滿不在乎地說：「算不了什麼！」[1]

以火災為例。公安部估計，1958 年大躍進開始的那一年，共有大約七千場火災，吞噬了一億元財物。造成巨大損失的原因之一是缺少滅火設備。過去，大部份消防龍頭、水泵、滅火器、灑水車等等是從國外進口的，但後來號召要自力更生，停止從國外採購。然而，到 1958 年底，生產此類設備的八十家國營工廠紛紛倒閉，只剩下七家。一些地方火災發生時，消防員只能空著手，眼睜睜看著火勢蔓延，一籌莫展。[2]

隨後幾年的情況也沒有改善。工人擠在泥瓦、竹子和乾草搭建的小工棚裏，圍著臨時支起的爐子，經常會發生意外。1959 年南京的火災多達上百起[3]。有時候人們從公社食堂偷偷溜出去自己燒飯，也容易引發火災。有個女孩子在乾燥天氣燒了一堆火，風帶起火星，引著了她的草棚，頓時熊熊燃燒，吞噬了生命和財物[4]。在湖北荊門，有人在工程中踢到了煤油燈，奪去了六十人的生命[5]。應徵修建灌溉工程的村民住在匆匆搭建的草房中，也經常發生火災，有時是疲憊的工人撞倒油燈，有時是偷偷抽煙[6]。沒有可信數據表明死亡人數有多少，但僅在江西，僅一個月之內發生的 24 起事故，就造成 139 人被燒死或窒息而死[7]。按照公安局的紀錄，1959 年上半年湖南每月大約有 50 人喪生；平均每天十起火災。[8]

生產事故有增無已，誰顧及安全誰就是「右傾保守主義」。貴州省委估計，1959 年初因事故喪生的人數是上年的 17 倍[9]。具體傷亡人數不清楚，調查者不願提及死亡人數，為大躍進潑冷水。企業則照例隱瞞不報。毛澤東的秘書之一李銳曾在廬山會議上挨鬥，他後來估計 1958 年間特大生產事故達到五萬起[10]。根據勞動部的統計，1960 年 1 月到 8 月間，大約一萬三千名工人喪生，也就是說每天五十多名。礦業和冶煉企業的事故更為嚴峻，統計數字只反映了極少一部份。在唐

山鋼鐵廠，一平方公里的地方擁擠地矗立著四十多台大型煉鋼爐，然而冷卻池週圍卻沒有任何防護籬。有工人滑倒，跌進沸騰的鐵水裏。全國的煤礦通風設施不完善，容易窒息，同時造成易燃氣體積聚。有時候電氣設備不完善，爆出火花，引起瓦斯爆炸，對整個礦井造成破壞。另一類礦井事故是透水。採礦場維護很差，坍塌下來，礦工則被活埋【11】。1962 年三月，吉林通化八道江礦井發生爆炸，造成 77 人死亡。但最嚴重的事故發生在 1960 年 5 月 9 日的大同老白洞礦井，677 名礦工喪生。【12】

小礦井也經常發生爆炸，但勞動部對此類事故根本不統計。根據湖南一則報告所批評的，大躍進開始後，礦井事故每個季度都在增加。到 1959 年初，該省每天都有兩名礦工在事故中喪生【13】。南京的官塘煤礦是大躍進期間開工的，兩週內發生了三起嚴重爆炸，同時還有若干起「可以避免的」事故。例如油燈從井筒跌落，不繫安全帶，毫無經驗的工人不經過正規培訓就下井工作，有人甚至光著腳。若干年後，有人形容當時挖的礦井和巷道是「一塌糊塗」，完全不考慮當地的地質狀況。【14】

礦井是工人死亡率最高的地方，然而其他地方死亡人數也在增加。車間內充滿污垢和雜物，通道裏擁塞著無人清掃的垃圾和廢棄的零件，廠房裏常年缺少照明、供暖和通風設備，工作環境相當危險。許多工人連制服都沒有，更不用說勞保服裝。為了追求高產，工人的安全被置之度外。從 1958 年開始，南京每個月都要發生一起重大生產事故【15】。許多工廠都是大躍進期間匆匆上馬，質量很差：有幾次是整個房頂坍塌下來，將工人掩埋。【16】

公共交通方面同樣糟糕。司機沒有經驗，車船超載；誰要提出限載或限速，不是被人嘲笑，就是被斥責為右傾份子；卡車、火車和輪船維護不善，超齡使用，一旦出故障就用不合格的設備或者撿來的零件拼湊修理一下。問題有多嚴重，同樣沒有具體數字說明，但從湖南

的一份總結報告中可看出大概。1958 年，在該省縱橫交錯的公路和河道上發生四千多起意外，572 人喪生。其中有一例事故中，輪渡的駕駛員是個瞎子，副駕是個跛子【17】。在鄰省湖北，船隻常常在黑暗中航行，因為燈和其他照明設備被丟了。1960 年八月，在武漢馬倉湖，一艘沒有配備任何安全設備的超載客船起火，二十名乘客溺水身亡。湖北其他地方也發生過同樣事故【18】。1961-1962 年冬春，在甘肅天水發生的兩起意外中，有一百多人喪生，大部份是學生，兩起事故先後相隔不足一個月。渭河上的輪渡超載了三倍【19】。公交車也同樣超載。廣州的公交車上，乘客擠得「像豬一樣」。出故障是家常便飯，成群的客人在車站外過夜，一等好幾天。重大車禍也經常發生。【20】

火車事故沒有那麼頻繁，但隨著饑荒的惡化，列車車廂也變成了危險的交通工具。1961 年 1 月，數九寒天，人們擠在車廂中被運往甘肅農村，出現引擎故障或燃料用盡，晚點達 30 小時。列車上不提供食物或水，車廂裏到處都是糞尿，乘客一批批餓死。如果出現列車線路擁堵，乘客就被扔在車站無人理睬。在蘭州，有一次因為嚴重晚點，近一萬名乘客被安置在臨時搭建的住宿點。車站擠滿了上千名滯留旅客，沒有足夠的供給。每天都有人死去。【21】

每一次意外都會奪去若干人的性命。而在大饑荒期間，一處小小的傷口就足以帶來厄運。工傷得不到賠償，受傷的工人被治療費壓垮，或者被辭退。在農村，貪心的幹部用食物當武器，曠工就剋扣伙食，哪怕是去看病。傷口感染、營養不良、身體殘疾，這三方面是互相影響的，病人因此在生存鬥爭中處在劣勢，並且惡性循環，直至被拖垮。

32
疾病

饑荒時期人們不都是餓死的。一些常見病——像腹瀉、瘧疾、發熱、傷寒——首先奪去了很多人的生命。幾乎無法弄清楚每種疾病在當時的中國肆虐程度如何，不僅因為國家太大，各地情況差異大，更因為許多檔案不巧都被衛生部門掌握。當時上百萬黨員被清肅或者劃為右派，在這樣的恐懼下，疾病和死亡成了最忌諱的話題。作為權力核心的中南海也有人營養不良，李志綏告訴主席肝炎和水腫患者遍地都是，毛嗤之以鼻：「你們醫生就喜歡誇大其詞嚇唬病人。你這是混淆視聽。我不相信你。」[1]

當然，大躍進期間，不斷有共產黨幹部冒著巨大的個人風險寫報告，就各種問題提出批評，但很難找到關於醫療條件的確切調查。衛生部門要麼在公社化過程中被搗毀，要麼疲於應對饑民，要麼乾脆倒閉了。即使在大城市，醫院的資源都流失殆盡，到 1960 年時，醫生護士自己都掙扎在生死線上。例如在南京，醫護人員有三分之二都在生病。生病的原因是醫院已經成為疾病和死亡的催化劑。一篇報告指出，食物上「經常」發現蒼蠅和其他寄生蟲，醫護人員和病人都因此患上腹瀉。即使專為共產黨高官服務的高級醫院，暖氣也壞了，工作人員的衣服又髒又舊，破爛不堪。工作服幾乎不清洗[2]。有一篇報告稱，因為物質匱乏，犯罪姑息，武漢人民醫院的許多醫生護士喪失了「責任感」。他們在藥裏摻水牟利，偷病人東西，毆打病人，男醫生侵犯女患者。醫院賬目亂七八糟。[3]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就一點也不奇怪，為什麼沒有醫療專家願意花時間拿著手術刀和試管走到饑餓的農村，處理死者，防止瘟疫。在農村，大批人死去之後不做任何處理。到 1960-1961 年冬春終於意識到饑荒的嚴重性，在廢棄的牛棚或者無人耕種的農田上建起急救中心，救助饑民。在四川榮縣，送進來的病人就直接扔在地上，僅在身下薄薄鋪一層乾草。大冷天沒有被子，臭氣熏天。痛苦的哀號遠遠都能聽見。一些人被丟在那裏，幾天沒有水喝，更談不上吃飯和吃藥。在銅梁，活人和死人睡在一張牀上；沒人在乎[4]。灌縣有時候是相反的情況：把活人和死人鎖在一起，因為有關人員已經等不及了。機械工人嚴錫山患間歇性癲癇，被捆綁關在停屍房中，不給治療。有些病人死後不及時通知家屬，因而有六具屍體被老鼠咬掉了眼睛、鼻子。[5]

* * *

饑荒時期最不可思議的一個現象就是瘟疫發生率極低。發生過斑疹傷寒，也叫監獄傷寒、醫院傷寒或者饑荒傷寒，但似乎沒有死很多人。這種病通過虱子或跳蚤的糞便傳播，在擁擠、不衛生的條件下出現，因此多發於饑荒、戰爭和寒冷天氣，常見於農村逃荒者聚集的收容所，甚至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也發生過[6]。有些國家，饑荒時有 10%-15% 的饑民會患上斑疹傷寒、傷寒症以及回歸熱，但在中國似乎不是這樣。是不是大量使用殺蟲劑滅四害起到效果？似乎不可能，因為在全國遭受自然災害時，許多昆蟲捲土重來。我們前面已經瞭解到，在本來就欠收的鄉村，蝗蟲鋪天蓋地，同時還有其他害蟲。大躍進初期的滅四害運動，把傳播跳蚤的老鼠列為首惡，但鼠類繁殖速度驚人，而且什麼都吃。

一旦患上斑疹傷寒，立刻發高燒，到最後導致精神錯亂。這種疾病沒有廣泛傳播的更可信的原因是，瘟疫被迅速隔離了。這是一個死不承認饑荒，但一旦懷疑傳染病即將爆發，就會不擇手段的軍事政府。1961 年夏在廣東出現的霍亂，就是一個例子。起因是六月初，幾

個漁民吃了不乾淨的海鮮而患病。幾週內，幾千人被傳染，不久一百多人致死。當地政府動用部隊，在疫區築了一條警戒線。儘管實施隔離，江門和中山還是被傳染——陽江甚至發生了慌亂，但死亡總人數很低[7]。1960 年 3 月瘟疫曾經遍及全省的範圍，但疫情似乎被控制住了。[8]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歷史學家指出，有幾種傳染病是隨饑荒衍生的，但在檔案上都沒有記載。天花、痢疾和霍亂的發病率較高，但檔案中沒有資料顯示瘟疫奪走上百萬人生命。幾十年之後，由地方黨委出版的地方志中也很少提及瘟疫。相反，只要提到疾病，標準的說法毫無例外都是：「因營養不良患水腫病死亡的人數很高」。[9]

通過資料，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有兩三種在歷史上跟饑荒相關的瘟疫，當時沒有襲擊中國，中國是被各種疾病全面籠罩。疾病蔓延如此廣、患病率增長如此快，一方面固然是饑餓導致的直接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集體化的破壞性後果影響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擁擠的幼兒園、骯髒的食堂、危險的工廠，到設備不合格、人滿為患、缺乏醫護人員的醫院。大人不得不將子女送到已經不勝重負的幼兒園，1958 年，在湖南有 7500 名兒童死於囊蟲病，是前一年的兩倍。1959 年小兒麻痺症患者，比 1958 年高十五倍。腦膜炎發病率高了一倍，也是因為寄宿幼兒園裏可怕的條件造成的[10]。其他地方也有些零星資料證實了這個趨勢。例如，1958-1959 年的冬春，南京出現上千例腦膜炎，140 人死亡[11]。白喉發病率也迅速增加，1959 年致死的患者是前一年的七倍。[12]

肝炎患者迅速上升，但多見於條件較好的城市，而不是貧窮的農村。1961 年，湖北有五分之一的城市居民罹患此病。僅在武漢一地，90 萬居民中大約有 27 萬人檢驗呈陽性[13]。上海的感染率也很高，有些國營企業不得不要求專門醫療機構來處理。[14]

瘧疾是地方病。1960 年夏，無錫地區有四分之一的村民感染[15]。血吸蟲病也很流行，這是寄生蟲侵入血液和肝臟引起的。在湖北很多縣有幾千病人，村民們光腳在灌水的稻田裏幹活或捕魚時被血吸蟲叮住。1961 年夏，在漢陽縣，饑餓的工人下到城市週圍的湖裏割麥子。三千人感染了血吸蟲病，十二人死亡[16]。鉤蟲病也很常見。寄生蟲爬在病人身上大量吸血，甚至會導致貧血。但沒有具體統計數字。不過問題十分嚴重，湖南衛生部門提出目標，要求在 1960 年治癒三百萬感染者——範圍僅僅是八個縣。[17]

集體化生產在各地都導致疾病高發。我們已經瞭解 1958 年大煉鋼鐵過程中有不少人死於臨時搭建的煉鋼爐的酷熱。接下來的幾年中依然有人死於中暑。營養不良、疲憊不堪的工人，整日曝露在酷暑下。1959 年夏，僅兩天中就發生了幾十起中暑，其中幾人斃命[18]。在湖北，農民被迫在烈日當頭的正午耕作，連一頂草帽都沒有。幾千人中暑，大約三十人因此死亡。[19]

麻風病也增加了。該病是一種細菌引起的，會給皮膚、神經、四肢和視力留下永久的損害。由於缺乏照料、水質不潔、食物不足，麻風病廣泛傳播。不堪重負的醫院拒收麻風病人。南京收治了大約 250 名病人，但因為人力有限，沒有條件將他們同其他病人隔離[20]。武漢已知的麻風病人超過兩千人，但醫院牀位不足，他們只能在城市流浪，從垃圾裏撿東西吃。農村的麻風病人更慘[21]。在廣東七拱公社，一名十六歲男孩和一個成人患了麻風病，被趕到山上用子彈射中後腦殺死。[22]

精神病也很普遍，雖然該病很難界定。無疑，國家對個人的不斷掠奪，加上廣泛瀰漫的失落、痛苦和哀傷情緒，令饑餓的人們陷入瘋狂。沒有做過詳細研究，但 1959 年，在廣東化州一個公社就有五百多村民患精神疾病[23]。有一個奇怪的例子是集體歇斯底里症，1960 年五月，在浙江瑞安縣一所中學裏，大約六百多名學生中有三分之一無

緣無故又哭又笑【24】。四川報道同樣的事件，幾個縣幾百名村民突然發瘋，胡言亂語，一陣陣大笑【25】。有推測說全國精神病患者是千分之一，但化州的例子說明，面對公社化暴力和饑餓的恐懼（在下一章我們可以看到自殺率很高，即是明顯的例子）而崩潰的人遠遠多於此。所有的患者都沒有得到關注，因為醫療部門寧可處理其他類型的病人。例如在武漢，已知大約兩千病人無法接受專門治療，因為整個城市只有三十張精神病人牀位。【26】

精神病人儘管遭受不平待遇，但有一個優勢：他們就好像宮廷小丑一樣，可以講真話而不受懲罰。信陽地區有個倖存者回憶說，整個村子只有一個人李大軍敢說大饑荒，他瘋瘋癲癲到處走，對每個人重複一句順口溜：「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居然沒有人去找他麻煩。【27】

* * *

中國農村沒有出現饑荒常見的傳染病。反而是集體化導致一系列疾病高發，帶來了毀滅性的後果，饑餓的人們到處找東西，從而導致食物中毒。有的是因為營養太豐富了——愛爾蘭在 1846-1848 年的土豆饑荒時期吃可食用海藻，1944-1945 年冬天荷蘭大饑荒時吃鬱金香的球莖——許多人因此患了消化性疾病。

人們還沒有開始到處找樹根和野菜吃之前，消化疾病已經出現了。主要是飲食嚴重失衡引起的。城市居民有時候會分配給過鹹的泡菜、醃菜和豆瓣醬代替新鮮蔬菜。例如在南京，許多工人每天食用三十到五十克鹽，幾乎是建議食用量的十倍。他們把醬油加在熱水裏下飯。有一個人在不足一個月之內吃掉了五升醬油【28】。但食用大量綠葉蔬菜而沒有碳水化合物照樣會致病。每當月末配給的穀物吃完後，饑餓的人們就吃新鮮蔬果充饑，造成亞硝酸鹽中毒，皮膚有時候會呈紫色，還有人致死。1961 年在上海郊區，有幾十例這樣的死亡病例。【29】

食品生產過程中惡劣的衛生條件造成腹瀉，病弱的人因此喪命。集體化使得食品供應鏈條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混亂不堪，因為政府控制了生產、存儲、加工、流通、供應等各個環節。食物不過是廠領導們傳達、扭曲、造假的又一個產量數字而已，工人變得冷漠，不在乎，消極怠工。1959 年夏，食物中毒在武漢十分普遍，幾天有好幾百例。炎炎酷熱是原因之一，但根據一份在六個食品生產廠所做的詳細調查報告，普遍的不負責任才是罪魁禍首。蒼蠅到處都是：有個好事的監察員數了數，每平方米有二十隻昆蟲。銷往市場的罐子和桶上的蓋子都破了，裏面的食物中蠕動著蟲子。有一家工廠生產的果醬和麥芽糖裏發現了蛆蟲。變質的雞蛋拿去做蛋糕和糖果。許多工廠沒有水，工人不洗手；有的在地上小便。食物一投放市場，立刻在濕熱的天氣裏變質。[30]

還有個問題是，許多配料不是來自近郊，而是長途跋涉，運輸過來。例如，一批來自浙江的胡蘿蔔，在運往武漢的途中就腐爛了。處理食物的人力物力嚴重匱乏。從前挑著新鮮蔬果走街串巷的小販，現在被編成為集體大軍的一員。六分之一的蔬菜爛在街上，只是因為沒有足夠的竹籃分裝。[31]

公社食堂的條件也好不到哪裏。蒼蠅在食物上爬，連最基本的餐具都沒有。在某地三百名工人早餐，只能共用三十雙筷子，用完就在盛滿髒水的池裏草草一涮了事。飯店工作人員也同樣漫不經心。廚房裏一片混亂，蒼蠅比人多。打死的蒼蠅直接落在食物裏。有一家飯店，上菜時蓋滿泥垢。醋和醬油瓶子裏都是蟲子。[32]

這些例子都是城市裏的，比起農村的糟糕環境來說還是相對優越的。在農村，所有的食物都由公社食堂分配，一旦出現腹瀉或食物中毒，整個村子都不能倖免。在四川金堂縣，分給二百名農民的薄粥裏有幾十條蛆。因為食堂取水的井緊挨著廁所，排水系統幾乎沒有分開，尤其暴雨之後就更糟。不願吃粥的人就要連續三天餓肚子。少數

人勉強吞進去之後肚子絞痛。幾十人病倒，十人死去[33]。在彭縣一個食堂裏，發現四個用來裝糞尿的桶，裏面的排泄物用來澆地了，洗食物和盤子的水是從門口的死水塘裏舀的。四分之一的村民都生病。蒼蠅肆虐[34]。四川綿陽縣孝德公社，「雞屎遍地，人糞成堆，陰溝不通，臭氣熏天」，當地人稱之為「屎家巷」[35]。食堂就算不缺食物，也缺煤缺水。成都本是長江幾條支流彙集的地方，但有的廚師不得不走半里地去找水，給人吃的穀物有時是生的[36]。自然，很多地方食堂乾脆就停辦了。既沒食物，又沒有煤，只好關門，村民們不得不自己想辦法填飽肚子。

我們在前一章瞭解到，集體化伴隨著事故。人們吃的是骯髒的蔬菜、污染的食物，而一旦出現中毒事故，大家都不能倖免。1960 年不到一個月時間，就有大約 134 起致命中毒事故上報衛生部，而這只反映了事實的一小部份。食堂和穀倉就放著殺蟲劑，盛飯的和裝農藥的勺子有時候沒有分開。在河北保定縣，一隻沾了殺蟲劑的滾筒被用來碾麥子，一百多名村民中毒。這批碾好的麵粉沒有經過任何處理，幾天後被賣掉，又害得一百五十人病倒。在山西文水，一隻裝農藥的罐子，不知怎的被放在一所幼兒園的廚房裏，結果引起三十多個孩子劇烈腹痛。湖北某地，肥料餅被當成豆餅。一千人中毒，三十八人死亡。[37]

* * *

食物吃光後，政府開始鼓勵發明新的食品技術代替食物。大多是無害的。例如「雙蒸法」，據稱是「烹飪技術的偉大革命」，讓廚師把大米蒸兩遍，每次蒸就加水進去，讓米粒膨大[38]。有的替代食品不過是玉米穗、玉米桿、豆殼或者其他穀物。政府還向老百姓介紹其他代用食物。1950 年代初期，食品專家開創性發現一種小球藻，向全世界推廣這種神奇藻類，其將太陽能轉化成蛋白質的能力是其他植物的二十倍。但人們發現，這種號稱能使百萬人脫離饑餓的海藻湯，不僅

難以生產，而且口感極差，於是狂熱逐漸熄滅。在中國，大饑荒期間含水的黏土被推崇為同樣神奇的食物。這種黏土可以在泥塘裏找到並提煉出來，但更常見是在人的便池裏，把綠苔刮去，洗淨，和米飯一起蒸[39]。其營養可能極低。1960 年代科學家發現，其中的營養成份被包裹在堅硬的細胞壁中，人體難以吸收。[40]

囚犯成了實驗用的小白鼠。餵他們吃令人作嘔的綠藻，還餵他們吃鋸末和木漿。包若望（Jean Pasqualini），寫了一部關於中國勞教所的回憶錄，他記得一條條棕色的東西被壓成漿汁，混在麵粉裏。許多人出現便秘，病弱的囚犯因此喪命[41]。即使在城市，也有人因為吃了這種替代性食物而造成便秘或肛裂。北京亮馬廠的工人不得不用手去摳大便。[42]

村民們把樹林洗劫一空，找野菜、莓子和堅果吃。他們像用梳子篦頭髮一樣，在山裏到處尋找可吃的樹根和野菜。他們在絕望之下吃腐肉，吃垃圾，剝樹皮，到最後吃泥巴來填肚子。即使在北京這樣的地方，外國人也親眼目睹人們用棍子擊落榆樹葉，裝袋，，煮湯喝[43]。嚴師傅是個瘦而結實的男人，常咧著嘴笑。四川資陽大躍進開始時他還是個十歲的孩子。他現在是廚師，對食物有著清晰的記憶。他記得苧麻葉子被剁碎攤成餅子，油菜稈燉成濃濃的粥，芥菜葉煮了吃。豌豆秸磨碎，篩過，做成小餅。香蕉稈剝皮生吃，就像甘蔗一樣。蘿蔔醃了放起來，只有招待客人才吃。昆蟲活著放進嘴裏，但毛毛蟲和癩蛤蟆要烤了之後吃。儘管全家想盡了辦法，他的父親和妹妹還是餓死了。[44]

村民找來當食物的某些草、蘑菇和樹根是有毒的。晚上出去挖野菜的都是孩子，人們不知道他們自己吃的究竟是什麼。有個倖存者朱二哥回憶說：「那時候，根本不是說出門找認識的野菜。只要是綠色的植物，我們什麼都吃。我們不在乎，只要知道那東西沒毒就行了。我們真的什麼都吃。[45]」但也常常出事。在河北，根據報道，每月因吃

受污染食物、病死動物和有毒的植物根莖致死的人有上百個[46]。比如木薯，它的塊莖富含澱粉可以磨成木薯粉，是優質的碳水化合物來源，但葉子劇毒，不能生吃。在廣西，一個月中有 174 人因為沒有將其正確浸泡烹飪直接食用而死亡。在福建的幾千起食物中毒事件中，也有一百六七十人因錯誤食用木薯導致精神麻痺[47]。蒼耳是一種多籽植物，同樣也很危險。籽裏有劇毒，無人看管的豬誤服後會死亡。人吃後會噁心、嘔吐，頸部肌肉扭曲，接著脈搏加快，呼吸困難，最終死亡。北京在十天內有一百六十人因服用蒼耳籽死亡[48]。

有時候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那些政治上被邊緣化的人反而在生存戰爭中佔了優勢，因為早在大躍進之前的許多年，他們已經學會如何用各種辦法尋找食物填飽肚子。湖北潛江的孟曉黎是「反動地主」的孩子，1949 年共產黨執政後他和哥哥就被趕出祖屋，根本不給他們機會收拾財物。儘管當時他還是個孩子，人們還是撕破了他的外衣。他們和母親一起在村子裏流浪，全村人都歧視他們。後來在河邊挖野菜吃。他們第一晚和村裏的狗一起睡在乾草上，後來才分給他們一間破泥瓦房。剛開始他們想討飯，但沒人敢給他們吃的。「我們想從湖裏撈魚，但沒工具，撈不到很多。但我們挖蓮藕，吃蓮子，還是活了下來。幾個月之後，我和哥哥就學會怎麼從湖裏捕魚。雖然我們吃不到米，其實還是吃得很好的。」幾年後整個村子遭遇饑荒，這一家人是唯一在災難面前有準備的。[49]

屋頂長的草莖秸稈也被吃了。11 歲的孤女趙曉白每天像大人一樣工作養活妹妹，她記得有一天她實在太餓了，沿著梯子爬到屋頂。「我那時候很小。太餓了，就折了一根玉米稈（本來是用來遮蓋屋頂的）嚼了嚼。真好吃！我就一根一根嚼起來。餓得太厲害連玉米稈都變得美味了。[50]」皮革軟化後也能吃。四川的朱二哥親眼看著一半村民都被餓死。但他卻活了下來，因為母親是食堂裏一個燒飯的。他解釋

說：「我們把人家坐的椅子上的皮泡在水裏。浸透水之後把皮煮一煮，切成小塊，就可以吃了。」[51]

饑餓的人們連病死的動物也吃。即便在北京郊區也是這樣。在懷柔縣，人們經常吃掉患了炭疽熱的死羊[52]。成都一家皮革廠，用扒了皮的動物，跟一家公社食堂換蔬菜，煮好的肉已經發臭，還帶著成團的毛，吃完後幾百人中毒。灌縣一家屠宰廠，把病死的動物肉，悄悄賣給當地一家公社[53]。咬人的老鼠現在反過來被人吃，有的是從陰溝裏撈上來的死老鼠。[54]

到實在沒什麼可吃的時候，人們開始吃一種叫做觀音土的軟泥。李井泉派出的一支工作組到四川渠縣考察，組員們都驚呆了。那簡直是人間地獄。不成人形的村民擁擠著，在深坑前排隊。他們瘦得皮包骨頭，在烈日下汗流浹背，等輪到他們，就爬進洞裏，舀幾捧白瓷色的泥巴。孩子們肋骨高高突起，因為疲累而昏倒，骯髒的身體就好像是泥巴雕出來的一樣。衣衫襤褸的老太太燒紙符，雙手合十鞠躬，嘴裏喃喃念著什麼。一萬多人挖了 25 萬噸土。僅在一個村子裏，262 戶人家中有 214 家人吃過泥巴，每人吃了幾公斤。有的村民在挖坑時就直接把泥巴往嘴裏填。但多數人會和穀皮、花和草籽混合起來揉成團，烤成泥餅吃，的確能充饑，雖然沒有任何營養。這種土被吃進胃裏之後，就好像水泥一樣，把胃和腸道裏的所有水份都吸乾。因此無法排便。每個村子裏都有人痛苦不堪地死去，腸子都被泥土塞住了[55]。河南的何光華回憶說，「我們家附近的山上有一種石頭也能吃，現在叫陽里石，就吃這種石頭磨的面，把這種石頭砸碎磨成面摻上野菜烙成餌吃，當時吃著也不覺得什麼，還有點好吃，但吃後就解不出手（大便），憋的受不了，大人就給小孩從屁股裏用樹棍把屎往外出掏，後來吃的人多了就相互掏」[56]。從四川、甘肅、安徽到河南，整個中國，被饑餓折磨的人們都吃過泥土。

＊＊＊

真的有人餓死——這和其他地方的饑荒不同，歷史上的饑荒主要是一般疾病致死的。用嚴格的醫學術語解釋，餓死是因為人體儲存的蛋白質和脂肪完全消耗之後，造成肌肉無力，最終停止運轉，連心臟也停止跳動。成人在沒有食物的情況下可以存活數週，只要有水。身體儲存的脂肪是能量的主要來源，首先被分解。肝部也能產生小部份熱量，因為肝糖通常能在一天之內轉化成能量。而一旦脂肪被完全消耗掉之後，肌肉和其他組織裏的蛋白質被肝臟提取，轉化成糖，優先供應大腦的需要。大腦會調動身體的各個器官，產生它賴以正常運轉的葡萄糖。血壓降低，意味著心臟負擔加重。身體變得虛弱，並逐漸消瘦。一旦蛋白質被完全消耗，體液從血管和離散的組織中滲漏出來，積聚在體表下面和身體各空腔處，造成水腫。水腫首先出現在臉部、腳和腿，但同樣也會積在胃部和胸腔。膝關節出現水腫的時候走路就會痛。攝入過多鹽份或者用水泡飯，只會令腫脹惡化。饑餓的人有時候不會患水腫，反而會脫水，皮膚像羊皮紙一樣，遍佈皺紋、脫皮，有時候會長滿棕色斑點。喉部肌肉弱化，喉嚨乾燥，嗓子變得沙啞，最後失聲。面部下陷，顴骨高聳，突出的眼球呈現可怕的白色，眼光空洞，好像麻木一樣。肋骨一根根突出。四肢細得像樹枝。黑髮失去光澤逐漸脫落。身體逐漸消瘦之後，血液量相對增加，造成心臟負擔加重。最後器官嚴重受損直至衰竭。【57】

饑餓是個被禁忌的話題，但檔案中充斥著關於水腫病和餓死人的記錄。研究英國文學的教授巫寧坤描述他遭遇饑餓的情況：「我嚴重水腫，是第一個倒下來的。我逐漸消瘦，腳踝腫脹，兩腿沒有力氣，被迫下田勞動的時候總是摔倒。我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樣子，因為也沒有鏡子，但看看四週形容枯槁的面孔，我知道自己也好不到哪去。【58】」別的饑民不如他語言能力這麼強。但這類症狀到處都是。清遠曾經是廣東的糧倉，但在 1960 年，某公社有 40% 的村民患水腫【59】。即便在城市也很普遍。我們已知北京有一半工人水腫。1960-1961 年上海高校

學生也出現水腫[60]。天津的最高學府南開大學，五分之一的學生有此症狀[61]。水腫太普遍了，要是沒有患病，反倒需要解釋。坦率直言的胡開明 1959 年被任命為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他觀察到 1960-1961 年冬天，饑民們會因低血糖而猝死，這些人並沒有出現常見的水腫特徵。[62]

在大規模饑荒發生之前，為什麼沒有大量村民死於傳染病？其中一個原因在上面已經提到，共產黨對傳染性疾病密切監控。然而，集體化造成組織結構一片混亂，農村的健康保健即便在最好的時候，也不過是略具基本醫療設施而已，在饑荒時期早已土崩瓦解。因此，更有說服力的原因是，病菌通常襲擊免疫力低下人群，但農村餓死人的速度，相對其他地方要快得多，病菌根本沒有機會傳播。僅有的食物都控制在公社食堂，如何分配掌握在當地幹部手裏。許多幹部在高壓下追求產量，用口糧做武器。我們在《暴力》一章可以看到，不幹活就不給飯吃，實在幹不動就被累垮。死亡於是接踵而至。

33
集中營

沈善慶，44 歲，在上海某農場工作，1958 年夏，他犯了一個重大錯誤：施肥前本該加水稀釋肥料，他卻直接把未經稀釋的肥料澆在胡蘿蔔上，致使葉子枯萎。顯然，沈更關心的是掙工分，而不是為農業大躍進無私奉獻。他滿不在乎，被捕之後毫無悔意，還說怪話：反正到處沒飯吃，監獄至少還有一塊牀板。更詳細的審查發現，兩年前他也曾誹謗過黨。他被立刻遣送到在上海西北兩千公里之外、風沙瀰漫的青海高原上的一處勞改營，接受十年的勞動改造。從他的檔案裏得知，他於 1968 年 9 月被釋放，一身病殘，甘願寫下最不堪的懺悔，從十年前的「蓄意破壞」到後來的「破壞國家財產」——其實不過是不小心打碎了一塊玻璃，好像這是他在十年強迫勞動期間所犯的最嚴重的違法行爲。[1]

對他的刑罰十分嚴酷。不過其他許多老百姓，也會因為一樁微不足道的過失而被判處一到五年勞改。許多證據都是公安局的機密檔案，被牢牢鎖起來了。但關於犯罪和處罰的報告偶爾會抄送共產黨的其他部門。例如，一份文件詳細記載著，1959 年夏在南京，即便小偷小摸也會被判五到十年徒刑。[2] 北京一份監獄內部登記表顯示，在 400 名男囚中，因一點小錯誤被判刑五至十年的絕不是少數。丁寶楨 1945 年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十年後復員，偷過兩條褲子，價值十七元，1958 年 2 月 11 日他被判徒刑十二年。陳志文是個不識字的村民，他在北京前門汽車站偷了遊客的東西，被判十五年。還有個叫花子，

本來是牛倌，1957 年不知怎麼到了北京，在北京百貨商店前扒竊時被抓，也被關了十五年。[3]

但被判死刑的人比前幾年少了——至少從 1958 年之後是如此。公安部長謝富治 1960 年 4 月對下面的人講，政策是「少抓人，少殺人，少管教人」。在計劃經濟下，連執行死刑也和生產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樣，變成了數字，成了一個個必須到達到的指標，一張張正在等待填寫的統計表：他宣佈說，1960 年應該殺四千人，比前一年少，1959 年殺了大約 4500 人（他們的說法總是赤裸裸的「殺」，共產黨政權認為沒有用「死刑」這類司法術語的必要），關了 213000 人，批鬥了 677000 人。[4]

敏感的數據很難找到，但河北一份公安部門的文件顯示了該省的情況。河北省就在首都周圍，1958 年間有大約 16000 名「反革命份子」被捕，比前兩年加起來還多三倍。另外還有兩萬名普通罪犯，是 1949 年之後人數最多的（1955 年除外）。1959 年數字驟降，當局只逮捕了 1900 名「反革命」和五千名普通罪犯。1960 和 1961 年變化不大，不過普通罪犯下降到一千名。[5] 1959 年大約八百人被槍斃。[6]

殺的人少了，但即使是短期勞改，也可能導致疾病或死亡。勞改營散佈在全國生存條件最惡劣的地方，從被稱為「北大荒」的黑龍江的大片沼澤地，到西北青海甘肅乾旱的山區和沙漠。牢獄之外的生活已經夠悲慘了，而在鹽井、鈾礦、磚廠、國營農場裏的生活更加殘酷，加上遍佈全國的饑荒，使得每五個或四個囚犯中就有一個死去。在四川黃水，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囚犯餓死。[7] 在甘肅戈壁灘的夾邊溝，1957 年 12 月第一批到達的囚犯有 2300 人，到 1960 年 9 月遷到另一個農場的時候，已有一千人悲慘死去。之後的 11 月和 12 月，隨著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下臺，該勞改營最終關閉，期間又有 640 人死亡[8]。1960 年 6 月，這個省共有大約 82000 名囚犯在一百所勞改營中勞動。[9] 到同年 12 月只有 72000 人存活，單 12 月一個月內就死去近

4000 人[10]。本書所查閱的檔案中，死亡率最低的勞改營是 1959-1961 年的河北，每年 4%-8%，不過那裏只關押了幾千名囚犯。[11]

勞改犯到底有多少人？謝富治估計，1960 年總數是 180 萬，不包括西藏。囚犯在 1077 家工廠、礦井、採石場以及 440 家農場服勞役[12]。1958 和 1962 年大致死亡率為 5%，1959-1961 年間每年為 10%，共有七十萬人死於疾病和饑餓。無怪有人企圖越獄。但看守十分嚴密，單是為了這些犯人替國家經濟作出的貢獻，也不會讓任何人逃走——1960 年謝富治估計每年產值達到三十億元，還不算在農場產出的七十五萬噸農產品。[13]

* * *

勞改營不過是龐大的集中營中的一部份。那些需要開會批鬥或者被官方監管的人經常被送去就地監禁，1959 年這樣的人接近百萬。[14]更重要的是，1957-1962 年間，正式司法程序被簡化了。這也毫不例外是最高統帥毛澤東發起的。1958 年 8 月，他宣佈：「我們的每一個決議案都是法，開個會就是法，治安條例也靠成了習慣才能遵守……我們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90%）是司局搞的。我們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開會），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15]

當黨委「在群眾的支持下」執掌了司法權之後，主席的話實際就是法律。正是在這樣的政治壓力下，1959 年廢除了司法部。在農村，這就意味著權力從司法部門轉移到地方民兵手裏。在河北寧晉，全縣 83 萬人口，只有 80 個幹部負責警察、檢察院和法院。這個數目是人民公社成立之前的一半。[16]

自 1957 年 8 月開始，地方民兵依靠一種世界監獄系統裏前所未有的機制，即勞教。像沈善慶這樣的普通罪犯是由人民法院量刑，但勞教所裏的犯人不必通過司法程序，就可把他無限期關押——直到「改造好」。勞教跟勞動改造不同，不是由公安部組織，而是由各省、市、縣、人民公社甚至各村組織決定。所有被懷疑偷東西、自由散漫、誹

謗黨、在牆上寫反動標語、妨礙生產或者做出任何不符合大躍進精神的行為的人，都會被關進勞教所。這裏就像正規的勞改營一樣嚴格，1957 年後遍佈各地。謝富治提到 1960 年勞教營的犯人有 44 萬人，但他從北京的辦公室裏遠遠看到的只不過是冰山一角。[17]

直到 1960 年底工作組開始下到農村監督整肅當地幹部時，才算瞭解到就地監禁的規模有多大。幾乎沒有一個集體沒有自己的監禁場所，1958 年夏成立了權力強大的民兵，之後由他們看管。許多報告提到某單位——當地警察局、村組織、人民公社——建了「私設公堂」。像沈善慶這樣的犯人，應該按正規途徑移交法院，但有的就繞過司法程序投進地方監獄。這種黑暗刑場的規模無法知道。我們之前看到，在徐水這樣的模範公社，張國忠建立了一套龐大的監獄系統，從縣級一直深入到每個生產隊，關了 1.5% 的人口。[18] 在上海近郊的奉賢，村民動不動就被關到勞動營，其中一個專門建來關押鬧事的孩子[19]。在開平縣，單單一個生產隊就擁有四個這樣的營，好幾百人被送進去，短則十幾天，長達 150 天。一旦被關押，就要挨打受折磨；有人終身殘疾。[20] 舉個例子，開平一個縣領導，把一個偷東西的老太太，用 4.5 公斤重的鐐銬鎖起來，關了十天。有個年輕民兵點火柴燒她的腿。[21]

全國各地都建立起這類特殊的營，發明特別的懲罰方法，各地方司法可以為所欲為。在貴州印江縣，犯人們額頭上被人用紅墨水寫上「小偷」字樣。各公社建立「集訓隊」，遍佈全省。誰若批評或者不參加會議，就被送進去「受教育」，被迫幹重活。[22] 1959 年柳州公安局還建立「集訓營」，專門看管反對公社化的顛覆破壞份子。[23] 在北京以北的延慶縣，有一點點偷懶跡象就要被拘留：一名 62 歲的老漢被關押一個月，因為他沒有抓到足夠的麻雀。[24]

如果按照一名正規罪犯對應於三到四名就地監禁犯的比例推算，大躍進中每年的犯人總數將達到八九百萬（180 萬到 200 萬在勞改營，

600 萬到 800 萬遭就地監禁）。根據早先的保守估計，在正規勞改營病死或餓死的囚犯大約七十萬，這個數字可能要乘以三到四倍，意味著大饑荒期間大約 300 萬人死在各種形式的監禁下。[25] 死亡率很高，但比起 1930 年的蘇聯，入獄率相對低。這是因為只有少數人才坐牢服刑，多數則代之以挨打和挨餓。

34
暴力

恐怖和暴力是這個政權的基礎。恐怖若想行之有效，必須專橫無情，必須使之家喻戶曉深入人心，但不必索取很多生命。這個原則被執行得很好。古語云，「殺雞給猴看」。位於首都附近的通州縣的幹部們在毆打村民之前，首先逼著他們下跪，這叫做「殺一儆百」。[1]

然而，大躍進期間農村出現了截然不同的風氣。暴力成了經常的統治工具。它不再是偶一為之、小懲大誡，而是全面性地、習以爲常地向大部份村民實施的手段——用來對付怠工者、干擾者和反抗者，更別說那些小偷小摸者。對農民來說，勞動的全部積極性已經被集體化毀掉了——土地是國家的，生產出來的糧食往往以低於成本的價格上繳，牲畜、農具、家庭用品都不屬於個人，連住房也常常被沒收。而當地的幹部們，則必須完成並超額完成上級規定的產量，面對著高壓，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無情地鞭策那些勞動力。

持續不斷的宣傳攻勢，在大躍進初期可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村民每天都被叫去開會，大部份人的睡眠時間被掠奪。「會議天天開，喇叭到處響，」四川的李婆婆接受採訪時回憶饑荒時代這麼說。[2] 開會實際上是集體化的動力，有的會議長達數天。不過這可不是讓農民群眾暢所欲言的社會民主主義的論壇，而是一個可怕的場所，幹部們長篇大論，聲嘶力竭，欺負和嚇唬老百姓。農民們經常晚上參加全村大會，半夜被喊醒去幹活，在農忙時節他們每天睡不了三四個小時。[3]

到頭來，如果烏托邦的許諾之後隨之而來的是累得要死的勞動，誰還願意用苦幹來換取永遠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呢？很快，為了強迫

疲憊不堪的勞動者服從命令，暴力成了唯一的手段。只有用饑餓、痛苦和死亡來威脅他們，才能刺激他們。有些地方村民與當地幹部頑固對抗，暴力的範圍和程度不斷持續升級，變本加厲。共產黨能夠提供的胡蘿蔔越來越少，只能越來越多地依賴大棒。

大棒是農村的武器，廉價而有效。一記警棍就能制服流浪漢，一頓痛毆可以打斷頑固份子的脊樑。遇到嚴重情況，可以將人綁起來打得全身青紫。村民被迫跪在碎貝殼上挨打。比如陳武雄就是這樣，他不願離家去修水利，當地幹部陳龍祥就命他跪下，用一根高舉過頭的木頭揍他。[4] 因為饑餓的村民多數患水腫，每挨一棒，毛孔裏就會滲出水來。有個常用的說法是某人「被打出水來了」。比如欽州縣農民盧景福，被一群暴徒追趕，為首的卻是那彭公社黨委的第一書記任忠光，他氣急敗壞，把盧毆打了二十分鐘之久。[5]

黨的幹部經常帶頭。清遠縣委整理了一份關於某公社虐待現象的調查顯示，公社黨委第一書記鄧中興為了完成任務，親手打過二百多名農民，其中十四名不治。[6] 湖南花明樓的劉生茂腦子有病，不能在水庫幹活，被生產隊長打得腦漿迸裂，隊長餘怒未消，繼續踢打他那毫無反應的身體。[7] 湖南某公社黨支書歐德生，自己打過一百五十人，其中四人身亡。他對新黨員說：「要入黨就要會打人。」[8] 在道縣，農民們經常被棒打。有個調查小組寫到：「到處都成了刑場。」有個生產隊幹部親手打死了十三人（後來又有九人被他們打得傷重不治）。[9] 這些幹部才是真正的惡霸，人們看到他們就害怕。南海縣一個生產隊長身上背著三把槍，穿著大皮襖在鄉裏巡視。[10] 河北一個生產隊長李獻春，每天自己注射嗎啡，穿著鮮紅的褲子，大搖大擺在村裏走，大聲罵娘，看誰不順眼就打誰。[11]

總體說來，全國可能有一半之多的幹部經常拳打或者棒打他們本應為之服務的百姓。1959-1960 年冬，湖南有一萬六千名村民參與修建黃材水庫，其中四千名遭到拳打腳踢，四百人因此死亡。[12] 廣東羅定

某公社，超過半數的幹部毆打村民，近一百人致死。[13] 在河南信陽做過更全面的調查，顯示 1960 年死亡人數超過一百萬，大多數是餓死的，但有大約六萬七千人是被民兵打死的。[14]

棍子只是當地幹部們用來懲罰落後分子的恐怖刑具之一。當饑荒蔓延農村之後，必須用更強硬的暴力手段，才能把饑餓的村民趕到地裏幹活。少數人折磨多數人的聰明才智是無窮無盡的。人可以被扔進池塘裏，有時綁著，有時被剝光衣服。羅定有個十歲男孩，因為偷了幾穗麥子，被人捆起來扔進泥塘，幾天之後，就死去了。[15]

還可以把人脫光衣服挨凍，農民朱玉發，因為偷了一公斤豆子，被罰款 120 元。他的衣服、被子、蓆子被沒收，接著再被脫光衣服，拉去批鬥。[16] 廣東某公社，幾千名農民被派去勞動，大冬天，誰偷懶就被脫光。[17] 在另一個地方，為了趕工修水庫，同時有近四百村民，被迫在零下的溫度中勞動，沒有棉衣穿。懷孕婦女也不例外。據說寒冷可以讓村民幹活更賣力。[18] 在湖南瀏陽，三百多名男女被迫光著膀子在雪地裏勞動，七分之一的人死去。[19]

夏天，則逼迫人們站在烈日下伸直胳膊（有的要跪在石頭或碎玻璃上）。從南部的四川，到北方的遼寧，都有這樣的事情。[20] 燒熱的工具可以用來燙人。滾燙的針頭用來燒肚臍。[21] 嶺背公社參加建設水庫的農民抱怨太苦，民兵燒他們全身。[22] 河北有人被烙鐵燙。[23] 在四川，有人被全身潑了汽油點火，有的被燒死。[24]

滾燙的水可以澆人。但因為燃料缺乏，更經常使用的是用糞便潑人[25]。有位八十歲老太太，冒失地向生產隊長承認自己偷了米，為此付出代價，被人往身上潑尿。[26] 在汕頭附近的龍歸公社，完不成生產任務的人，被逼著吃糞，被迫喝尿，或者被燒手。[27] 在另一個地方，人們把糞便兌了水和稀，灌進被懲罰者的喉嚨。村民黃炳銀因為餓得沒有力氣，偷了一隻雞，被抓住後，村幹部逼他吞牛糞。[28] 劉得勝因

為偷了一個紅薯，被人用尿澆。他，他的妻子和兒子還被逼著吃屎，他拒絕吞下去，人們就用鐵鉗撬開他的嘴。三週後，他死了[29]。

割和剪也是常見手段。拔光頭髮。[30]剪掉耳朵鼻子。廣東村民陳狄因為偷糧食被民兵陳秋綁起來，剪掉了一隻耳朵。[31]王自友的案子被上報到中央領導：他的一隻耳朵被剁掉，腿用電線綁起來，背上垂著一塊十公斤重的石頭，又用烙鐵燒，——這樣的懲罰，是因為他偷挖了一個土豆。[32]湖南沅陵縣，人們踢睪丸，用烙鐵燙腳底，鼻子裏塞辣椒，把耳朵釘在牆上。[33]湖南瀏陽地區，常用鐵絲捆綁農民[34]。四川簡陽，小偷被人們用鐵絲從耳朵穿過，掛一張紙板，寫著：「慣偷」。[35]還有些人用針扎他們的指甲縫。[36]廣東某些地方，幹部用平時給牛扎針的針筒，往人身上注射鹽水。[37]

有時候夫妻雙方被迫互相毆打，少數人被打死。[38]有位老人梁先生2006年接受本書採訪時，回憶到他當時是個小伙子，和其他村民一起，被迫打一位老太太，她因為從林子裏撿柴火，被抓住後鎖在當地一間廟裏。說著，他忍不住無聲啜泣起來。[39]

模擬死刑和模擬埋葬也可以叫人畏懼。[40]湖南的報告中還提到了活埋。人們被鎖在地窖裏，恐懼至極，大叫，抓門，一段時間之後，在陰森的寂靜中死去。[41]這種情況實在太普遍了，以致1958年11月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視察鳳嶺時，專門就此事提出質問。[42]

羞辱與痛苦共生。到處都有人被遊街——有時候戴著紙摺的高帽，有時候胸前掛個牌子，有時候一絲不掛。[43]臉上塗上黑墨水。[44]被剪成陰陽頭——一半留頭髮，一半剃光。[45]辱罵十分尋常。十年後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不過見樣學樣而已。

就算死去，折磨也沒有停止。有時候這些被打死的人的屍體就被扔在路邊，下輩子注定還要做賤民。根據普遍的說法，如果死無葬身之地，便成為孤魂野鬼，不得安寧。有的墓碑上寫了標誌。在廣東龍歸公社，1959年五分之一的人口死去，有人被草草掩埋在路邊，埋葬

地點放一個標牌，寫著:「懶漢」。[46]在湖南石門縣，毛炳香全家死絕，不許白天埋人，結果放了六天六夜才埋，死者的眼睛，面部被老鼠吃出了洞。當地人說：「現在人不如狗，死了都沒人埋。」[47]

被地方司法判為有罪的人，如果家屬試圖來收屍掩埋，也會受到懲罰。有位七十歲的母親因不耐饑餓上吊自殺，她女兒匆匆從田裏趕回家，但當地幹部對她擅自回家十分惱火，把她追上，打倒在地，又猛踢她的身子，使她後來終身殘疾，還叫她「吃掉」她母親已經開始腐爛的屍體。[48]尤其喪心病狂的，是把屍體剁碎當肥料。村民鄧大明因為孩子偷了一點蠶豆就被打死，黨的書記亶倪明下令把他的屍體漚成肥料，用來做南瓜地裏的底肥。[49]

* * *

暴力到了不容低估的地步：在一份由中央監察委員會提交給周恩來的報告中說，像湖南這樣總體傷亡數字不算最多的省份，86 個縣和市中，被打致死的有 82 人。[50]但要拿出可靠的數據就困難多了，更沒有人能說出全國範圍的情況。對於調查員來說，當時很難確定饑荒時期到底死了多少人，更別說弄清楚是什麼原因死的。但有些小組被派到農村深入調查，大略瞭解到基本情況。在湖南道縣，1960 年死了好幾千人，但只有 90% 死於疾病和饑餓。調查小組採集證據後發現，10% 的人是被黨的幹部和民兵活埋、打死或者用其他方法殺死。[51]在湖南石門縣，1960 年死了大約 13500 人，其中 12% 是被「打死或迫害死的」。[52]在信陽，像李先念這樣的高層領導親自率隊調查，1960 年死了一百萬人。有個官方的調查委員會預計，6%-7% 是被打死的。[53]四川這個比例更高。當時，省委派了工作組到開縣做詳細調查，發現豐樂公社在不到一年中死了 17% 的人口，其中高達 65% 的人是被打死，被剝奪口糧餓死，或者被迫自殺的。[54]

一份份報告詳細描述了人們是如何被折磨的。這些大量證據顯示，大饑荒期間死去的人，至少有 6% 到 8% 是被幹部或民兵直接殺

死，或者重傷後感染而死。我們將在第 37 章看到，1958 到 1962 年大饑荒期間，至少 4500 萬人死去，高於正常死亡率。黨的檔案中所記錄的暴力，程度嚴重，範圍廣泛，由此可以推論出，其中至少 250 萬是被打死或折磨死的。

匆忙打造的集體化中存在這樣的暴力，原因一言難盡。其中可以追溯到中國成百上千年的暴力統治傳統，但這跟世界其他國家有什麼分別？歐洲也充滿血腥，二十世紀前半葉，在大規模屠殺中喪生的人數是空前的。現代專政擁有新的權力機構，由一個黨實行統治，掌握新的殺戮手段，從機關槍到毒氣室，因此更為殘忍。當強權政府整合他們手中的全部資源，決定將某個集團全部消滅的時候，整個後果會是毀滅性的。畢竟，只有在現代政體出現之後，種族滅絕才成為可能。

毛澤東領導下的一黨專制確實沒有傾其全部國力滅絕某一特定群體——當然，除了反革命份子、蓄意破壞份子、裏通外國份子和其他的「人民公敵」，其實這樣的政治界定很模糊，幾乎可以包括任何人。但是，毛澤東確實將整個國家投入了大躍進，把黨的軍事化結構延伸到整個社會。「全民皆兵」。毛澤東在運動最高潮的時候宣佈，將資產階級法權徹底摒棄，例如工資、每週休一天假、規定每個工人的最高工作時間。[55] 計劃經濟下龐大的人民軍隊隨時隨地聽從上級指揮。在持續不斷的運動中，社會各個方面都按照軍隊編制來組織——食堂、寄宿學校、集體宿舍、突擊隊和村民，都被按照軍事化對待。這不僅是借來強調集體團結的術語。所有的領導都是在殘酷戰爭中千錘百煉的軍人。他們幾乎是赤手空拳，打了二十年的游擊戰。他們挺過了蔣介石的國家主義政權發動的一次次圍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軍隊的攻擊下也存活下來。他們還熬過了共產黨內部定期發起的肅反運動和一波波的迫害。他們以暴力為榮，也習慣了大規模的死亡。他們所有人都抱定一個宗旨，即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1962 年，四川省死了幾百萬百姓，李井泉把大躍進比作長征——當年長征只有十分

之一的士兵到達終點。他說：「我們不是弱了，而是更強了，我們保留了骨幹，還會更強大起來。」【56】

當年，百萬大軍被號召起來投入反抗蔣介石的血腥戰鬥的時候，黨的幹部們根本無視他們的性命。此時，他們表現出同樣的殘忍和漠視。當年搶奪政權的野蠻勁頭，現在被釋放到經濟建設中來了——無論傷亡多麼慘重。人的意志力可以克服任何困難——可以移山倒海——如果不能，就是有人破壞。在「滅四害運動」中偷懶的人，很可能就是破壞整個大躍進軍事戰略的「壞份子」。從食堂偷東西的農民就是逃兵，一定要殺掉，否則整個排的人就要被叛徒出賣。任何人都有可能是逃兵、間諜、叛國賊，再小的錯誤都得接受最嚴厲的軍事審判。全國變成一個大軍營，老百姓接受命令執行任務，不能多說一句話，儘管標榜社會主義民主。他們必須服從命令，否則就要受罰。對暴力的任何牽制——宗教、法律、社團、家庭，都被拋至一邊。

共產黨在大躍進期間也清除了很多人，所以也發展新黨員，其中許多不是善類，為了完成任務，不惜使用暴力。擁有紅旗最多的村子、公社或縣，通常也是害人最多的地方。但紅旗隨時會被收走，給了競爭對手，這就使當地幹部始終處於高壓之下，儘管幹活的人已經不勝重負。於是出現了鎮壓的惡性循環：用更無情的毆打，迫使饑餓的人們，完成分配下來的任何任務。隨著暴力不斷升級，當受罰的恐懼與挨餓的恐懼相抵消時，暴力也就到了頭。有個被迫在大冬天到山上長時間幹活的村民簡單地說：「我累了，你打我，我也不幹，在打我就走。」【57】

有一份非常有趣的手抄本，分析了當時為什麼暴力會不斷升級，題目叫《幹部打人的起因和經過》，由一支派到湖南農村的調查小組寫的。作者不但花功夫收集幹部們濫用職權的證據，還採訪了這些幹部，試圖瞭解究竟出了什麼問題——這是很少見的。他們發現這條酬報原則：幹部們打村民，是為了贏得他們的領導的讚揚。無論當時的

情況多麼混亂，暴力總沿著一條線，即從最高層到最底層。趙長勝就是個例子。他是個職位很低的黨員，最初他拒絕打那些廬山會議之後被揪出的「右派」。他的上級責怪他，他甚至冒著被指責為「右傾保守主義」的風險。因為不斷表達不願用暴力對付黨的敵人。他被罰了五元錢作為警告。於是，過了很久之後，他不得不屈服於壓力，而且變本加厲，把一個小嬰兒打得全身是血。[58]

單純的壓力常常把當地幹部拖入同樣的境地，他們結成爲一個暴力聯盟。在耒陽，縣長張東海和他的隨從認為，暴力是「不斷革命」不可或缺的任務：「運動不是繡花，打死人是不可避免的。」當地幹部如果拒絕打偷懶的人，自己就得挨批鬥，被捆起來打。大約二百六十人被解職，三十人被打死。[59] 在四川合川縣，幹部們被教導說：「勞動力多得很，打死幾個沒關係，打死十個算五雙。」[60]

1961 年黨的檢查組所做的調查裏同時採訪了打人者和被打者。邵克南是個湖南小伙子，1958 年夏天第一次挨揍，當時是公社化高潮最瘋狂的時候。他後來大冬天被派到花果山修建灌溉工程，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又遭到拳打腳踢。其中一個打他的幹部叫易少華。邵從小就認識易，記得他在大躍進之前從來不會訴諸暴力。隨著新的政治運動的展開，他變了，動不動就打人罵人。他出手十分狠，把人打得青紫、受傷、流血。[61] 當易少華被問起為什麼會變得這麼暴戾，他解釋說，壓力來自他的上級。易害怕被劃成右派。他的領導告訴他：「你要是不打他們，任務就完不成。」壓力必須通過一連串命令傳遞下去：「上頭的人壓榨我們，我們就壓榨下面的人。」[62] 換句話說，當黨員被恐嚇的時候，他們就恐嚇他們手下的人。

* * *

幹部們必須做出選擇。他們可以改善村民的生活條件——頂住各種壓力——或者盡力完成黨的指標。選擇一方，就要犧牲另一方。許多人選擇不反抗。一旦做出選擇，暴力就開始實施自己的邏輯。在普

遍貧困的條件下，不可能讓每個人都生存下來。村裏的食物遠遠不夠，連青壯勞力都不能保證足夠的口糧，1959 年廬山會議後出現一片消沉，在這樣環境下食物匱乏問題不可能在短期內解決。計劃經濟已經把人看做不過是資產表上的數字而已，人，是為了生產更多貨物而開採的資源，就好比煤炭或者農作物一樣。國家至上，個人等於零，個體價值以工分定期評估，由犁地或種稻子的能力決定。在農村，農民被像牲口一樣對待：他們要飯吃，要衣服穿，要房子住，這都為集體造成負擔。經過一番無情的衡量，順理成章的，那些被認為毫無價值的人就被挑出來。偷懶的、病弱的以及其他幹不動活的人遭到歧視，把他們殺死就能節省食物，分給那些能為國家做出貢獻的人。暴力是解決食物匱乏的手段之一。

食物就是武器。饑餓是首選的懲罰，比毆打還常用。楚雄縣某公社的副書記李文明打死過六個農民，但他強迫人服從的最主要手段還是挨餓。一對兄弟不聽話，被罰整整一星期不吃飯，他們餓極了就在樹林裏挖樹根吃，很快還是餓死了。其中一個的妻子臥病在牀，她也不許進食堂。某生產隊整整七十六人被罰，十二天不給吃飯。[63] 許多人餓死。廣東龍歸公社的書記下令說，不勞動者不得食。[64] 有個檢查員描述到四川一些縣的情況，說，「生病不能幹活的社員就不給東西吃——加速了他們的死亡。」第一個月，每人每天配給的糧食減到 150 克，第二個月就只剩 100 克。到最後，對那些奄奄一息的人根本不發糧食。在四川的江北和永川，「幾乎每個人民公社都剋扣糧食。」在一個供給六十七人吃飯的食堂，三個月內死去十八人，都是因病被食堂拒之門外的人。[65] 沒有可靠數字，但一組檢查員仔細分析了四川內江縣幾個生產隊的情況，認為餓死的人中有 80% 是因為被罰不得吃飯[66]。即便那些能從食堂領到食物的人，也常常被剋扣。有個農民解釋說，勺子只是在鍋裏蘸蘸，裏面的東西「能照出影子來」。他說的現象，許多被訪者都記得，食堂掌勺的人有意歧視那些他認為的「壞份子」。好

好幹活的人，勺子就撈到底，「壞份子」就只撈表面的一層，只是一層稀湯：「那湯水顏色發綠，難以下嚥。」[67]

一份份報告都證明，生病的人也被迫下地勞動。幹部趙學東強迫二十四名患水腫的村民去勞動，除了四個人其他都死掉了。金堂縣竹篙公社的社員比較幸運，可以去看病，但一出醫院就被書記趕去幹重活。[68] 全國都有病重幹不動活的人被扣發糧食——幹部們認為，生病的人是國家的廢物，因此很容易就會做出這個決定。在境況最差的地方，即使努力完成每天工作量的人，也只能領到一碗稀粥。

* * *

一些模範縣例如徐水提出口號說「按需分配」，但在大多數地方，現實情況卻更像列寧的名言：「不勞動者不得食」。有的集體甚至將當地百姓按照他們的勞動能力劃分成不同的組，每組分給不同的糧食。根據能力分配能量。辦法就是剋扣那些出力少的人的糧食，獎賞給幹活多的人。匱乏時期，獎勵強者犧牲弱者是簡單而有效的制度。當年納粹面對同樣的匱乏，沒有多餘的食物供給幹活的犯人時，在類似的情況下，也採用了同樣的制度。有個礦井專為德國 IG Farben 集團提供化學絡合物，經理 Günther Falkenhahn 把他的勞動力分成三類，可分配的食物優先供應那些能將每一單位卡路里轉化成最大價值的工人，那些底層的人則陷入因吃不飽而生產力低的惡性循環。到 1943 年，這種「勞動力飼養法」獲得了全國性承認，被推崇為僱傭勞力的標準做法[69]。

甚至用不著上面下命令，黨員們就知道只需讓精壯勞力不挨餓就可以。對一些熱衷於用最少代價獲取最大產值的幹部來說，這是十分有效的方法。在廣東桃村，幹部們把農民按照勞動能力劃分為十二個級別。列在最上層的人每天也不足 500 克糧食，但列在最底層的勞動者每天只能領到 150 克，永遠處於饑餓狀態，支撐不下來就被除掉了。上面一級的人滑下來之後，無情地填補了下面的空缺，苟延殘喘。

1960 年餓死的人有十分之一。[70] 我們在前面看到，實際上全國的單位都被劃分成不同等級，高級的掛紅旗，中等的掛灰旗，最差的掛白旗。這樣的等級再細化一點，很容易就變成分配食物的依據。例如金堂縣某個村子的村民就被分成「上等」、「中等」和「下等」三組，各組組員的名字分別寫在紅色、綠色和白色的紙上。不同級別的人不能混合。紅色名字被表揚，而白色名字就被無情地殘害，許多人被送到臨時搭建的勞動營去「受教育」。[71]

* * *

自殺成了流行病。被殺死的是少數，受折磨的是多數，其中就有些人選擇了結束生命，一了百了。他的死常常其他村民帶來更大的羞恥屈辱。有如此這般的固定說法，「畏罪自殺」，「自走絕路」，「自尋短見」，都是形容自殺的標準說法。在上海奉賢，1958 年夏天短短幾個月間，有九百六十人死亡，其中九十五人是「自走絕路」，其他人則死於因病不能及時醫治、受虐或者受累。[72] 根據經驗可以粗略估算（很可悲，又是缺乏可靠數字），大約 3%-6% 可以避免的死亡是自殺，也就是說，大約有一百萬到三百萬人在大躍進期間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廣東普寧，自殺被形容為「接連不斷」；有人因為偷了村民的東西，羞愧之下走上絕路。當集體受罰時，有人會因為連累他人覺得內疚而自殺。[73] 在開平縣，一名五十六歲的婦女偷了兩捧穀子，全家被罰，五天不得進食堂，被送到勞動營。她本人於是自殺。[74] 有時候女人帶孩子一起死，她們知道，自己死後，孩子們也活不下去。汕頭有名婦女偷了東西，她把兩個孩子綁在身上，然後投河自盡。[75]

城市裏的自殺率也高得驚人，不過也沒有確切數字。例如 1959 年上半年，報道說南京有大約二百人投河自殺，公安局為之震驚。多數是女性。[76] 許多人所以自殺，是因為集體化讓使他們家破人亡。比如湯桂英，兩個兒子病死了，接著因為修建灌溉工程，她的房子被毀

掉。她到南京，找在工廠裏工作的丈夫，當局又發起運動，把進城農民遣散回鄉，丈夫也幫不了她。她上吊了。【77】

35
恐怖地

黨中央領導第一次看到大規模死人的恐怖情景是在信陽：讓李先念這個剛硬的紅軍老兵都落淚了。第一反應是歸咎於反動派。很快全國展開一場從反動派手中奪回權力的運動，軍隊也常常被中央派下去助陣。為了把信陽說成一個例外，採取了一個聰明做法：黨內發佈的報道裏都稱此為「信陽事件」。除此又加上「鳳陽事件」，鳳陽是安徽省淮河流域一個塵土飛揚的縣城。這裏本有 335000 名村民，四分之一也在恐怖統治下死亡。關於兩起事件，黨內編輯的報告直到 1980 年代才開始傳播，其中包括一份六百頁的文件，在 1989 年天安門屠殺期間被秘密帶出中國。這些文件於是成為許多人研究當時情況的基礎材料。信陽成了大饑荒的代名詞。

然而，當 1961 年全國各地幹部被召集起來討論信陽報告的時候，他們顯得漠然。湖南湘潭一個縣有幾萬人死亡，有的幹部覺得，信陽事件跟自己家門口發生的事情比起來平淡無奇。有人還想，為什麼要叫做「事件」？[1]

實際上，許多村子裏，一年中就有超過 30% 的村民死亡——有的地方整個村莊都變成空村。不過縣是更大的行政單位，人口一般是十二萬到三十五萬。一個縣包括幾百個村子，有的是密集地挨在一起，有的被山河或者樹林分隔。就全省範圍而論，一年中 10% 的死亡率，只有在異常強大的政治壓力時才會出現。欺騙和暴政相結合，導致大規模死亡，這種恐怖之地遍佈全國。每一個被政治狂熱份子統治的省內都有幾塊這樣的地方，有的甚至有十幾塊。到底有多少地方，

在任何時候都很難提供一張完整名單，因為共產黨的檔案大多都嚴嚴密密地鎖了起來。不過以下是一份包括五十五個縣的臨時名單，隨著可掌握的資料越來越多，這個數字一定會增加。這份名單的主要參考了北京公安局一位人口統計學者王維志收集整理的四十個縣的數據[2]。但他的信息也不完善，因為他的數據來自上報給中央的官方數字而不是當地調查。根據本書所查詢的檔案資料，名單中又加入了許多縣（用星號*註明）。本章將詳細說明其中幾個縣的情況。

四川：石柱，榮經，涪陵*，榮縣，大足*，資陽，秀山，酉陽，南溪，墊江，樂山，犍為，沐川，屏山*，郫縣*，雅安*，廬山*，色達*

安徽：巢縣，太和，定遠，無為，宣城，亳縣，宿縣，鳳陽，阜陽，肥東，五河

河南：光山，商城，新蔡，汝南，唐河，息縣，固始，正陽上蔡，遂平

甘肅：通渭*，隴西*，武威*

貴州：湄潭，赤水，金沙，桐梓

青海：湟中，雜多，政和

山東：巨野*，濟寧*，齊河*，平原*

湖南：古丈*

廣西：環江

* * *

甘肅西北的通渭是全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它座落在乾旱的黃土高原，在連綿的山巒間，被一條條溝壑分開。曾經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一站。在重心移向蔥鬱的江南之前，這裏也曾經一片繁盛，肥沃的黃土被充份利用。處處留著歷史的痕跡，因為土壤容易被開墾。牆、房子和墓地都是黃土建成的，而且看起來是按照地形直接修建起來的。在容易開鑿的山上挖出窯洞，內部是拱形的，院子裏滿是塵土。風雨常年侵蝕著山體，這些窯洞到最後都是獨立支撐。山頂的梯田和深谷中的道路，構成一幅由勤勞的人們世世代代打造的黃土高原的風景。1935年九月紅軍佔領通渭，毛澤東在此賦詩，歌頌長征。

該縣的縣委第一書記席道隆是模範黨員，1958 年 5 月被省裏選去北京參加大會，那是共產黨最具影響的會議之一。幾個月後，主席號召全力投入公社化運動，席道隆踴躍響應，將所有的合作社，合併成十四個大公社。在民兵的密切監視下，所有東西都歸集體所有，土地、牲畜、房子、農具，直到鍋碗瓢盆都充公了。農民必須服從黨的一切指示。該省黨委計劃將一條黃河支流引到高山上，通過這條水路，將乾涸的高原變成綠洲，通渭正是樞紐，於是五分之一的農民被派去興修水利。為了滿足領導要求，加速完成工程計劃，一半村民在農忙時節被派到遙遠的建築工地上。農作物爛在地裏。在這座長期貧困的縣裏，農民本來就生活艱難，大躍進開始後第一年，就有 19.5 萬畝土地廢棄不種。收成年年減產，從 1957 年的 1.64 億斤，到 1958 年的 1.16 億斤，到 1959 年的 0.84 億斤，到 1960 年只剩下可憐的 0.36 億斤。但上繳公糧卻逐年增加。席道隆上報說，1958 年糧食大豐收達到十三萬噸。政府收走三分之一。1959 年他報告的糧食產量又提高了一倍。國家當時雖然「只」徵收了相當於上報產量的一半，卻根本沒有糧食剩下。[3]

有怨言的村民被劃成右傾份子、破壞份子或者反黨份子。縣長田步霄看到農村的情景，深深震驚。他被譴責為反黨份子，被當做「小彭德懷」，不斷受到批鬥，於 1959 年 10 月自殺。一千多名幹部，通過不同形式發表不同意見，均遭懲罰。有的被撤職，有的被關押，然而折磨依舊在蔓延，尤其是對村民的折磨。村民被活埋在黃土山上的窯洞裏。冬天就被埋在雪下。還有其他懲罰工具，比如竹籤。送交省委的文件的最後版本裏附加了一份未編輯的報告，其中有句話提到：「打死人漚綠肥」。[4] 超過一千三百人被打死或折磨死。到了 1959-1960 年冬春，人們吃樹皮、樹根和穀糠。[5]

大饑荒之後過了幾年，通渭縣委編輯了一份報告：1959-1960 年大約六萬人死去（該縣 1957 年有村民二十一萬人）。沒有一家不挨餓。幾乎人人都有親戚餓死。兩千多戶全家死絕。[6]

席道隆最後被拘捕，然而，能夠在幾年中實行這種恐怖統治，如果沒有上級領導的支持也不可能。他的上級之一就是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通渭歸定西管轄。而竇本人需要定期向甘肅省的頭頭張仲良匯報工作。所以席道隆也承受強大壓力，凡是企圖逃離本土的村民都被看成是「壞人」，都犯了「反黨罪」。為了上繳更多的公糧，他不斷施壓，宣稱「寧可百姓餓死也不能向國家要糧食」[7]。但到最後即便是他的上級也無法忽視饑荒的嚴重程度，1960 年 2 月從省會蘭州派下來一支百人工作組。席道隆和他的助手被逮捕。[8] 一個月之後一份報告被送交北京。中央領導宣佈通渭「完全變質」。[9]

* * *

和甘肅不同，四川富饒肥沃，自古被稱為「天府之國」，有亞熱帶叢林，數百條河流從古代就被引流用作灌溉。這個大省，面積相當於法國，情況複雜多樣。川西高原有深峭的峽谷和崎嶇的山脈，零星居住著一些少數民族；與之成爲對照的是成都附近的盆地，丘陵和沖積平原養育著幾千萬農民。這個省，每年餓死人達 10% 以上的縣，比任何地方都多。大多都是環繞盆地的貧瘠山區，但也有不少分布在重慶週圍。重慶是依傍著長江岸邊的峭壁而建立起來的城市。

例如，涪陵就屬於這種情況。這裏曾經是個比較繁榮的縣城，座落在重慶外圍的邊遠地區，沿著長江，開墾梯田。擁有一萬五千人口的堡子公社被稱為「涪陵的穀倉」，產量很高，經常把收成的一半上繳國家。沿著大路，天天都能看到四百來人把穀子、蔬菜和豬送進市場出賣。但到 1961 年，糧食產量垂直下降了大約 87%。田裏荒草叢生，死了一半人口。是「共產主義風」吹遍了整個公社，在瘋狂的共產風潮中，磚、木、鍋、農具，針，嬰兒尿片，統統充公，保存任何個人

財產都被視爲「右傾保守主義」。當時的口號是：「三年不種地，也能吃飽飯」，於是 70% 的勞力被調出去修建大食堂、豬圈和市場。留在地裏耕種的人必須服從公社命令，比如，成片的玉米被拔掉，因為黨的一位副書記認為葉子的朝向有錯誤。另外，密集種植使得稻穀在最肥沃的土地上也無法成活。這個公社的很多地方，把種水稻的梯田抽乾，改種蔬菜，結果招來一場災難。還有，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命令說，進步的單位應該做出貢獻，把山畫成綠色，在山坡上種滿麥子，於是農民不得不放棄肥沃的梯田，走出若干里路之外，來到岩石嶙峋的山上去開荒。

為了掩蓋農業總產量的急劇下降，1959 年公社領導聲稱，農作物收成是 0.22 億斤，其實只有 700 萬斤。國家收走了 600 萬斤。民兵到處搜查，嚴防有人私藏糧食，見到什麼就拿什麼。批鬥打斷了每天的生產生活。體重成了劃分窮人和富人的階級界限：胖的就是右傾份子，右傾就要不停被批鬥——常常被鬥死。到最後，人們沒有吃的只能吃樹皮和泥巴。堡子公社的某些村子，三分之一的人都死去了。【10】

堡子絕不是例外。整個涪陵縣死亡率都很高，有的村子，1960 年中僅一個月就死了 9% 的人口。【11】全部地區，平均死亡率在 40%-50% 的生產隊並不罕見。【12】

重慶地區其他縣，1960 年死亡率也超過 10%，比如石柱、秀山和酉陽。在石柱，民兵不許村民找樹根和野草吃，挨家挨戶把鍋子都收走，不許在食堂以外煮飯吃。暴力很常見，縣裏有些地方成立「打人隊」維持紀律；有人就帶著鉗子和竹籤。某公社副書記陳智林，打過幾百人，打死八個。有人被活埋。根據公安局的統計，在整個縣，僅 1959-1960 年，有大約六萬四千人死去，佔人口的 20%。大面積的死亡令當局不安，最後死人就被集體掩埋。四十具屍體被扔在水田公社的一個深坑裏。另外六十具屍體就埋在城關鎮公路旁邊一條淺溝裏，埋

得十分潦草，其中二十具露出地面，很快被惡狗咬噬。棺材木很少，幾個同時死去的小孩子，就用籐筐抬出去埋葬。[13]

從長江兩岸青蔥的峽谷一直往西，便是青藏高原，激烈的戰爭曾經染紅了那裏的草地。色達是甘孜自治區的一個縣，1959 年拉薩發生叛亂，達賴喇嘛被迫徒步流亡，翻越喜馬拉雅山逃到印度，之後，色達的藏民被包圍起來，強迫集體化。在 1958 年底以前，甘孜發生過幾十起叛亂，上千人被捕，許多人被殺。[14] 色達在集體化之前，人們大量宰殺牲畜，因為牧民寧可將羊宰殺也不肯上繳政府。上萬隻牲畜被屠殺後吃掉。那些掌管糧食的幹部不願意分配食物給遊牧民族，把他們視為敵人，派民兵把所有能拿的物品拿走。人們被合併到匆忙成立的公社裏，許多人死於疾病。從前，這些遊牧民族一年到頭都能找到潔淨的水，現在被趕進粗劣的缺乏基本設施的營房，不久就糞便成堆，垃圾滿地。大約一萬六千人中，1960 年就有 15% 的人死亡，其中 40% 是被打死或者折磨死的。[15]

* * *

貴州和位於北部的鄰省四川不同，是個窮省，歷史上經常發生少數民族叛亂，少數民族佔人口的至少三分之一，他們大多生活貧困，住在山裏或高原上。貴州多山，被稱作「山國」。赤水是運鹽路上的一個戰略性關口，一度很繁榮，現在是個廢棄的邊境村落，與四川臨界。河水流經一段紅色砂巖的峽谷，挾帶著沖積物，因此有了「赤水」之名。1935 年 3 月，紅軍多次渡過這條河，這個縣因此成為聖地，革命後當地領導大力推進。赤紅色的高山上，長著巨大的杪欏和鮮綠的竹林，小村落散佈其間。許多人在河水及支流兩岸種植稻穀和甘蔗。從 1959 年 10 月到 1960 年 4 月，大約兩萬四千人死亡——超過人口的 10%。[16]

縣委書記王臨池三十五歲，相對很年輕。1958 年他獲得一面令人艷羨的紅旗。中央領導表揚他將一片死水改造成為「千斤縣」。他靠的

都是大躍進中倡導的新花樣。赤水在王臨池的領導下，深耕就是深挖三四尺，越深越好。密植就是大量撒種，往一畝地撒 27 到 60 斤種子，有時候竟然撒進 2000 到 4000 今，甚至 6000 斤。這位縣長發明了許多偉大的技術，其中之一就是灌溉工程：將水通過竹子做的管道，傳輸到全縣各地。縣裏的口號是「空中水管化」。但這項工程最後慘敗了。大片的竹林被砍伐，當地失去了一項必需的資源。

赤水大躍進的結果是糧食產量直線下降，牲畜基本絕跡。然而王臨池毫不動搖地維持他的聲譽。早在 1958 年 9 月——趙紫陽寫報告指出廣東瞞產私分糧食的好幾個月之前——他就宣佈說，有一部份糧食被「富農」和「壞份子」私藏起來，這些人頑固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一場毫不留情的反擊戰開始了，要求武裝民兵保護公社，防止反革命。當地群眾十分恐懼。一年以後，廬山會議召開，村民被劃分為「貧農」和「富農」。富農身後站著地主、反動派、反革命和其他妄圖破壞革命的份子。「貧農和富農鬥爭，你死我活！」幾千名幹部因為階級成份不純而被驅逐出黨。組織大規模遊行、批鬥會和反窩藏運動，以清除每一個階級敵人。王臨池和毛澤東一樣也是個詩人，他賦詩盛讚工人階級，排練傳統戲，並親自演男主角，幾百位客人被邀請來舉行宴會，欣賞表演。同時，農業被荒廢：1960 年 1 月王臨池上報給貴陽市領導的產量是高達 0.67 億斤，其實真正的產量只有 20%。[17]

王臨池不是貴州的特例。貴州是一個激進省，其領導周林是毛澤東的緊密追隨者。在周林的默許下，全省各地都受到鼓勵，採取激進手段投入大躍進，最後導致該省死亡率是全國最高之一。

在以茶聞名的湄潭，六個月中四萬五千人死亡。縣委第一書記王卿臣，隨意分派五萬勞力去建造大規模的茶園、果園、灌溉設施和公社建築，為的是將湄潭變成全國模範縣。徵用了四萬頭豬，為的是建成「萬豬城」。誰批評這些工程，誰就是「鼓吹萬惡的修正主義」，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1960 年警察和民兵開展「大捕大押」

運動，橫掃全縣，一個月內關押了近三千人。一句簡單的口號可以概括湄潭的精神：「搞不出糧食來就不發口糧」。[18]

四萬五千人的死亡數字已經算相當高，但即使這個數字也是被低估了。根據省黨委的一份調查，僅僅在一個公社，有一萬二千人「餓死」，佔人口的 22%。[19] 從整個村子看，有份更為詳細的調查顯示，超過三分之一的農民死亡。農茶曾是個相對繁榮的村子，每家每戶都養幾隻雞鴨，但到 1961 年，糧食產量與 1957 年相比減產三分之二。蔬菜很難找到。甘蔗製品曾經是農民不可或缺的產品，用來交換食物和其他貨品，卻被基本剷除乾淨。在搞完深耕和土地改造等試驗之後，許多土地都荒廢了。有的被稱作「月亮田」，因為坑坑窪窪的土地再也留不住任何水份。工分也不計算了，村民能否從混亂的食堂得到吃的，全憑當地領導的好惡。沒收個人財產，禁止自留地。儘管糧食減產，上繳公糧的數目依然高得驚人：1959 年四分之三的糧食都被政府官員強行徵走，任由村民們挨餓。到 1961 年，整個村子只剩下一頭豬。[20]

1960 年 4 月，當一支檢查組要來湄潭時，當地領導日夜加班，忙於將屍體集體掩埋在路邊。患病的村民和無人照料的孩子被鎖起來，由民兵監視。被吃光皮的樹被連根拔起。[21] 1960 年 3 月，聶榮臻在該地區視察時，對貴州的情況感到十分驚喜，寫信給毛澤東：「貴州其實一點都不窮，而是富得很。將來會是我們西南地區的重工業基地。」[22]

* * *

黃河在高原上經過長途跋涉，在下游與大運河交匯。大運河是一條人工河，興建於七世紀，用於將進貢的糧食從南方運到北方皇帝所在的都城。據說修建這條運河系統用了四萬七千多名工人。在十五世紀中期的鼎盛時代，每年承載大約一萬一千艘運糧船。齊河是山東主要的河港，在濟南西北，處在黃河的戰略位置上，本該發展很好。大躍進之前它被稱為「穀倉」，豐年時糧產量可達 4 億斤，對於大約五十

萬人口的縣城可以說富足。棉花、煙草和水果也廣泛種植。但 1961 年齊河失去了十萬人口，相當於 1957 年人口的五分之一。存活下來的，一半是病人。經濟一塌糊塗。1956 年糧食產量是 4 億斤，幾年後只剩下區區 0.32 億斤。花生種植遭到的重創更大：1956 年的收成是 7780 噸，1961 年只收穫了可憐的 10 噸。幾乎所有產量都減少到 1958 年之前的十分之一。連可耕種地的面積也縮減了，因為五分之一的土地被用來修建水利或者修路，大多數工程根本沒完成。在北方所有地方，鹽鹼地的面積都翻了一番，達到耕地面積的幾乎三分之一。儘管——應該說因為——大量投資建設蓄水工程，灌溉總面積減少了 70%。耕地之外的損失也很明顯。牲畜少了一大半，農用車減少，像耙子和鋤頭這樣的簡單農具少了上萬件。一多半的樹被砍倒。全縣的房子有 38% 被毀。那些還保留著的，有四分之一嚴重損壞，亟待修繕。大約一萬三千家庭甚至沒有一間自己的屋子。[23]

韓莊是齊河縣諸多的小村落中的一個。1957 年有 240 名村民，但到了 1961 年僅剩 141 名。四分之一的村民死於饑餓，六分之一的家庭是全家因餓滅門——在一個注重傳宗接代的文化中，家庭依然佔據重要地位，儘管官方處處宣揚階級鬥爭。從 1958 年到 1961 年，全村只有四個孩子出生，其中一個夭折。許多村民都是單身，大多數是病弱的人，其他村的女人不願意嫁給當地男子。村子失去了 40% 的土地，剩下的土地有一大半是重度鹽鹼地，幾乎寸草不生。當地人說：「出門一望白茫茫」，觸目所及都是鋪滿白鹽的地面。在這貧瘠、枯竭的土地上，立著一些被廢棄的泥草房。

村子裏本來總共擁有 240 間房子，只剩下 80 間，而且大多數屋頂漏水，牆壁塌陷。在這些可憐的房子內部，一無所有，正如一個檢查組所披露的：「大饑荒時期家家戶戶都破產度荒。輕的賣衣服、傢俱，重的把鍋、碗、勺、盆，房屋木料都賣了。全村財產全部賣光或基本賣光的有 27 戶。」例如楊吉茂 1960 年離開村子。他的妻子和孩子只能

靠賣家裏的東西活下來。他們沒有牀，沒有鍋，沒有耕地的農具。全家人共用一方破毯子和一件破舊外套。還有人家境況更差。三十三歲的劉再林是少數幾個留在韓莊的，不久就餓死了。他妻子懸樑自盡，留下兩個孩子被村民收養。

被派到山東調查情況的工作組無法指責濫用職權的幹部，他們跟甘肅或者廣東的幹部情況不同。但饑荒期間的政治任務很明確。大躍進開始後，村長換了十五次。誰也不能違抗上面壓下來的苛刻的公糧指標，1959 年，村民每人只剩了二十五公斤糧食——這是他們全年的口糧。大量徵召勞力修建灌溉工程，但毫無作用。1959-1960 年冬天韓莊四十六名最精壯的勞力被徵調。他們連續工作四十晝夜，在國家命令下累得筋疲力盡。有人在寒冷中挖土時死掉了，還有人在回家的途中死在路旁。[24]

整個山東有無數村莊都處於同樣的惡劣境遇，經過四年的大規模迫害已經被拖垮。1959 年已經出現前期預兆。山東一名高級幹部譚啟龍，親眼目睹濟寧地區幾個縣裏，樹皮都被剝光了，孩子們被遺棄，農民死在路邊，面頰因饑餓呈菜色。在巨野，人們吃枕頭裏的草；幾千人餓死。譚啟龍將這種情況報告給省委第一書記舒同；他同時又做了件不尋常的事，將報告複印後遞送毛澤東。[25] 幾週之後，主席乘專列經過此地，舒同不得不悔恨認錯，向主席解釋「濟寧事件」。[26]

但舒同沒有採取任何措施救災。他承認，他討厭壞消息，根本不願談到山東「一個指頭」的缺點，威脅那些批評大躍進的人，扣上「右傾保守主義」的帽子。[27] 根據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們說，他的烏托邦空想害死了無數人的性命，一旦有人阻止，這個土皇帝就暴跳如雷。「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他將毛澤東的建議當成聖旨，搶在農民吃掉糧食之前，大量收繳公糧，以滿足北京的要求。[28]

* * *

甘肅、四川、貴州、山東——1960 年這些省裏都有若干縣死亡率超過 10%。但這些地方都沒有安徽嚴重，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是毛澤東最忠誠的追隨者之一。安徽像其他省一樣被劃分為十幾個地區。其中之一是阜陽。阜陽 1958 年有八百萬人口。此後三年內死了二百四十多萬。[29]

死亡率如此高，其中一個原因是土地條件本身。這裏地勢平坦，基本一片荒蕪，無處藏身。許多逃荒的人沿河來到鄰省河南的信陽地區，但那裏的饑荒情況更嚴重。淮河流域本身成了死地。1957 年它成為一項龐大的水利工程的中心，動員了 80% 的勞力。每 15 畝地都要建管道，每 150 畝挖一條水渠，1500 畝修建一條大渠。田野要像鏡子一樣平滑，土壤要深耕，直到像麵團一樣軟滑。阜陽被規定必須在一到兩年之內達到這個目標。[30]「雨天當晴天，黑夜當白天」，「日戰太陽夜戰星，白天比紅旗，夜晚比紅燈」。這些標語背後，是不斷壓迫最精壯的勞動者沿河工作。很多人累病，累垮，累死。[31]

為了阻止民工們春節回家，民兵查封了他們的家。為了絕對確保大壩、大堤和運河的順利修建，所有障礙都要清除。樹木、墳地、甚至大橋，都被推倒，農民不得不每天徒步好幾公里去種地。[32]領導一時心血來潮，整個村莊就得在一夜之間遷移：幾百個村子從此在地圖上消失。[33]

播種和收割沒有完，最好的勞動力就從地裏被帶走，去參加其他更宏偉的工程。糧食太豐富了——這是黨的路線政策——穀物應該用來釀酒。亳縣努力成為釀酒「千噸縣，百噸社」，1959 年 1 月建了 3200 多個酒廠。投入使用的不到一半，多少噸糧食都被糟蹋了[34]。

農業機械化是同樣具有破壞性的嘗試。大約一萬台農用車被裝上笨重的鐵輪，重得牛都拉不動。[35]更嚴重的是，未經改造的舊車不允許在路上使用，誰用了誰就被譴責為「右傾份子」。[36]

糧食產量大幅下滑，但狂熱的幹部們上報的數字卻是成倍增長。隨之而來的就是幾近掠奪的徵購；經常通過暴力，收走將近 90% 的糧食。[37] 為了彌補糧食缺口，幹部們闖入百姓家裏，抬走桌椅和牀。農民們被迫要上繳一定數量的棉衣，每家必須上繳幾公斤，完不成指標就不能進食堂。趙懷仁不得不把七十歲老母親和孩子的棉衣都上繳了。在徹骨的寒冷中，他們只好將身子埋在乾草裏取暖。到 1960 年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上交了，有個公社沒收來的最大財物是一百口棺材。[38]

虐待變得猖獗。用鐵絲穿過「壞份子」的耳朵，婦女被脫光衣服，綁著她們頭髮吊起來。用界首縣一個幹部的話說：「把她們的奶子擰出水來。」[39] 在臨泉，有個當地的黨幹部這麼總結當地使用暴力的情況：「從死人的慘狀看，自殺吊死，扣飯餓死，有的活埋死，有的是嚴刑拷打死，刮耳朵，挖鼻子，撕破嘴等等殘無人道的刑罰，害死了生命，檢查起來，十分嚴重。」[40] 殺人很常見。臨泉的一個小村叫大黃莊，十九個幹部中有九個在饑荒期間至少殺死過一個村民。隊長李鳳英殺了五個人。[41]

有些地方村民是被故意陷害的。1959 年底，饑荒最困難的時候，在阜南縣糧食局下屬有個食品加工廠，院子裏放著豆餅，大門敞開。當饑餓的村民想偷吃時，門突然在他們身後鎖上了。「有的被裝在麻袋裏，封住口，用鐵條抽打。血都印到麻袋外面來；有的先用刀子劃破臉，然後將油漆塗在刀口裏。」[42]

災民的救濟物資被扣留。有個縣，送去賑災的 3 萬斤糧食被沒收，加速了幾千人的死亡。[43] 當地領導故意向檢查小組隱瞞饑荒真相，也造成百姓死亡。例如，讓民兵封鎖全村，那些有饑餓模樣的人不能出現在街上。[44] 1960 年某公社為了應付內務部的檢查，縣裏的領導匆忙圍捕了三千多名患水腫的村民，把他們藏起來。這些村民被鎖住，沒有任何醫療條件，幾百人在數天內死去。[45] 其中有個水腫病人

秦宗懷，檢查組快到時，當地幹部匆匆看了他一眼，下令道：「他不能活了，快埋掉。」黨支書劉道誠向地委後來匯報說：「他在埋時還在出氣。」[46]

36
人吃人

饑荒之前，農村裏熱熱鬧鬧。小販的吆喝老遠就能聽到，有人故意發出卡嗒卡嗒的聲音招攬生意。遇到特殊日子還會敲鑼打鼓放鞭炮，比如紅白喜事。大喇叭裝在街角或者村廣場的樹上，播放著宣傳口號和革命歌曲。拖拉機和公交車來來往往，在身後揚起滾滾黃煙，一路不停按喇叭。人們隔著田地兩頭大聲交談，不知情的人還以為他們在吵架。

然而，幾年饑荒之後，農村籠罩著一片死一般的沉默。少數沒有被沒收的豬，不是餓死就是病死。雞鴨早就被宰光了。樹上沒有一隻鳥。樹本身也被摘光了葉子剝光了皮，光禿禿，瘦伶伶，淒涼地立在荒蕪的地平綫上。人們餓得話也說不出來了。

所有能填進肚子的，包括樹皮和泥巴，都被搶來吃了。在這樣的境況下，死人只能草草掩埋，或者乾脆扔在路邊。有些人於是吃人肉。始於雲南。雲南是 1958 年夏遭遇饑荒的。最初是把病死的牲畜屍體挖出來吃，隨著饑荒進一步惡化，有人竟然把死屍挖出來煮了吃。[1] 不久每一個被饑餓煎熬的地區都出現了這種現象，連形勢相對較好的省份如廣東都有。例如羅定的替濱公社，1960 年每二十個村民中有一個餓死，幾個死孩子就這樣被吃掉了。[2]

沒有檔案提供人吃人的資料，哪怕是間接的。但一些公安部門的報告卻寫得十分詳細。在甘肅西禮縣（當年西和縣與禮縣合併為西禮縣——譯者註）一個小村子，村民發現鄰居的棚屋裏飄出煮肉的氣味。他們向村支書匯報，支書懷疑有人偷了羊，就進屋搜查。他們發現桶

裹裝著肉，還有一隻髮夾、飾物和一條圍巾被埋在坑底。這些物品很快就被認出來，屬於幾天前在村裏失蹤的一個小女孩。此人不僅對這起謀殺供認不諱，還承認另有兩次把小孩子的屍體挖出來吃掉，後來村民們發現有人挖墳，採取措施保護，於是他就開始轉向殺人。[3]

人肉就好像商品一樣在黑市上交易。有個農民在張掖火車站用一雙鞋換了一公斤肉，發現裏面有一隻人鼻和幾隻人耳朵，於是向當地公安局報案。[4] 為了防止敗露，有時候人肉會和狗肉混在一起，在黑市上出售。[5]

但沒有人系統地整理過這方面的報告。在當時的情況下，一個幹部只要提到饑荒，就會惹來麻煩，任何地方出現吃人的案子，都被隱瞞下去了。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本人就聽到在通渭、玉門、武山、靜寧和武都有一系列人吃人案件，但他一概置之不理，怪罪於「壞分子」。[6] 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同樣把吃人事件壓下去，害怕負面消息會影響他的聲譽。[7] 赤水縣委書記王臨池（赤水即上一章提到的恐怖之地）派當地警衛逮捕那些吃人的村民。[8] 這是一個難以說出口的話題，因此在一份遞呈黨領導的報告中，類似事件被說成是反動份子為了破壞黨的光輝形象，誇大饑荒的程度，於是挖出屍體，假裝要吃人肉。[9]

少數比較全面的文件保存下來。其中一份是由臨夏市某市政部門於 1961 年三月整理的，臨夏在蘭州南部，深受伊斯蘭教影響，是當地首府，主要人口為回族，是各少數民族雜處地區，包括藏族、撒拉族、保安族和東鄉族。該地區在大躍進期間大規模集體化，各民族的風俗習慣都被踐踏，深受其害。該地區饑荒時期產生怎樣的直接後果，有一份調查顯示，僅僅兩年間五萬四千人死亡。[10] 報告列出大約五十起事件——在臨夏一個市發現的，不是指整個地區——為了維護領導，全部都泛泛地列成一份清單，恐怖行為都被縮小為一些簡單的事件和數字。下面是四個此類案件的細節：

時間：1960. 2. 25.

地點：紅臺公社，腰閣家村。

作案人：楊忠生。成份：貧民。作案人數：1.

被害人姓名：楊三順。與作案人關係：親弟弟。被害人數：1.

作案方式：殺死吃掉。原因：生活問題。

時間：（空缺）。

地點：（空缺）。

作案人：馬麻乃。成份：貧民。作案人數：全家 4 人。

被害人姓名：（空缺）。與作案人關係：（空缺）。人數：13.

作案方式：挖屍體吃。原因：生活問題。

時間：1960. 1. 9.

地點：買集公社張灑麻村。

作案人：康尕麥。成份：貧民。作案人數：1.

被害人姓名：馬哈買吉。與作案人關係：同村人。人數：1.

作案方式：用斧砍死燒吃。原因：生活問題。

時間：1960. 3.

地點：紅臺公社小溝門。

作案人：朱雙喜。成份：貧民。作案人數：2.

被害人姓名：（空缺）。與作案人關係：丈夫、長子。人數：2.

作案方式：吃屍體。原因：生活問題。

名單裏的大多數作案人都吃人，要麼是吃剛死的人，要麼是把已經掩埋的屍體挖出來吃。這 76 名受害者可以分成三類：被謀殺後吃掉（12 人），死後被吃掉（16 人），以及被挖出來吃掉（48 人）。那些被謀殺的，大致一半是同鄉村民，一半是過路的陌生人，只有一起謀殺案發生在家庭內部。[11]

臨夏不是絕無僅有。1961 年初，有個工作組被派去調查四川石柱縣橋頭公社，他們被人吃人的程度震驚了。他們並不像通常那樣做一下記錄，表明有此事件，而是在當地公安局的幫助下，設法對一個生產隊展開深度調查。他們整理的名單裏詳細記錄了 16 名受害人和 18 個罪犯。顯然，第一個吃人的是七十歲的女子羅文秀，她把兩個小孩的屍體挖出來煮熟吃了。有時候只吃屍體的某一部份，例如把馬澤民的心挖出來吃掉。這可能跟大多數屍體都已經重度腐爛有關。有些人吃屍體時撒上辣椒。【12】

俄語中有兩個不同的詞：「食人」和「食屍」。這是個非常有用的區別，因為發生這種事情不僅共產黨自己感到驚駭，更為黨的敵人所鄙視，有了這樣兩個不同的詞可以使這個話題變得微妙，這是很有必要的。為了維護自己的制度，用比喻的說法來談論人吃人的事情。當村民們一遍遍地提到盜屍者、青面獠牙的食人魔、以及易子而食之類的故事，整個吃人行為聽起來就像籠罩著一團神秘的煙霧。【13】

然而，臨夏和橋頭的案子告訴我們，真正把人殺了吃掉的食人魔其實沒有多少。許多人是渡荒者，為了生存，不得不走到吃屍體的地步。他們怎麼會想到吃人肉，原因各各不同。然而，他們掙扎在生死線上，一定看到過許多加諸活人身上的恐怖行為，從砍掉人身的某一部位，直到把人活埋。人性在這場由國家發動的暴力中淪喪了。當然，人吃人絕不是最常見的，也不是最廣泛的。

37
最終計數

死了多少人？這個問題永遠不可能有準確的答案。其中一個原因是，大饑荒期間很少有可靠的數據被保留下來。

全書到此，其中每一個值得注意的估算數字都來自 1984 年國家統計局首次出版的《統計年鑒》，以其中所公佈的 1950-1982 年官方的人口統計以及出生、死亡率數字為基礎，或者參考 1953、1964、1982 年官方的人口普查數據。緊隨著《統計年鑒》的出版，Basil Ashton 即利用這些官方資料估算出 1958-1962 年間非正常死亡有三千萬人，當時的人口總數大約是六億五千萬。[1] 一位專職的人口統計學家 Judith Banister，通過人口數據也得出結論，1958-1961 年非正常死亡估計是三千萬人。[2] 由於資料本身存在一系列問題，例如缺乏內部的一致性、出生死亡登記不全，以及不包括軍隊人口，因此不同的專家只能輔以這樣那樣的變量，將數字減少或者增加。1987 年一位人口研究專家彭希哲估算是二千三百萬人，而張戎在她一本關於毛澤東的書中，說是三千八百萬。[3] 更近一點，退休記者楊繼繩認為是大約三千六百萬——也是基於已公佈的統計數字。[4]

2005 年出現了新的證據，上海一位歷史人口學家曹樹基，系統深入地研究了一千多本地方志——1979 年之後由縣委或市委官方出版的地方史料。他承認這套完全不同的數據也是以共產黨的數字為基礎的，但更為細緻地分析了地區間的差異。曹估計，非正常死亡人數為三千二百五十萬。[5]

官方數據有多可靠？在蘇聯，中央統計局給出兩套人口統計數據，一套內部流傳，一套公開。我們從虛報糧食產量就可以看出來，中國共產黨的檔案，在公社、縣、省一直到中央的每個層次上，都有不同的統計數據。何況有的是集體化高潮時編撰的，目的是為了宣揚政治激情；另一些則是派到鄉村的調查小組收集的，目的是檢查濫用職權的幹部，準備逼迫他們離職。換句話說，爭論公佈出來的數據是否偽造已經毫無意義。任何人都沒有必要偽造，這不過是編制一套看來能盡量避免政治傷害的統計數據而已。或者，用一種略有不同的說法，一黨統治下，官方數據即使沒有造假，也不一定意味著可靠。

檔案中至少存在著三套不同的內部數據，即分別由省公安廳、地方黨委和地方統計局整理的。沒有任何人能夠看到完整的三套數據。據黨內高官陳一諮說，曾查到饑荒期間死亡人數為 4300 萬到 4600 百萬。[6] 在研究大饑荒的人中，只有一個人把陳一諮的話當真——那就是 Jasper Becker。他採訪了陳，後來在 1996 年出版了《饑餓的幽靈》一書。下面首次披露的檔案資料將 1958-1962 年大饑荒時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數字保守估計為至少 4500 萬。

* * *

即便是陳一諮他們，在調查時大概也遭遇到困難。在一黨專制下，檔案不是公開的。它們為黨所有，受黨控制。除了一些被移交給各公安局的，其他大多數都放在各地黨總部的大樓裏。即使是從北京來的享有特權的人物，也會被敷衍搪塞，或者被有經驗的檔案員故意誤導。尤其如果有的檔案沒有目錄，更是如此。在多數情況下，有些檔案乾脆遺失了。例如在湖北，從黨委拿到的文件本來應該涵蓋饑荒期間的非自然死亡人數，但卻是不完整的。棕色的卷宗裏有一張檔案員夾進去的手寫的便條，日期是 1979 年 6 月，抱歉地說，裏面的東西「弄丟了」。[7] 至於公安廳，湖北公安廳的檔案只提供了一個粗略的估

計，推測 1961 年死亡率比前一年低兩到三倍。報告提出了總死亡率是多少的疑問，但沒有給出答案。[8]

在所有地方，這三個組織——省公安部門，省黨委和省統計局——都必須一層層依靠下一級部門提供報告，而下級部門也常常阻撓。1962 年甘肅省委下令要求估算饑荒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但這項工作後來被擱置了，因為只有寥寥幾個縣響應。[9]

即便是縣有關部門把數字上報了，依然存在著問題。首先是如何區分「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人口統計學家區分二者是為了梳理出一個粗略的估算數字，到底有多少人死於饑荒而非壽終正寢。但在中國，這一區別就是政治性的。工業事故、自殺、致命瘟疫、或者餓死，都是令當局尷尬的問題。這是社會和政治健康的風向標，一絲不苟地被黨監控著。哪怕僅僅一起自殺案件就能說明社會出了問題，需要自上而下開展一場政治調查。安徽的恐怖地帶之一阜陽，百姓大批死亡，有的村子死亡率達到 70%，該地區上報說，1961 年第一季度死亡人數為 10890——但其中只有 524 人被界定為「非正常」死亡，包括 103 死於「消瘦」和「水腫」的人[10]。在四川榮縣，縣委書記徐文正竟然下令說，官方統計必須遵循兩個原則：出生率必須高於死亡率，死亡率不得超過 2%。同樣在四川，在涪陵，保存著兩套統計數據。1960 年基層統計的總人數為 594324，但上報的數字是 697590，出入超過十萬。[11]

即使幹部願意直面饑荒的嚴酷現實，在死亡如雪崩的時候又該如何作出記錄？ 1960 年 12 月，在四川江津和江北縣，每天都有 250 人死去：基層幹部哪裏還會想到每天巡視，將死亡人數列成一份清晰的名單，即便他們的領導特別要求這樣做。[12] 有些基層幹部和公安部門試圖報告死亡的嚴重程度，他們通常被劃為右派。四川溫江縣公安局長趙健，系統地編輯了 1959 年的人口統計，發現比前一年少了兩萬七千

人，也就是人口少了 16%。他的上級、該省的領導批評他，然而他拒絕修改數字，於是直接導致了他政治生命的結束。[13]

自下而上一片混亂，一直到最高層都是如此，使得情況更為複雜。河北省長劉子厚——跟其他許多人一樣——按規矩向毛澤東報告了 1960 年整個河北有四千七百起「非正常」死亡，其實他自己的工作組成員之前僅僅在一個縣就發現，自 1958 年以來大約一萬八千人餓死[14]。頗為諷刺的是，他一邊對隱瞞饑荒程度的縣領導加以懲罰，一邊卻用虛假數字欺瞞自己在北京的領導。[15] 每一層的黨領導都逼迫自己的下屬說真話，卻對自己的上級隱瞞，自欺欺人，莫此為甚。說知識就是力量已經是陳詞濫調，我們不用仔細想就能明白，越是絕對的特權力量，能得到的真知就越少。

然而這麼大規模的死亡很難永遠掩蓋下去。有時基層幹部冒著風險，實話實說，把報告越級遞交，偶爾也會遞到周恩來或毛澤東本人手中。1960 年 10 月之後，調查組遍佈農村，整理出極為詳細的報告，直接導致一大批造成大量百姓死亡的幹部下臺。饑荒過後的幾年中，有時候會進行回訪，因為共產黨希望搞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調查結果往往不是條理分明的、反映真實情況的有說服力的數據，而是一大堆有矛盾的、有時候甚至是混亂不堪的文件，通過不同方式、在不同時間、出於不同原因、來自不同的組織、有著不同程度的可靠性。因此派出二百人的調查組去篩選證據，確實是必要的。

這些文件中最好的部份是由一個有權威的公安局編寫的，報告了整個省的情況。我們已知，當時全中國受害最嚴重的省份不是安徽，而是四川。省公安局長授權調查 1954-1961 年間的統計數據。調查結果比許多報告的總和更為嚴重，單 1960 一年，那些報告大大低估了死亡率。1954-1957 年間正確的死亡率是：1954-1957 年是平均 1%。1958 年上升至 2.5%，1959 年是 4.7%，1960 年是 5.4%，1961 年是 2.9%。1958 到 1961 年間死亡人數加起來就是 1060 萬。其中 790 萬（已經超過了

1%）可以被視爲「非正常死亡」。[16] 但四川和全國其他地方不同，1962 年饑荒仍沒有結束，依然有無數報告稱許多縣還存在著饑荒，饑荒一直持續到 1962 年底。公安局整理的數字顯示，當年有 1.5% 的死亡率，也就是說，又有 30 萬人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總數從而達到 820 萬。[17] 然而即使這個數字也低估了至少 10% 到 20%，只要列出一個原因就夠了：在四川——不同於甘肅等省——儘管李井泉對於死去的數百萬百姓負有責任，他依然牢牢把持著政治局委員和省委第一書記的權位。即使到 1962 年，四川各縣的領導也不敢將災情的真實情況反映上來。

沒有類似的其他文件——截至目前。然而我們卻有地方統計局收集上來的數據。雲南的災情始於 1958 年，當年記錄的死亡率是 2.2%，是 1957 年全國平均數的兩倍：單這一年就相當於 43 萬人非自然死亡，但許多歷史學家援引官方數據，這些數據宣稱，整個 1958-1961 年間只有 80 萬人死亡。[18]

已有資料中最完善的部份是村、公社和縣提供的，編得很仔細。歷史人口統計學家曹樹基利用共產黨出版的地方志，從縣一級的水平來估算死亡率，他的研究和其他人口統計專家提出的死亡人數一致，都是大約 3200 萬，因此就提供了一個很有幫助的基線。按照常理，各地黨委總會想方設法報低死亡率，從這個角度講，曹樹基的估算只能看成是保守數字。下一步就是驗證他的數據，並且提出一個粗略的想法來調整。這些數據著眼於縣級的小行政單位，比全國範圍的統計數字要準確得多。不僅如此，在分析普查數字的時候會受到各種變量的困擾，這些數字使我們能夠排除許多變量，例如國內遷徙、1958-1962 年間軍隊的規模。

然而，要計算「非正常」死亡的數字，必須有個平均死亡率做比較。什麼是合理的？國家主席劉少奇 1961 年在他的老家花明樓，那裏每個月就死好幾百人，談到大饑荒的時候他這麼說：「什麼是正常死

亡？什麼是非正常死亡？打一次受傷致死，跳水死的，都是非正常死亡。1956 年、1957 年死了多少才算正常死亡？可以拿這兩年和現在作比較。除此之外，傳統都算正常死亡。正常死亡是百分之零點幾，一般是 0.8%，生的是百分之二，除了 0.8% 之外，統統是非正常死亡。[19]」為了保守起見，考慮到全國的大不同，可以將 1% 作為正常死亡率。

以河北為例，我們有一些關於 1960 年的非常詳細的報告，得力於省長劉子厚大開綠燈，要求深入調查非正常死亡，「下到每家每戶」。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是一個敢於直言的人，他後來實行包產到戶，為農民爭取更多自由，惹得毛澤東大怒。當時他上報說，1960 年人口死亡率為 1.9%，相當於伍萬九千人。在鄰近張家口的魏縣，1960 年的死亡率為 3.4%，也就是一萬八千人死亡。[20]曹樹基利用官方文件統計出整個三年饑荒期間張家口和魏縣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是一萬五千名。[21]在天津及附近的鄉村——絕不是全國受災最嚴重的——1960 年底三個月中死去三萬人。[22]自然死亡的人數可能只佔不到一半。同樣，曹樹基還是根據官方數字而非檔案資料，提供的數據是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三萬人。還有個例子是當地省會石家莊，包括大約 15 個縣。曹批判性地研究了官方數據，最後得出結論，三年間整個地區非正常死亡為一萬五千人。但在 1961 年 1 月（當時計算餓死人口已經不算是禁忌）只是在石家莊一個城市，僅僅十天內，就有近四千人死去[23]。

天津、張家口和石家莊都是城市，名義上與鄉村的饑荒完全隔離。有個完全不同的例子來自甘肅，1960 年 11 月張仲良被撤職後，在當地展開為時幾個月的調查，那裏的災荒情況被曝光。隴西縣 1959 年有一萬六千人死去，佔人口的 7.5%，緊接著 1960 年死了二萬三千人，佔 11%。單單這兩年非自然死亡人數就達到三萬五千人。然而曹樹基給出的數字是三年死了二萬四千人。[24]在靜寧縣，檔案中記載 1959 和 1960 年死了三萬二千人，大約每年 7%，這和曹樹基給出的三年間非自然死亡一萬九千人的數字大有出入。[25]在總人口大約是二十八萬

的張掖，1960 年 11 月大約死了五千人，接著的 12 月又死了六千人。即使我們將自然死亡率翻一番變成 2%，依然意味著在不到一個季度的時間內，有超過一萬人是非自然死亡。曹樹基估計有一萬七千例非自然死亡，但範圍不同，不是一個縣，而是四個縣；也不是兩個月，而是三年。[26] 1960 年夏，僅武威縣就死了大約兩萬人。曹樹基給出五萬的非正常死亡數據，也是四個縣三年間的人數。[27]

到 1961 年，貴州省委自己估計，與 1957 年相比，勞動力少了大約 10%——也就是說五十萬人，不算孩子和老人。[28] 當然，這些人不是都死掉了，許多人從該省逃荒出去，但整個貴州省死亡率很高，尤其是像赤水和湄潭這樣的地方。在赤水，半年間大約有兩萬二千人死亡，佔人口的 10%。[29] 曹樹基根據該縣的官方數字，計算出三年間死亡四萬六千人，聽起來比較合理。但該縣的情況是，半年就死了四萬五千人。曹樹基所提出的四個縣三年間死亡十萬五千人，肯定是少的。[30] 更有意味的是，雖然他盡心盡責地編寫所有縣的官方數據，有的地方還是遺漏了：銅仁地區的沿河縣沒有被提到，光這個縣，餓死的人就大概有四五萬人。[31]

在山東，也存在同樣大的差異——即使歷史學家無法看到有關檔案。以該省西北的平原縣為例，根據一支高級調查組的記錄，1957 年當地人口為四十五萬兩千，到 1961 年超過四萬六千死亡。儘管有兩萬四千名嬰兒出生，人口總數還是降為三十七萬一千，因為還有幾萬人逃荒離開本地——許多人客死他鄉，因此就沒有算入死亡數字。曹樹基研究了官方數據後提出，平原縣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一萬九千。即便我們把四年間平均每年 1% 的正常死亡率考慮在內，當時報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依然可以達到兩萬八千人，也就是說比他說的高 50%[32]。在齊河可以做同樣的觀察。當地在 1957 到 1961 年間，人口少了五分之一，即少了一萬人。如果我們扣除四年的平均正常死亡率 1%，再假設大約一半的缺損人口可能逃往其他地區（關於這方面沒有清楚的

記錄），得到的數字還是和平原縣相仿，即大約三萬人，而曹樹基提出的數字卻只有一萬九千人，少了三分之一。[33] 在整個萊州地區，包括青島和其他十三個縣，曹樹基的估計是四年間十六萬四千人非正常死亡。但檔案顯示，僅即墨一個縣，根據不完全統計，兩年間大約四萬七千人死亡（不包括逃荒離開的五萬一千名農民）。當地人口大約是七十五萬人，即使我們扣除一萬五千自然死亡人數，得出該縣的非正常死亡依然是三萬二千人——遠遠超過曹樹基的估計。[34]

有的地方檔案數據和公開的資料是一致的。在廣東新興縣，1959年死亡率為1.5%，1960年為2.88%。相當於大約五千人，而曹樹基的統計是三年一共八千人。[35] 廣東江門地區比新興縣大得多，包括好幾個縣，上報給省委的死亡率是1960年有2%（即十二萬人，一半可能會被算作「非正常」），這可能很難和曹樹基重新整理的官方數據相比，因為1961年之後該地區的行政區域重新劃分，大大擴大了，但他估計三年中有十一萬二千人非正常死亡，與以上數字大致相符。[36] 在四川，上面提到，在李井泉的政治高壓下，幾乎沒有哪個縣上報過高的死亡率，沒有一個數字跟幾十年後公佈的官方文件相符，和曹樹基的數字也不同。

在這裏絕不是為了批評曹樹基的工作：相反，他以上千份地方志為基礎，耗盡心思，從縣級單位出發重新整理當時的資料，他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基線，這個基線同其他人口統計學家從更為抽象的統計數據中得出的結論相一致。如果沒有他的努力，根本不可能將這些數字和當時或饑荒過後立即編撰的檔案數據作出系統對比。而當我們用檔案資料和那些官方數字作比較時，我們發現普遍存在低估，有的低估了30%到50%，有的只報了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可能有的報告中誇大了死亡率，但很難知道為什麼。多報死亡人數，得不到任何政治利益。1960年之後在黨內開展清肅時，死亡人數並不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如何死亡才是重要的。根據不同的濫用

職權程度劃分基層幹部。實際上，誇大總人口數是非常有利的。1964年一個工作小組在湖南調查數據，發現總人口整體被多報了1%，有的縣多報了2%到3%。湖南1963年的人口竟然多報了五十萬。「通過試點，發現過去虛報人口的現象是普遍嚴重的。」[37] 1963年公安部開展了一項更為廣泛的人口核查，發現全國都存在同樣的虛報現象，例如甘肅，竟然多報了2.2%。「現在全國六億八千一百萬人口中，估計還有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一點五的虛數。不少基層幹部為了多領布票等東西，他們就有意多報人口。」[38] 一年之後，在1964年官方人口普查期間，中央人口普查辦公室確認「人口虛報的問題比我們原來估計的情況還要嚴重」，河北和河南至少各多報了一百萬，山東不少於七十萬，在這三個省做了詳細調查：關於這個問題也無能為力。[39]

即使我們將檔案數據和官方數字之間最離譜的差異剔除，二者之間依然存在著50%到100%的差別。關於死亡人數，很難提出一個替代性的結論，尤其是許多關鍵的檔案資料被嚴密封鎖起來，那些探尋的歷史學家根本看不到。陳一諮，這位百人工作組中的高級工作人員，查閱了1980年左右的黨內部檔案，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數為四千三百萬到四千六百萬人。我們可以從大量不同的黨組織中得到足夠證據，證明他的數字是一個相當可靠的估計。因而，非正常死亡人數被確認為不少於四千五百萬。

實際情況可能更糟。有的歷史學家估算真正的數字高達五千到六千萬。我們不可能期待有一天檔案會完全公開，使災難的真相大白於天下。但這些都是許多黨內歷史學家非正式討論的數字。根據陳一諮所說，這也是趙紫陽手下的共產黨高級官員在黨內會議中引用的數字。[40] 余習廣，一位經驗豐富的獨立研究者，估計非正常死亡人口為五千五百萬。[41]

結語

轉折點是 1962 年 1 月。七千名幹部從全國各地來到北京，在現代化建築人民大會堂裏召開一場規模空前的工作會議。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座無虛席的會場中，公佈了一份官方報告。他講了三個小時，沒有休息——但常被人打斷。他沒有直接頂撞毛澤東，頂撞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但他公開了他半年前在一個高級領導內部秘密會議中的的發言。他解釋道，湖南的農民認為，所謂的「困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人禍」這個說法像一顆炸彈，讓所有的聽眾倒抽一口氣。劉繼續往下說，他不贊成「九個指頭對一個指頭」，這是毛澤東強調成績大於過失時最喜歡用的說法，氣氛變得更加緊張。「總的來講，成績是主要的，缺點和錯誤是次要的，是第二位。我想是否可以這樣講，總的來一個三七開，三分是缺點錯誤，七分是成績，各個地方也不能一樣。一個指頭九個指頭的關係也不能到處套。有一小部份地區缺點是一個指頭，成績是九個指頭。」主席明顯不快，打斷劉：「不是一小部份，如河北只有百分之二十減了產。江蘇百分之三十地區年年增產。」但劉並沒有被嚇到，繼續說：「總的來講，也不能講一個指頭，而是三個指頭，也有的地區三個指頭也下不去，如信陽地區（河南），天水地區（甘肅）。」誰要為這場災難負責？劉公正地將責任歸於黨中央。[1]

劉確實試圖平復主席的怒火。他捍衛黨的總路線，把對人民公社的評判推遲到五年或者甚至十年以後。但毛澤東還是暴怒了。他對他的醫生吐露說：「他說有天災有人禍。這種說法本身就是禍害。」[2]

林彪將軍在 1959 年廬山會議中挺身維護主席，這時再次讚揚大躍進，稱頌其為國家歷史上最史無前例的成績。他狂熱地說：「毛澤東思

想從來是正確的……毛主席的優點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的。總是比較實際一點，總是八九不離十，總是從實際出發，在實際週圍，圍繞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刻體會到，凡是把工作搞好了，就是毛主席單獨領導的時候，毛主席的領導不受干擾的時候。而當毛主席的領導受到干擾的時候，就會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的實際都證明了這一點。」[3]

周恩來採取了他一向最擅長的做法。他盡力為毛澤東開脫，對過去發生的問題自己承擔了大部份責任，徵購高、人口虛報高、上調高、出口高，將這些都歸咎於自己。「這是我的錯誤。」他宣佈說，還繼續聲明，「這幾年缺點錯誤雖然嚴重，但屬於執行中的具體改革，具體工作問題缺點錯誤，恰恰是因為違犯了總路線和毛主席寶貴的指示。」[4] 他想盡力搭起一座橋來讓毛劉二人修好，但無濟於事。

我們永遠不可得知到底是什麼時候毛決定搞掉劉的，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革所有大躍進期間反對過他的人的命。最有可能的就是，他意識到他所有聲譽包括他在歷史上的地位都岌岌可危，於是立刻開始計劃消滅這個日漸威脅他的政敵。

決定性的時刻是 1962 年 7 月某個夏日午後。毛澤東在他的游泳池裏暢遊。他被劉急急請回北京，心情很不好。劉少奇兒子回憶說，他父親快步走向主席，主席叫他來是讓他解釋什麼事這麼緊急。劉少奇上來就說，陳雲和田家英，這兩個直言批評大躍進最激烈的人，現在要正式提出關於土地分配的意見。毛澤東立刻發出一連串責難。但劉並沒有停止。他快速說：「餓死這麼多人！」接著，他衝口而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毛澤東勃然大怒。「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他吼道，「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這兩人迅速冷靜下來。毛澤東同意經濟調整還得繼續。[5] 但現在毛主席已經認定，他發現了他身邊的赫魯曉夫，膽敢對抗主子斯大

林。他認定，劉顯然會在他身後召開秘密會議，揭露他的罪行。毛澤東在等待時機，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念頭那時候開始萌生。這場長久準備的革命，終將使共產黨和整個國家陷入又一場浩劫。

關於《引文來源及參考書目》的說明

書中大量的資料來自中國的黨內檔案。在此說明幾句可能有助於讀者更好地理解本書的寫作基礎。在一黨制的國家裏，檔案為黨所有，不對公眾開放，通常保存在各級黨委所在地的某棟大樓中，周圍往往綠樹蔥蘢，草坪齊整，有解放軍嚴密看守。大約十年前，要查看這些檔案根本不可能，即便是現在，也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查。在過去的幾年中，越來越多的檔案超過了三十年的保密期，可以憑介紹信查閱。這些資料的內容和價值各不相同。總體來說，大多數文件有「公開」和「封存」之分，也就是分為解密和保密兩種，後者是高度敏感的資料，除了黨內高級人士，其他人根本無法接近。這種區別使得大多數歷史學家，無論多麼認真，也無法看到大量的珍貴資料，因此也就意味著，本書中所依靠的材料都是被相對「軟化」了的：希望以後的歷史學家能夠在完全公開的文檔基礎上，揭示最完整的事實真相。

還有一個複雜情況就是，除了外交部，其他的中央各機關的文件都是很難被看到的。許多歷史學家只好轉而研究省或縣級文獻。全書用了十幾個城市和縣的檔案，但最重要的資料來自十個省的檔案（詳見《引文來源及參考書目》），大都是從公開的材料中遴選出來的。據我所知，到現在，沒有任何歷史學家曾研究過安徽省檔案中的有關毛澤東時代的記錄，河南的檔案也是高度限制的，即便准許查閱，也毫無意義，因為被允許拿出來的都是最陳舊的文獻，而且零零散散，讓人頭痛。相對而言，其他省份的檔案逐漸公開，我有意選擇了不同省份，根據人口密度（山東對甘肅）、饑荒程度（四川是一個極端，浙江

是比較好的省份）以及地理位置（從北方的河北到南部的廣東）等因素。

各省收集的檔案反映了共產黨內部的組織結構。根據所屬的單位，這些檔案通常分為更小的類別——例如，屬於衛生部門的，屬於林業部門的。因此，本人所找到的經常是極為不同的資料，絕不像我們心目中的「檔案」那樣清晰規整。其中，有普通人寫的信，有中華全國總工會所做的關於各工廠工作環境的調查，有對腐敗案件的調查，有公安局關於偷竊、謀殺、焚燒哄搶糧倉的報告，有整風運動期間派出的特別小組整理的關於基層幹部濫用職權的詳細證據，有公社化運動期間關於農民牴觸行為的總體情況的報告，有關於思想動態的調查，不一而足。

不過，大量的參考資料還是來自官方。即使是普通農民和工人寫的信，也是出於某種官方原因，才被挑選出來的，同時，我們也別無選擇，只能通過國家的多稜鏡來透視民生。所有的國家檔案都是這樣，包括希特勒時代的德國和斯大林時代的蘇聯。這並不表示我們不能從另一個角度來解讀。歸根結底，任何稱職的歷史學家都知道怎樣看待官方報告的寫作立場，他們預期的讀者是誰，他們所處部門的情況，以及他們寫報告時的條件如何。歷史學家要體會其中的複雜性。官方的褒貶色彩會扭曲社會事實，有些說法，例如「反動派」、「怠工者」、「叛國」、「人民敵人」和「左傾冒進分子」，模糊了實際情況。而大量來自各方面的關於群眾抵抗的報告，則顯示了農民為求生而作出的努力。國家本身是一個複雜的綜合體，絕不可能只用一種聲音說話——或者上報。就好像在中央領導層內部，彭德懷和周恩來對大躍進中之所見就大有分歧。對當地發生的情況，不同的個人、單位和組織，它們作出的匯報也大相逕庭。

省級檔案不僅比縣、市甚至村收集的資料豐富，而且常常保留了許多從中央（即北京）傳達下來的珍貴文件，也有的是從下面縣裏

送來的關於重要事件的報告，例如糧食不足、大壩坍塌。在官僚主義盛行的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很少有什麼文件是「獨一無二」的，因為要複製散發給許多部門，以便面臨類似情況時，可作參考。例如，工作組編輯的許多報告，發給了幾十名黨內人士。重要的中央文件，每省、每縣都要發，而更機密一點的材料，可能就只印發給各省的第一書記看。換句話說，有大量材料不一定和當地相關，但也會被收存在該省的檔案中，包括最高領導的講話和會議的記錄。這些記錄可能差異巨大，因為是不同人收集的，有的是根據錄音整理的。有的詳細，有的簡略。我盡了最大努力讓感興趣的讀者能找到每一份文件的出處。在註釋中，文檔說明部分的第一個數字指的是材料來源的總分類，具體名字在本書最後附錄的檔案清單中可以找到。例如，「湖南，1962 年 10 月 6 日，207-1-750，pp.44-49」意思是該記錄來自湖南省檔案中的一份文件，編號 207 代表水利水電廳。

北京最高層的權力中心內部到底是什麼情況？到目前為止，為了瞭解毛澤東統治下的宮廷政治，許多歷史學家求助於官方出版物、內部文件或者文化大革命期間流傳的紅衛兵資料。相反，我盡量參考檔案，原因有三個。第一、高級官員的講話在印發出來之後，整句或整段都被刪除了；尤其（但不僅）在紅衛兵的資料中。有無數例子顯示，小到風格上的更改，大到編輯有意刪除，許多講話被刊發出來之後，整個基調都變了味了。第二、所有經過審定的會議記錄，無論是大陸官方公佈的或者文革期間被私帶出境的紅衛兵材料都有這個問題。第三、歷史學家極為關注的幾個會議，也是幾位重要的黨領導後來談到的會議，其中關鍵性事件和決定都是這樣經過審定的，那些能接觸北京中央檔案的黨內歷史學家所編寫的高官們的回憶錄，本該十分可靠，但也不能避免這種情況。前面（第 11 章）提到的，1959 年 3 月 25 日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的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徵購全部糧食的三分之一，以滿足對外國的承諾，這件史實就遭到了上述命運。

簡言之，關於毛澤東時代的所有記錄，無論是公開出版的還是內部流傳的，都不過是嫻熟地混淆視聽，因此，對於歷史研究來說無法提供足夠的基礎。最近，高文謙所著的一本周恩來傳記也證明了我的懷疑。高是黨內的歷史學家，在北京的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多年，逃到美國之前將他的筆記全部帶走。他這本書堪稱石破天驚，顛覆了許多人心目中的周總理形象（高文謙，《晚年周恩來》英文版，紐約：公共事務出版社，2007）。然而，一旦意識到這些材料中的缺陷，再去看待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所有材料，包括那些洋洋巨製、旁徵博引的領導人們的傳記，其價值就無法估量了。這些出版物的問題是，大量關鍵性的信息都被故意有選擇性地剔除了，同樣，十幾卷本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96）也存在這個問題。

中國同其他共產主義政體一樣，官僚主義現象嚴重。即使對無足輕重的文件——哪怕在饑荒蔓延時期——重視的程度也讓人好笑。不過，也不是每一片紙都會珍而重之地保存在檔案中。工廠、政府部門，甚至法院和公安部門，都有時會將文件丟棄，例如當他們搬到新辦公場所的時候。其中有些文件——供詞、報告、指示、批件、各種證書——都可以在廣州、上海或者北京熱鬧的跳蚤市場上找到。因為檔案被封閉，我花了許多週末在這些塵封的文件中翻找：有的成捆散在蓆子上，主人就蹲坐在一堆舊報紙上；有的攤在臨時搭起來的桌子上，和紀念品、明信片、雜誌和郵票混在一起。我收藏的文檔已經小有規模（其中包括一堆不同圖案、不同顏色的票證，因為它們都是官僚主義的人為的產物，直到饑荒過後還在用），但極少引用，只有在官方黨史檔案中找不到相應證據時才拿出來。

還有小部分的例證來自於外文檔案，特別是蘇聯和東德，這兩個國家當時和中國的關係最密切。總體上說，這些檔案有助於重新解讀那個時代的對外貿易和對外政策，儘管對了解當時的普通人生活幫助不大。大多數專家顧問只能生活在城市裏。在所有同情大躍進的歐洲

國家中，東德是支持時間最久的，然而到 1960 也開始成批離開。發往倫敦的報告中可以摘錄一小部分引用，但整體而言，那些英國大使館裏的漢學家的話不盡不實，毫無根據——也沒有做過充分調查，根本不知道公社化的具體情況以及造成的影響。哪怕是不入流的小作家，只要有蘇聯經驗的，也能做得比他們好。相反，台灣機密部門的工作人員就十分令人敬佩，他們為蔣介石整理的關於大饑荒時期的報告異常詳細，見解深刻。同樣傑出的還有他精心挑選的幾個助手，負責定期發佈情報公告，這些公告可以在設於臺北附近新店的調查局看到。美國不信任蔣介石（根據 CIA 的報告所說），顯然是害怕他將美國人拖進來攻擊大陸。不過，因為中國的黨史檔案更為可靠，我根本沒有用到這些材料。

官方新聞機構新華社一周數次編輯一份三到十頁的報告，名字叫《內部參考》，分發到各部官員或更高級官員手中。這份資料同檔案比較相形見絀，因為是經過嚴格審查的，然而也涵蓋一些有趣的片段信息。最後，一些黨內人士、翻譯、秘書和外交人員的自傳和個人回憶錄也很有用，不過大多數已經過自我審查，而且缺乏具體細節。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許多漢學者責備他的書「太感性」，其實他的記述十分可靠，可以在黨史檔案中得到驗證，有的地方甚至可以逐字逐句驗證（學者 Lorenz Luthi 經過觀察，也可以證明這一點。他全面地研究了蘇聯的文獻；參考 Lorenz M. Luthi，《中蘇分裂：共產主義世界的冷戰》，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8，p. 354.）。

我用了一小部分採訪記錄，讓老百姓也多少發出一點聲音——當然，儘管他們也在許多黨內文獻裏高聲疾呼、長篇大論，其中有意見調查，也有公安報告。我花了幾年時間專門為這項計劃培訓了一些調查者，他們採訪了大約一百人，通常採取的形式是專家所說的「內部人士採訪」，意思是，不讓「外人」（外國人或者城市人）和翻譯與

被採訪者直接接觸，使採訪者跟被訪者具有同樣社會背景、說同樣方言，有時候是同鄉甚至是一家人。所有這些採訪記錄都被轉錄後存放在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所有被訪者，以及一小部分可能還健在的人們，使用的都是化名。

最後，關於二手資料略微贅述幾句。幾十年來，研究毛澤東時代的最好的專家都在歐洲、美國和日本，但目前已經明顯轉回中國。關於大饑荒也出版了一些書，雖然不多，但在慢慢增加，作者都是花了許多時間研究各種檔案資料的歷史學家。這些出版物在中國並不總是受到歡迎，主要在香港流傳——香港再次作為大陸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重要紐帶，迅速崛起。歷史學家余習廣是迄今最善於從檔案中挖掘關鍵信息的人，從他的出色著作中就可以看出來（余習廣，《大躍進苦日子》，香港：時代潮流出版社，2005）。還要特別提到楊繼繩，這位退休記者是第一個利用各省檔案的人（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他這本書意義重大，尤其是直到現在也沒有其他歷史學家對河南的大饑荒做出研究並且著書出版。但這書也有缺陷。熟悉材料的人能看出，該書更像是查閱不同資料之後所整理的筆記，而不是一個嚴謹構建的文本。有時候它比較雜，把大段文字串聯起來，有的來自網上，少數來自出版物，還有的是從檔案裏轉錄的。在各種有價值的材料中，夾雜一些瑣事，使得讀者難以理解。有時只花一兩天查閱檔案，遺漏了最重要的信息，其實那些信息都是公開的、可以找到的。例如有關廣東的章節，單憑一份文件，就推論饑荒的全貌。該書總體上沒有時間線索，作者羅列了許多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敘述，把重點放在糧食匱乏上，沒有展現出災難的整體情況。林蘊暉的著作更加具體，也更權威，記錄了大躍進的過程，內容深刻。儘管大量參考了公開出版的資料，且重要關注的是公安法庭，但其分析的深度和廣度超越了同一主題的其他政治科學類書籍（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最後還要提到一個重要參考資料，即高王凌關於大饑荒時期農民的抵抗方式的著作，顯示了出色的原創性和洞察力，是本書重要的參考之一（高王凌，《人民公社時期中國農民「反行為」調查》，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

英文資料中，對精英政治感興趣的讀者會喜歡看 Roderick MacFarquhar 的著作：《文化大革命起源：大躍進，1958-1960》，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83。更近一點的有 Alfred Chan 的書，他對毛澤東的想法如何在廣東落實所作出的分析，至今無人超越（Alfred Chan，《毛澤東的社會運動：中國大躍進的政治和政策執行》，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還有一些基於訪談的農村研究也很好，不過它們是以倖存者的談話為基礎，那些死去的人就無法發出聲音。近年的一個代表是 Ralph A. Thaxton，《中國農村的災難和鬥爭：毛的大躍進，大佛村的饑荒和正義抵抗的源起》，紐約：劍橋大學出版社，2008。Jasper Becker 關於饑荒時期的著作可讀性也非常強（Jasper Becker，《饑餓的幽靈：毛的秘密大饑荒》，紐約：Henry Holt 出版社，1996）。其他提及饑荒的作者還有：David Bachman，《中國的官僚、經濟和領導階層：大躍進的制度性起源》，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91；Thomas Bernstein，《毛澤東和 1959-1960 的大饑荒：關於個人集權的研究》，中國季刊，No. 186（2006 年 6 月），pp. 421-425，以及《斯大林主義、饑荒和中國農民：大躍進時期的糧食徵繳》，理論和社會，Vol. 13（1984 年 5 月），pp. 339-377；Edward Friedman，Paul G. Pickowicz 和 Mark Selden，Kay Ann Johnson 的著作：《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政體》，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1991；Jean-Luc Domenach 的《大躍進起源：中國一個省的例子》，博爾德：威斯特維出版社，1995；Penny Kane 的《中國大饑荒，1959-1961：人口統計和社會的暗示》，貝辛斯托克：麥克米倫出版社，1988；Roderick MacFarquhar 的《文化大革命起源》，Vol. 3：《災難來臨，1961-1966》，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9；Frederick

C. Teiwes 和 Warren Sun 的《中國的災難之路：大躍進過程中的毛澤東、中央領導和省幹部，1955-1959》，阿蒙克，紐約：M. E. Sharpe 出版社，1999；Dali L. Yang（楊大利），《中國的災難和改革：大躍進饑荒之後的政體、農村社會和制度變遷》，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6. 其他有用的研究文獻請參閱《引文來源及參考書目》。

引文來源及參考書目

檔案

外文檔案

AVPRF: Arkhiv Vneshnei Politiki Rossiiskoi Federatsii, Moscow, Russia（莫斯科，俄羅斯）
BArch: Bundesarchiv, Berlin, Germany（柏林，德國）
ICRC: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Geneva, Switzerland（日內瓦，瑞士）
MfAA: Politische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s, Berlin, Germany（柏林，德國）
PRO: National Archives, London, United Kingdom（倫敦，英國）
PRO, Hong Kong: Public Record Office, Hong Kong（香港）
RGAE: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Ekonomiki, Moscow, Russia（莫斯科，俄羅斯）
RGANI: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Noveishei Istorii, Moscow, Russia（莫斯科，俄羅斯）

中文檔案

中央級檔案

外交部檔案館（北京）

省市級檔案館

北京市檔案館（北京）
1 中共北京市委員會
2 北京市人民委員會
84 北京市婦女聯合會
92 北京市農林局
96 北京市水利氣象局
101 北京市總工會
甘肅省檔案館（蘭州）
91 中共甘肅省委
96 中共甘肅省農村工作部
廣東省檔案館（廣州）
216 廣東省委統戰部
217 廣東省農業廳
218 廣東省工業廳
231 廣東省總工會

235 廣東省人民委員會
253 廣東省計劃委員會
262 廣東省林業廳
266 廣東省水利水電廳
300 廣東省統計局
307 廣東省文化廳
314 廣東省教育廳
317 廣東省衛生廳

廣西省檔案館（南寧）
X1 中共廣西省委

貴州省檔案館（貴陽）
90 貴州省農業廳

河北省檔案館（石家莊）
855 中共河北省委
856 中共河北省紀委
878 中共河北省委生活辦公室
879 中共河北省委農村工作部
880 中共河北省委農業整風整社辦公室
884 中共河北省委政法委員會
979 河北省農業廳

湖北省檔案館（武漢）
SZ1 中共湖北省委員會
SZ18 中共湖北省委員會農村政治部
SZ29 湖北省總工會
SZ34 湖北省人民委員會
SZ113 湖北省水利廳
SZ115 湖北省衛生廳

湖南省檔案館（長沙）
141 中共湖南省委員會
146 中共湖南省委農村工作部
151 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
163 湖南省人民委員會
186 湖南省計劃委員會
187 湖南省統計局
207 湖南省水利水電廳
265 湖南省衛生防疫廳

山東省檔案館（濟南）
A1 中共山東省委

上海市檔案館（上海）
A2 上海市委辦公廳
A20 上海市委里弄工作委員會
A23 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
A36 上海市委工業政治部
A70 上海市委農村工作部
A72 上海市委農村工作委員會
B29 上海市經濟計劃委員會

B31　上海市統計局
B112　上海市冶金工業局
B123　上海市第一商業局
B242　上海市衛生局

四川省檔案館（成都）
建川1　四川省委辦公廳
建川12　四川省委民工委
建川44　四川省民政廳
建川50　四川省人民委員會宗教事務処
建川67　四川省統計局
建川133　四川省衛生廳

雲南省檔案館（昆明）
2　中共雲南省委
11　中共雲南省委農村工作部
81　雲南省統計局
105　雲南省水利水電廳
120　雲南省糧食廳

浙江省檔案館（杭州）
J002　中共浙江省委
J007　浙江省委農村工作部
J116　浙江省農業廳
J132　浙江省糧食廳
J165　浙江省衛生廳

地縣級檔案

赤水市檔案館（貴州）
1　赤水市委

阜陽市檔案館（安徽）
J3　阜陽市委

廣州市檔案館（廣東）
6　廣州市委宣傳部
13　廣州市農村工作部
16　廣州市委街道工作部
69　廣州市委鋼鐵生產指揮部辦公室
92　廣州市總工會
94　廣州市婦女聯合會
97　廣州市人民委員會辦公廳
176　廣州市衛生局

貴陽市檔案館（貴陽，貴州）
61　中共貴陽市委

開平市檔案館（開平，廣東）
3　開平市委

麻城市檔案館（麻城，湖北）
1　麻城縣委

南京市檔案館（南京，江蘇）
4003　南京市委

4053 南京市委城市人民公社領導小組辦公室
5003 南京市人民政府
5012 南京市民政局
5035 南京市重工業局
5040 南京市手工業局
5065 南京市衛生局
6001 南京市總工會

遂平市檔案館（遂平，河南）
1 遂平縣委

武漢市檔案館（武漢，湖北）
13 武漢市人民政府
28 武漢市江岸區委員會
30 武漢市江漢區委員會
70 武漢市教育局
71 武漢市衛生局長
76 武漢市工商管理局
83 武漢市民政局

吳江縣檔案館（吳江，江蘇）
1001 吳江縣委辦公室

無錫市檔案館（無錫，江蘇）
B1 無錫縣委辦公室

吳縣縣檔案館（吳縣，江蘇）
300 吳縣縣委辦公室

信陽縣檔案館（信陽，河南）
229, 304 信陽縣委

宣城縣檔案館（宣城，安徽）
3 宣城縣委辦公室

出版物

Arnold, David, *Famine: Social Crisis and Historical Change*（《饑荒：社會危機和歷史變革》）, Oxford: Blackwell, 1988.

Ashton, Basil, Kenneth Hill, Alan Piazza and Robin Zeitz, 'Famine in China, 1958-61'（《中國的饑荒：1958-61》）,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0, no. 4 (Dec. 1984), pp. 613-45.

Bachman, David, *Bureaucracy, Economy, and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中國的官僚、經濟和領導階層：大躍進的制度性根源》）,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Banister, Judith, 'An Analysis of Recent Data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關於中國人口最新資料的分析》）,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0, no. 2 (June 1984), pp. 241-71.

Banister, Judith,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中國人口變遷》）,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Becker, Jasper,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饑餓的幽靈：毛的秘密饑荒》）, New York: Henry Holt, 1996.

Belasco, Warren, 'Algae Burgers for a Hungry World? The Rise and Fall of Chlorella Cuisine'（《海藻漢堡拯救饑餓世界？藻類美食神話的破滅》）,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38, no. 3 (July 1997), pp. 608-34.

Berlin, Isaiah,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扭曲的人性之材：人類思想史章節》）, Vintage Books, 1992.

Bernstein, Thomas P., 'Mao Zedong and the Famine of 1959-1960: A Study in Wilfulness'（《毛澤東和 1959-1960 年的饑荒：關於個人集權的研究》）, *China Quarterly*, no. 186 (June 2006), pp. 421-45.

Bernstein, Thomas P.,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Grain Procurement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史達林主義、饑荒和中國農民：大躍進時期的糧食征繳》）,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3 (May 1984), pp. 339-77.

Birch, Cyril, 'Literature under Communism'（《共產主義制度下的文學》）,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John King Fairbank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5: *Revolu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6-1982*,（《劍橋中國史，第十五卷：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743-812.

Bo Yibo 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與決策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3。

Boone, A.,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中國對外貿易》）, *China Quarterly*, no. 11 (Sept. 1962), pp. 169-83.

Brown, Jeremy, 'Great Leap City: Surviving the Famine in Tianjin'（《城市大躍進：從天津饑荒中倖存》）, in Kimberley E. Manning and Felix Wemheuer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and Great Famine*（《中國大躍進和大饑荒的新視野》）,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0.

Cao Shuji 曹樹基：《大饑荒：1959-1961 年的中國人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The Case of Peng Teh-huai, 1959-1968（《彭德懷案，1959-1968》）,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68.

Chan, Alfred L., *Mao's Crusade: Politic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毛澤東的社會運動：中國大躍進中的政治及政策》）,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ng, G. H. and G. J. Wen, 'Communal D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8-1961'（《公社食堂和 1958-1961 年的中國饑荒》）,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no. 46 (1997), pp. 1-34.

Chang, Jung 張戎, *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英文版）, Clearwater, FL: Touchstone, 2003.

Chang, Jung 張戎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5.

Chao, Ka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Communist China*, 1949-1965（《共產中國的農業生產》）,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0.

Cheek, Timothy, *Propaganda and Culture in Mao's China: Deng Tuo and the Intelligentsia*（《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宣傳和文化：鄧拓和知識份子》）,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毛澤東的中國和冷戰》）,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Cheng, Tiejun and Mark Selden, 'The Construction of Spatial Hierarchies: China's *hukou* and *danwei* Systems' (《地域等級的構建：中國的戶口和單位制度》), in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中國國家社會主義的新視野》),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 pp. 23-50.

Chinn, Dennis L., 'Basic Commodity Distrib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商品流通》), *China Quarterly*, no. 84 (Dec. 1980), pp. 744-54.

Conquest, Robert, *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 (《悲傷的收成：蘇聯的集體化和恐怖饑荒》),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Dai Qing (ed.) 戴晴 (編), *The River Dragon has Come! The Three Gorges Dam and the Fate of China's Yangtze River and its People* (《龍王來了！三峽大壩和中國長江及中國人民的命運》),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8.

Davis-Friedmann, Deborah, *Long Lives: Chinese Elderly 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長命：中國老人和共產主義革命》),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Dikötter, Frank, *China before Mao: The Age of Openness* (《毛澤東之前的中國：開放的年代》),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Dikötter, Frank,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Post-Liberation China: The Prisoners of a Beijing Gaol in the 1950s' (《中國解放後的犯罪與處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某北京監獄的囚犯》), *China Quarterly*, no. 149 (March 1997), pp. 147-59.

Dikötter, Frank, *Exotic Commodities: Modern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 (《外國商品：時尚物件與中國的日常生活》),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Ding Shu 丁抒，《人禍：大躍進與大饑荒》，香港：《九十年代》雜誌，1996。

Dirks, Robert, 'Social Responses during Severe Food Shortages and Famine' (《食物嚴重短缺和饑荒期間的社會反應》),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21, no. 1 (Feb. 1981), pp. 21-32.

Domenach, Jean-Luc, *L'Archipel oublié* (《被遺忘的島嶼》), Paris: Fayard, 1992.

Domenach, Jean-Luc,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ase of One Chinese Province* (《大躍進起源：中國一個省的例子》),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Domes, Jurgen, *Peng Te-huai: The Man and the Image* (《彭德懷：個人與形象》),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Donnithorne, Audrey, *China's Economic System* (《中國經濟制度》), London: Allen & Unwin, 1967.

Fang Weizhong, Jin Chongji et al. (eds.) 房維中、金沖及等（編），《李富春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Fitzpatrick, Sheila, *Everyday Stalinism: Ordinary Life in Extraordinary Times: Soviet Russia in the 1930s* (《每日史達林主義：不尋常時代的尋常生活：1930 年代的蘇聯》),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Fitzpatrick, Sheila, 'Signals from Below: Soviet Letters of Denunciation of the 1930s' (《下層的聲音：1930 年代蘇維埃時期的檢舉信》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8, no. 4 (Dec. 1996), pp. 831-66.

Friedman, Edward, Paul G.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with Kay Ann Johnso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政體》),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Fu Zhengyuan, *Autocratic Tradition and Chinese Politics* (《獨裁傳統和中國政治》),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Fuyang shiwei dangshi yanjiushi 阜陽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征途——阜陽社會主義時期黨史專題彙編》，阜陽：安徽經視文化傳播有限責任公司，2007。
Gao Wangling 高王凌，《人民公社時期中國農民反行為調查》，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
Gao Wenqian 高文謙，*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晚年周恩來》英文版），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7.
Gao Xiaoxian 高小賢，'"The Silver Flower Contest": Rural Women in 1950s China and the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ur'（《「銀花賽」：50 年代中國農村婦女與性別分工》），*Gender and History*, vol. 18, no. 3 (Nov. 2006), pp. 594-612.
Ginsburgs, George, 'Trade with the Soviet Union'（《對蘇貿易》），in Victor H. Li, *Law and Politics in China's Foreign Trade*（《中國對外貿易的法律與政策》），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7, pp. 70-120.
Greenough, Paul R., *Prosperity and Misery in Modern Bengal: The Famine of 1943-44*（《現代孟加拉的繁榮與貧困：1943-44 年的饑荒》），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Gu Shiming, Li Qiangui and Sun Jianping, 顧士明、李乾貴、孫劍平，《李富春經濟思想研究》，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
Hayek, Friedrich A., *The Road to Serfdom: Text and Documents*（《奴役之路：文本和檔》），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Huang Kecheng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Huang Zheng 黃峥，《劉少奇一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Huang Zheng 黃峥，《劉少奇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Huang Zheng 黃峥，《王光美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Ji Fengyuan, *Linguistic Engineering: Language and Politics in Mao's China*（《語言工程：毛澤東時代中國的語言和政治》），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Jiang Weiqing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Jin Chongji (ed.) 金沖及（編），《周恩來傳，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
Jin Chongji and Chen Qun (eds), 金沖及、陳群（編），《陳雲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Jin Chongji and Huang Zheng (eds), 金沖及、黃峥（編），《劉少奇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Kane, Penny, *Famine in China, 1959-61: Demograph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中國大饑荒，1959-61：人口統計和社會意義》），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8.
Kapitsa, Mikhael, *Na raznykh parallelakh: Zapiski diplomata*, Moscow: Kniga i biznes, 1996.
Khrushchev, Nikita, *Vremia, liudi, vlast'*, Moscow: Moskovskiye Novosti, 1999.
Kiernan, Ben, *The Pol Pot Regime: Race, Power, and Genocide in Cambodia under the Khmer Rouge, 1975-79*,（《波爾布特政權：赤棉統治下柬埔寨的種族、權力和種族屠殺》），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King, Richard, *Heroes of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Two Stories*（《中國大躍進時期的英雄們：兩個故事》），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2010.
Kitchen, Martin, *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1800-2000*（《現代德國史，1800-2000》），New York: Wiley-Blackwell, 2006.

Klochko, M. A., *Soviet Scientist in China*（《中國的蘇維埃科學家》）, London: Hollis & Carter, 1964.

Krutikov, K. A., *Na Kitaiskom napravlenii: Iz vospominanii diplomata*, Moscow: Institut Dal'nego Vostoka, 2003.

Kueh, Y. Y., *Agricultural Instability in China, 1931-1991*（《中國農業的不穩定性，1931-199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Kung, James Kai-sing and Justin Yifu Lin, 'The Causes of China's Great Leap Famine, 1959-1961'（《中國大躍進饑荒的緣起，1959-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52, no. 1 (2003), pp. 51-73.

Li Huaiyin 李懷印, 'Everyday Strategies for Team Farming in Collective-Era China: Evidence from Qin Village'（《集體制時期中國農民的日常勞動策略：以秦村為例》）, *China Journal*, no. 54 (July 2005), pp. 79-98.

Li, Lilian M.,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華北饑荒：國家、市場與環境的退化，1690s-1990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Li Rui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 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

Li Rui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 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Li, Wei and Dennis Ya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atomy of a Central Planning Disaster'（《大躍進：一場中央集權災難的剖析》）,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3, no. 4 (2005), pp. 840-77.

Li Yueran 李越然,《外交舞臺上的新中國領袖》,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

Li Zhisui 李志綏,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The Memoirs of Mao's Personal Physician*（《毛主席的私生活：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英文版）,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Lin, Justin Yifu, and Dennis Tao Yang, 'On the Cause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and the Great Leap Famine'（《論中國農業危機與大饑荒的原因》）,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9, no. 2 (1998), pp. 125-40.

Lin Yunhui 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Liu Chongwen, Chen Shaochou et al. (eds), 劉崇文、陳紹疇等（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Lu Xiaobo, *Cadres and Corruption: The Organizational In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幹部與腐敗：中國共產黨的制度性墮落》）,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Lüthi, Lorenz M.,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中蘇分裂：共產主義世界的冷戰》）,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文化大革命起源，卷 1：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2: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文化大革命起源，卷 2：大躍進，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文化大革命起源，卷 3：災難來臨，1961-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MacFarquhar, Roderick, Timothy Cheek and Eugene Wu (eds),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毛主席的秘密講話：從百花齊放到大躍進》）,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Manning, Kimberley E., 'Marxist Maternalism, Memory,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Women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馬克思主義時代下的女性主義，回憶和大躍進中的婦女動員》）, *China Review*, vol. 5, no. 1 (Spring 2005), pp. 83-110.

Mao Zedong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96。

Mao Zedong 毛澤東，《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Mićunović, Veljko, *Moscow Diary*（《莫斯科日記》）, New York: Doubleday, 1980.

Mueggler, Erik, *The Age of Wild Ghosts: Memory, Violence, and Place in Southwest China*（《野鬼的年代：西南中國的記憶、暴力和場所》）,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Näth, Marie-Luise (ed.), *Communist China in Retrospect: East European Sinologists Remember the First Fifteen Years of the PRC*（《回顧共產主義中國：東歐漢學家回憶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十五年》）, Frankfurt: P. Lang, 1995.

Ó Gráda, Cormac, *The Great Irish Famine*（《愛爾蘭大饑荒》）, Macmillan, 1989.

Oi, Jean C.,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當代中國的政體和農民：農村政府的政治經濟》）,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Osokina, Elena, *Our Daily Bread: Socialist Distribution and the Art of Survival in Stalin's Russia, 1927-1941*（《我們每日的麵包：史達林統治的蘇聯的社會主義配給和生存藝術》）,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1.

Pang Xianzhi, Guo Chaoren and Jin Chongji (eds), 逄先知、郭超人、金沖及（編），《劉少奇》，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

Pang Xianzhi and Jin Chongji (eds), 逄先知，金沖及（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Pasqualini, Jean, *Prisoner of Mao*（《毛澤東的囚徒》）,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Patenaude, Bertrand M., *The Big Show in Bololand: The American Relief Expedition to Soviet Russia in the Famine of 1921*（《蘇聯大秀場：蘇聯 1921 饑荒期間的美國救援》）,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eng Dehuai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Peng Dehuai zhuan《彭德懷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

Peng Xizhe 彭希哲,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s Provinces'（《大躍進期間中國各省人口統計結果》）,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3, no. 4 (Dec. 1987), pp. 639-70.

Pepper, Suzanne, *Radicalism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20th-Century China: The Search for an Ideal Development Model*（《20 世紀中國的激進主義和教育改造：尋找理想發展模式》）,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Reardon, Lawrence C., *The Reluctant Dragon: Crisis Cycles in Chinese Foreign Economic Policy*（《頑抗的巨龍：中國對外經濟政策的危機週期》）,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Russell, Sharman Apt, *Hunger: An Unnatural History*（《饑餓：一段反自然的歷史》）,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5.

Salisbury, Harrison E.,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新帝王們：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的中國》）, Boston: Little, Brown, 1992.

Service, Robert, *Comrades: A History of World Communism*（《同志們：世界共產主義歷史》）,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Shapiro, Judith,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毛澤東的與天鬥：革命中國的政治和環境》）,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Shen Zhihua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份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Shevchenko, Arkady N., *Breaking with Moscow*（《斷交莫斯科》）,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85.

Short, Philip, *Pol Pot: The History of a Nightmare*（《波爾布特：歷史的噩夢》）, London: John Murray, 2004.

Smil, Vaclav, *The Bad Earth: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China*（《糟糕的地球：中國的環境退化》）,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4.

Tao Lujia 陶魯笳，《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Taubman, William,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赫魯曉夫：他與他的時代》）, London: The Free Press, 2003.

Teiwes, Frederick C.,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中國的政治和整肅：黨風的整頓和衰落》）,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3.

Teiwes, Frederick C.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中國災難之路：大躍進前期的毛澤東、中央領導和省幹部，1955-1959》）,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Thaxton, Ralph A., *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 Mao's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and the Origins of Righteous Resistance in Da Fo Village*（《中國農村的災難和鬥爭：毛的大躍進，大佛村的饑荒和正義抵抗的源起》）,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Tooze, Adam,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薪酬制度的破壞：納粹經濟的產生和消亡》）, New York: Allen Lane, 2006.

Townsend, James R. and Brantly Womack, *Politics in China*（《中國的政治》）, Boston: Little, Brown, 1986.

Viola, Lynn, *Peasant Rebels under Stalin: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Peasant Resistance*（《史達林統治下的農民反抗：集體化和農民抵抗運動》）,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Walker, Kenneth R., *Food Grain Procurement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中國的糧食征繳與消費》）,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Wang Yan et al. (eds) 王焰等（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Watson, James L.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帝制末期和當代中國的死亡儀式》）,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Woman From Shanghai: Tales of Survival From a Chinese Labor Camp（《上海女人：中國勞動營倖存者的故事》）, New York: Pantheon, 2009.

Wu Hung 巫鴻, *Remaking Beijing: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Creation of a Political Space*（《重建北京：天安門廣場和政治空間的開創》）,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5.

Wu Lengxi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 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Wu Lengxi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段》，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

Wu Ningkun and Li Yikai 巫甯坤、李怡楷，*A Single Tear: A Family's Persecution, Love, and Endurance in Communist China*（《一滴淚：共產中國裏一個家庭的迫害、愛情和堅忍》），New York: Back Bay Books, 1994.

Xiong Huayuan and Liao Xinwen 熊華源、廖心文，《周恩來總理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Yan Mingfu 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當代中國史研究，No. 19（1997 年 5 月），pp. 6-21。

Yang, Dali L.,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中國的災難和改革：大躍進饑荒之後的政體、農村社會和制度變遷》），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Yang Jisheng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

Yang Xianhui 楊顯惠，《夾邊溝記事：楊顯惠中短篇小說精選》，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

Yu Xiguang 余習廣，《大躍進苦日子：上書集》，香港：時代潮流出版社，2005。

Zazerskaya, T. G., Sovetskie spetsialisty i formirovanie voenno-promyshlennogo kompleksa Kitaya (1949-1960 gg.), St Petersburg: Sankt Peterburg Gosudarstvennyi Universitet, 2000.

Zhang Letian 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Zhang Shuguang 張曙光，*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經濟冷戰：美國對華經濟禁運和中蘇同盟，1949-1963》），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Zubok, Vladislav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克里姆林宮內的冷戰：從史達林到赫魯曉夫》），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註釋

作者原序

1 由於 Alfred L. Chan 的作品我們已經熟知這方面情況，見 *Mao's Crusade: Politic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毛澤東的社會運動：中國大躍進中的政治及政策》）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see also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中國災難之路：大躍進前期的毛澤東、中央領導和省幹部，1955-1959》）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2 最新的關於鄉村的研究是 Ralph A. Thaxton, *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 Mao's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and the Origins of Righteous Resistance in Da Fo Village*（《中國農村的災難和鬥爭：毛的大躍進，大佛村的饑荒和正義抵抗的源起》）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a classic study is 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with Kay Ann Johnso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政體》）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3 Robert Service, *Comrades: A History of World Communism*（《同志們：世界共產主義歷史》）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6.

1 兩個對手

1 William Taubman,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赫魯曉夫，他和他的時代》）London: The Free Press, 2003, p. 230.

2 逄先知、金沖及（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p. 534。

3 Li Zhisui 李志綏 ,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The Memoirs of Mao's Personal Physician*（《毛主席的私生活：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英文版）,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pp. 182-4.

4 A helpful overview of the Socialist High Tide appears in Chan, *Mao's Crusade*（《毛澤東的社會運動》）pp. 17-24.

5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段》，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 p. 57.

6 Lorenz M. Lü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中蘇分裂：共產主義世界的冷戰》）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71-2.

7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文化大革命起源，卷一：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313-15.

2 賭局開場

1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 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pp. 205-6；同時參見 Lüthi,《中蘇分裂》，p. 74.
2 李志綏，(《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p. 220-1.
3 同上，p. 221.
4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96，卷 6，pp. 625-6.
5 參見毛澤東翻譯之一李越然的回憶錄，《外交舞臺上的中國領袖》，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p. 137；同時參閱閻明複，《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當代中國史研究，No. 19(1997 年 5 月)，pp. 6-21.
6 Nikita Khrushchev, *Vremia, liudi, vlast'*, Moscow: Moskovskiye Novosti, 1999, vol. 3, p. 55.
7 **Veljko Mićunović**, *Moscow Diary* (《莫斯科日記》) New York: Doubleday, 1980, p. 322.
8 毛，《建國以來》，卷 6，pp. 640-3。
9 Mikhael Kapitsa, *Na raznykh parallelakh: Zapiski diplomata*, Moscow: Kniga i biznes, 1996, p. 60.
10 毛，《建國以來》，卷 6，p. 635。
11 '1957: Nikita Khrushchev' (《1957：尼奇塔·赫魯曉夫》) *Time*, 6 Jan. 1958.
12 'Bark on the wind' (《風中的口號》) *Time*, 3 June 1957.
13 Taubman, *Khrushchev* (《赫魯曉夫》) pp. 305 及 374-5.
14 'N. S. Khrushchov's report to anniversary session of USSR Supreme Soviet' (《赫魯曉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周年會議上的報告》) Moscow: Soviet News, 7 Nov. 1957, p. 90.
15 毛，《建國以來》，卷 6，p. 635。

3 整肅隊伍

1 MacFarquhar, *Origins*, vol. 1 (《起源，卷一》) p. 312.
2 黃崢，《劉少奇一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3 人民日報，1958 年 1 月 1 日，p. 1；吳，《憶毛主席》，p. 47。
4 人民日報，1957 年 12 月 8 日，p. 1。
5 人民日報，1958 年 1 月 25 日，p. 2。
6 金沖及(編)，《周恩來傳，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p. 1234.
7 《南寧會議紀要》，甘肅，1958 年 1 月 28 日，91-4-107, p. 1。
8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卷 2，pp. 68-9。
9 1956 年 6 月該社論刊發時，鄧拓為《人民日報》主編；1957 年 7 月吳冷西接任，鄧於 1958 年 11 月被免職，但之後幾年仍然寫文章支持大躍進；吳，《憶毛主席》，pp. 47-9；關於鄧拓，見 Timothy Cheek《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宣傳和文化：鄧拓和知識份子》，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 李志綏，(《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 230.
11 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與決策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3，p. 639。
12 熊華源，廖心文，《周恩來總理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p. 241。
13 南寧會議紀要，甘肅，1958 年 1 月 28 日 91-4-107 pp. 9-10；亦見毛，《建國以來》，卷 7，p. 59。
14 'Rubber communist' (《共產黨橡皮人》) *Time*, 18 June 1951.

15 Gao Wenqian 高文謙 , *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晚年周恩來》英文版）,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7, p. 88.
16 毛澤東講話，1956 年 11 月 15 日，甘肅，91-18-480, p. 74。
17 毛澤東在成都的講話，1958 年 3 月 10 日，甘肅，91-18-495, p. 211。
18 李，《大躍進》，卷 2，p. 288。
19 See also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2: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文化大革命起源，卷 2：大躍進，1958-1960》）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57.
20 Teiwes, *China's Road to Disaster*（《中國災難之路》）p. 246，引自劉講話記錄；同時參見金沖及、黃崢（編），《劉少奇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pp. 828-9。
21 秘書范若愚回憶錄，摘自金，《周恩來傳》，pp. 1259-60。
22 Nathan，「序言」，高，《周恩來》，p. xiii。
23 Teiwes, *China's Road to Disaster*（《中國災難之路》）p. 85.
24 陶魯笳，《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pp. 77-8. 1996。
25 毛澤東講話，1958 年 1 月 28 日，甘肅，91-18-495, p. 200。
26 鄧小平的講話，1958 年 1 月 15 日，甘肅，91-4-107, pp. 73, 94。
27 甘肅，1958 年 2 月 9 日，91-4-104, pp. 1-10。
28 甘肅，1961 年 1 月 12 日，91-4-735, pp. 75-6。
29 甘肅，1961 年 1 月 12 日，91-18-200, p. 35。
30 甘肅，1962 年 12 月 3 日，91-4-1028, p. 8。
31 雲南，1958 年 4 月 20 日，2-1-3059, pp. 57-62；亦見人民日報，1958 年 5 月 26 日，p. 4。
32 雲南，1958 年 9 月 25 日，2-1-3059, pp. 2-3。
33 毛澤東在成都的講話，1958 年 3 月 10 日，甘肅，91-18-495, p. 211。
34 關於整風參見 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中國的政治和清肅：黨風的整頓和衰落》）Armonk, NY: M. E. Sharpe, 1993.
35 同上，p. 276；亦見張林南，《關於反潘、楊、王事件》，選自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風雨春秋——潘復生詩文紀念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36 Thaxton, *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中國農村的災難和鬥爭》）p. 116.
37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pp. 415-16。
38 雲南，1959 年 5 月 22 日，2-1-3700, pp. 93-8。
39 陳正人在北京的講話，1957 年 12 月 19 日，甘肅，91-8-79, p. 179。

4 吹響號角

1 Judith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毛澤東的與天鬥：革命中國的政治和環境》）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49.
2 Shang Wei 講述了這個情節 , 'A Lamentation for the Yellow River: The Three Gate Gorge Dam (Sanmenxia)'（《哀黃河：三門峽》）, in Dai Qing (ed.) 戴晴 (編), *The River Dragon has Come! The Three Gorges Dam and the Fate of China's Yangtze*

River and its People（《龍王來了！三峽大壩和中國長江及中國人民的命運》），Armonk, NY: M. E. Sharpe, 1998, pp. 143-59.

3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毛澤東的與天鬥》）pp. 53-4.
4 周恩來講話，1961 年 9 月 19 日，甘肅，91-18-561, p. 31。
5 外交部，北京，1964 年 7 月 23 日，117-1170-5, pp. 45-7。
6 人民日報，1958 年 2 月 1 日，p. 11；'A Profile of Dams in China'（《中國大壩概述》）in Dai, *The River Dragon has Come!*（《龍王來了！》）p. 22.
7 Yi Si, 'The World's Most Catastrophic Dam Failures: The August 1975 Collapse of the Banqiao and Shimantan Dams'（《世界上最嚴重的垮壩災難：1975 年 8 月板橋和石漫灘大壩坍塌》）in Dai, *The River Dragon has Come!*（《龍王來了！》）p. 30.
8 甘肅，1958 年 1 月 29 日，91-4-138, pp. 135-7。
9 甘肅，1958 年 10 月，1958, 91-4-263, pp. 29-30。
10 甘肅，1958 年 9 月 9 日，229-1-118。
11 甘肅，1959 年 4 月 26 日，91-4-348, pp. 30-5。
12「『引洮上山』的回憶」，摘自邱石（編），《共和國重大決策出臺前後》，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8，卷 3，p. 226。
13 甘肅，1962 年 4 月 18 日，91-4-1091, pp. 1-8。
14 Shui, 'A Profile of Dams in China'（《中國大壩概述》）p. 22.
15 北京，1959，96-1-14, pp. 38-44。
16 Jan Rowinski, 'China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Leninism'（《中國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危機》）in Marie-Luise Näth (ed.), *Communist China in Retrospect: East European Sinologists Remember the First Fifteen Years of the PRC*（《回顧共產中國：東歐漢學家回憶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十五年》）Frankfurt: P. Lang, 1995, pp. 85-7.
17 M. A. Klochko, *Soviet Scientist in China*（《中國的蘇維埃科學家》London: Hollis & Carter, 1964, pp. 51-2.
18 Rowinski, 'China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Leninism'(《中國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危機》) pp. 85-7; Klochko, *Soviet Scientist*（《蘇維埃科學家》）pp. 51-2.
19 李志綏，(《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p. 247-8.
20 同上，pp. 249-51。
21 雲南，1958 年 1 月 9 日，2-1-3227, p. 5。
22 人民日報，1958 年 1 月 15 日，p. 1。
23 雲南，1958 年 10 月 5 日，2-1-3227, pp. 109-23。
24 人民日報，1958 年 1 月 19 日，p. 1。
25 人民日報，1958 年 2 月 18 日，p. 2。
26 雲南，1958 年 4 月 21 日，2-1-3260, p. 117.
27 李，《大躍進》，卷 2，p. 363。
28 雲南，1958 年 6 月 23 日，2-1-3274, pp. 37-9。
29 雲南，1958年11月20日，2-1-3078, pp. 116-23；1958年8月22日，2-1-3078, pp. 1-16。
30 江，《七十年征程》，p. 421。
31 甘肅，1961 年 2 月 14 日，91-18-205, p. 58。

5 衛星上天

1 李志綏，(《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p. 226-7.
2 湖南，1958 年 7 月，186-1-190, pp. 1-2；亦見 1958 年 7 月，141-2-62, pp. 1-2。

3 William W. Whitson, *The Chinese High Command: A History of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1927-71*（《中國最高領導：共產黨軍事政治史，1927-71》New York: Praeger, 1973, p. 204, quoted in MacFarquhar（摘自《起源》）*Origins*, vol. 2, p. 83.
4 湖南，1959 年 5 月 11 日，141-1-1066, pp. 80-3。
5 湖南，1959 年 9 月，141-1-1117, pp. 1-4；1959 年 9 月，141-1-1066, pp. 5-13。
6 是他事後承認的；參閱廬山會議紀要；甘肅，1959 年 8 月，91-18-96, p. 570。
7 雲南，1958 年 7 月 29 日，2-1-3102, p. 20。
8 雲南，1958 年 9 月 4 日，2-1-3101, pp. 1-35。
9 雲南，1958 年 9 月，2-1-3101, pp. 36-9, 48-65, 66-84, 94-104, 105-23。
10 廣東，1951 年 1 月 20 日，217-1-645, pp. 15-19。
11 Teiwes, *China's Road to Disaster*（《中國災難之路》）p. 85.
12 薄，《若干重大事件》，p. 682；整個制度的描述見 MacFarquhar 的《起源》卷 2，p. 31。
13 南寧會議記錄，甘肅，1958 年 1 月 28 日，91-4-107, p. 2。
14 Lu Xiaobo 呂小波訪談 *Cadres and Corruption: The Organizational In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幹部與腐敗：中國共產黨的制度性墮落》）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84.
15 遂平，1958 年 2 月 13 日，1-201-7, pp. 8 及 1958 年 10 月 29 日，1-221-8。
16 雲南楚雄縣的一個例子，參見 Erik Mueggler, The Age of Wild Ghosts: Memory, Violence, and Place in Southwest China,《野鬼的年代：西南中國的記憶、暴力和場所》）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 176.
17 廣東，1961，217-1-618, p. 36。
18 人民日報，1957 年 11 月 26 日，p. 2；1957 年 12 月 29 日，p. 2；1958 年 1 月 21 日，p. 4；1958 年 8 月 16 日，p. 8。
19 麻城，1958 年 7 月 15 日，1-1-331；1959 年 4 月 13 日，1-1-370, p. 37。
20 廣東，1960 年 12 月 31 日，217-1-576, pp. 54-68。
21 江，《七十年征程》，p. 431。
22 薄，《若干重大事件》，p. 683；實踐來自山東某集體農場。
23 中央報告，雲南，1958 年 9 月 3 日，120-1-84, pp. 52-67。
24 廣東，1961 年 12 月 31 日，217-1-642, pp. 11-12。
25 廣東，1961 年 1 月 7 日，217-1-643, pp. 120-2.
26 Roderick MacFarquhar, Timothy Cheek and Eugene Wu (eds),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毛主席的秘密講話：從百花齊放到大躍進》）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450.
27 麻城，1959 年 1 月 15 日，1-1-443, p. 10.
28 劉書訪談，出生於 1946 年，四川仁壽縣，2006 年 4 月。
29 羅白訪談，出生於 1930 年代，四川洪雅縣，2006 年 4 月。
30 浙江，1961 年 5 月 4 日，J007-13-48, pp. 1-8。
31 麻城，1959 年 1 月 20 日，1-1-378, p. 22。
32 河北，1961 年 4 月 16 日，884-1-202, pp. 35-47。
33 廣東，1961 年 1 月 5 日，217-1-643, pp. 50-60。
34 李志綏，(《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 278。
35 會議紀要，河北，1958 年 8 月 4-5 日，855-4-1271, pp. 6-7 及 13-14；亦見人民日報，1958 年 8 月 4 日，p. 1，1958 年 8 月 11 日，p. 1。

36 湖南，1958 年 10 月 19 日，141-2-64, pp. 78-82；湖南，1958 年 9 月 18 日，141-1-1066, pp. 7-8。
37 湖南，1958 年 10 月 19 日，141-2-64, pp. 78-82。
38 湖南，1958 年 11 月 5 日，141-1-1051, p. 124。
39 國務院指示，甘肅，1959 年 1 月 7 日，91-8-360, pp. 5-6。

6 鳴炮發令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pp. 323-4。
2 Lüthi, ***Sino-Soviet Split***（《中蘇分裂》）pp. 92-3.
3 李，《外交舞臺上》，p. 149。
4 Harrison E.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新帝王們：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的中國》）Boston: Little, Brown, 1992, pp. 155-6.
5 李，《外交舞臺上》，p. 151。
6 Russian minutes in 'Peregovory S. Khrushcheva s Mao Tszedunom 31 iiulia-3 avgusta 1958 g. i 2 oktiabria 1959 g.', ***Novaia i Noveishaia Istoria***, no. 1 (2001), pp. 100-8; reference on page 117.
7 Khrushchev, ***Vremia, liudi, vlast'***, vol. 3, pp. 76-7.
8 李志綏，(《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 p. 261。
9 李，《外交舞臺上》，pp. 149-50。
10 幾年後他回憶在某次全體會議的講話；見 RGANI，Moscow，1961 年 1 月 18 日，2-1-535, pp. 143-6；亦見 RGANI，Moscow，1964 年 2 月 14 日，2-1-720, p. 137。
11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克里姆林宮內的冷戰：從史達林到赫魯曉夫》）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25-6.
12 李志綏，(《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 270。
13 毛，《毛澤東外交文選》，pp. 344 及 347。
14 Roland Felber, 'China and the Claim for Democracy'（《中國和民主主張》），摘自 Näth, ***Communist China in Retrospect***（《回顧共產中國》）p. 117; 更近一點是 中蘇關係專家 Lorenz Lüthi 的著作，同樣分析了內部發展如何決定了炮轟金門的時機；參見 Lüthi, ***Sino-Soviet Split***（中蘇分裂）p. 99.

7 人民公社

1 李志綏，(《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 263。
2 河北：1957 年 9 月，855-4-1271, pp. 1-5。
3 河北，1958 年 2 月 13 日及 4 月 30 日，855-18-541, pp. 13-20 及 67-81。
4 毛，《建國以來》，卷 7，p. 143。
5 人民日報，1958 年 4 月 17 日，p. 2。
6 陳伯達，《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紅旗，1958 年 7 月 16 日，no. 4, pp. 1-12。
7 1958 年 8 月 19 日及 21 日的講話，甘肅，91-18-495, pp. 316 及 321。
8 李，《大躍進》，卷 2，p. 31。
9 人民日報，1958 年 9 月 1 日，p. 3。
10 金、黃，《劉少奇傳》，pp. 832-3。
11 人民日報，1958 年 9 月 18 日，p. 2；1958 年 9 月 24 日，p. 1。
12 毛，《建國以來》，卷 7，p. 494。

13 Ji Fengyuan, *Linguistic Engineering: Language and Politics in Mao's China*（《語言工程：毛澤東時代中國的語言和政治》）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p. 88.
14 1958 年 8 月 21 及 24 日的講話；湖南，141-1-1036, pp. 24-5 及 31。
15 人民日報，1958 年 10 月 3 日，p. 2。
16 人民日報，1958 年 10 月 6 日，p. 6；1958 年 10 月，p. 1。
17 湖南，1958 年 9 月 18 日，141-1-1066, p. 5。
18 John Gittings, 'China's Militia'（《中國的民兵》）*China Quarterly*, no. 18 (June 1964), p. 111.
19 麻城，1959 年 1 月 15 日，1-1-443, pp. 9 及 24。
20 南京，1961 年 4 月 10 日，4003-2-481, pp. 75-83。
21 湖南，1961 年 2 月 4 日，51-1-20, pp. 8-9。
22 廣東，1960 年 12 月 10 日，217-1-643, p. 44。
23 李爺爺訪談，出生於 1935 年，四川閬中縣，2007 年 4 月。
24 馮大伯訪談，出生於 1930 年代，四川閬中縣，2006 年 9 月。
25 四川，1960 年 2 月 26 日，建川 1-1846, p. 22。
26 廣東，1960 年 12 月 10 日，217-1-643, p. 45。
27 廣東，1959 年 2 月 12 日，217-1-69, pp. 25-33。
28 廣東，1961 年 1 月 7 日，217-1-643, p. 111。
29 廣州，1958 年 10 月 27 日，16-1-1, p. 76。
30 武漢，1958 年 11 月 3 日，83-1-523, p. 126。
31 武漢，1958 年 9 月 19 日及 11 月 3 日，83-1-523, pp. 21-5 及 126-32。
32 廣州，1958 年 10 月 27 日，16-1-1, p. 76。
33 武漢，1958，83-1-523, p. 87。
34 麻城，1959 年 1 月 20 日，1-1-378, p. 24；1960 年 12 月 11 日，1-1-502, pp. 207 及 213；1959 年 4 月 16 日，1-1-383, p. 1。
35 四川，1961，建川 1-2606, pp. 18-19。
36 甘肅，1961 年 1 月 16 日，91-18-200, p. 94。
37 湖南，1959 年 9 月 2-4 日，141-1-1116, p. 11。
38 麻城，1961 年 5 月 13 日，1-1-556, pp. 2-3；亦見 1959 年 1 月 20 日，1-1-378, p. 23。
39 麻城，1959 年 4 月 18 日，1-1-406, p. 1。
40 麻城，1959 年 1 月 29 日及 2 月 2 日，1-1-416, pp. 36 及 49；1958 年 4 月 26 日，1-1-431, p. 37。
41 南寧，4003-1-150，1958 年 12 月 30 日，p. 89。

8 大煉鋼鐵

1 雲南，1958 年 11 月 8 日，pp. 11-14；1958 年 3 月 11 日，105-9-6, pp. 71-4。
2 毛，《建國以來》，卷 7，p. 236。
3 毛澤東第 2 次講話後，召集了一部分省市書記談話，謝富治將毛的談話向雲南和貴州、貴陽的代表同志作了傳達，這是根據謝傳達的精神摘記的，貴陽，61-8-84，1958 年 5 月 28 日，p. 2。
4 Lin Keng, 'Home-Grown Technical Revolution'（《本土的技術革命》）*China Reconstructs*, Sept. 1958, p. 12.
5 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p. 132。

6 廣東，1960 年 12 月 31 日，217-1-642, pp. 10-16。
7 關於數據之間的差別 MacFarquhar 均有所敍述 *Origins*（《起源》，卷 2）pp. 88-90。
8 顧士明，李乾貴，孫劍平，《李富春經濟思想研究》，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p. 115。
9 該談話陳雲在場；參見逄、金，《毛澤東傳》，pp. 824-5；亦見雲南，1958 年 6 月 23 日，2-1-3276, pp. 1-9；毛，《建國以來》，卷 7，pp. 281-2。
10 冶金部報告，雲南，1958 年 6 月 23 日，2-1-3276, pp. 1-9；亦見薄，《若干重大事件》，pp. 700-1。
11 金沖及，陳群（編），《陳雲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p. 1143；亦見 Chan, *Mao's Crusade*（《毛澤東的社會運動》），pp. 73-4。
12 雲南，1958 年 9 月 10 日，2-1-3276, pp. 99-100。
13 雲南，1958 年 9 月 16 日，2-1-3101, pp. 105-23。
14 雲南，1958 年 9 月 17 日，2-1-3102, pp. 58-78。
15 雲南，1958 年 9 月 20 日及 1959 年 1 月 5 日，2-1-3318, pp. 1-5 及 10-19。
16 雲南，1958 年 9 月 23 日，1958, 2-1-3102, pp. 147-9。
17 雲南，1958 年 9 月 25 日，2-1-3101, p. 185。
18 雲南，1958 年 10 月 18 日，2-1-3102, pp. 160 及 230；1958 年 10 月，2-1-3102, pp. 235-73。
19 雲南，1958 年 12 月 14 日，2-1-3259, pp. 165-72。
20 雲南，1959 年 1 月 5 日，2-1-3318, p. 18。
21 麻城，1959 年 1 月 20 日，1-1-378, p. 23。
22 麻城，1959 年 1 月 15 日，1-1-443, p. 10。
23 張愛華訪談，出生於 1941 年，安徽定遠縣，2006 年 9 月。
24 南寧，1958，4003-4-292, pp. 16 及 48-52。
25 甘肅，1959 年 5 月 20 日，91-18-114, p. 209。
26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彙編》，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p. 3，摘自林，《烏托邦運動》，p. 205。
27 Klochko, *Soviet Scientist*（《蘇維埃科學家》）p. 82。
28 上海，1959 年 3 月 12 日，B98-1-439, pp. 9-13。
29 雲南，1959 年 5 月 16 日，81-4-25, p. 2。
30 雲南，1958 年 11 月 8 日，105-9-1, p. 15；亦見 105-9-3, pp. 9-16。
31 雲南，1958 年 7 月 29 日，2-1-3102, p. 19。
32 雲南，1958 年 4 月 21 日，2-1-3260, p. 116。
33 這只是粗略估計，各地區情況不同：在湖南，1958 年之後不再務農的人數增加了 40%；湖南，1959 年 6 月 4 日，146-1-483, p. 116；在山東，只有 50% 的勞力在地裏勞動；譚震林講話，甘肅，1959 年 6 月 26 日，91-18-513, p. 16。
34 雲南，1958 年 7 月 29 日，2-1-3102, p. 21。
35 廣東，1961 年 1 月 5 日，217-1-643, pp. 50-60。
36 譚震林講話，1958 年 10 月，湖南，141-2-62, p. 148。

9 警訊乍現

1 雲南，1958 年 4 月 12 日，中發 (58) 295, 120-1-75, pp. 2-4。
2 湖南，1958 年 4 月 25 日，141-1-1055, pp. 66-7。
3 雲南，1958 年 11 月 20 日，2-1-3078, pp. 116-23；1958 年 8 月 22 日，2-1-3078, pp. 1-16。

4 雲南，1958 年 11 月 20 日，2-1-3078, pp. 116-23。
5 雲南，1958 年 9 月 12 日，2-1-3077, pp. 55-77；1958 年 9 月 12 日，2-1-3076, pp. 97-105；1958 年 9 月，2-1-3075, pp. 104-22。
6 雲南，1959 年 2 月 28 日，2-1-3700, pp. 93-8。
7 雲南，1959 年 5 月 16 日，81-4-25, p. 17；關於 1957 年平均死亡率，見《中國統計年鑒，198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p. 83。
8 毛，《建國以來》，卷 7，pp. 584-5；原出處見雲南，1958 年 11 月 25 日，120-1-84, p. 68；亦見鄭州會議文件，1958 年 11 月 25 日，湖南，141-2-76, pp. 99-103。
9 河北，1961 年 4 月 16 日，884-1-202, pp. 35-47。
10 河北，1961 年 2 月 19 日，856-1-227, p. 3。
11 河北，1958 年 12 月 25 日，855-4-1271, pp. 58-65。
12 河北，1958 年 10 月 18 日，855-4-1270, pp. 1-7。
13 河北，1958 年 10 月 23 日，855-4-1271, pp. 25-6。
14 河北，1958 年 10 月 24 日，855-4-1271, pp. 42-3。
15 湖南，1958 年 11 月 5 日，141-1-1051, p. 123。
16 李井泉在省委會議的講話，四川，1059 年 3 月 17 日，建川 1-1533, pp. 154-5。
17 甘肅，1959 年 1 月 25 日，91-18-114, p. 113。
18 例如，額外多運了 600,000 公噸到北京，800,000 公噸到上海；見上海，1959 年 3 月 12 日，B98-1-439, pp. 9-13。
19 雲南，1958 年 12 月 18 日，2-1-3101, pp. 301, 305-12。

10 徵購狂潮

1 外交部，北京，1963 年 9 月 6 日，109-3321-2, pp. 82-5。
2 K. A. Krutikov, *Na Kitaiskom napravlenii: Iz vospominanii diplomata*, Moscow: Institut Dal'nego Vostoka, 2003, p. 253; see also T. G. Zazerskaya, *Sovetskie spetsialisty i formirovanie voenno-promyshlennogo kompleksa Kitaya (1949-1960 gg.)*, St Petersburg: Sankt Peterburg Gosudarstvennyi Universitet, 2000.
3 俄羅斯外交部檔案，莫斯科，1958 年 3 月 9 日，0100-51-6, papka 432, p. 102。
4 外交部，北京，1958 年 6 月 10 日，109-828-30, pp. 176-7。
5 George Ginsburgs, 'Trade with the Soviet Union'（《對蘇貿易》）in Victor H. Li, *Law and Politics in China's Foreign Trade*（《中國對外貿易的法律與政策》）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7, p. 100.
6 聯邦檔案，Berlin，1958 年 12 月 2 日，DL2-4037, pp. 31-9。
7 Jahrbuch，1962，Berlin，1962，p. 548，以及 MfAA, Berlin，1963 年 11 月 25 日，C572-77-2, p. 191。
8 聯邦檔案，Berlin，1961 年 1 月 7 日，DL2-4039, p. 7；1959, DL2-VAN-172。
9 見《周恩來年譜》，卷 2，pp. 149, 165, 231, 256, 摘自張曙光，Zhang Shu Guang,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經濟冷戰：美國對華經濟禁運和中蘇同盟，1949-1963》）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12-13.
10 見 p. 100。
11 A. Boone,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中國對外貿易》）*China Quarterly*, no. 11 (Sept. 1962), p. 176.
12 聯邦檔案，Berlin，1957 年 10 月 6 日，DL2-1932, pp. 331-2。

13 Lawrence C. Reardon, *The Reluctant Dragon: Crisis Cycles in Chinese Foreign Economic Policy*（《頑抗的巨龍：中國對外經濟政策的危機週期》）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91-2.
14 Martin Kitchen, *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1800-2000*（《現代德國史，1800-2000》）New York: Wiley-Blackwell, 2006, p. 336.
15 MfAA, Berlin，1958 年 9 月 27 日，A6861, p. 145。
16 同上，pp. 151-2。
17 聯邦檔案，Berlin，1959 年 6 月 24 日，DL2-1937, p. 231。
18 'Russia's trade war'（《俄國貿易戰》）*Time*, 5 May 1958; 亦見 Boone, 'Foreign Trade of China'.（《中國的對外貿易》）
19 'Squeeze from Peking'（《北京的壓榨》）*Time*, 21 July 1958.
20 'Made well in Japan'（《與日本改善關係》）*Time*, 1 Sept. 1958.
21 外交部，北京，1958 年 11 月 8 日，109-1907-4, p. 49。
22 外交部，北京，1959 年 1 月，109-1907-3, pp. 24-5。
23 外交部，北京，1958 年 11 月 8 日，109-1907-4, pp. 46-50。
24 外交部，北京，1958 年 12 月 23 日，109-1907-2, pp. 12-13；關於德國，見 MfAA, Berlin，1959 年 9 月 21 日 , A9960-2, pp. 183-4。
25 外交部，北京，1958 年 11 月 8 日，109-1907-4, pp. 44-5。
26 外交部，北京，1958 年 11 月 23 日，109-1907-5, p. 56。
27 湖南，1959 年 1 月 22 日，163-1-1052, p. 237。
28 湖南，1959 年 1 月，141-2-104, pp. 10-12。
29 甘肅，1959 年 1 月 25 日，91-18-114, p. 119；外交部，北京，1958 年 12 月 23 日，109-1907-2, pp. 12-13。
30 外交部報告，上海，1958 年 10 月 31 日，B29-2-97, p. 23。
31 廣東，1961 年 8 月 10 日，219-2-318, p. 14。
32 湖南，1959 年 2 月 7 日，163-1-1052, p. 11。
33 同上，p. 12。
34 同上，p. 11。
35 外交部，北京，1959 年 4 月 10 日，109-1907-8, p. 100；亦見 1959 年 3 月 25 日講話，甘肅，19-18-494, p. 46。
36 彭和周的講話，見外交部紀要，北京，1959 年 4 月 10 日，109-1907-8, p. 101。
37 電話命令；湖南，1959 年 5 月 26 日，141-1-1252, pp. 39-40。
38 湖南，1959 年 11 月 20 日，163-1-1052, pp. 25-9。
39 湖南，1959 年 6 月 6 日，163-1-1052, pp. 119-24。
40 甘肅，中發 (60) 98，1960 年 1 月 6 日，91-18-160, pp. 187-90。
41 湖南，1960 年 1 月 6 日，141-2-126, pp. 14-15。
42 甘肅，中發 (60) 98，1960 年 1 月 6 日，91-18-160, pp. 187-90。
43 湖南，1959 年 11 月 24 日，163-1-1052, pp. 21-4。
44 上海，1960 年 2 月 20 日，B29-2-112, pp. 2-5。
45 上海，1959 年 12 月 1 日，B29-2-112, pp. 2-5。

11 衝昏頭腦

1 林，《烏托邦運動》，pp. 371-2；吳，《憶毛主席》，pp. 105-6。
2 趙紫陽在雷南縣的報告，開平，1959 年 1 月 27 日，3-A9-78, pp. 17-20。
3 內部參考，1959 年 2 月 5 日，pp. 3-14。
4 毛，《建國以來》，卷 8，pp. 52-4。

5 同上，pp. 80-1。
6 同上，pp. 52-4。
7 毛在鄭州的講話，1959 年 3 月 18 日，甘肅，91-18-494, pp. 19-20 及 22。
8 毛 1959 年 3 月 5 日的講話，摘自逄、金，《毛澤東傳》，p. 922。
9 毛 1959 年 2 月 2 日的講話，甘肅，91-18-494, pp. 10-11。
10 毛對王任重的指示，湖南，1959 年 4 月 13 日，141-1-1310, p. 75。
11 薄，《若干重大事件》，p. 830。
12 毛 1959 年 4 月 5 日清晨的十六條講話，湖南，141-2-98, pp. 1-12；亦見林，《烏托邦運動》，pp. 413-17。
13 毛，《建國以來》，卷 8，p. 33。
14 毛的談話紀要，甘肅，1959 年 3 月 18 日，91-18-494, p. 19。
15 引自廣西地委書記伍晉南 1959 年 2 月 14 日講話；見紀要，廣西，X1-25-316, pp. 8-9。
16 毛的談話紀要，甘肅，1959 年 3 月 25 日，19-18-494, pp. 44-8。
17 電話會議，甘肅，1959 年 6 月 20 日，91-18-539, p. 41。
18 李，《大躍進》，卷 2，p. 393。
19 電話會議，1959 年 1 月 20 日，甘肅，91-18-513, p. 59。
20 毛的電報，甘肅，1959 年 4 月 26 日，91-8-276, pp. 90-2。

12 真理死了

1 毛的講話，1959 年 8 月 11 日，甘肅，91-18-494, p. 81。
2 李志綏，(《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p. 310-11。
3 王焰等（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p. 738。
4 金，《周恩來傳》，p. 1326。
5 湖南，1959 年 8 月 31 日，141-1-1115, pp. 107-9 及 111-13。
6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p. 275。
7 見彭德懷與周小舟的談話，甘肅，1959 年 8 月 13 日，91-18-96, p. 518。
8 這一描述來源於早期的親密戰友 Kung Chu, *The Case of Peng Teh-huai, 1959-1968* (《彭德懷案，1959-1968》)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68, p. i。
9 甘肅，1959 年 7 月 14 日，91-18-96, pp. 579-84。
10 李志綏，(《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 314。
11 毛，《建國以來》，卷 8，p. 356。
12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pp. 111-15。
13 黃克誠自述，甘肅，1959 年 8 月，91-18-96, p. 491。
14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p. 250。
15 毛的講話，1959 年 8 月 11 日，甘肅，91-18-494, p. 78。
16 甘肅，1959 年 7 月 21 日，91-18-96, pp. 532-47。
17 彭德懷供述他與張聞天的聯繫，甘肅，1959 年 8 月，91-18-96, p. 568。
18 甘肅，91-18-488，1959 年 7 月 15 日，pp. 106-8。
19 周小舟寫給毛澤東的信，甘肅，1959 年 8 月 13 日，91-18-96, p. 518。
20 內部參考，1959 年 7 月 26 日，pp. 19-20。
21 毛，《建國以來》，卷 8，p. 367；該報告來自外交部，北京，1959 年 7 月 2 日，109-870-8, pp. 81-3。
22 吳冷西未出版的回憶錄，摘自逄、金，《毛澤東傳》，p. 983。
23 甘肅，1959 年 8 月 11 日，91-18-494, p. 84。
24 甘肅，1959 年 7 月 23 日，91-18-494, pp. 50-66。

25 李志綏，(《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 317。
26 甘肅，1959 年 8 月 2 日，91-18-494, pp. 67-70。
27 李，《廬山會議》，pp. 206-7。
28 黃崢，《王光美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p. 199。
29 李，《廬山會議》，pp. 359-60。
30 黃克誠自我批評，甘肅，1959 年 8 月，91-18-96, p. 495。
31 甘肅，1959 年 8 月，91-18-96, p. 559。
32 甘肅，1959 年 8 月 11 日，91-18-494, pp. 82-3。
33 甘肅，1959 年 8 月 16 日，91-18-96, p. 485。

13 殘酷鬥爭

1 高，《周恩來》，pp. 187-8。
2 甘肅，1959 年 9 月 19 日，91-18-561, p. 28。
3 甘肅，中發 (60) 28，1960 年 1 月 8 日，91-18-164, pp. 109-14。
4 甘肅，1962 年 12 月 3 日，91-4-1028, pp. 8-9。
5 毛，《建國以來》，卷 8，p. 529。
6 甘肅，1960 年 7 月 1 日，91-4-705, pp. 1-5。
7 雲南，1959 年 10 月 28 日，2-1-3639, pp. 23-31。
8 河北，1960，879-1-116, p. 43。
9 河北，1959 年 11 月 9 日，855-5-1788, pp. 3-6。
10 毛，《建國以來》，卷 8，p. 431。
11 湖南，1959 年 9 月 2-4 日，141-1-1116, pp. 40-3, 49-50 及 121。
12 李志綏，(《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p. 299-300；幾天之前周小舟和王任重的電話中談到幾乎一模一樣的內容，周奚落王在糧食產量上放衛星，挑釁要他到長沙看看當地的產量；見湖南，1959 年 9 月 1 日，141-1-1115, pp. 235-7。
13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文化大革命起源，卷 3：災難來臨，1961-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61, 179 and 206-7; Lu, ***Cadres and Corruption*** (《幹部與腐敗》) p. 86, 引用數字來自當時的《人民日報》；彭真於 1959 年 9 月的講話中，估計黨員數量為 13,900,000，過去兩年中清肅的幹部為 700,000；見甘肅，1959 年 9 月 19 日，91-18-561, p. 28。

14 中蘇分歧

1 國務院，外交部的指令，北京，1960 年 8 月 1 日，109-927-1, pp. 1-5。
2 Klochko, ***Soviet Scientist*** (《蘇維埃科學家》) p. 171.
3 許多外交人士認為這是分裂的主要原因；參見 Kapitsa, ***Na raznykh parallelakh***, pp. 61-3; Arkady N. Shevchenko, ***Breaking with Moscow*** (《斷交莫斯科》)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85, p. 122.
4 Zubok and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克里姆林宮內的冷戰》) p. 232.
5 召回國書的俄文和中文原件在外交部，北京，1960 年 7 月 16 日，109-924-1, pp. 4-8。
6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5, p. 465.
7 吳，《十年論戰》，p. 337。
8 甘肅，1960 年 8 月 5 日，91-9-91, pp. 7-11。
9 外交部，北京，1960-1, 109-2248-1, p. 38。

10 外交部，北京，1963 年 8 月 20 日，109-2541-1, pp. 12-13。
11 外交部，北京，1960 年 3 月 28 日，109-2061-1, p. 3；外交部，北京，1962, 109-3191-6, p. 5。
12 外交部，北京，109-2541-1, pp. 12-13。
13 外貿銀行報告 , RGANI, Moscow, 2 June 1961, 5-20-210, p. 34; 細節另見：*Sbornik osnovnykh deistvuiushchikh dogovorokh i soglosheniі mezhdu SSSR i KNR, 1949-1961*, Moscow: Ministerstvo Inostrannykh Del, no date, p. 198.
14 Ginsburgs, 'Trade with the Soviet Union'（《對蘇貿易》）pp. 100 and 106.
15 聯邦檔案，Berlin，1960 年 11 月 12 日，DL2-1870, p. 34。
16 RGANI，Moscow，1964 年 2 月 14 日，2-1-720, p. 75。
17 Mr Chan (陳先生) 訪談，出生於 1946 年，香港，2006 年 7 月。
18 Taubman, *Khrushchev*（《赫魯曉夫》）p. 471。
19 李志綏，(《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 339。

15 進口洋麵

1 金，《周恩來傳》，p. 1398。
2 外交部，北京，1960 年 8 月 20 日，118-1378-13, pp. 32-3。
3 Oleg Hoeffding, 'Sino-Soviet Economic Relations, 1959-1962'（《中蘇經濟關係，1959-1962》）*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349 (Sept. 1963), p. 95.
4 外交部，北京，1960 年 12 月 31 日，110-1316-11, pp. 1-5。
5 外交部，北京，1961 年 1 月 18 日，109-3004-2, p. 8。
6 外交部，北京，1960 年 12 月 31 日，110-1316-11, pp. 1-5。
7 BArch, Berlin, 12 Nov. 1960, DL2-1870, p. 34.
8 'Famine and bankruptcy'（《饑荒和銀荒》）*Time*, 2 June 1961.
9 金，《周恩來傳》，pp. 1414-15。
10 Colin Garratt, 'How to Pay for the Grain'（《糧食的代價》）*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33, no. 13 (28 Sept. 1961), p. 644.
11 金，《周恩來傳》，p. 1413。
12 周恩來報告，湖南，1961 年 12 月 4 日，141-1-1931, p. 54。
13 MfAA, Berlin, 1962, A6792, p. 137。
14 周恩來報告，湖南，1961 年 12 月 4 日，141-1-1931, p. 54。
15 Boone, 'Foreign Trade of China'（《中國的對外貿易》）。
16 周恩來報告，湖南，1961 年 12 月 4 日，141-1-1931, pp. 52-3。
17 'Famine and bankruptcy'（《饑荒和銀荒》）*Time*, 2 June 1961。
18 外交部，北京，1961 年 3 月 8 日，109-3746-1, pp. 17-18。
19 RGANI, Moscow, 14 Feb. 1964, 2-1-720, pp. 81-2; 運糖的合同書，見：*Sbornik osnovnykh deistvuiushchikh dogovorokh i soglosheniі mezhdu SSSR i KNR, 1949-1961*, Moscow: Ministerstvo Inostrannykh Del, no date, pp. 196-7.
20 外交部，北京，1961 年 4 月 4 日，109-2264-1, pp. 1-8。
21 外交部，北京，1961 年 8 月 22 日，109-2264-2, p. 38。
22 外交部，北京，1962 年 4 月 6 日，109-2410-3, p. 53。
23 同上。
24 外交部，北京，1962 年 8 月 15 日，109-2410-1, pp. 62-3。
25 BArch, Berlin, 1962, DL2-VAN-175, p. 15.
26 Chang and Halliday, *Mao*（《毛》）p. 462.

27 MfAA, Berlin，1962 年 7 月 11 日，A17334, p. 92。
28 外交部，北京，1960 年 7 月 1 日，102-15-1, pp. 26-39；亦見 MfAA, Berlin，1962 年 7 月 11 日，A17334，pp. 89-94。
29 上海，1959 年 12 月 1 日，B29-2-112, p. 3。
30 財政部報告，甘肅，1961 年 7 月 1 日，91-18-211, p. 25。
31 MfAA, Berlin，1962 年 1 月 4 日，A6836, p. 33;；亦見關於東德對外援助政策的分析，被認為是饑荒的主要原因之一；MfAA, Berlin，1962 年 1 月 4 日，A6836, p. 16。
32 財政部報告，甘肅，1961 年 7 月 1 日，91-18-211, pp. 22-5。
33 湖南，1960 年 3 月 29 日，163-1-1083, pp. 119-22；到年底，根據 1960 年 9 月在北戴河制定的決議，這個數字降到 3 千 1 百萬，大米減半至 144,000 公噸；見湖南，1960 年 10 月 22 日，163-1-1083, pp. 130-4。
34 廣東，1960 年 9 月 29 日，300-1-195, p. 158。
35 廣州，1961 年 4 月 5 日，92-1-275, p. 105。
36 甘肅，1961 年 1 月 16 日，91-18-200, p. 72。
37 上海，1960 年 10 月 21 日，B29-2-112, pp. 2-5.
38 'Back to the farm'（《回到田間》）*Time*, 3 Feb. 1961.
39 ICRC, Geneva, 1961 年 1 月 18、28、30 日及 2 月 6 日電報，BAG 209-048-2。
40 ICRC, Geneva, 1961 年 3 月 1 日及 14 日討論，BAG 209-048-2。
41 外交部，北京，1959 年 1 月 27 日，109-1952-3, p. 13。

16 尋找出路

1 薄，《若干重大事件》，p. 892。
2 毛，《建國以來》，卷 9，p. 326；林，《烏托邦運動》，p. 607。
3 章重，《信陽事件揭秘》，黨史天地，2004, no. 4, pp. 40-1。
4 楊振剛、張劍生、劉士楷，《關於壞分子馬龍山大搞反瞞產及其後果等有關材料的調查報告》，1960 年 11 月 9 日，p. 7。
5 李振海、劉正榮、張春元，《關於信陽地區新蔡縣去冬今春發生腫病死人和幹部嚴重違法亂紀問題的調查報告》，1960 年 11 月 30 日，p. 1。
6 信陽地委組織處理辦公室，《關於地委常委書記王達夫同志所犯錯誤及事實材料》，1962 年 1 月 5 日，pp. 1-2。
7 章，《信陽事件揭秘》，p. 42；亦見喬培華，《信陽事件》，香港：開放出版社，2009。
8 毛，《建國以來》，卷 9，p. 349。
9 《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卷 2，pp. 419-30。
10 Chester J. Cheng (ed.),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Red Army*（《中國解放軍政治》）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ublications, 1966, pp. 117-23.
1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卷 13，pp. 660-76。
12 薄，《若干重大事件》，pp. 893-6。
13 李志綏，（《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 339。
14 劉少奇講話，甘肅，1961 年 1 月 20 日，91-6-79, pp. 46-51 及 103-7。
15 毛澤東講話，甘肅，1961 年 1 月 18 日，91-6-79, p. 4。
16 黃，《劉少奇一生》，pp. 346-8；黃，《王光美訪談錄》，pp. 225-6 及 240。

17 劉少奇談話，1961 年 4 月 25 日、28 日及 30 日，湖南，141-1-1873, pp. 106-50；亦見黃，《王光美訪談錄》，pp. 238-40；金、黃，《劉少奇傳》，pp. 865-6。
18 金、黃，《劉少奇傳》，p. 874。
19 劉少奇信件，甘肅，1961 年 4 月 -5 月，91-4-889, pp. 2-4。
20 劉少奇，1961 年 5 月 31 日，甘肅，91-6-81, pp. 69-73。
21 金，《周恩來傳》，pp. 1441-2。
22 李富春在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上的講話，湖南，1961 年 1 月 14 日，中發 (61) 52，186-1-505, pp. 1-28。
23 李富春講話，湖南，1961 年 7 月 17 日，186-1-584, pp. 7 及 13。
24 北戴河會議文件，湖南，1961 年 8 月 11 日，186-1-584, pp. 38-48, 125, 134 及 152。
25 李志綏，(《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 380。

17 毀了農業

1 Jean C. 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當代中國的政體和農民：農村政府的政治經濟》)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48-9.
2 河北，1961 年 4 月 11 日，878-1-14, pp. 56-8。
3 雲南，1958 年 7 月 29 日，2-1-3102, pp. 16-22。
4 Kenneth R. Walker, *Food Grain Procurement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 (《中國的糧食征繳與消費》)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5 省內制定的 1959-1960 年的糧食征繳計畫，見甘肅，1959 年 7 月 31 日，中發 (59) 645, 91-18-117, p. 105。
6 浙江，1961 年 7 月 16 日，J132-13-7, pp. 22-8，摘自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p. 418；將其與楊的統計資料對比，p. 417。
7 貴州，1962, 90-1-2706, 列印頁 p. 3；縣級資料中可以找到精確資料，和上述數位大致相同。例如在遵義縣 (1957 年是 26.5%，1958 年是 46.3%，1959 年 47%，1960 年 54.7%)，貴州，1962, 90-1-2708, 列印頁 p. 7；該檔案中還有其他類似例子，有的地區上繳率高達 80%；糧食局數字參見楊，《墓碑》，p. 540。
8 1959 年 3 月 25 日講話，甘肅，19-18-494, pp. 44-6。
9 浙江，1961 年 7 月 16 日，J132-13-7, pp. 22-8；對比楊的《墓碑》，p. 540。
10 國務院報告，甘肅，1960 年 6 月 15 日，中發 (60) 547, 91-18-160, pp. 208-12。
11 廣東，1961 年 8 月 10 日，219-2-318, pp. 9-16。
12 鄧小平講話，1961 年 12 月 11 日，湖南，141-2-138, p. 43。
13 1959 年 3 月 25 日講話，甘肅，19-18-494, p. 48。
14 上海，1961 年 4 月 4 日，B6-2-392, pp. 20 ff。
15 上海，1958 年 7 月 8 日，B29-2-97, p. 17。
16 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當代中國的政體和農民》) pp. 53-5.
17 關於政策檔和湖南的例子，見湖南，1959 年 11 月 3 日及 12 月 1 日，146-1-483, pp. 9, 18-20 及 86。
18 浙江，1961 年 1 月，J116-15-10, pp. 1-14。
19 廣東，1961 年 1 月 7 日，217-1-643, pp. 120-2。
20 廣東，1961 年 1 月 2 日，217-1-643, pp. 61-6。
21 1958 年 8 月 30 日講話，湖南，141-1-1036, p. 38。

22 湖南，1964, 187-1-1355, p. 64。
23 浙江，1961, J116-15-139, p. 1；1961 年 1 月 29 日，J116-15-115, p. 29。
24 湖北，1961 年 1 月 13 日，SZ18-2-200, p. 27。
25 甘肅，1959 年 6 月 20 日，91-18-539, p. 35。
26 甘肅，1961 年 2 月 12 日，91-18-209, p. 246；Walker 估計 1958 年播種面積約為 1.3 億公頃，見 Walker，《糧食征繳》，p. 147。
27 Walker, *Food Grain Procurement*（《糧食征繳》）pp. 21-2.
28 廣東，1961 年 3 月 1 日，235-1-259, pp. 23-5。
29 雲南，1961 年 9 月 20 日，120-1-193, pp. 85-92。
30 甘肅，1961 年 2 月 20 日，中發 (61) 145, 91-18-211, p. 91。
31 廣東，1961 年 3 月 1 日，235-1-259, pp. 23-5。
32 湖南，1960 年 11 月 15 日，163-1-1082, p. 106。
33 雲南，1961 年 2 月 6 日，120-1-193, pp. 108-9。
34 北京，1960 年 11 月 29 日及 12 月 10 日，2-12-262, pp. 21-3。
35 雲南，1960 年 12 月 14 日及 1961 年 9 月 20 日，120-1-193, pp. 85-92 及 112-15。
36 甘肅，1961 年 2 月 20 日，中發 (61) 145, 91-18-211, p. 92。
37 雲南，1960 年 12 月 14 日，120-1-193, pp. 112-15。
38 湖南，1959 年 8 月 20 日，141-1-1259, pp. 51-2。
39 MfAA, Berlin, 1962, A6860, p. 100.
40 浙江，1961 年 1 月 29 日，J116-15-115, p. 12。
41 廣東，1961 年 3 月 15 日，217-1-119, p. 78。
42 MfAA, Berlin, 1962, A6792, p. 136.
43 湖南，1961 年 11 月 6 日，141-1-1914, pp. 48-52。
44 雲南，1962, 81-7-86, p. 13。
45 湖南，1959 年 2 月 19 日，163-1-1052, pp. 82-7。
46 紡織工業部部長錢之光報告，湖南，1961 年 8 月 11 日，186-1-584, p. 107。
47 廣州，1961 年 2 月 28 日，6-1-103, pp. 3-4。
48 北京，1962 年 1 月 8 日，2-13-138, pp. 1-3。
49 胡耀邦報告，1961 年 10 月 1 日，湖南，141-2-138, p. 197。
50 河北，1962, 979-3-870, pp. 1-30。
51 湖南，1959 年 3 月 15 日，141-1-1158, p. 140。
52 廣東，1959 年 7 月 3 日，217-1-69, pp. 74-5。
53 廣東，1961 年 10 月 12 日，235-1-259, p. 13。
54 浙江，1961 年 1 月 29 日，J116-15-115, pp. 16-21。
55 湖南，1961 年 1 月 15 日，146-1-580, p. 13。
56 廣東，1961 年 5 月 20 日，217-1-210, pp. 82-7。
57 浙江，1961 年 1 月 29 日，J116-15-115, pp. 16-21。
58 李井泉和周恩來在總理辦公室的談話，1962 年 4 月 1 日，四川，建川 1-3198, p. 33。
59 上海，1961, B181-1-510, pp. 17-20。
60 北京，1962 年 7 月 31 日，1-9-439, pp. 1-4。
61 莫斯科大使館的報告，外交部，北京，1958 年 9 月 18 日，109-1213-14, p. 142。
62 浙江，1960 年 3 月 21 日，J002-3-3, p. 34。
63 上海，1961, B181-1-510, p. 7。
64 外交部，北京，1959 年 4 月 10 日，109-1907-8, p. 100；亦見談話，1959 年 3 月 25 日，甘肅，19-18-494, p. 46。

65 上海，1961, B29-2-980, p. 143。
66 廣東，1961 年 9 月 16 日，235-1-259, p. 71。
67 浙江，1961 年 1 月 29 日，J116-15-115, pp. 5 and 16。
68 宣城，1961 年 5 月 17 日，3-1-257, pp. 127-31。
69 上海，1961, B181-1-511, p. 25。
70 湖南，1961 年 8 月 11 日，186-1-584, p. 134。
71 湖南，1959 年 3 月 15 日，141-1-1158, p. 152。
72 廣東，1961 年 2 月 25 日，217-1-119, p. 57。
73 河北，1962, 979-3-870, pp. 1-30。
74 浙江，1961 年 1 月 29 日，J116-15-115, pp. 15 及 29。
75 同上，p. 52。
76 廣東，1961 年 2 月 25 日，217-1-119, p. 58。

18 毀了工業

1 Klochko, *Soviet Scientist*（《蘇維埃科學家》）pp. 85-6.
2 廣東，1961, 218-2-320, pp. 26-31。
3 MfAA, Berlin，1961 年 6 月 7 日，A6807, pp. 20-4。
4 MfAA, Berlin，1962 年 11 月 14 日，A6860, pp. 142-5。
5 北京，1961 年 7 月 31 日，1-5-371, pp. 5-10。
6 廣東，1961, 218-2-320, pp. 26-31。
7 Klochko, *Soviet Scientist*（《蘇維埃科學家》）p. 91.
8 內部參考，1960 年 11 月 25 日，p. 7。
9 湖南，1961 年 9 月 21 日，186-1-525, pp. 2-6。
10 同上。
11 上海，1959 年 3 月 28 日，B29-1-34, pp. 16-21。
12 湖南，1961 年 5 月 5 日，141-1-1939, pp. 33-4。
13 北京，1961 年 6 月 26 日，2-13-89, pp. 14-15。
14 湖南，1959 年 12 月 26 日及 1960 年 1 月 16 日，163-1-1087, pp. 70-2 及 91-5。
15 談話，1959 年 3 月 25 日，甘肅，19-18-494, p. 46。
16 賀龍和聶榮臻的報告，1960 年 9 月 13 日，91-6-26, pp. 69-75。
17 內部參考，1960 年 11 月 25 日，p. 9。
18 南京，1960 年 9 月 2 日，6001-1-73, pp. 12-15。
19 甘肅，1960, 19-1-255, pp. 39-41；1961 年 9 月 11 日，pp. 94-100。
20 廣東，1961 年 8 月 7 日，219-2-319, pp. 17-31。
21 北京，1959 年 1 月 17 日及 3 月 31 日，101-1-132, pp. 14-18 及 26-40。
22 北京，1960 年 3 月 29 日，101-1-138, p. 3。
23 北京，1961 年 3 月 24 日，1-28-28, p. 6。
24 北京，1961 年 9 月 28 日，2-13-138, pp. 25-9。
25 南京，1960 年 7 月 13 日及 11 月 22 日，5065-3-395, pp. 7-19 及 35-52。
26 南京，1960 年 7 月 13 日，5065-3-395, pp. 7-19。
27 南京，1961, 5065-3-443, pp. 51, 60 及 66。
28 北京，1961 年 7 月 31 日，1-5-371, pp. 5-10。
29 南京，1961 年 9 月 15 日，6001-3-328, pp. 25-8。
30 南京，1960, 4053-2-4, p. 98. 上述工資總體來說是固定的，只是在 1961-2 冬固定工資被各種補償制度取代，包括計件工資、利潤分紅；見南京，1961 年 12 月 4 日，4053-2-5, p. 1。

31 南京，1961 年 9 月 15 日，6001-2-329, pp. 30-1。
32 北京，1960 年 3 月 29 日，101-1-138, p. 4。
33 南京，1960, 4053-2-4, p. 93。
34 湖南，1959 年 9 月 3 日，141-1-1259, pp. 69-70。
35 北京，1961 年 7 月 30 日，1-5-371, p. 8。
36 煤炭部報告，甘肅，91-18-193，1961 年 9 月 11 日，p. 71。
37 四個煤礦為：曲仁、南嶺、羅家渡和連陽；廣東，1960 年 6 月，253-1-99, pp. 17-20。
38 甘肅，1961 年 2 月，91-18-200, p. 245。
39 上海，1961 年 1 月，A36-1-246, pp. 2-3。
40 上海，1961 年 8 月，B29-2-655, p. 92。
41 廣東，1961 年 8 月，219-2-319, pp. 31-56。

19 毀了貿易

1 湖南，1960 年 9 月 13 日及 11 月 7 日，163-1-1083, pp. 83-5 及 95-7。
2 上海，1960 年 8 月 11 日，B123-4-782, pp. 26-9。
3 雲南，1958 年 10 月 23 日，中發 (58) 1060, 2-1-3276, pp. 131-5。
4 雲南，1960 年 10 月 15 日，中發 (60) 841, 2-1-4246, pp. 103-8。
5 上海，1961 年 8 月，B29-2-655, p. 160；1961 年 4 月 20 日，B29-2-980, p. 248。
6 雲南，1960 年 10 月 15 日，中發 (60) 841, 2-1-4246, pp. 103-8。
7 雲南，1960 年 12 月 3 日，中發 (60) 1109, 2-1-4246, pp. 117-19。
8 外交部，北京，1960 年 1 月 1 日，118-1378-13, p. 82。
9 雲南，1961 年 10 月 25 日，2-1-4654, pp. 44-6。
10 雲南，1960 年 9 月 22 日，2-1-4269, pp. 36-9。
11 湖南，1959 年 8 月 3 日，141-1-1259, p. 148。
12 MfAA, Berlin，1961 年 12 月 11 日，pp. 347-51。
13 廣東，1961 年 8 月，219-2-319, pp. 31-56。
14 上海，1961 年 5 月，B29-2-940, p. 161。
15 關於革命前的中國零售業和物質生活，見：Frank Dikötter, *Exotic Commodities: Modern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外國商品：時尚物件與中國的日常生活》）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16 Klochko, *Soviet Scientist*（《蘇維埃科學家》）p. 53。
17 南京，1961 年 11 月，5040-1-18, pp. 14-19 及 20-6。
18 南京，1959 年 1 月 12 日及 4 月 26 日，4003-1-167, pp. 22-4 及 36-8.
19 J. Dyer Ball, *The Chinese at Home*（《中國人日常生活》）Londo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11, p. 240, 被引用在 Dikötter, *Exotic Commodities*（《外國商品》）p. 63.
20 廣州，1959 年 8 月 22 日，16-1-13, pp. 56-7；廣州，1961 年 7 月 20 日，97-8-173, p. 18。
21 南京，1959 年 7 月 1 日，4003-1-167, pp. 39-46。
22 內部參考，1960 年 12 月 2 日，p. 11。
23 上海，1961 年 5 月 7 日，A20-1-60, pp. 64-6。
24 南京，1959 年 6 月 4 日，5003-3-722, pp. 77-81。
25 內部參考，1960 年 11 月 23 日，pp. 15-16。
26 內部參考，1961 年 5 月 5 日，pp. 14-16。
27 廣州，1961 年 3 月 27 日、6 月 1 日及 7 月 6 日，97-8-173, pp. 45-6 及 52-3；60-1-1, pp. 80 及 105-11。

28 武漢，1959 年 7 月 29 日，76-1-1210, p. 68。
29 北戴河講話，甘肅，1961 年 8 月 11 日，91-18-561, p. 51。
30 北京，1961 年 6 月 26 日，2-13-89, pp. 2-3。
31 北京，1961 年 7 月 31 日，2-13-100, pp. 1-6。
32 南京，1961 年 11 月，5040-1-18, pp. 14-19 及 20-6。
33 內部參考，1960 年 8 月 0 日，pp. 13-15。
34 北京，1961 年 3 月 28 日，1-28-28, pp. 9-11。
35 上海，1961 年 7 月 31 日，A20-1-55, pp. 23-9。
36 老田訪談，出生於 1930 年代，河北徐水，2006 年 9 月。

20 毀了住房

1 沈勃，《回憶彭真同志關於人民大會堂等「十大建築」設計的教導》，城建檔案，no. 4 (2005), pp. 10-11。
2 Wu Hung, ***Remaking Beijing: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Creation of a Political Space***, 巫鴻，《重建北京：天安門廣場和政治空間的開創》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5, p. 24.
3 'Ten red years'（《紅色十年》）*Time*, 5 Oct. 1959.
4 謝蔭明、瞿宛林，《誰保護了故宮》，黨的文獻，no. 5 (2006), pp. 70-5。
5 PRO, London，1959 年 11 月 15 日，FO371-133462。
6 PRO, London，1959 年 7 月 23 日，FO371-141276。
7 北京，1958 年 12 月 27 日及 1959 年 2 月 2 日，2-11-128, pp. 1-3 及 8-14。
8 湖南，1959 年 1 月 21 日，141-2-104。
9 甘肅，1961 年 1 月 9 日，91-18-200, pp. 18-19。
10 甘肅，1961 年 2 月 22 日，91-18-200, pp. 256-8。
11 湖南，1961 年 4 月 3 日、14 日，151-1-24, pp. 1-13 及 59-68。
12 廣東，1961 年 1 月 20 日，217-1-645, pp. 15-19。
13 廬山會議報告，甘肅，1961 年 9 月，91-18-193, p. 82。
14 甘肅，1960 年 10 月 24 日，中發 (60) 865, 91-18-164, pp. 169-72。
15 李富春講話，湖南，1961 年 12 月 20 日，141-1-1931, pp. 154-5。
16 上海，1959 年 7 月 28 日，B258-1-431, pp. 4-5。
17 武漢，1959 年 5 月 15 日、6 月 23 日，13-1-765, pp. 44-5 及 56。
18 湖南，1960 年 4 月，141-2-164, p. 82。
19 廣東，1961 年 7 月 5 日，307-1-186, pp. 47-52。
20 四川，1960 年 3 月 22 日、24 日，建川 50-315。
21 四川，1961 年 12 月，建川 50-325。
22 北京，1959 年 3 月 4 日及 8 月 7 日，2-11-146, pp. 1-23。
23 南京，1959 年 4 月 16 日，4003-1-279, p. 153。
24 廣東，1961 年 1 月 7 日，217-1-643, pp. 110-15。
25 四川，1961 年 2 月，建川 1-2576, pp. 41-2。
26 廣東，1960 年 12 月 10 日，217-1-643, pp. 44-9。
27 廣東，1960 年 12 月 12 日，217-1-643, pp. 33-43。
28 湖南，1961 年 5 月 11 日，141-2-139, p. 61。
29 湖南，1961 年 5 月 17 日，146-1-584, p. 26。
30 四川，1961 年 8 月，建川 1-2584, p. 14。
31 四川，1962, 建川 44-1440, pp. 127-8。
32 湖北，1960 年 11 月 18 日，SZ18-2-198, pp. 69-71。

33 湖南，1962 年 8 月 4 日，207-1-744, p. 9。
34 Li Heming, Paul Waley and Phil Rees, 'Reservoir Resettlement in China: Past Experience and the Three Gorges Dam'（《中國水庫移民：過去的經驗和三峽大壩》）*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67, no. 3 (Sept. 2001), p. 197.
35 廣東，1961 年 10 月，217-1-113, pp. 58-61。
36 湖南，1961 年 12 月 15 日及 1962 年 3 月 21 日，207-1-753, pp. 103-5 及 106-9。
37 北京，1961 年 4 月 25 日，2-13-39, pp. 1-14。
38 James L. Watson,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Funerary Rites'（《中國葬禮儀式結構》）in James L. Watso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帝制末期和當代中國的死亡儀式》）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39 內部參考，1960 年 12 月 7 日，pp. 12-13。
40 湖南，1958 年 2 月 14 日，141-1-969, p. 19。
41 魏叔訪談，出生於 1920 年代，四川閬中縣，2006 年 4 月。
42 北京，1959 年 4 月 18 日，2-11-36, pp. 7-8 及 17-18。
43 北京，1958 年 11 月 14 日，2-11-33, p. 3。
44 該報告送交湖南省委；湖南，1959 年 3 月，141-1-1322, pp. 108-10。

21 毀了自然

1 Ferdinand P. W. von Richthofen, *Baron Richthofen's Letters, 1870-1872*（《里奇德霍芬男爵來信，1870-1872》）Shanghai: North-China Herald Office, 1903, p. 55, 被引用在 Dikötter, *Exotic Commodities*（《外國商品》）p. 177.
2 I. T. Headland, *Home Life in China*（《中國家庭生活》）London: Methuen, 1914, p. 232, quoted in Dikötter, *Exotic Commodities*（《外國商品》）p. 177.
3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毛澤東的與天鬥》）pp. 3-4.
4 毛在全國最高會議的講話，1958 年 1 月 28-30 日，甘肅，91-18-495, p. 202。
5 湖南，1962 年 4 月 13 日，207-1-750, pp. 1-10。
6 湖南，1962 年 10 月 6 日，207-1-750, pp. 44-9。
7 RGAE, Moscow，1959 年 8 月 7 日，9493-1-1098, p. 29。
8 湖南，1962 年 4 月 13 日，207-1-750, pp. 1-10。
9 甘肅，1962 年 8 月 17 日，中發 (62) 430, 91-18-250, p. 66。
10 北京，1961 年 3 月 3 日，2-13-51, pp. 7-8。
11 北京，1961 年 5 月 26 日，92-1-143, pp. 11-14。
12 同上。
13 北京，1961 年 3 月 3 日，2-13-51, pp. 7-8。
14 湖北，SZ113-2-195，1961 年 2 月 12 日及 11 月 1 日，pp. 8-10 及 28-31。
15 甘肅，1962 年 10 月 23 日，91-18-250, p. 72。
16 甘肅，1962 年 10 月 31 日，91-18-250, p. 83。
17 廣東，1961 年 5 月 10 日，217-1-210, pp. 88-9。
18 南京，1958 年 12 月 25 日，4003-1-150, p. 73。
19 北京，1961 年 5 月 26 日，92-1-143, pp. 11-14。
20 甘肅，1962 年 8 月 17 日，中發 (62) 430, 91-18-250, p. 69。
21 湖北，1961 年 3 月 10 日，SZ113-2-195, pp. 2-3。
22 湖南，1961 年 11 月 28 日，163-1-1109, pp. 138-47。
23 甘肅，1962 年 10 月 31 日，91-18-250, p. 83。
24 湖南，1961 年 11 月 18 日，163-1-1109, p. 60。

25 甘肅，1962 年 8 月 17 日，91-18-250, p. 65。
26 一些估算基於公開發表的材料，如：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毛澤東的與天鬥》）p. 82.
27 甘肅，1962 年 8 月 17 日，91-18-250, p. 68。
28 甘肅，1962 年 10 月 31 日，91-18-250, p. 82。
29 湖南，1962 年 10 月 6 日，207-1-750, pp. 44-9。
30 廣東關於林業的報告，1962 年 9 月 21 日，湖南，141-2-163, p. 50。
31 余習廣，《大躍進苦日子：上書集》，香港：時代潮流出版社，2005，p. 8；為了便於理解這個比例，參照 1949 年，森林面積估計有 8 千 3 百萬公頃；見 Vaclav Smil, *The Bad Earth: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China*（《糟糕的地球：中國的環境退化》）Armonk, NY: M. E. Sharpe, 1984, p. 23。
32 北京，1959 年 9 月 15 日，2-11-63, pp. 31-6 及 48-52。
33 早先有些描述，其中之一是譚震林在一次關於夏糧的電話會議上提出的；見甘肅，1959 年 6 月 26 日，92-28-513, pp. 14-15。
34 Y. Y. Kueh, *Agricultural Instability in China, 1931-1991*（《中國農業的不穩定性，1931-1991》）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研究了氣象資料，得出結論：惡劣氣候不是糧食減產的主要原因，過去也有同樣的氣候現象，但沒有出現這樣的後果。
35 北京，1960 年 5 月 7 日，2-12-25, pp. 3-6。
36 北京，1962 年 9 月 8 日，96-2-22, pp. 15-18。
37 河北，1961 年 8 月 15 日，878-1-6, pp. 31-44。
38 胡耀邦報告，1961 年 10 月 1 日，湖南，141-2-138, pp. 186-9。
39 湖南，1962 年 4 月 13 日，207-1-750, pp. 1-10。
40 湖南，1962 年 10 月 6 日，207-1-750, pp. 44-9。
41 湖南，1962 年 8 月 4 日，207-1-744, pp. 1-12。
42 湖南，1962 年 10 月 6 日，207-1-750, pp. 44-9。
43 湖南，1961 年 5 月 13 日、15 日，146-1-584, pp. 13 及 18。
44 湖南，1961 年 4 月 24 日，146-1-583, p. 108；按照北京的定義，大型水庫就是容積為 1 億立方米以上，中型是 1 千萬到 1 億立方米，小水庫是低於 1 千萬立方米。
45 湖南，1962 年 8 月 4 日，207-1-744, pp. 1-12。
46 湖南，1962 年 1 月 7 日，207-1-743, pp. 85-105。
47 湖南，1961 年 12 月 1 日，163-1-1109, p. 101。
48 湖北，1959 年 9 月 12 日，SZ18-2-197, pp. 39-43。
49 湖北，19959 年 8 月 1 日，SZ113-1-209, p. 3。
50 湖北，1961 年 3 月 27 日，SZ18-2-201。
51 湖北，1961 年 3 月 18 日及 6 月 9 日，SZ113-1-26, pp. 1-3 及 12-14。
52 湖北，1962 年 4 月 14 日，SZ113-2-213, p. 25。
53 湖南，1964, 187-1-1355, p. 64。
54 廣東，1960 年 12 月，1960, 266-1-74, pp. 105-18。
55 水利水電部的報告，1960 年 7 月 27 日，湖南，141-1-1709, p. 277。
56 廣東，1962 年 12 月，266-1-74, p. 117。
57 Yi, 'World's Most Catastrophic Dam Failures'（《世界上最嚴重的垮壩災難》）pp. 25-38.
58 Shui, 'Profile of Dams in China',《中國大壩概述》）p. 23.
59 中南局書記李一清的報告：湖南，1961 年 8 月 11 日，186-1-584, p. 134。
60 北京，1962 年 4 月 17 日，96-2-22, p. 6。

61 河北，1961 年 7 月 1 日，979-3-864, pp. 4-5。
62 河北，1962, 979-3-870, p. 7；亦見河北，1962 年 7 月 13 日，979-3-871, pp. 1-22，關於日益增加的鹽鹼地，這裡有個更低的資料。
63 劉建勳報告，1961 年 12 月 24 日，湖南，141-2-142, p. 225。
64 胡耀邦報告，1961 年 10 月 1 日，湖南，141-2-138, pp. 186-7。
65 華山報告，1962 年 5 月 9 日，山東，A1-2-1125, pp. 5-7。
66 甘肅，1960 年 3 月 9 日，中發 (60) 258, 91-18-154, pp. 254-5。
67 北京，1959 年 9 月 17 日，2-11-145, pp. 3-6。
68 甘肅，1960 年 3 月 9 日，中發 (60) 258, 91-18-154, pp. 254-5。
69 甘肅，1960 年 2 月 24 日，91-18-177, pp. 14-17。
70 甘肅，1960 年 3 月 9 日，中發 (60) 258, 91-18-154, pp. 254-5。
71 南京，1960 年 11 月 22 日，5065-3-395, pp. 35-52。
72 毛啟華報告，甘肅，1960 年 9 月 4 日，中發 (60) 825, 91-18-154, p. 104。
73 上海，1961 年 10 月，B29-2-954, p. 57。
74 同上。
75 同上，p. 76。
76 湖北，1961 年 1 月 10 日，SZ34-5-45, pp. 22-4；1961 年 1 月，SZ1-2-906, p. 17.
77 Klochko, ***Soviet Scientist***（《蘇維埃科學家》）pp. 71-3.
78 南京，1959 年 3 月 18 日，5065-3-367, pp. 20-2；1959 年 3 月 25 日，5003-3-721, pp. 8-9。
79 上海，1959, A70-1-82, p. 9。
80 Shapiro, ***Mao's War on Nature***（《毛澤東的與天鬥》）p. 88.
81 湖北，1961 年 7 月 8 日及 25 日，SZ18-2-202, pp. 78 及 101。
82 南京，1960 年 10 月 24 日，4003-1-203, pp. 20-1。
83 浙江，1961 年 1 月 29 日，J116-15-115, p. 11。

22 餓鄉狂宴

1 James R. Townsend and Brantly Womack, ***Politics in China***（《中國的政治》）Boston: Little, Brown, 1986, p. 86.
2 Tiejun Cheng and Mark Selden, 'The Construction of Spatial Hierarchies: China's ***hukou*** and ***danwei*** Systems',《地域等級的構建：中國的戶口和單位制度》）in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中國國家社會主義的新觀點》）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 pp. 23-50.
3 廣東，1962 年 3 月 15 日，300-1-215, pp. 205-7。
4 李志綏，(《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p. 78-9。
5 Fu Zhengyuan, ***Autocratic Tradition and Chinese Politics***（《獨裁傳統和中國政治》）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38.
6 Lu, ***Cadres and Corruption***（《幹部與腐敗》）p. 86.
7 上海，1961, B50-2-324, pp. 15-24。
8 內部參考，1960 年 11 月 25 日，pp. 11-12。
9 內部參考，1961 年 3 月 6 日，p. 5。
10 內部參考，1961 年 2 月 22 日，pp. 13-14。
11 廣東，1960 年 9 月 5 日，231-1-242, pp. 72-7。
12 廣東，1960 年 6 月 18 日，231-1-242, pp. 63-5。
13 廣東，1960 年 12 月 10 日，217-1-643, pp. 44-9。
14 同上，p. 45。

15 廣東，1959 年 7 月 24 日，217-1-497, pp. 61-3。
16 廣東，1961, 217-1-116, p. 48。
17 廣東，1959 年 6 月 26 日，217-1-69, pp. 33-8。
18 PRO, London，1959 年 11 月 15 日，FO371-133462。
19 上海，1960 年 10 月 8 日，A20-1-10, pp. 19 ff。
20 河北，1959 年 5 月 8 日，855-5-1758, pp. 97-8。
21 北京，1959 年 2 月 14 日，1-14-573, p. 65。
22 上海，1961 年 1 月 27 日，A36-1-246, pp. 9-17。

23 上欺下瞞

1 上海，1960 年 12 月 20 日，A36-2-447, pp. 64-5。
2 內部參考，1960 年 6 月 2 日，pp. 14-15。
3 內部參考，1960 年 11 月 16 日，pp. 11-13。
4 上海，1961 年 2 月，A36-2-447, p. 22。
5 廣東，1960 年 11 月，288-1-115, p. 1。
6 內部參考，1960 年 11 月 16 日，pp. 11-13。
7 廣東，1961 年 2 月 9 日，235-1-255, pp. 39-40。
8 廣東，1961 年 12 月 5 日，235-1-259, p. 75。
9 南京，1959 年 5 月 27 日，4003-1-279, p. 242。
10 內部參考，1960 年 11 月 25 日，pp. 13-15。
11 甘肅，1960 年 10 月 24 日，中發 (60) 865, 91-18-164, pp. 169-72。
12 財政部報告，甘肅，1960 年 11 月 5 日，中發 (60) 993, 91-18-160, pp. 275-80。
13 內部參考，1960 年 12 月 7 日，pp. 14-15。
14 北戴河講話，甘肅，1961 年 8 月 11 日，91-18-561, pp. 51 及 55。
15 財政部報告，甘肅，1960 年 11 月 5 日，中發 (60) 993, 91-18-160, pp. 275-80。
16 內部參考，1960 年 8 月 8 日，pp. 5-7。
17 河北，1959 年 4 月 19 日，855-5-1758, pp. 105-6。
18 北京，1961 年 6 月 23 日，1-5-376, pp. 4-10。
19 南京，1960 年 8 月，4003-1-199, p. 19。
20 南京，1960 年 8 月 14 日，4003-1-199, pp. 1-4。
21 內部參考，1960 年 11 月 25 日，pp. 12-13；1960 年 12 月 30 日，pp. 10-11。
22 北京，1961 年 4 月 27 日，1-28-30, pp. 1-4。
23 上海，1961 年 8 月 7 日，A20-1-60, pp. 181-5。
24 北京，1960 年 11 月 28 日，101-1-138, pp. 13-29。
25 上海，1959 年 3 月 28 日，B29-1-34, pp. 48-9。
26 內部參考，1960 年 12 月 26 日，pp. 10-11。
27 內部參考，1961 年 5 月 17 日，p. 22。
28 廣東，1961 年 1 月 23 日，217-1-644, pp. 10-12。
29 廣州，1961 年 2 月 24 日，92-1-275, p. 74。
30 南京，1959 年 9 月 1 日，5003-3-722, p. 89。
31 湖南，1961 年 1 月 15 日，146-1-580, p. 15。
32 描述見 Dennis L. Chinn, 'Basic Commodity Distrib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Quarterly*（《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商品流通》）no. 84 (Dec. 1980), pp. 744-54.
33 內部參考，1960 年 8 月 18 日，p. 16。
34 廣東，1961 年 2 月 9 日，235-1-259, pp. 39-40。

35 內部參考，1960 年 12 月 7 日，p. 24。
36 廣東，1961 年 2 月 9 日，235-1-259, pp. 39-40。
37 北京，1960 年 12 月 29 日，2-12-262, pp. 18-20。
38 湖南，1961 年 6 月 13 日，163-1-1109, pp. 21-2。
39 MfAA, Berlin，1961 年 3 月 -4 月，A17009, pp. 3-4。
40 內部參考，1961 年 1 月 23 日，pp. 10-11；1962 年 2 月 6 日，pp. 5-6。
41 亦見 Jeremy Brown, 'Great Leap City: Surviving the Famine in Tianjin'（《城市大躍進：從天津饑荒中倖存》）被引用在 Kimberley E. Manning and Felix Wemheuer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and Great Famine*（《中國大躍進和大饑荒中的新觀點》）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0.
42 MfAA, Berlin，1962 年 9 月 6 日，A6862, p. 8。
43 湖北，1961 年 8 月 7 日及 1962 年 7 月，SZ29-1-13, pp. 73-4 及 76-7。
44 四川，1962 年 8 月 16 日及 9 月 12 日，建川 44-3918, pp. 105-7 及 117-19。
45 湖北，1961 年 9 月 18 日，SZ18-2-199, pp. 6-7。
46 河北，1950 年 5 月 6 日，855-5-1744, pp. 101-3。
47 四川，1962 年，建川 1-3047, pp. 1-2。
48 山東，1959 年 8 月 10 日，A1-2-776, p. 72。

24 小偷小摸

1 湖南，1961 年 2 月 12 日，151-1-20, pp. 32-3。
2 北京，1961 年 3 月 24 日，1-28-28, pp. 2-6。
3 上海，1961 年 10 月 25 日，B123-5-144, p. 176。
4 上海，1961 年 8 月，B29-2-655, p. 82。
5 四川，1959, 建川 9-249, p. 160。
6 四川，1959, 建川 9-250, pp. 14 及 46。
7 丁橋兒訪談，出生於 1951 年，山東黃縣，2006 年 12 月。
8 內部參考，1960 年 6 月 2 日，pp. 14-15。
9 內部參考，1960 年 12 月 19 日，p. 21。
10 同上，pp. 23-4。
11 內部參考，1960 年 12 月 7 日，pp. 21-4。
12 南京，1959 年 2 月 26 日，4003-1-171, p. 62。
13 上海，1960 年 3 月 31 日，B123-4-588, p. 3；1961 年 5 月 22 日，B112-4-478, pp. 1-2。
14 Thaxton, *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中國農村的災難和鬥爭》）p. 201.
15 內部參考，1960 年 9 月 2 日，pp. 5-7。
16 宣城，1961 年 5 月 3 日，3-1-259, pp. 75-6。
17 曾木訪談，出生於 1931 年，四川彭州，2006 年 5 月。
18 廣東，1961 年 3 月 1 日，235-1-259, pp. 23-5。
19 廣東，1961 年 3 月 1 日及 27 日，235-1-259, pp. 23-5 及 32-4。
20 內部參考，1961 年 4 月 26 日，p. 20。
21 河北，1960 年 9 月 27 日，855-5-1996, pp. 52-4。
22 吳縣，1961 年 5 月 15 日，300-2-212, p. 243。
23 廣東，1961 年 1 月 21 日，235-1-259, pp. 16-17。
24 湖北，1959 年 2 月 22 日，SZ18-2-197, pp. 19-21。
25 河北，1959 年 6 月 2 日，855-5-1758, pp. 46-7。
26 湖北，1959 年 2 月 22-23 日，SZ18-2-197, pp. 6-8 及 12-14。

27 河北，1960 年 12 月 13 日，855-18-777, pp. 40-1。
28 河北，1959 年 6 月 1 日，855-5-1758, pp. 126-7。
29 湖南，1959 年 12 月 10 日及 18 日，146-1-507, pp. 81 及 90-3。
30 湖南，1959 年 12 月 31 日，146-1-507, pp. 120-1。
31 河北，1959 年 6 月 1 日，855-5-1758, pp. 126-7。
32 南京，1959 年 6 月 4 日，5003-3-722, pp. 77-81。
33 南京，1960 年 1 月 26 日，5012-3-556, p. 60。
34 湖南，1961 年 2 月 13 日，151-1-18, pp. 24-5。
35 李二姐訪談，出生於 1922 年，四川成都，2006 年 4 月。
36 湖北，1961 年 5 月 11 日，SZ18-2-202, pp. 25-6。
37 廣東，1961, 235-1-256, p. 73。
38 湖北，1961 年 9 月 18 日，SZ18-2-199, p. 7。
39 雲南，1958 年 12 月 30 日，2-1-3442, pp. 11-16。

25 偉大領袖

1 河北，1961 年 1 月 4 日，880-1-11, p. 30。
2 我抑制了羅列更多例子的想法，但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見這些卓越的篇章：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饑餓的幽靈：毛的秘密饑荒》）New York: Henry Holt, 1996, pp. 287-306.
3 François Mitterrand, ***La Chine au défi***, Paris: Julliard, 1961, pp. 30 and 123.
4 PRO, London，1960 年 11 月，PREM11-3055。
5 南京，1959 年 3 月 17 日，4003-1-279, pp. 101-2。
6 內部參考，1960 年 12 月 7 日，pp. 21-4。
7 上海，1961 年 5 月 7 日，A20-1-60, pp. 60-2。
8 湖北，1961 年 10 月 14 日，SZ29-2-89, pp. 1-8。
9 廣東，1962, 217-1-123, pp. 123-7。
10 廣東，1961 年 2 月 24 日，92-1-275, p. 75。
11 廣東，1962, 217-1-123, pp. 123-7。
12 廣東，1961, 217-1-644, p. 20。
13 南京，1959 年 7 月 16 日，5003-3-721, pp. 26-7。
14 甘肅，1962 年 9 月 5 日，91-18-279, p. 7。
15 河北，1959 年 6 月，884-1-183, p. 39。
16 甘肅，1962 年 9 月 5 日，91-18-279, p. 7。
17 公安部報告，甘肅，1961 年 2 月 8 日，91-4-889, pp. 25-30。
18 南京，1959 年 7 月 16 日，5003-3-721, pp. 26-7。
19 河北，1959 年 6 月 27 日，884-1-183, pp. 136 及 140。
20 湖北，1959 年 9 月 5 日，SZ18-2-197, p. 34。
21 四川，1959 年 5 月 25 日，建川 1-1721, p. 3。
22 Cyril Birch, 'Literature under Communism'（《共產主義文學》）in Roderick MacFarquhar, John King Fairbank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5: ***Revolu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6-1982***,《劍橋中國史，第十五卷：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768.
23 上海，1961 年 5 月 7 日，A20-1-60, p. 62。
24 廣東，1961 年 1 月 3 日，217-1-643, p. 102。
25 楊華豐訪談，出生於 1946 年，湖北潛江縣，2006 年 8 月。

26 廣東，1961 年 1 月 2 日，217-1-643, pp. 61-6。
27 四川，1961, 建川9-464, p. 70。
28 關於集體化時期的謠言，有一些很具開導性的作品：Lynn Viola, *Peasant Rebels under Stalin: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Peasant Resistance*（《史達林統治下的農民反抗：集體化和農民抵抗運動》）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5-7.
29 武漢，1958 年 11 月 3 日，83-1-523, p. 134。
30 廣東，1961 年 1 月 23 日，217-1-644, pp. 10-12。
31 湖北，1961 年 1 月 4 日，SZ18-2-200, p. 11。
32 湖北，1961 年 5 月 5 日，SZ18-2-201, p. 95。
33 四川，1961, 建川1-2614, p. 14。
34 內部參考，1960 年 6 月 9 日，pp. 7-8。
35 廣東，1961 年 2 月 5 日，217-1-119, p. 45。
36 廣東，1961 年 1 月 23 日，217-1-644, pp. 10-12 及 20。
37 湖南，1961 年 1 月 23 日，146-1-580, p. 54。
38 甘肅，1962 年 9 月 5 日，91-18-279, p. 7。
39 南京，1959 年 3 月 19 日，5003-3-722, pp. 68-9。
40 河北，1959 年 6 月，884-1-183, pp. 84-92 及 128。
41 關於蘇聯的揭發材料，見：Sheila Fitzpatrick, 'Signals from Below: Soviet Letters of Denunciation of the 1930s'（《下層的聲音：1930 年代蘇維埃時期的檢舉信》*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8, no. 4 (Dec. 1996), pp. 831-66.
42 湖南，1959-61, 163-2-232，全部檔案。
43 南京，1961 年 3 月 7 日及 5 月 13 日，5003-3-843, pp. 1-4 及 101。
44 上海，1959 年 11 月 30 日，A2-2-16, p. 75。
45 廣東，1961, 235-1-256, p. 90。
46 內部參考，1960 年 5 月 31 日，pp. 18-19。
47 內部參考，1960 年 12 月 19 日，pp. 15-17。
48 湖南，1961 年 12 月 31 日，141-1-1941, p. 5。
49 廣東，1961 年 2 月 24 日，235-1-256, pp. 40-2。
50 內部參考，1961 年 6 月 12 日，p. 23。
51 甘肅，1961 年 1 月 14 日，91-18-200, p. 50。
52 省委工作組報告，四川，1961, 建川1-2616, p. 111。

26 鋌而走險

1 河北，1961 年 8 月 15 日，878-1-6, p. 38。
2 內部參考，1960 年 12 月 16 日，p. 9。
3 例子見河北，1959 年 6 月 27 日，884-1-183, p. 135。
4 湖北，1961 年 1 月 6 日，SZ18-2-200, p. 22。
5 湖南，1961 年 1 月 17 日，146-1-580, p. 29。
6 甘肅，1961 年 1 月 24 日，91-9-215, pp. 117-20。
7 同上。
8 內部參考，1960 年 6 月 20 日，pp. 11-12。
9 鐵道部報告，甘肅，1961 年 1 月 20 日，1961, 91-4-889, pp. 19-21。
10 湖南，1959 年 11 月 22 日，146-1-507, pp. 44-6。
11 四川，1959 年 5 月 26 日，建川1-1721, p. 37。
12 四川，1959 年 6 月 8 日，建川1-1721, p. 153。

13 湖南，1959 年 3 月 9 日，163-1-1046, p. 24。
14 河北，1959 年 6 月，884-1-183, p. 40；1960 年 4 月 25 日，884-1-184, p. 20。
15 南京，1959 年 1 月 30 日，4003-1-171, p. 35。
16 南京，1959 年 3 月 19 日，5003-7-722, pp. 68-9。
17 湖北，1961 年 1 月 4 日，SZ18-2-200, p. 11。
18 湖北，1959 年 2 月 22 日，SZ18-2-197, pp. 6-8。
19 四川，1959 年 11 月 2-4 日，建川 1-1808, p. 137。
20 廣東，1961 年 2 月 3 日，262-1-115, pp. 86-7。
21 開平，1960 年 12 月 29 日，3-A10-81, p. 2。
22 湖南，1961 年 1 月 17 日，146-1-580, p. 29。
23 甘肅，1958 年 6 月 18 日，中發 (58) 496, 91-18-88, pp. 29-34。
24 雲南，1960 年 11 月 30 日，2-1-4108, pp. 72-5；1960 年 12 月 2 日，2-1-4108, pp. 1-2；亦見 1960 年 11 月 8 日及 12 月 9 日，2-1-4432, pp. 1-10 及 50-7。
25 公安部報告，甘肅，1961 年 2 月 8 日，91-4-889, pp. 25-30。
26 河北，1959 年 6 月，884-1-183, pp. 39-40 及 132。
27 河北，1960 年 4 月 26 日，884-1-184, p. 36。
28 廣東，1961, 216-1-257, pp. 64-5。

27 背鄉離井

1 上海，1959 年 3 月 12 日，B98-1-439, pp. 9-13。
2 張啟武，《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長》，人民日報，1979 年 8 月 21 日，p. 3，摘自 Judith Banister,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中國人口變遷》）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30.
3 雲南，1958 年 12 月 18 日，2-1-3101, p. 301。
4 上海，1959 年 4 月 20 日，A11-1-34, pp. 1-3。
5 上海，1959 年 3 月 12 日及 17 日，B98-1-439, pp. 12 及 25。
6 上海，1959 年 4 月 20 日，A11-1-34, pp. 4-14。
7 信陽，1960 年 8 月 4 日，304-37-7, p. 68。
8 河北，1959 年 2 月 28 日、3 月 11 日及 4 月 15 日，855-5-1750, pp. 74-5, 91-4 及 132-4。
9 浙江，1959 年 3 月 3 日，J007-11-112, pp. 1-6。
10 廣東，1961 年 1 月 23 日，217-1-644, pp. 10-12。
11 河北，1959 年 4 月 15 日，855-5-1750, pp. 132-4。
12 武漢，1959 年 4 月 14 日，76-1-1210, pp. 87-8。
13 內部參考，1960 年 6 月 20 日，pp. 11-12。
14 河北，1959 年 3 月 11 日，855-5-1750, pp. 91-4。
15 北京，1959 年 1 月 23 日及 8 月 31 日，2-11-58, pp. 3-4 及 8-10。
16 南京，1959 年 3 月 14 日，4003-1-168, pp. 39-49；1960 年 8 月 14 日，4003-1-199, p. 2。
17 南京，1959 年 12 月 23 日，5003-3-721, p. 115；1959 年 7 月 21 日，4003-2-315, pp. 11-18。
18 南京，1959 年 7 月 21 日，4003-2-315, pp. 11-18。
19 同上。
20 雲南，1958 年 11 月 29 日，中發 (58) 1035, 2-1-3276, pp. 250-3。
21 南京，1960 年 8 月 14 日，4003-1-199, p. 2。
22 南京，1959 年 11 月 21 日，4003-2-315, p. 32。
23 甘肅，1961 年 1 月 14 日，91-18-200, pp. 47-8。

24 廣東，1961 年 1 月 5 日，217-1-643, p. 63。
25 河北，1961 年 8 月 15 日，878-1-6, pp. 31-44。
26 雲南，1958 年 11 月 29 日，中發 (58) 1035, 2-1-3276, pp. 250-3。
27 河北，1959 年 4 月 15 日，855-5-1750, p. 133。
28 湖北，1958 年 2 月 25 日，SZ34-4-295, p. 7。
29 湖北，1958 年 9 月，SZ34-4-295, pp. 38-42。
30 河北，1960 年 12 月 17 日，878-2-8, pp. 8-10。
31 國務院和公安部報告，河北，1961 年 2 月 6 日、6 月 5 日及 11 月 10 日，SZ34-5-15, pp. 7-8 及 58-61。
32 四川，1961 年 11 月 -12 月，建川1-2756, pp. 84-5。
33 內部參考，1960 年 5 月，p. 30。
34 甘肅，1960 年 8 月 31 日，91-9-58, pp. 32-7。
35 湖北，1961 日 4 月 18 日，SZ34-5-15, p. 9。
36 湖北，1961, SZ34-5-15, pp. 9-10。
37 甘肅，1961 年 6 月 16 日，中 (61) 420, 91-18-211, pp. 116-19。
38 雲南，1960 年 8 月，2-1-4245, p. 55；雲南，1961 年 7 月 10 日，2-1-4587, p. 83。
39 雲南，1961 年 7 月 10 日及 22 日，2-1-4587, pp. 82 及 112-14。
40 廣東，1961 年 7 月 20 日、8 月 2 日及 11 月 23 日，253-1-11, pp. 44, 51 及 53。
41 宣城，1961 年 6 月 25 日，3-1-257, p. 32。
42 湖南，1961 年 12 月 12 日，186-1-587, p. 5。
43 外交部，北京，1958 年 6 月 12 日及 1959 年 1 月 14 日，105-604-1, pp. 21 及 24-30。
44 PRO, London，1959 年 2 月 28 日，FO371-143870。
45 外交部，北京，1961 年 8 月 23 日，106-999-3, pp. 40-55。
46 RGANI，Moscow，1962 年 5 月 22 日，5-30-401, p. 39。
47 外交部，北京，1962 年 5 月 10 日，118-1100-9, pp. 71-9
48 RGANI，Moscow，1962 年 4 月 28 日，3-18-53, pp. 2-3 及 8-12。
49 RGANI，Moscow，1962 年 5 月，3-16-89, pp. 63-7。
50 外交部，北京，1962 年 6 月 30 日，118-1758-1, pp. 1-8。
51 RGANI，Moscow，1964 年 11 月 6 日，5-49-722, pp. 194-7。
52 ***Hong Kong Annual Report***（《香港年報》）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59, p. 23.
53 ICRC, Geneva，J. Duncan Wood 的報告，1963 年 9 月，BAG 234 048-008.03.
54 ***Hong Kong Standard***（《香港標準》）11 May 1962.
55 根據一位元脫離 CIA 的人員的訪談；見 CIA, Washington, 27 July 1962, OCI 2712-62, p. 4；類似的報告也刊登在《南華早報》上，1962 年 6 月 6 日。
56 ICRC, Geneva，Paul Calderara 的報告，1962 年 6 月 5 日，BAG 234 048-008.03.
57 同上；亦見 PRO, Hong Kong, 1958-60, HKRS 518-1-5.
58 Hansard, 'Hong Kong (Chinese Refugees)'（《香港（中國難民）》）HC Deb, 28 May 1962, vol. 660, cols 974-7; ICRC, 國際紅十字會，日內瓦，Geneva, report from J. Duncan Wood, Sept. 1963, BAG 234 048-008.03.
59 Aristide R. Zolberg, Astri Suhrke and Sergio Aguayo, ***Escape from Violence: Conflict and the Refugee Crisi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逃離暴力：發展中國世界的衝突與難民危機》）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60.
60 'Refugee dilemma'（《難民困境》）***Time***, 27 April 1962.

28 兒童

1 吳江，1959 年 4 月 13 日，1001-3-92, pp. 63-9。
2 北京，1960 年 8 月 4 日及 18 日，84-1-167, pp. 1-9 及 43-52。
3 北京，1959 年 3 月 31 日，101-1-132, pp. 26-40。
4 廣州，1959 年 1 月 9 日、3 月 7 日、4 月 29 日、5 月 18 日及 12 月 14 日，pp. 19-24, 51-5, 57-61, 64-6 及 70；關於上海的體罰，見上海，1961 年 8 月 24 日，A20-1-54, p. 18。
5 上海，1961 年 5 月 7 日，A20-1-60, p. 64；1961 年 8 月 24 日，A20-1-54, pp. 16-24。
6 北京，1960 年 8 月 4 日，84-1-167, pp. 43-52。
7 北京，1960 年 8 月 18 日，84-1-167, pp. 1-9。
8 南京，1961 年 11 月 14 日，5012-3-584, p. 79。
9 廣州，1959 年 5 月 18 日，16-1-19, pp. 51-5。
10 南京，1960 年 4 月 21 日，4003-2-347, pp. 22-6。
11 湖北，1960 年 12 月 25 日，SZ34-5-16, pp. 2-3。
12 廣東，1961, 314-1-208, p. 16。
13 關於中學教育的規定，見：Suzanne Pepper, ***Radicalism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20th-Century China: The Search for an Ideal Development Model***（《20 世紀中國的激進主義和教育改造：尋找理想發展模式》）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93 ff.
14 武漢，1958 年 4 月 9 日及 12 月 26 日，70-1-767, pp. 33-45。
15 武漢，1959 年 1 月 6 日，70-1-68, pp. 19-24。
16 南京，1958 年 12 月 28 日，4003-1-150, p. 81。
17 湖南，1960 年 6 月 2 日，163-1-1087, pp. 43-5。
18 四川，1961 年 5 月，建川1-2346, p. 15。
19 廣東，1961 年 1 月 25 日，217-1-645, pp. 11-14。
20 廣東，1961, 217-1-646, pp. 10-11。
21 湖南，1961 年 4 月 8 日，146-1-583, p. 96。
22 同上。
23 廣東，1960 年 12 月 31 日，217-1-576, pp. 54-68。
24 湖南，1961 年 2 月 13 日，151-1-18, pp. 24-5。
25 廣東，1960, 217-1-645, pp. 60-4。
26 內部參考，1960 年 11 月 30 日，p. 16。
27 雲南，1959 年 5 月 22 日，2-1-3700, pp. 93-8。
28 丁橋兒訪談，出生於 1951 年，山東黃縣，2006 年 12 月。
29 劉書訪談，出生於 1946 年，四川仁壽縣，2006 年 4 月。
30 李二姐訪談，出生於 1922 年，四川成都，2006 年 4 月。
31 這類情況，見：Robert Dirks, 'Social Responses during Severe Food Shortages and Famine'（《食物嚴重短缺和饑荒期間的社會反應》）*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21, no. 1 (Feb. 1981), p. 31.
32 南京，1960 年 5 月 10 日，5003-3-722, pp. 27-31。
33 河北，1960 年 2 月 10 日，855-18-778, p. 36。
34 李二姐訪談，出生於 1922 年，四川成都，2006 年 4 月。
35 南京，1960 年 1 月 4 日，4003-1-202, p. 1；1959 年 7 月 21 日、9 月 3 日及 12 月 15 日，4003-2-315, pp. 17, 20, 27 及 36。

36 南京，1960年1月4日，4003-1-202, p. 1；1959年7月21日，9月30日及12月15日，4003-2-315, pp. 17, 27及36。
37 南京，1959年5月20日，4003-2-315, pp. 12-14。
38 武漢，1959年7月20日，13-1-765, pp. 72-3；湖北，1961年8月30日，SZ34-5-16, pp. 35-6。
39 湖北，1961年9月18日，SZ34-5-16, pp. 41-2。
40 河北，1961年8月17日，878-2-17, pp. 142-5
41 河北，1961年1月24日，878-2-17, pp. 1-5。
42 廣東，1961年2月10日，217-1-640, pp. 18-28。
43 四川，1961年10月1日，建川44-1432, pp. 89-90；1962年9月的一份報告提及200,000名孤兒；見：建川44-1442, p. 34。
44 四川，1962，建川44-1440, pp. 46及118-19。
45 四川，1962, 建川44-1441, p. 35。
46 趙曉白訪談，出生於1948年，河南魯山縣，2006年5月、12月。
47 四川，1961, 建川1-2768, pp. 27-9。
48 湖北，1961年4月24日、8月30日及9月18日，SZ34-5-16, pp. 19, 35-6及41-2。
49 雲南，1959年5月16日，81-4-25, p. 17。
50 湖南，1964年6月30日，187-1-1332, p. 14。

29 婦女

1 見Dikötter, *Exotic Commodities*.（《外國商品》）
2 見Gao Xiaoxian, ' "The Silver Flower Contest": Rural Women in 1950s China and the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ur',《「銀花賽」：50年代中國農村婦女與性別分工》*Gender and History*, vol. 18, no. 3 (Nov. 2006), pp. 594-612.
3 湖南，1961年3月13日，146-1-582, pp. 80-1。
4 四川，1961, 建川1-2611, p. 3。
5 湖南，1961年3月31日，146-1-582, pp. 80-1。
6 廣東，1961年3月23日，217-1-643, pp. 10-13。
7 廣東，1961, 217-1-618, pp. 18-41。
8 廣東，1961年1月2日，217-1-643, pp. 61-6。
9 北京，1961年3月15日，1-28-29, pp. 1-2。
10 北京，1961年2月10日，84-1-180, pp. 1-9。
11 湖南的數字是對「婦科病」的估計，所謂婦科病指的是在勞動婦女中存在的子宮下垂、停經至少半年的情況，不包括那些確實病弱無力工作的婦女；上海，1961年，B242-1-1319-15, p. 1；湖南，1960年12月8日，212-1-508, p. 90；亦見河北，1961年1月19日，878-1-7, pp. 1-4。
12 湖北，1961年2月23日，SZ1-2-898, pp. 12-17。
13 廣東，1961年4月6日，217-1-643, pp. 1-9。
14 河北，1961年6月27日，880-1-7, pp. 53及59。
15 河北，1961年4月27日，880-1-7, p. 88。
16 河北，1960年6月2日，855-9-4006, p. 150。
17 湖南，1961年1月21日，146-1-580, p. 45。
18 湖南，1961年2月24日，146-1-588, p. 9。
19 湖南，1959, 141-1-1322, pp. 2-5及14。
20 內部參考，1960年11月30日，p. 17。

21 開平，1960 年 9 月 24 日，3-A10-76, p. 19。
22 開平，1959 年 6 月 6 日，3-A9-80, p. 6。
23 四川，1962 年 8 月 18 日，建川44-3927, pp. 2-6。
24 南京，1959 年 5 月 20 日，4003-2-315, p. 12。
25 內部參考，1961 年 2 月 13 日，pp. 14-15。
26 內部參考，1961 年 6 月 12 日，pp. 9-10。
27 廣東，1961, 217-1-618, pp. 18-41。
28 David Arnold, *Famine: Social Crisis and Historical Change*（《饑荒：社會危機和歷史變革》）Oxford: Blackwell, 1988, p. 89.

30 老人

1 Charlotte Ikels, *Aging and Adaptation: Chinese i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在適應中老去：香港和美國的中國人》）Hamden: Archon Books, 1983, p. 17.
2 麻城，1959 年 1 月 15 日，1-1-443, p. 28。
3 Deborah Davis-Friedmann, *Long Lives: Chinese Elderly 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長命：中國老人和共產主義革命》）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87, 引用《人民日報》1959 年 1 月 15 日。
4 北京，1961 年 5 月，1-14-666, p. 25。
5 廣東，1961 年 2 月 10 日，217-1-640, pp. 18-28。
6 四川，1958 年 11 月 29 日及 12 月 24 日，建川1-1294, pp. 71 及 129。
7 四川，1959, 建川44-2786, p. 55。
8 湖南，1961, 167-1-1016, pp. 1 and 144。
9 湖南，1960, 146-1-520, p. 102。
10 蔣桂花訪談，出生於 1940 年，四川昭覺縣，2007 年 4 月。
11 河北，1961 年 7 月 3 日，SZ18-2-202, p. 70。

31 事故

1 湖南，1958 年 11 月 5 日，141-1-1051, p. 123。
2 湖南，1959 年 3 月 9 日，163-1-1046, p. 24。
3 南京，1959 年 4 月 16 日，4003-1-279, pp. 151-2。
4 南京，1959 年 10 月 31 日，5003-3-711, p. 33。
5 湖北，1960 年 1 月 5 日，SZ34-4-477, p. 34。
6 湖南，1960 年 1 月 16 日及 2 月 12 日，141-1-1655, pp. 54-5 及 66-7。
7 國務院報告，湖北，1960 年 3 月 3 日，SZ34-4-477, p. 29。
8 湖南，1959 年 7 月，141-1-1224, pp. 13-14。
9 赤水，1959 年 2 月 27 日，1-A10-25, p. 2。
10 李，《大躍進》，卷 2，p. 233。
11 毛啟華給中央的報告，甘肅，1960 年 9 月 4 日，中發 (60) 825, 91-18-154, pp. 99-106；該報告估計，13,000 名遇難人員中，大約 5,000 名發生在採礦業。
12 四川，1962 年 6 月 15 日到 11 月 19 日，建川1-3174, pp. 4-6。
13 湖南，1959 年 10 月 4 日，141-1-1258, pp. 12-13；1959 年 7 月，141-1-1224, pp. 13-14。
14 南京，1959 年 9 月 -10 月，5035-2-5, pp. 15-21；1961 年 8 月 3 日，9046-1-4, pp. 47-54。
15 南京，1959 年 1 月 12 日，5003-3-721, pp. 1-7。
16 南京，1959 年 1 月 9 日，4003-1-171, p. 17。

17 湖南，1959 年 5 月，141-1-1258, pp. 63-4。
18 湖北，1960 年 9 月 12 日，SZ34-4-477, pp. 70-81。
19 甘肅，1961 年 11 月 1 日，91-9-215, p. 72。
20 廣東，1961 年 8 月 7 日，219-2-319, pp. 56-68。
21 甘肅，1961 年 1 月 12 日及 16 日，91-18-200, pp. 32 及 84。

32 疾病

1 李志綏，(《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p. 339-40。
2 南京，1961 年 10 月 7-10 日，5065-3-467, pp. 33-7 及 58-61。
3 武漢，1959 年 9 月 11 日，30-1-124, pp. 40-2；1959 年 6 月 22 日，28-1-650, pp. 27-8。
4 四川，1961 年 1 月 18 日，建川 1-2418, p. 2；亦見：建川 1-2419, p. 43。
5 四川，1961, 建川 1-2419, p. 46。
6 四川，1960, 建川 133-220, p. 137。
7 廣東，1961 年 10 月 30 日，235-1-255, pp. 170 及 179；上海，1961 年 7 月 28 日及 8 月 24 日，B242-1-1285, pp. 28-37 及 46-9。
8 四川，1960, 建川 1-2007, pp. 38-9。
9 關於所有縣誌的系統分析，參見曹樹基：《大饑荒：1959-1961 年的中國人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一個很好的例子見 p.128。
10 湖南，1959 年 1 月 5 日，141-1-1220, pp. 2-3；1962, 265-1-309, pp. 4-5。
11 南京，1959 年 4 月 6 日，4003-1-171, p. 138。
12 南京，1959 年 10 月 25 日，5003-3-727, pp. 19-21。
13 湖北，1961, SZ1-2-898, pp. 18-45。
14 上海，1959 年 10 月 18 日，B242-1-1157, pp. 23-6。
15 無錫，1961, B1-2-164, pp. 58-66。
16 湖北，1961 年 2 月 25 日及 7 月 7 日，SZ1-2-898, pp. 7-11 及 45-9。
17 湖南，1960 年 11 月 25 日，265-1-260, p. 85；1960 年 12 月 8 日，212-1-508, p. 163。
18 南京，1959 年 8 月 27 日，5003-3-727, p. 88。
19 湖北，1961 年 6 月 6 日，SZ1-2-906, p. 29；1961 年 7 月 21 日，SZ1-2-898, pp. 49-52。
20 南京，1959 年 4 月 3 日，5003-3-727, p. 67。
21 武漢，1962 年 2 月 19 日，71-1-1400, pp. 18-21。
22 廣東，1960, 217-1-645, pp. 60-4。
23 廣東，1959, 217-1-69, pp. 95-100。
24 浙江，1960 年 5 月 10 日，J165-10-66, pp. 1-5。
25 四川，1960 年 7 月 9 日，建川 133-219, p. 106。
26 武漢，1961 年 8 月 16 日，71-1-1400, pp. 9-10。
27 李大軍訪談，出生於 1947 年，河南息縣，2006 年 10 月。
28 南京，1961, 5065-3-381, pp. 53-4。
29 上海，1961 年 5 月 11 日，B242-1-1285, pp. 1-3。
30 武漢，1959 年 6 月 30 日，30-1-124, pp. 31-3。
31 武漢，1960 年 7 月 1 日，28-1-650, p. 31。
32 武漢，1959 年 6 月 30 日，30-1-124, pp. 31-3。
33 四川，1960 年 5 月 16 日，建川 1-2115, pp. 57-8。
34 四川，1960, 建川 1-2114, p. 8。

35 四川，1959, 建川9-448, pp. 46-7。
36 四川，1959, 建川44-2786所有。
37 衛生部報告，湖北，1960年4月24日，SZ115-2-355, pp. 10-13。
38 湖南，1960年5月11日，163-1-1082, pp. 26-8。
39 Jung Chang, 張戎在 *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英文版）一書裏面做了很好的描述，Clearwater, FL: Touchstone, 2003, p. 232.
40 Warren Belasco, 'Algae Burgers for a Hungry World? The Rise and Fall of Chlorella Cuisine'（《海藻漢堡拯救饑餓世界？藻類美食神話的破滅》）*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38, no. 3 (July 1997), pp. 608-34.
41 Jean Pasqualini, *Prisoner of Mao*（《毛澤東的囚徒》）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pp. 216-19.
42 北京，1961年2月1日，1-14-790, p. 109。
43 Barna Talás, 'China in the Early 1950s'（《1950年代初期的中國》）in Näth, *Communist China in Retrospect*（《回顧共產中國》）pp. 58-9.
44 嚴師傅訪談，出生於1948年，四川簡陽，2007年4月。
45 朱二哥訪談，出生於1950年，四川簡陽，2007年4月。
46 河北，1960年4月30日及8月，855-18-777, pp. 167-8；855-18-778, pp. 124-5。
47 衛生部報告，湖北，1960年3月及12月，SZ115-2-355, pp. 12-15。
48 北京，1961年4月14日，2-13-135, pp. 5-6。
49 孟曉黎訪談，出生於1943年，湖北潛江縣，2006年8月。
50 趙曉白訪談，出生於1948年，河南魯山縣，2006年5月及12月。
51 朱二哥訪談，出生於1950年，四川簡陽，2007年4月。
52 北京，1961年7月3日，2-1-136, pp. 23-4。
53 四川，1960, 建川133-219, p. 154。
54 四川，1961年10月，建川1-2418, p. 168；1962, 建川44-1441, p. 27。
55 四川，1961年8月31日，建川1-2620, pp. 177-8。
56 何光華訪談，出生於1940年，河南平頂山，2006年10月。
57 關於饑餓的分析和精辟闡述，見 Sharman Apt Russell, *Hunger: An Unnatural History*（《饑餓：一段反自然的歷史》）New York: Basic Books, 2005.
58 Wu Ningkun and Li Yikai 巫甯坤，李怡楷，*A Single Tear: A Family's Persecution, Love, and Endurance in Communist China*（《一滴淚：共產中國裏一個家庭的迫害、愛情和堅忍》）New York: Back Bay Books, 1994, p. 130.
59 廣東，1961年3月23日，217-1-643, pp. 10-13。
60 上海，1961年1月-2月，B242-1-1285, pp. 1-3及17-27。
61 河北，1961, 878-1-7, pp. 12-14。
62 河北，1961年1月21日，855-19-855, p. 103。

33 集中營

1 「上海市東郊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983號」，私人收藏，Frank Dikötter。
2 40%被判一到五年刑，25%的人被監視；南京，1959年6月8日，5003-3-722, p. 83。
3 見 Frank Dikötter,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Post-Liberation China: The Prisoners of a Beijing Gaol in the 1950s'（《中國解放後的犯罪與處罰：1950年代某北京監獄的囚犯》）*China Quarterly*, no. 149 (March 1997), pp. 147-59.

4 第十次全國會議關於國家安全的文件，甘肅，1960 年 4 月 8 日，中發 (60) 318, 91-18-179, pp. 11-12。
5 河北，1962, 884-1-223, p. 149。
6 河北，1960 年 10 月 23 日，884-1-183, p. 4。
7 廣東，1961, 216-1-252, pp. 5-7 及 20。
8 甘肅，1961 年 2 月 3 日，91-18-200, pp. 291-2；小說家楊顯惠根據對倖存者的採訪，形象地描述了勞改營的情況。他估計 2,400 名囚犯中有 1,300 名死亡。甘肅檔案證實了他的描述；楊顯惠，《夾邊溝記事：楊顯惠中短篇小說精選》，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p. 356。
9 省公安局報告，甘肅，1960 年 6 月 26 日，91-9-63, pp. 1-4。
10 甘肅，1961 年 1 月 15 日，91-18-200, p. 62。
11 河北，1962, 884-1-223, p. 150。
12 第十次全國會議關於國家安全的文件，甘肅，1960 年 4 月 8 日，中發 (60) 318, 91-18-179, p. 26。
13 同上。
14 同上，pp. 11-12。
15 1958 年 8 月 21 日講話，湖南，141-1-1036, p. 29。
16 河北，1959 年 6 月 27 日，884-1-183, p. 128。
17 第十次全國會議關於國家安全的文件，甘肅，1960 年 4 月 8 日，中發 (60) 318, 91-18-179, p. 26。
18 河北，1961 年 4 月 16 日，884-1-202, pp. 35-47。
19 雲南，1959 年 5 月 22 日，2-1-3700, pp. 93-8。
20 廣東，1961 年 1 月 2 日，217-1-643, pp. 61-6。
21 開平，1960 年 9 月 22 日，3-A10-31, p. 10。
22 內部參考，1960 年 11 月 30 日，p. 16。
23 廣東，1961 年 8 月 15 日，219-2-318, p. 120。
24 北京，1961 年 1 月 11 日，1-14-790, p. 17。
25 這也是 Jean-Luc Domenach 的估計，他所描寫的中國集中營系統的歷史，是最詳細可信的；Jean-Luc Domenach, ***L'Archipel oublié*** (《被遺忘的島嶼》) Paris: Fayard, 1992, p. 242.

34 暴力

1 北京，1959 年 5 月 13 日，1-14-574, pp. 38-40。
2 李婆婆訪談，出生於 1938 年，四川閬中縣，2007 年 4 月。
3 內部參考，1960 年 6 月 27 日，pp. 11-12。
4 廣東，1961 年 1 月 25 日，217-1-645, p. 13。
5 廣東，1960 年 12 月 30 日，217-1-576, p. 78。
6 廣東，1961 年 2 月 5 日，217-1-645, pp. 35-49。
7 湖南，1961 年 4 月 3 日，151-1-24, p. 6。
8 湖南，1960, 146-1-520, pp. 97-106。
9 湖南，1961 年 4 月 8 日，146-1-583, p. 96。
10 廣東，1960, 217-1-645, pp. 25-8。
11 河北，1961 年 1 月 4 日，880-1-11, p. 30。
12 湖南，1960, 146-1-520, pp. 97-106。
13 廣東，1961 年 4 月 16 日，217-1-643, pp. 123-31；1961 年 1 月 25 日，217-1-646, pp. 15-17。

14 信陽地委組織處理辦公室，《關於地委常委書記王達夫同志所犯錯誤及事實材料》，1962 年 1 月 5 日，pp. 1-2。
15 廣東，1961 年 4 月 16 日，217-1-643, pp. 123-31。
16 這發生在容縣；四川，1962, 建川 1-3047, pp. 37-8。
17 廣東，1961 年 4 月 16 日，217-1-643, pp. 123-31; 1961 年 1 月 25 日 , 217-1-646, pp. 15-17。
18 廣東，1961 年 3 月 23 日，217-1-643, pp. 10-13。
19 湖南，1960 年 11 月 15 日，141-1-1672, pp. 32-3。
20 內部參考，1960 年 10 月 21 日，p. 12；四川，1959 年 5 月 25 日，建川 1-1721, p. 3。
21 廣東，1961 年 3 月 23 日，217-1-643, pp. 10-13。
22 廣東，1960, 217-1-645, pp. 60-4。
23 河北，1961 年 6 月 27 日，880-1-7, p. 55。
24 四川，1961 年 1 月 27 日，建川 1-2606, p. 65; 1960, 建川 1-2116, p. 105。
25 廣東，1960 年 12 月 12 日，217-1-643, pp. 33-43。
26 廣東，1961 年 3 月 23 日，217-1-642, p. 33。
27 廣東，1961, 217-1-644, pp. 32-8。
28 廣東，1961 年 1 月 29 日，217-1-618, pp. 42-6；亦見河北，1961 年 6 月 27 日，880-1-7, p. 55。
29 湖南，1961 年 4 月 3 日及 14 日，151-1-24, pp. 1-13 及 59-68；亦見 1961 年 2 月 3 日，146-1-582, p. 22。
30 內部參考，1960 年 10 月 21 日，p. 12。
31 廣東，1960, 217-1-645, pp. 60-4。
32 內部參考，1960 年 11 月 30 日，p. 17。
33 湖南，1961 年 2 月 3 日，146-1-582, p. 22。
34 湖南，1961 年 8 月 10 日，146-1-579, pp. 32-3。
35 四川，1960, 建川 1-2112, p. 4。
36 廣東，1961 年 4 月 16 日，217-1-643, pp. 123-31；1961 年 1 月 25 日，217-1-646, pp. 15-17。
37 廣東，1961, 217-1-644, pp. 32-8；1961, 217-1-618, pp. 18-41, 尤其是 pp. 21 及 35。
38 湖南，1961, 151-1-20, pp. 34-5。
39 梁先生訪談，出生於 1949 年，廣東鐘山縣，2006 年 7 月 13 日。
40 廣東，1960, 217-1-645, pp. 60-4。
41 湖南，1961 年 4 月 8 日，146-1-583, p. 96；亦見 1960 年 5 月 12 日，146-1-520, pp. 69-75。
42 湖南，1959 年 9 月，141-1-1117, pp. 1-4。
43 麻城，1959 年 1 月 20 日，1-1-378, p. 24；廣東，1960, 217-1-645, pp. 60-4；內部參考，1960 年 11 月 30 日，p. 17。
44 北京，1961 年 1 月 7 日，1-14-790, p. 10。
45 湖南，1961, 151-1-20, pp. 34-5。
46 廣東，1961, 217-1-644, pp. 32-8。
47 徐啟文報告，湖南，1961 年 3 月 12 日，141-1-1899, pp. 216-22。
48 雲南，1960 年 12 月 9 日，2-1-4157, p. 171。
49 省委工作組的報告，四川，1961, 建川 1-2616, pp. 110-11。
50 湖南，1960 年 11 月 15 日，141-2-125, p. 1。
51 湖南，1961 年 4 月 8 日，146-1-583, p. 95。
52 徐啟文報告，湖南，1961 年 3 月 12 日，141-1-1899, p. 222。

53 信陽地委組織處理辦公室，《關於地委常委書記王達夫同志所犯錯誤及事實材料》，1962 年 1 月 5 日，pp. 1-2。
54 四川，1961 年 1 月 5 日，, 建川 1-2604, p. 35。
55 1958 年 8 月 21 及 24 日講話，湖南，141-1-1036, pp. 24-5 及 31。
56 李井泉講話，1962 年 4 月 5 日，四川，建川 1-2809, p. 11。
57 湖南，1961 年 2 月 4 日，151-1-20, p. 14。
58 湖南，1961, 151-1-20, pp. 34-5。
59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報告，湖南，1960 年 11 月 15 日，141-2-125, p. 3。
60 四川，1960 年 11 月 29 日，建川 1-2109, p. 118。
61 湖南，1961 年 2 月 4 日，151-1-20, p. 14。
62 同上，pp. 12-13。
63 雲南，1960 年 12 月 9 日，2-1-4157, p. 170。
64 廣東，1961, 217-1-644, pp. 32-8。
65 四川，1960 年 5 月 2 日，建川 1-2109, pp. 10 及 51。
66 四川，1961, 建川 1-2610, p. 4。
67 魏叔訪談，出生於 1920 年代，四川閬中縣，2006 年 4 月。
68 四川，1960, 建川 133-219, pp. 49 及 131。
69 Adam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薪酬制度的破壞：納粹經濟的產生和消亡》）New York: Allen Lane, 2006, pp. 530-1.
70 廣東，1960 年 5 月 8 日，217-1-575, pp. 26-8。
71 四川，1959 年 5 月 3 日，建川 1-1686, p. 43。
72 雲南，1959 年 5 月 22 日，2-1-3700, pp. 93-4。
73 廣東，1961 年 2 月 5 日，1961, 217-1-119, p. 44。
74 廣東，1961 年 1 月 2 日，217-1-643, pp. 61-6。
75 開平，1959 年 6 月 6 日，3-A9-80, p. 6。
76 南京，1959 年 9 月 15 日，5003-3-721, p. 70。
77 南京，1959 年 5 月 8 日，5003-3-721, p. 12。

35 恐怖地

1 湖南，1961 年 8 月 6 日，146-1-579, pp. 5-6。
2 材料引自楊，《墓碑》，pp. 901-3。
3 甘肅，1965 年 7 月 5 日，91-5-501, pp. 4-5。
4 同上，p. 24。
5 同上，pp. 5-7。
6 同上，p. 7。
7 甘肅，1961 年 1 月 12 日，1961, 91-4-735, p. 79。
8 甘肅，1960 年 2 月 10 日，91-4-648，所有文檔；1960 年 3 月 24 日，91-4-647，所有文檔。
9 甘肅，1960 年 4 月 21 日，91-18-164, pp. 153-60。
10 四川，1961, 建川 1-2608, pp. 1-3 and 21-2; 1961, 建川 1-2605, pp. 147-55。
11 四川，1961, 建川 1-2605, p. 171。
12 四川，1961, 建川 1-2606, pp. 2-3。
13 楊萬軒報告，四川，1961 年 1 月 22 及 27 日，建川 1-2606, pp. 48-9 及 63-4；亦見 1961 年 1 月 25 及 27 日，建川 1-2608, pp. 83-8 及 89-90。
14 四川，1958 年 12 月 8 日，建川 1-1804, pp. 35-7。

15 四川，1961 年 4 月 4 日，建川 12-1247, pp. 7-14。
16 管理委員會報告，赤水，1961, 2-A6-2, pp. 25-6。
17 赤水，1958 年 9 月 30 日，1-A9-4, pp. 30-1；1961 年 1 月 14 日，1-A12-1, pp. 83-7；1960 年 12 月，pp. 67-71；亦見 1960 年 4 月 25 日，1-A11-39, pp. 11-15。
18 赤水，1960 年 5 月 9 日，1-A11-9, pp. 5-9。
19 貴州，1960, 90-1-2234, p. 24。
20 貴州，, 90-1-2708, 列印頁 1-6。
21 赤水，1960 年 5 月 9 日，1-A11-9, pp. 5-9。
22 聶榮臻自成都寫給毛澤東的信，甘肅，1960 年 3 月 16 日，91-9-134, p. 2。
23 山東，1962, A1-2-1130, pp. 39-44。
24 山東，1962, A1-2-1127, pp. 7-11。
25 譚啟龍向舒同和毛澤東的報告，山東，1959 年 4 月 11 日，A1-1-465, p. 25。
26 舒同自述，山東，1960 年 12 月 10 日，A1-1-634, p. 23。
27 同上，p. 9。
28 楊宣武寫給省委的關於舒同的信，山東，1961 年 4 月 9 日，A1-2-980, p. 15；亦見 1961, A1-2-1025, pp. 9-10。
29 這是阜陽一組黨內歷史學家的估計：阜陽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征途——阜陽社會主義時期黨史專題彙編》，阜陽：安徽經視文化傳播有限責任公司，2007，p. 155。
30 阜陽，1961 年 8 月 17 日，J3-2-280, p. 114。
31 阜陽，1961 年 3 月 12 日，J3-1-228, p. 20；1961 年 8 月 18 日，J3-2-280, p. 126。
32 阜陽，1961 年 1 月 10 日，J3-2-278, p. 85。
33 同上，p. 86。
34 阜陽，1961 年 8 月 12 日，J3-1-228, p. 96b。
35 阜陽，1961 年 8 月 17 日，J3-2-280, p. 115。
36 阜陽，1961 年 1 月 10 日，J3-2-278, p. 86。
37 阜陽，1961 年 1 月 30 日，J3-2-278, pp. 2-9。
38 界首領導郝如意自述，阜陽，1961 年 1 月 10 日，J3-2-280, p. 48。
39 同上。
40 臨泉幹部趙松自述，1961 年 2 月 15 日，阜陽，J3-2-280, p. 91。
41 阜陽，1961 年 1 月 6 日，J3-1-227, pp. 54-5。
42 阜陽，1961 年 6 月 12 日，J3-2-279, p. 15。
43 阜陽，1961 年 3 月 20 日，J3-2-278, pp. 67 及 69。
44 同上。
45 阜陽，1961 年 2 月 29 日，J3-2-278, p. 64。
46 劉道誠書記給地委的報告，阜陽，1961 年 1 月 6 日，J3-1-227, pp. 54-5。

36 人吃人

1 雲南，1959 年 2 月 28 日，2-1-3700, p. 103。
2 廣東，1961, 217-1-646, pp. 25-30。
3 西禮縣是當時的禮縣和西和縣的合併；員警向公安部的報告，甘肅，1961 年 4 月 13 日，91-9-215, p. 94。
4 同上。
5 省委派去的工作組的報告，山東，1961, A1-2-1025, p. 7。
6 張忠良自述，甘肅，1960 年 12 月 3 日，91-18-140, p. 19。
7 舒同自述，山東，1960 年 12 月 10 日，A1-1-634, p. 10。

8 縣委會議紀要，赤水，1960 年 12 月 9 日，1-A11-34, pp. 83 及 96。
9 內部參考，1960 年 4 月 14 日，pp. 25-6。
10 甘肅，1961 年 1 月 -2 月，91-18-200, p. 271。
11 甘肅，1961 年 3 月 3 日，91-4-898, pp. 82-7。
12 四川，1961, 建川 1-2608, pp. 93 及 96-7。
13 在蘇聯幾乎發生了同樣的情況，見：Bertrand M. Patenaude, *The Big Show in Bololand: The American Relief Expedition to Soviet Russia in the Famine of 1921*（《蘇聯大秀場：蘇聯 1921 饑荒期間的美國救援》）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62.

37 最終計數

1 Basil Ashton, Kenneth Hill, Alan Piazza and Robin Zeitz, 'Famine in China, 1958-61'（《中國的饑荒：1958-61》）*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0, no. 4 (Dec. 1984), pp. 613-45.
2 Judith Banister, 'An Analysis of Recent Data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關於中國人口最新資料的分析》）vol. 10, no. 2 (June 1984), pp. 241-71.
3 Peng Xizhe,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s Provinces', 彭希哲，《大躍進期間中國各省人口統計結果》*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3, no. 4 (Dec. 1987), pp. 639-70; Chang and Holliday, *Mao*, p. 438.
4 楊，《墓碑》，p. 904。
5 曹，《大饑荒》，p. 281。
6 Becker, *Hungry Ghosts*（《饑餓的幽靈》）pp. 271-2.
本書英文版引用未經證實的《饑餓的幽靈》情節：據黨內高官陳一諮說，1979 年之後，新領導想更多瞭解毛澤東時代，趙紫陽曾派出二百人小組到各省巡視，檢查黨的內部文件。這位 1959 年曾經在廣東發起反瞞產私分的省委書記現在已經是總理，他要求檢查組調查當年中國農村情況。工作小組的報告始終沒有公開，但陳一諮在 1989 年天安門屠殺時逃亡美國。流亡期間他說，曾查到饑荒期間死亡人數為 4300 萬到 4600 百萬。
7 湖北，1962, SZ34-5-143，所有文檔。
8 湖北，1962 年 3 月，SZ34-5-16, p. 43。
9 甘肅，1962 年 3 月 16 日，91-9-274, p. 1；之後有一份備忘，送達日期是 1962 年 5 月 24 日，p. 5.
10 阜陽，1961, J3-1-235, p. 34。
11 四川，1961 年 11 月 -12 月，建川 1-2756, p. 54。
12 四川，1961 年 10 月，建川 1-2418, p. 106。
13 四川，1959 年 11 月 2 日，建川 1-1808, p. 166。
14 河北，1961 年 1 月 10 日，856-1-221, pp. 31-2；1960 年 12 月 17 日，858-18-777, pp. 96-7。
15 河北，1960 年 12 月 29 日，855-18-777, pp. 126-7。
16 四川，1962 年 5 月 -6 月，建川 67-4；亦見：建川 67-1003, p. 3。
17 四川，1963 年 2 月 23 日，建川 67-112, pp. 9-12。
18 雲南，1959 年 5 月 16 日，81-4-25, p. 17；1957 年平均死亡率見《中國統計年鑒，198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p. 83；曹，《大饑荒》，p. 191。
19 劉少奇講話，1961 年 5 月，湖南，141-1-1901, p. 120。

20 河北，1961 年 1 月 21 日，855-19-855, pp. 100-4；關於胡開明，見餘，《大躍進苦日子》，pp. 451-75。
21 曹，《大饑荒》，p. 234。
22 河北，1961 年 1 月 19 日，878-1-7, pp. 1-4；曹，《大饑荒》，p. 246。
23 河北，1961 年 1 月 19 日，878-1-7, pp. 1-4；曹，《大饑荒》，pp. 240 及 246。
24 甘肅，1961 年 1 月 -2 月，91-18-200, p. 57；曹，《大饑荒》，pp. 271 及 465。
25 甘肅，1961 年 1 月 -2 月，91-18-200，p. 94；曹，《大饑荒》，p. 273。
26 甘肅，1961 年 1 月 -2 月，91-18-200，p. 107；曹，《大饑荒》，p. 275。
27 甘肅，1961 年 1 月 -2 月，91-18-200，p. 45；曹，《大饑荒》，p. 275。
28 貴州，1962, 90-1-2706, 列印頁 19。
29 赤水，1961 年 1 月 14 日，1-A12-1, pp. 83-7；1960 年 12 月，1-A11-30, pp. 67-71；曹，《大饑荒》，p. 158。
30 赤水，1960 年 5 月 9 日，1-A11-9, pp. 5-9；曹，《大饑荒》，p. 164。
31 關於沿河縣的報告，貴州，1961, 90-1-2270，列印頁 1；曹提到銅仁地區共有 24,000 例非正常死亡；曹，《大饑荒》，p. 166。
32 山東，1962, A1-2-1127, p. 46；曹，《大饑荒》，p. 219。
33 山東，1962, A1-2-1130, p. 42。
34 山東，1961 年 6 月 7 日，A1-2-1209, p. 110；曹，《大饑荒》，p. 231。
35 廣東，1961, 217-1-644, p. 72；曹，《大饑荒》，p. 129。
36 廣東，1961 年 1 月 20 日，217-1-644, p. 61；曹，《大饑荒》，pp. 126-8。
37 湖南，1964 年 6 月及 8 月 28 日，141-1-2494, pp. 74 及 81-2。
38 公安部關於人口統計資料的報告，1963 年 11 月 16 日，赤水，1-A14-15, pp. 2-3。
39 中央人口普查報告，1964 年 5 月 26 日，赤水，1-A15-15, pp. 6-7。
40 Becker, *Hungry Ghosts*（《饑餓的幽靈》）p. 272。
41 余，《大躍進苦日子》，p. 8。

結語

1 劉的講話，1962 年 1 月 27 日，甘肅，91-18-493, pp. 58-60 及 62。
2 李志綏，（《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 386。
3 林彪講話，甘肅，1962 年 1 月 29 日，91-18-493, pp. 163-4。
4 周恩來講話，甘肅，1962 年 2 月 7 日，91-18-493, p. 87。
5 劉源，《毛澤東為什麼要打倒劉少奇》，摘自高，《周恩來》，pp. 97-8。劉妻的說法略有不同，見黃，《王光美訪談錄》，p. 288。

［圖 1］毛澤東和斯大林一樣，對自己在歷史上的作用深信不疑。（1952，黃河邊。）

［圖 2］赫魯曉夫竭盡所能滿足北京，他以爲會得到不薄的回報。毛澤東看不起他，認定他是個粗野的、不成熟的暴發戶（1959，Brian Brake 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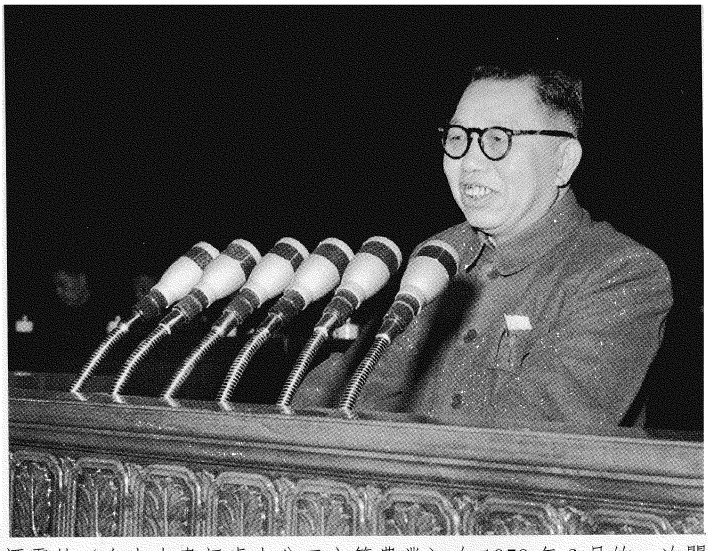
73 廣東，1961 年 2 月 5 日，1961, 217-1-119, p. 44。
74 廣東，1961 年 1 月 2 日，217-1-643, pp. 61-6。
75 開平，1959 年 6 月 6 日，3-A9-80, p. 6。
76 南京，1959 年 9 月 15 日，5003-3-721, p. 70。
77 南京，1959 年 5 月 8 日，5003-3-721, p. 12。

35 恐怖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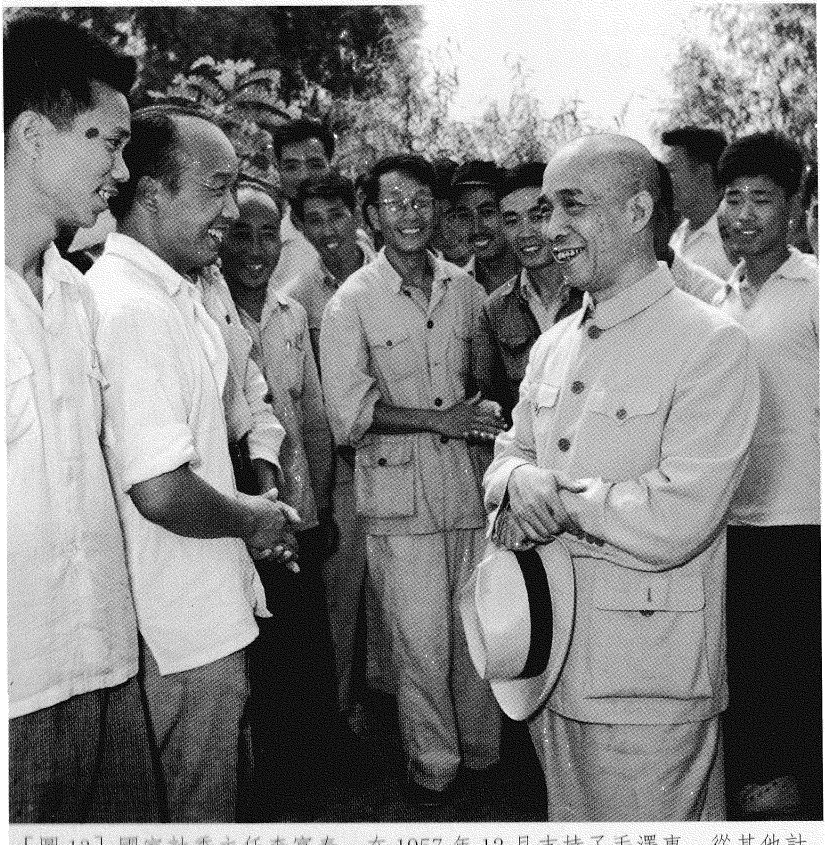
1 湖南，1961 年 8 月 6 日，146-1-579, pp. 5-6。
2 材料引自楊，《墓碑》，pp. 901-3。
3 甘肅，1965 年 7 月 5 日，91-5-501, pp. 4-5。
4 同上，p. 24。
5 同上，pp. 5-7。
6 同上，p. 7。
7 甘肅，1961 年 1 月 12 日，1961, 91-4-735, p. 79。
8 甘肅，1960 年 2 月 10 日，91-4-648，所有文檔；1960 年 3 月 24 日，91-4-647，所有文檔。
9 甘肅，1960 年 4 月 21 日，91-18-164, pp. 153-60。
10 四川，1961, 建川 1-2608, pp. 1-3 and 21-2; 1961, 建川 1-2605, pp. 147-55。
11 四川，1961, 建川 1-2605, p. 171。
12 四川，1961, 建川 1-2606, pp. 2-3。
13 楊萬軒報告，四川，1961 年 1 月 22 及 27 日，建川 1-2606, pp. 48-9 及 63-4；亦見 1961 年 1 月 25 及 27 日，建川 1-2608, pp. 83-8 及 89-90。
14 四川，1958 年 12 月 8 日，建川 1-1804, pp. 35-7。

[圖 5] 大煉鋼鐵運動在 1958 年夏末達到了高潮。為了保持勢頭，毛澤東在 9 月訪問了武漢，參觀武鋼第一爐鐵水出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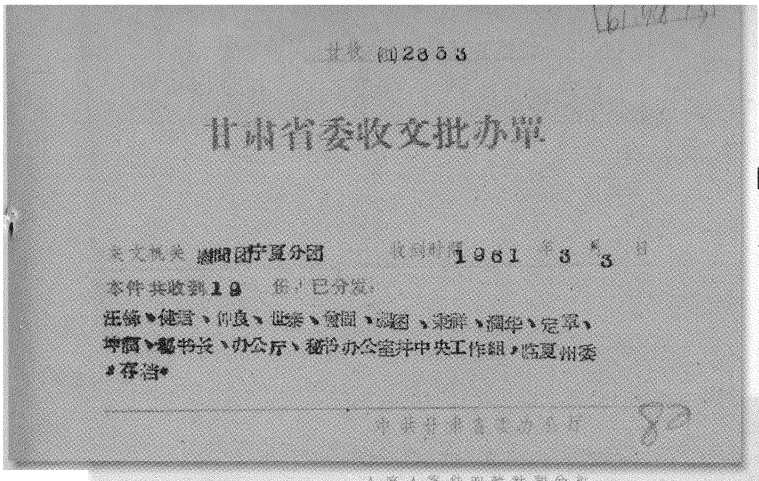
[圖 6] 1958 年，全國上下都得了指標發燒癥，競相追逐農業和工業產值的離奇數字以引起注意。在黨的會議上發出各種豪言壯語，然後由強大的機器宣傳鼓吹，包括宣傳那些領導大家取得最新光榮紀錄的領導人。指標高不可攀，實現了新的高度則被稱為「放衛星」。



[圖 12] 譚震林（在中央書記處中分工主管農業）在 1959 年 6 月的一次關於採購的電話會議上作了說明。他解釋說，在農民開始吃新糧之前就必須把國家需要的糧食徵購到手：速度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國家和農民在爭奪糧食。「但是『先下手為強』這句話只能傳達到縣、區委書記，再往下，很容易引起誤解。」圖為譚在 1958 年 10 月。



[圖 13] 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在 1957 年 12 月支持了毛澤東，從其他計劃工作者中脫穎而出。圖為李在 1958 年秋。



甘收 字2853

甘肃省委收文批办单

来文机关 全国团结互助分团　　收到时间 1961 年 3 月 3 日

本件共收到 1 份　份 已分发：

伍修、健吾、仲良、世泰、鲁固、晓阳、荣祥、润华、定军、坤阳、秘书长、办公厅、秘书办公室并中央工作组、临夏州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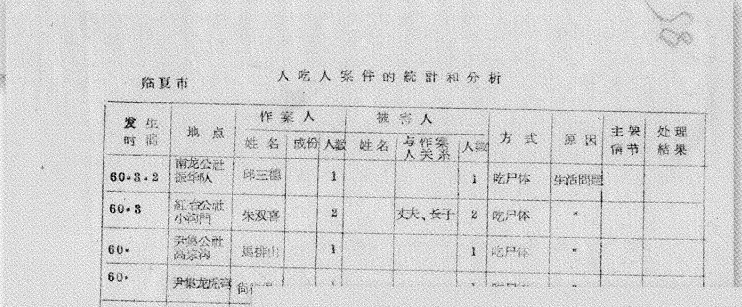
存档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

[圖 14] 所有能填進肚子的，包括樹皮和泥巴，都被搶來吃了。在這樣的境況下，死人只能草草掩埋，或者乾脆扔在路邊。有些人於是吃人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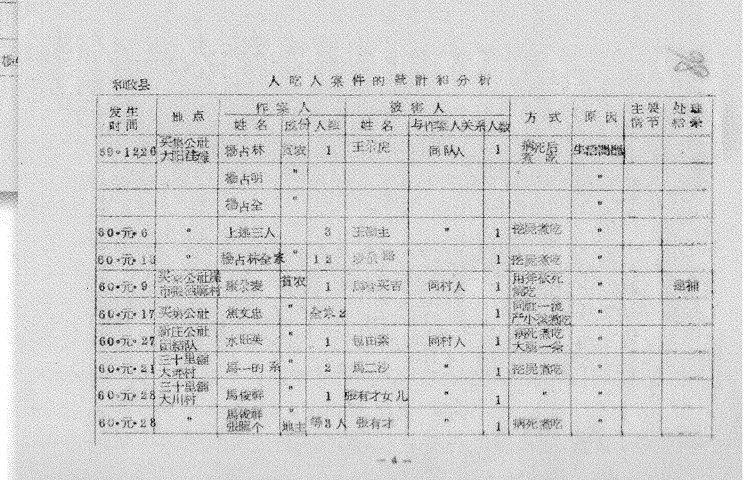
臨夏市　　人吃人案件的統計和分析

发生时间	地点	作案人 姓名	成份	人数	被害人 姓名	与作案人关系	人数	方式	原因	主要情节	处理结果
60·元·24 二起	马集公社 铁只村	铁二个					2	活吃尸体	生活困难		
60·2·28	红台公社 麻舍家过	杨忠华	贫	1	德三顺	亲舅舅	1	杀死吃肉	"		
60·2· 三起	韩集公社梁 寺沟背后庄	尹五成	贫				4	活吃尸体	"		
60·2·	韩集寺沟 崖家湾	包年乃				亲生女孩	1	"	"		
60·3·18	红台公社 窑家大队	赵香香					1	杀吃小孩	"		逮捕
60·3·	大河家 官红坪	海任令成				同村人	1	活吃尸体	"		
60·3·	大河刘集 大队大庄人	张					1	"	"		
60·3·	大河石砭 生产队	石万山					1	"	"		
60·3·	大河大庄 生产队	海长贵成				自己父亲	1	"	"		
60·3·	大河刘集 大庄队	王福红成					1	"	"		
60·3·	大河什信坪	韩海娃寺					1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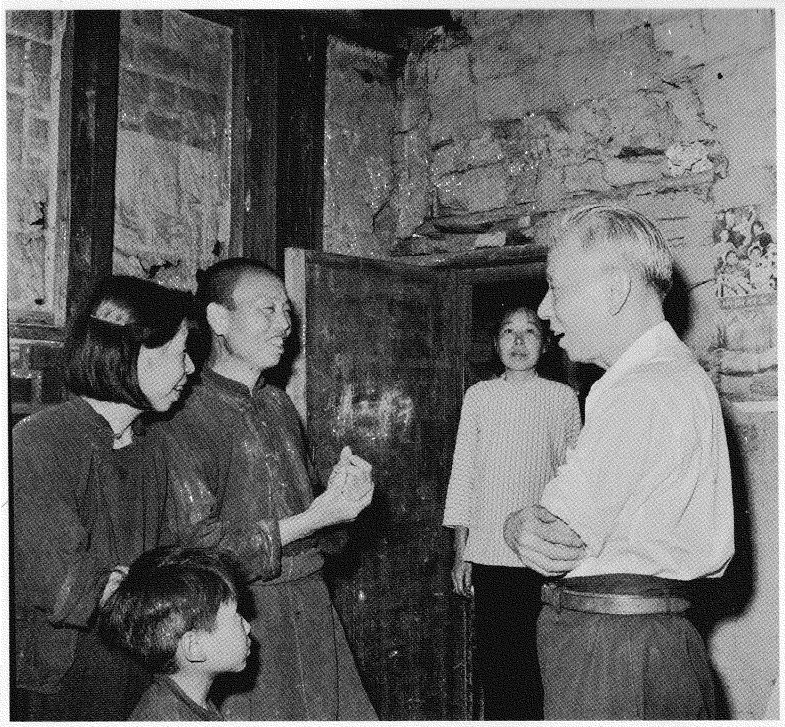
臨夏市　　人吃人案件的統計和分析

发生时间	地点	作案人 姓名	成份	人数	被害人 姓名	与作案人关系	人数	方式	原因	主要情节	处理结果
60·3·2	南龙公社	邱三德		1			1	吃尸体	生活困难		
60·3	红台公社 小刘门	朱双喜		2		丈夫、女子	2	吃尸体	"		
60·	关滩公社 高家沟	马排山		1			1	吃尸体	"		
60·	尹集龙湾	尚[illegible]									
60·	四河公社										
60·2·17	红台南庄 大队	张[illegible]									



和政县　　人吃人案件的統計和分析

发生时间	地点	作案人 姓名	成份	人数	被害人 姓名	与作案人关系	人数	方式	原因	主要情节	处理结果
59·12·26	买集公社 大川社	德占林	贫农	1	王张氏	同队人	1	杀死后煮吃	生活困难		
		德占明	"						"		
		德占全	"						"		
60·元·6	"	上述三人		3	王福生	"	1	挖尸煮吃	"		
60·元·13	"	德占林全家	"	12	德占福		1	挖尸煮吃	"		
60·元·9	买集公社	张宗发	贫农	1	马尚买吉	同村人	1	用绳扼死煮吃	"		逮捕
60·元·17	买集公社	张文忠	"	全家2			1	同社一逃 亡人活煮吃	"		
60·元·27	新庄公社	水旺英	"	1	包旺荣	同村人	1	杀死煮吃 大腿一条	"		
60·元·21	三十里铺 大平村	马一时 系	"	2	马二沙	"	1	挖尸煮吃	"		
60·元·28	三十里铺 大川村	马俊鲜	"	1	张有才女儿	"	1	"	"		
60·元·28	"	马俊鲜 张掘个	地主	等3人	张有才	"	1	病死煮吃	"		



[圖 15] 1961 年 5 月 31 日，劉少奇直言不諱地把饑荒的責任歸咎於黨。「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是由於天災，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圖為劉少奇 1961 年 4 月在湖南。

[圖 16] 我們永遠不可得知到底是什麼時候毛澤東決定搞掉劉少奇的，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革所有大躍進期間反對過他的人的命。最有可能的就是，他意識到他所有聲譽包括他在歷史上的地位都岌岌可危，於是立刻開始計劃消滅這個日漸威脅他的政敵。1962 年 1 月，左起：周恩來、陳云、劉少奇、毛澤東及鄧小平。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by Frank Dikötter

Winner of the 2011 Samuel Johnson Prize for Non-Fiction

開創性的一流的研究成果，馮客的[illegible]將使毛澤東發動並主導的一場史上最嚴重的人禍載入史冊。

——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
《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11年1月20日

有些書迫使人們直面歷史而注定要產生深遠影響。《毛澤東的大饑荒》就是這樣一本書。

——杰弗里·白勃(Jeffry Babb),《國家觀察》(*National Observer*), 2011年1月31日

這是一份傲視群倫的研究成果。香港大學教授馮客根據[illegible]新公開的中[illegible]檔案，詳細披露[illegible]一人之誤導致[illegible]千五百萬人死亡的的悲劇，全文振[illegible]發聵。

——《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 2010年12月2日

《毛澤東的大饑荒》一[illegible]，依據中共的檔案文[illegible]推算出至少有[illegible]千五百萬人在這個瘋狂的運動中喪生，可算是開山之作。

——傅建中,《中國時報》(*The China Times*), 2010年10月8日

這是一部[illegible]中[illegible]大躍進之後人類苦難的驚人寫照。歷史學家馮客不僅披露了鮮爲人知的真實歷史紀錄，而且更爲重要的是，他以精湛的文筆將這些事實構建成一個難以磨滅的故事。

——杰弗里·凱恩(Geoffrey Cain)
《基督教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010年11月2日

新世紀出版社
New Century Press

ISBN 978-988-19430-0-
9 789881 943002

HK $ 128